司法心理学系列

Detecting Lies and Deceit

说谎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Lying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英】Aldert Vrij 著

郑红丽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万千图书

说谎心理学

由英国朴次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德顿·维吉（Aldert Vrij）所著的《说谎心理学》一书，综合了西方最近二三十年来所有的关于谎言以及谎言识别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理论上的阐述，又有对操作性很强的测谎方法和技术的介绍，是一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好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学术性较强的关于测谎技术的国外著作被引入，所以我认为本书的翻译对我国测谎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十分有益的。

—— 罗大华

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ISBN 7-5019-4664-7

9 787501 946648 >

ISBN 7-5019-4664-7/B·037

定价：18.00元

司法心理学系列

Detecting Lies and Deceit

The Psychology of Lying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说谎心理学

【英】Aldert Vrij 著

郑红丽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谎心理学／（英）维吉（Vrij, A.）著；郑红丽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1
（司法心理学系列）
ISBN 7-5019-4664-7

Ⅰ.说… Ⅱ.①维…②郑… Ⅲ.谎言－测试－司法心理学 Ⅳ.D9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137 号

版权声明

总 策 划：石 铁
策划编辑：李 峰
责任编辑：张乃柬 孙 琦 责任终审：杜文勇
版式设计：史春雨 责任监印：刘智颖

出版发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东长安街 6 号，邮编：100740）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张：10.25
字 数：180 千字
书 号：ISBN 7-5019-4664-7/B・037 定价：18.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4-5519
咨询电话：010-65595090，65262933
发行电话：010-65141375，85119845
网 址：http://www.chlip.com.cn
E-mail：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邮购）联系调换

推 荐 序

随着司法心理学在国内的发展，我很高兴地看到，心理学已经开始真正地应用于司法实践中，这其中包括测谎技术、犯罪描写技术和罪犯心理矫治技术等。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测谎技术的研究，1992年开始将测谎技术应用于实案之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实践当中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使得我们的学者、相关的实践工作者以及大众对测谎技术的使用产生了不小的疑问。这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我们在测谎技术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它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自己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还需要借鉴别人的优秀成果。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学术性较强的关于测谎技术的国外著作被引入，所以我认为本书的翻译对我国测谎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十分有益的。

由英国朴次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德顿·维吉(Aldert Vrij)所著的《说谎心理学》一书，综合了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最近二三十年来所有的关于谎言以及谎言识别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理论上的阐述，又有对操作性很强的测谎方法和技术的介绍，是一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好书。

本书共8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对说谎以及谎言识别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了简述。比如，什么是说谎，人为什么要说谎，谎言的不同类型以及说谎的个体差异。第一部分介绍如何通过观察非言语的行为来测谎，非专业人士和专业人士如何看待说谎的非

言语线索，这些线索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到底如何。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如何通过言语特征来测谎，介绍了以前的相关研究，并重点介绍了两门新兴的、有效的测谎技术——陈述有效性评价技术和真实监控技术。最后一部分介绍了颇受争议的多道测谎仪，如多道测谎仪的工作程序，相关/不相关技术，以及多道测谎仪的准确性问题。

本书的特点是注重实证研究。作者在全书的每一部分，都十分注重运用实证研究资料，共引用了437项相关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包括了写作本书期间正待发表的一些研究，可见其内容非常新颖。而且，这些研究不仅仅包括了实验室研究，还包括了现场研究，这对犯罪问题研究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国内近20年来尽管在测谎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对这项技术的科学研究还不是很多，即使有也是经验总结性的研究，很少见到严谨的实证研究（无论是实验室研究还是现场研究）。此书的翻译可为我们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上打开思路，有助于规范和提高我们的研究与应用水平。本书对司法实践人员以及那些关注测谎技术的人们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2004年11月

译 者 序

如果一个人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他确信没有一个凡人能保守住秘密。如果他的双唇紧闭，他会用指尖交谈。背叛无孔不入。

——弗洛伊德

说谎以及测谎（或者说识别谎言）历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同时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对于谎言与测谎，人们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情感。首先，正如本书所提到的，说谎是一桩日常生活事件。一般来说，人们一天两次或在与他人交往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几乎都在说谎。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谎言都是不好的，有时候因为社交的需要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需要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但在多数情况下，谎言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事实而不是谎言。情侣们想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否对自己忠诚，父母想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否真的没抽过烟，警察想知道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所说的话是否属实，法官想知道他所面对的诉讼双方谁在说真话……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梦想着有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识别谎言的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测谎方法、技术以及仪器，人们总是抱着一种非常怀疑或抵制的态度。这样强烈的又爱又恨的情感在其他的领域或者研究中很少见到。

诚然，这样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来自测谎所面对的对象或者说被试。我们知道，人的个体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我们在做任何有关人的结论的时候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正如本书所要表达的一个重

要观点那样，并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典型的说谎的言语、非言语或者生理模式。对于多数人而言，说谎时可能会出现相似的言语、非言语或者生理模式，但对于少数人而言，模式可能恰恰相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不少人（包括一些法学或者心理学的学者）对测谎方法、技术以及仪器有着非常消极的态度。“它是伪科学”“它一点科学性都没有”“它完全不可靠”“我强烈反对使用它”是我们常常在学术会议上、文献上或者媒体上听到的意见。看完这本书，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态度未免有些偏激和狭隘。因为正如书中所言，我们识别谎言的方法是那么多种多样，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用到一些朴素的测谎方式，我们会试图根据对方说话时的言语或非言语线索来识别谎言与真实。那么，当我们借助仪器进行谎言的识别时，为什么会有人如此强烈地反对呢？我想，也许这更多地涉及伦理问题而不是测谎方法本身的准确性问题。这本书为我们，无论是测谎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或者关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路。

这本翻译稿对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在2004的春夏，我第一次品尝到一个曾经让我无比信任的人说谎所带来的痛苦，这样的打击对于缺乏生活阅历的我而言猝不及防。是我的父母，我的师长，我的朋友，还有这本书帮我度过了这段有生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所以我要感谢他们，感谢在我的生命中有他们的存在。虽然我研究谎言，探索测谎的方法，也亲身体验过谎言所带来的恶果，但是，我在现在、今后都会坚信人性的美好，坚信有一天那些恶意的谎言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而我们也不再需要形形色色的测谎方法和仪器。

郭红丽

2004年11月

原丛书序

威利关于犯罪、警务和法律心理学的这套系列丛书是对当代研究中的重要的新兴领域的简洁而综合的回顾。这套丛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以清晰易读的形式展现研究的结果，也对实务和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这套丛书不仅对心理学家有用，也对所有关注犯罪识别和预防、警务工作和司法程序的人士有用。

在本书中，阿德顿·维吉对有关欺骗识别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其中包括他目前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欺骗的非言语指示器。关于人们在说谎或者说实话时的真实行为的研究已经表明，并不存在着两分法。说谎与说实话在行为上的差异在个体之间是变化的。对同一个人而言，它也是随着环境和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毫无疑问，观察者并不善于从他们对行为的观察中识别欺骗。但是，很多人（包括相关专业认识，例如警察）都认为他们很擅长通过行为线索识别欺骗。本书回顾了关于人们对欺骗的行为线索的信念的研究，包括作者本人的研究，研究表明，虽然人们似乎有很强的信念，并且相互认同这些信念，但是这些信念其实是错误的。很多他们认为有用的线索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有用。

说谎者说了些什么是本书第二部分的重点。起源于德国最新研究的陈述有效性评价似乎——当由接受过适当训练的人使用时——提供了一种有前途的帮助确定某人是否在描述一个真正经历过的事件的方法。它最初是一种用于那些可能受到性虐待的儿

童的程序，它在成人中的可能的有用性现在正在研究中。当然，如果研究发现一些用于检查陈述的标准是实话的可靠的指示器，知道了这样的研究发现的说谎者可能会努力在他们的虚假叙述中加入某些信息。对于最新的研究“真实监控标准”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关于说实话者或说谎者的生理活动。当一些人说谎时（例如缺乏技巧和没有经验的说谎者），这些生理反应（例如手掌出汗和心率）会增加。但是，建立在检查这些生理活动基础上方法——常被称为多道测谎——必须指出，人们的生理活动会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而发生变化。例如，一名无辜的已婚人士，当被警察问及他或她的秘密情人被谋杀的问题时，可能会非常紧张。阿德顿·维吉很清楚地解释到，这一方法最关键的是向那些接受“测试”的人所提的问题的性质。即使使用了适当的问题，说谎者也可能使用反测试来试图欺骗测谎人员。

本书提供了一个文笔优美、内容全面的研究综述。它也在引进更多的相关理论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这正是许多研究文献所缺乏的。

在本书的最后，阿德顿·维吉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他告诉我们他很愿意得到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时，我们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在我们写这个序的这两天里，最权威的国家电台（BBC4 台）进行了一次讨论，是关于说谎者能否通过观察他们的行为而被识别的。似乎是在伦敦有一个针对人事培训的课程，并且这个课程告诉那些从事人事工作的人，他们能通过观察面试中的人的行为来识别说谎者。那些读过相关研究综述的人能站在一个绝佳的角

度来确定是谁真正地欺骗着这些从事人事工作的人。

瑞·布尔(Ray Bull)

格雷厄姆·戴维斯(Graham Davies)

1999 年 6 月

作 者 序

1997年,乔纳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一位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客,被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和格伦纳达电视台(Granada Television)指控在他担任英国国防采购部部长(Defence Procurement Minister)时,曾在巴黎的濠璟酒店(Ritz Hotel,以豪华著称的瑞士酒店)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的花销都是由一个沙特阿拉伯的商人支付的。艾特肯否认了这一指控,并控告《卫报》和格伦纳达电视台诽谤。报纸和电视台的指控真的是错的吗?还是艾特肯说了谎?

一般来说,测谎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观察人们的非言语行为(他们所做的动作,他们是否出现笑容,视线转移,他们说话的音调,语速,是否出现口吃,等等)。第二个方法是分析说话的内容——也就是分析正在说什么。第三种方法是通过检查人的生理反应(血压、心率、手掌出汗等等)。

本书考察了测谎的所有三个方面。尤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第一,说谎者和说实话者之间在非言语行为、说话内容和生理反应方面是否存在着系统差异?第二,观察者通过观察别人的非言语行为、说话内容和生理反应能在多大程度上识别谎言。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非言语行为和欺骗。第2章中将论述说谎者表现出的典型的非言语行为。其中包括了关于一个嫌疑犯的讨论——这名嫌疑犯最后在实质性证据(substantial evidence)的基础上被判谋杀——讨论了他在否认自己实施谋杀罪行的警察询

问期间的行为表现。这章将表明,欺骗和非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不同人在说谎时表现的行为是不同的。而且,说谎者的行为依赖于谎言出现的环境。第3章讨论了没经过训练的非专业人士和专业谎言识别人士(例如警察和海关人员)在通过观察他人行为识别谎言方面的准确性如何。他们通过他人行为识别欺骗的能力一般都是很低的,而在非专业人士和专业谎言识别人士中都存在着对说谎者的一般行为的错误观念。

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说谎者的说话内容。早期的研究并不是很系统,但是展示了对欺骗的言语指示器的几个深入的调查。第4章讨论了早期研究。关于欺骗和言语行为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相对较新,大约开始于10年以前。德国法庭心理学家,乌都·安乔吉(Udo Undeutsch)描述了几个内容标准来评价声称的性虐待的受害人的陈述。主要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人们发展出了陈述有效性评价(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SVA)———种评价书面陈述真实性的方法。现在,陈述有效性评价(SVA)是最广泛使用的评价言语行为真实性的工具。SVA评价已经在美国的一些法庭以及向德国和荷兰这样的西欧国家的一些法庭上被作为证据使用。第5章将对陈述有效性评价进行描述。研究已经表明SVA评价是区分说实话者和说谎者的有效工具。但是,这一评价并不是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准确。通过分析说话内容而努力提高谎言识别的准确性的另一个方法在最近被引入,称为真实监控。第6章将讨论这一新方法。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欺骗的生理反应。有史以来,人们都假设说谎都伴随着说谎者体内的生理活动,并发展出一些方法来测量生理反应。现代识别说谎者的生理活动的方法包括使用多

道测谎仪,也就是熟知的测谎仪(虽然这个标签有误导性,这点将在第7章中讨论)。多道测谎仪的使用遍及好几个国家,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在美国的几个法庭案例中,多道测谎的结果曾被作为证据使用。而西欧国家对多道测谎测试的使用更多地抱怀疑态度。多道测谎的工作过程以及多道测谎测试识别谎言的准确性将在第7章中讨论。在这章,对科学文献的回顾显示,谎言可以被多道测谎测试识别,但是多道测谎并不像某些人声称的那么准确。

对言语行为和生理反应的分析有时被作为法庭证据使用;非言语行为的分析将永不可能出现在法庭案例中,因为对非言语行为的解释是复杂的,因此并不总是可靠的。尽管非言语行为检查缺乏权威性,但是对非言语行为与欺骗的关系的讨论始终贯穿全书。第一个原因是观察者有更多的机会考察非言语行为,而不是言语行为和生理反应。因为要分析言语行为和生理反应,需要潜在的说谎者说些什么。分析一个人的行为并不需要言语反应,因此,即使在某人决定保持沉默时非言语行为的分析也能进行。第二,与言语行为和生理反应分析不同的是,非言语行为分析可以马上进行,不需要任何设备。考察言语行为需要陈述的书面记录,而生理反应只能通过使用技术仪器才能得到。这意味着在需要立即观察的环境下,进行言语行为和生理反应的分析不太可能。很显然,父母不会为了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否抽烟而使用多道测谎测试进行询问。海关官员也不可能书面记录下他们与被检查者的对话,在分析这些记录的基础上决定他们是否搜查某人的行李。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观察者是依靠分析非言语行为来发现某人是否说谎。因此,获得非言语行为和欺骗之间关系的事实是特别有用的。

第 8 章，也就是本书的总结章，总结了说谎心理学和测谎。但愿这章能成为那些想提高他们测谎技巧的一种指导。但是，我们需要提醒的是，识别谎言是困难的。因此，阅读本书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你识别说谎者的技巧。当然，本书是为了提高你关于欺骗的知识而写的，这将使你在识别谎言方面受益。

本书在讨论欺骗的非言语，言语和生理反应以及识别谎言之前，首先将会给出一些常识性的信息。

阿德顿·维吉

(Aldert Vrij)

目　录

第 1 章
说谎的社会心理学和识别欺骗

欺骗他人是日常社交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人声称他很喜欢他收到的生日礼物，但事实上他并不喜欢这些礼物；主人受到别人对他的厨艺的恭维，而实际上他做得食物并不是真的好；一个正在看电视的学生告诉她的父亲她已经完成了家庭作业；一位与人通奸的男子否认与那名女性发生过关系；走私犯告诉海关她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报关的；一名杀人犯系统性否认他曾经犯下的罪行。以上这些只是无穷无尽的可能的谎言中的几个例子。研究已经指出，说谎是日常生活事件。每天我们不止一次地试图欺骗别人，我们也常常试图发现别人是否在欺骗自己。有时，欺骗会带来很重要的影响。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就充分了解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也许今天，世界会完成不一样。虽然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欺骗，但欺骗有时还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说谎者如何表现自己以及如何测谎方面还存在许多错误的认识。本书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研究欺骗。我将讨论说谎者如何表现自己以及测谎仪如何测谎。在讨论这些问题以前，将先介绍欺骗的一般常识。包括：人们一般不善于测谎的原因，欺骗的定义，人们说谎的频率，为什么说谎，谎言的不同类型，以及哪些人最经常说谎。这一章将挑战“说谎是不好的”这一刻板观点。本章将表明，说谎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现象，我们往往喜欢经常说谎的人的陪伴。

失败的测谎者

如果有人问你以下两个问题："你善于说谎吗？"和"你善于测谎吗？"你将如何回答？你可能会回答说你不是一个好的说谎者，但是当别人想骗你的时候，你一般都会意识到。本书要说的是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一般而言，人们更善于说谎，而不是善于测谎。人们不善于测谎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关于如何识别一名说谎者的知识。但是，这不是惟一的原因。谎言不会被识破常常是因为观察者本身不想识别出说谎者。第三个原因是，有一些人非常善于说谎，很难被发现。

关于动机，是指一些谎言之所以没有被揭穿是因为观察者不想测谎，他们最大的兴趣不在于了解事实。人们常常会喜欢别人恭维他们的身材，发型，他们的穿着方式，他们的成就等等。因此，为什么要去弄清楚说这些恭维话的人本来想说什么呢？经常的情况是，一个人不会总是试图发现他的配偶是否有通奸行为。一旦丈夫告诉不忠的妻子他已经发现她和她情人的事情，妻子会被迫在他与情人之间选择，可能会导致离婚，这可能是丈夫不想要的。简单来说，他发现的事情可能带来不想要的结果，一旦意识到这点，他可能会决定不去调查这件事情。

有时候，人们不愿意去测谎是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事实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做？例如，大多数客人不会去弄清楚主人是否真的喜欢他们的礼物，因为如果不喜欢，他们就陷入了不知如何去做的困境。因为同样的理由，更严重的谎言也没有被识破。虽然很多孩子的父母都禁止他们的孩子吸烟，但是孩子还是会吸。他们的

吸烟行为常常不被注意，因为他们的父母并不想弄清楚他们的孩子是否吸烟。一旦他们发现孩子吸烟，他们将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但是他们能做什么呢？很多父母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什么，因此他们选择保持无知。假设上面提到的那个例子中的丈夫的妻子选择不离开他，他应该怎么做？离开她也许是最合适的，但是可能有很多原因他不想离开。

克林顿总统的私人秘书——贝蒂·柯莉（Betty Currie）——竭力避免知道克林顿总统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关系的细节。一次偶然的机会，莱温斯基（向柯莉）说到她与克林顿："只要没人看见我们——确实没有人看见——那么什么都没有发生。"柯莉女士回答道："不想听到这个。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事实上，很难看出柯莉女士知道这件事后会有什么好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选择保持无知。

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曾为克林顿总统的政治顾问，记者称之为伪君子，并认为他应该知道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关系。斯特凡诺普洛斯说他不很看重这件事，因为他不想知道真相。

在与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曝光以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和他的助手们说，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没有性关系。白宫幕僚长鲍勒士（Erskine Bowles），更愿意相信他。这是他向大陪审团描述当时的情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我为他工作的这个人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他和她没有性关系。如果我不相信他，我就得走。所以我相信他。"

埃克曼（Ekman）（1992，1993）指出，当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在1938 年 9 月 15 日为了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希特勒会谈时，

他并不想知道真相。希特勒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他的军队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他能阻止捷克动员军队,那么他的军队在几周后就能发动闪电战。因此,希特勒在与张伯伦的会谈中,掩盖了他的企图,向张伯伦保证他不会袭击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条件捷克不能进行军队动员。张伯伦没有发现希特勒的谎言,于是说服捷克,只要和希特勒的协定还在就不要进行军队动员。与希特勒会面后,张伯伦在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尽管我在他脸上看到了强硬和无情,但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是一个会履行自己诺言的人。"(Ekman,1992,pp. 15 - 16)。在国会上,张伯伦说他确信希特勒没有欺骗他。因此,看起来张伯伦是真的信任希特勒。根据埃克曼的说法,张伯伦之所以信任希特勒是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如果他承认希特勒藏有战争计划,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调和策略(reconciliation policy)的失败,承认这个政策将欧洲和英国带入了真正的危机。

有时候情况不同。潜在的购买者想知道二手车是否真的像销售人员说的那样好;雇主想知道应聘者是否真的如应聘者声称的那样有能力;海关官员想知道旅行者是否真的没有什么东西要报关;警探想知道嫌疑犯在声称自己无辜时是否说了实话。但人们试图测谎时,他们往往失败了。研究表明,即使是专业的谎言识别者,例如海关官员和警察,当他们识别谎言的时候也常常犯错,他们的测谎能力并不强于非专业人士。但是,警察的一些文献显示他们对警察的测谎能力有很强的自信,有时他们还详细地描述说谎者将如何表现自己。这些文献常常显出谎言研究的不足。

可以用以下三个例子来说明。关于用多道记录仪(polygraph)作测谎仪的争论越来越热,本书的后面章节将会详细解释。从业

者对多道记录仪的准确性的信念很强。例如，查尔斯·汉斯(Charles Honts)，美国心理学教授，多道记录仪领域的重要的从业者，最近说："我测试过很多精神病患者和杀人犯，当他们说谎时，他们都不能通过测试。"(Honts，引自《圆滑》，1998，p. 30)但是，在对多道记录仪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就会对多道记录仪的准确性的信任产生疑问。

应鲍(Inbau)、瑞德(Reid)和伯克利(Buckley)写过一本关于侦查技巧和技术的有影响的小册子。他们声称对嫌疑人在说谎时常表现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应鲍和他的同事的观点，说谎的行为线索包括姿势变化、视线的转移、下意识动作(敲打后脑勺、摸鼻子、拉拉头发、拔衣服上的线头等等)，说话时把手放在嘴上或眼睛上，藏手(把它们坐在身下)或者藏脚(把它们放在椅子下)。尤其是说谎者会把手放在嘴上和眼睛上的观念经常会出现在警察文献中(Brougham，1992；Kuhlman，1980；Walkley，1985；Walters，1996；Waltman，1983)。但是，这一说谎的行为线索，以及应鲍所提到的其他行为线索，在现有的关于非言语行为与说谎之间关系的文献中没有被证实。

另一方面，前任荷兰警务处处长布劳(Blaauw)认为说谎的有效的非言语线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应该忽视行为线索。这个观念在 1971 年可能是合宜的——在这年布劳发表了这篇文章——但是，在今天，经过过去的 25 年的研究，对非言语行为与说谎的关系的讨论更多了。

但是，当观察者试图识别谎言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是把做出错误判断的责任推给观察者。有时候谎言不能被识别是因为谎言本身没有可识别性——也就是，说谎者没有给出任何线索。对于那

些说谎没有认知困难和说谎时不带任何感情的说谎者就更是如此。他们是非常出色的说谎者，他们的谎言——如果可能——很难识别，这本书将会对此进行讨论。

说谎的定义

说谎可能有很多种定义。米歇尔（Mitchell）（1986）的定义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把说谎定义为“倾向有利于沟通者的错误沟通”。米歇尔的定义意味着不仅人类，还有动物，甚至植物都可以说谎。一些心理学家，例如庞德（Bond）和罗宾逊（Robinson）（1988），也同意这一观点。他们描述了镜兰（ophrys speculum）如何利用交配的假象来欺骗雄黄蜂。这种兰花分泌出一种香气，类似昆虫的信息素，去吸引雄黄蜂。雄黄蜂聚集在花心，因为它的颜色类似雌黄峰的。在花心，雄黄蜂发现了细长的类似雌黄峰腹部的毛的东西。雄黄蜂相信它已经找到了配偶，于是产生拟交配。当雄黄蜂飞到另一朵兰花上后，兰花就经过这个过程完成了异花授粉。

米歇尔的定义引起很大的争论，但并不是因为非人类能说谎的假设，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们能。狄瓦儿（DeWaal）举出了一些狡猾的动物欺骗的例子，其中包括黑猩猩吓唬同类的例子。雄性黑猩猩使用相互吓唬来识别两者中哪一个是最强壮的。有时，在这个过程中黑猩猩不自觉地露出了牙齿，这是恐惧的表现。很显然，如果这一表现被觉察，那么黑猩猩的吓唬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黑猩猩倾向于在露出牙齿之前转身，并在露完牙齿以后重新开始吓唬别人。在一个例子中，狄瓦儿甚至观察到黑猩猩很快地用手

指把它的唇推回去掩住它的牙齿。米歇尔的定义之所以引起争论是因为这一定义也暗示,那些无意识地、错误地误导他人的沟通也应该归为欺骗。一个售货员,因为没有得到老板关于产品价格下调的通知,结果多收了钱,按照米歇尔的定义,这个售货员就是说谎者。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并且认为欺骗是一种故意地不说事实的行为。因为在克诺斯(Krauss)(1981)以后,许多研究人员把欺骗定义为"一种企图在另一个人身上建立欺骗者认为是错误的信任或理解的行为。"

说谎是一种有意的行为。因为失误而没有说实话不是说谎。一名妇女错误地认为她童年是滥交的,因此她去警察局自首,提供了虚假的报告,但是她没有说谎。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相信自己是拿破仑,他声称自己没有说谎。很明显,他没有说实话,但是他相信自己的说法,因此他没有欺骗别人的意图。

根据这个定义,讽刺的评论也不是说谎。实际上,有些人有意地发表讽刺评论并不说实话,但是这种形式的说谎并不是要在另一个人身上建立错误的信念。相反,说谎者想让谎言被揭穿,并努力通过表情或变换语调让其更清楚。(Zuckerman, DeFrank, Hall, Larrance &Rosenthal, 1979)。

说谎不一定非要使用言语。运动员在表现不好以后假装腿部受伤是一种没有使用语言的说谎。隐瞒信息也可能是说谎,但是必须是有意隐瞒。有时候,人们因为失误而忘记给出信息不能算说谎。纳税人隐瞒某种特殊的收入来源也是说谎,而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仅仅是忘记给出信息的人则不是说谎。一个男人告诉他的妻子有谁出席了晚宴,偶尔忘记提起他的秘书也参加了晚宴不是说谎。但是,如果他有意不提及她就是说谎。

在我看来,克诺斯的定义并不是很令人满意。它忽视了埃克曼所提到的说谎的另一个方面(1992)。埃克曼认为人们只有在事先没有告诉别人他们想说谎的时候才是说谎。因此,当人们坐在观众席上期待被欺骗的时候,魔术师就没有说谎。由此,埃克曼把欺骗定义为"故意选择误导对象而不提供关于想做什么的任何提示。"

我认为,埃克曼的定义也是不全面的。说谎有时候并不能成功地误导对象,尽管它们有很强烈的企图。例如,对象知道说谎者想要他或她相信的信息是错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企图欺骗对象的尝试会失败,但是这样的不成功的尝试仍可被定义为说谎。因此,我将欺骗定义为"一种成功或不成功的有意尝试,没有预先警告,使另一个人产生一种沟通者自己知道是错误的信念。"

有时候人们也愚弄自己——学生考试失败,他们常常让自己相信自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重视而考试失败,而不是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自我欺骗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影响(Lewis,1993)。人们能忽视或否认一些身体的症状的严重性,例如乳房的肿块或是干体力活儿时胸腔的疼痛。这些症状可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自我欺骗能为保护自尊服务。当约会别人被拒绝后,人们能使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其实对和这一个人约会不感兴趣,而不是承认是这一个人对他们不感兴趣。根据我的定义,欺骗是一种至少包括两个人的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自我欺骗,因此,自我欺骗在本书的后面不再进一步讨论。

人们为什么说谎

对日常欺骗的数据分析最全面的是贝拉·狄保罗(Bella DePaulo)和她的同事(DePaulo &Bell,1996;DePaulo& Kashy,1998;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 Epstein,1996;Kashy & DePaulo,1996)。他们要求他们的被试(美国大学的学生和社区成员)写7天的日记,记录下他们所有的社会交往以及在交往中所有的谎言。社会交往被定义与另一个人交流在10分钟以及10分钟以上的时间。因此像早上问好这样简单的相见则被忽略。研究表明,说谎是一件日常生活事件。一般来说,人们一天两次或者说在与他人交往的四分之一的时候几乎都在说谎。一个星期中,他们对与他们交往的所有人中的34%说谎。对他们交往的有一些人,他们经常说谎。对感情上比较亲近的人,他们较少说谎。与他们的配偶,平均每10次交往说一次谎。被试在说谎时通常没有觉得不舒服,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说谎是成功的。只有18%的谎言被识破。但是,当他们对感情近的人说谎时,会感到相对的不舒服,而且他们的谎言更经常被感情近的人识破。虽然人们倾向于对亲近的人更少说谎,但是有两个例外。首先,相比而言,人们对不是配偶的情人更经常说谎(每三次交往中说一次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们不确定他们的"真实自我"是否够可爱,能吸引并留住这些伙伴,因此他们把自己弄成对方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实际上的自己(DePaulo & Kashy,1998)。其次,学生时常对他们的母亲说谎(在他们几乎一半的交谈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仍需要依赖他们的母亲(例如钱),有时必须用说谎来巩固他们的资源。举

例来说，一位学生谎报了她买打字机的价格以便她的父母会给她更多的钱（Kashy & DePaulo，1996）。另外的一种解释是，他们仍在意他们的母亲如何看待他们。例如，一位学生告诉他的母亲，他在学校不喝啤酒（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 Epstein，1996）。

人们说谎的频率依赖于当时的情景。罗宾逊（Robinson）、夏柏（Shepherd）和海伍德（Heywood）（1998）访谈了大学生，其中有83%的人说他们为了找到一个工作而说过谎。他们说，对最好的朋友说谎是错的但对未来的雇主则不是。他们说，如果为了保住工作而说谎没什么问题。而且他们认为，当申请工作时，雇主也知道应聘者会夸大其词。在若拉特（Rowatt）、古尼罕（Cunningham）和杜恩（Druen）的研究中（1998），90%被试承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将愿意说至少一个谎言。

人们说谎有几个理由。第一，他们说谎是为了给别人制造积极的印象或保护他们自己免于尴尬或被拒绝。在狄保罗的日记研究中，一个女孩告诉她的朋友，有一个特别的男孩仍然迷恋她，虽然现在实际情况不再是这样了。他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她觉得很没面子，而且也不敢对她的朋友说实话。当克林顿总统在电视上对美国人民第一次承认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有“不正当关系”时，他解释当时误导别人的第一个原因是“想保护自己免于因自己行为而产生的尴尬。”

第二，人说谎是为了要获得利益。举例来说，应聘者面谈的时候可能会夸大他们现在的收入，以确保他们下个工作的收入更高。

第三，人说谎是为了避免惩罚。例如，为了避免惩罚，孩子可能不告诉父母他们拿了一个面包。到现在为止提到的说谎都是自

我导向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好或者得到个人的利益。狄保罗的日记研究表明，人们说的大约一半的谎言都是自我导向的。

第四，人们说谎也会为了使他人显得更好或为了另一个人的利益。例如，一个学生告诉老师她的朋友生病了，虽然她知道她的朋友只是偷懒。一个女孩在狄保罗的日记研究中说，她告诉她的朋友她（朋友）会很快找另外一个男友。她说她这样说是为了让她的朋友在被她的前任男友甩了以后更快建立自信。这些谎言是他人导向的。人们说的大约 25% 的谎言属于这类（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 Epstein，1996）。相当多的他人导向的谎言是说给那些说谎者认为关系较近的人。贝尔（Bell）和狄保罗（DePaulo）（1996）进行的实验也发现了这点，在这个实验中，被试讨论了他们喜欢或讨厌的艺术家的作品。调查结果表明，相对那些他们讨厌的艺术家，被试对他们喜爱的艺术家的讨论更友好，也更有欺骗性，特别是对他们喜欢的艺术家做出了更多的恭维的评价。

第五，人们会说那些我称为“社会谎言”的谎言。他们说谎是为了社会关系。如果人们在所有的时候都告诉他人事实，交谈就可能变得愚蠢和粗鲁无礼，社会交往也容易变得混乱。为了维持和同事的适当关系，当他们邀请你吃午餐时，说你很忙碌会比较好，而不是说你不喜欢他们，因此不原意和他们一起外出吃午餐。同样，当一个丈夫知道妻子在打折时买的衣服是不能退回商场的时候，避免明确地批评这件衣服会比较好。当人们不时地称赞彼此的时候，社会关系就可能得到改善。当对他们最新的发型进行积极的评价时，大多数人都会很乐意接受。因此，做一些欺骗但恭维的评价可能有益于彼此的关系。社会谎言同时也服务于自我利

益和他人的利益。举例来说,当说谎者使其他人高兴时,或者通过说谎来避免尴尬的情景或讨论时,说谎者也会自我满足。狄保罗(DePaulo)日记研究表明,人们说的25%的谎言是同时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服务的。

调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谎的另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写下他们说的最后一个谎言。这一个方法最近被贝克比尔(Backbier)和塞斯窝德(Sieswerda)(1997)使用,结果与狄保罗及其同事的类似。被试(大学生)说的大部份谎言是自我导向的谎言(69%),而且大多数的谎言是对他们的母亲说的(29%)。在大部份的情况下(80%),他们的谎言未被识破。

如果问到人们说谎的频率,他们是否会意识到他们几乎每天都可能说谎?我自己的研究已经表明是这样的(Vrij,1997a,b)。要求被试在一个调查表中指出他们在一个星期说谎的比率,这些谎言中有多少是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的,他们说谎时是否感到不安,并指出通常有多少谎言被识破。大部分调查结果与狄保罗的类似。一般来说,被试认为他们平均1.5天说一次谎,当他们说谎的时候没有觉得不安,他们估计大约75%的谎言未被识破。与狄保罗的研究惟一不同的是关于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的谎言。我的研究的被试估计他们大多数的谎言是他人导向的,但是狄保罗发现大多数的谎言是自我导向的。有两种可能解释人们为什么容易低估他们的自我导向的谎言。可能是人们不想或不喜欢承认他们常常说自我导向的谎言。另一种解释是,可能是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说了许多自我导向的谎言。也许人们认为他们不应该讲自我导向的谎言,因此他们不愿想起和尝试忘记他们讲这样的谎言的事。

不同类型的谎言

除了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分类就是直接的谎言、夸大的谎言和技巧的谎言（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 Epstein，1996）。直接的谎言（也被称为歪曲事实；Ekman，1997）是完全错误的——谎言中所传递的信息与事实是完全相反的。一名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否认自己与案件有任何牵连就是直接的谎言。应聘工作的人在面谈的时候声称自己做现在的工作很愉快，只是想在同一个工作上工作多年后换一个，而实际情况是他们是被解雇的，那么他们的谎言就是直接的谎言。当克林顿总统在保拉·琼斯案中作证时说他不记得是否曾经在白宫单独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直接的谎言。狄保罗（DePaulo）的研究表明人们说的大部份谎言（65%）是直接的谎言（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 Epstein，1996）。在贝克比尔（Backbier）和塞斯窝德（Sieswerda）（1997）的研究中直接的谎言百分比与之相似（67%）。

夸大是指在谎言中事实被夸大描述或者传递的信息超出了事实。人们可能夸大和朋友约会迟到的歉意，可能在接受警察询问承认罪行时过分渲染他们的懊悔，或者可能在应聘面试时表现的比实际上的更适合这一工作。

技巧的谎言是指那些用来误导他人的字面上的事实。当克林顿总统对美国人民说他“与那名女性，莱温斯基小姐有性关系”时，就使用了这一谎言，这一谎言是很有技巧的，因为它说在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没有发生性关系，然而它意指的是他们没有真正的

行房。另一类型的技巧的谎言通过规避问题或省略细节来隐瞒信息。同性恋男子告诉同事他的性经验而没有提到是和男人的,这就是隐瞒信息,因为他知道他的同事正在假定他谈论和女人的性关系。某人不喜欢一位朋友的画可以藉由说喜欢在画中使用明亮的颜色来隐藏她的意见。

另一种对谎言的分类是根据谎言的复杂性及其结果(Ekman,1992;Ekman & Frank,1993;Vrij,1998b)。一些谎言比其他的谎言讲起来更困难。例如,当另一个人正好有某些证据表明这个人在说谎时,这时候说谎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个 12 岁的男孩,不顾父母的禁令抽烟。他的父母直接问他是否在抽烟,当他的父母在他的房间发现空烟盒与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抽烟的习惯相比,男孩更难说谎。如果另一个人持怀疑态度也很难说谎。如果丈夫持怀疑态度而不是不怀疑,红杏出墙的妻子很难隐藏她的秘密。最后,如果说谎者有充分的时间准备,那么将更容易说谎。一个女孩不想和某个男孩出去,如果她提前被邀请并准备好了托词,说谎就容易一些。如果她是意外被邀请的,不得不临时说谎推辞就比较困难。

另外,说谎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与女孩子在和朋友交谈中夸大自己拥有 CD 的数量相比,杀人犯在接受警察询问否认罪行的谎言的结果要严重得多。走私犯如果被海关发现走私海洛因与走私酒相比,其后果更严重。

在谎言的复杂性和后果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是十分有用的,因为正像在第 2 章要讲到的那样,说谎者在不同的情景下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说谎者在说复杂的谎言与说简单的谎言时表现的行为是不同的。在说高风险的谎言和低风险的谎言时,其

行为表现也是不同的。

说谎的个体差异

性别差异

狄保罗(DePaulo)和她的同事的日记研究表明在说谎上存在着性别差异(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 Epstein,1996)。虽然在说谎的频率方面没有发现性别差异,但是男人与女人倾向说不同类型的谎言则是比较显著的。男人多说自我导向谎言,而女人则更多地说他人导向的谎言,尤其是对其他女性说话时。在两名女性之间的交谈中,几乎一半的谎言是他人导向的。

狄保罗(DePaulo)和贝尔(Bell)(1996)的第二个研究也表明了性别差异。要求被试从 19 幅画中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两幅画和最不喜欢的两幅画。在他们作出选择之后,让他们写下他们对自己提名的四幅画中的每一幅都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告知被试,他们将会会见一位艺术系的学生,讨论他们关于那四幅画的意见。并且告诉被试这名艺术系的学生可能画了其中的一些画,而且如果确实有她的画,她会告诉被试。他们还被告知,这名艺术系的学生不知道他们最喜欢哪幅和最不喜欢哪幅画。而事实上,艺术系的学生是同盟者(实验者的一个助手),知道被试喜欢那幅画和讨厌那幅画。就四幅画中的每一幅画,艺术系学生都会详细地询问被试对它的感受,了解被试特别喜欢什么和讨厌什么。她以被试最喜欢的画开始进行讨论,对于被试最不喜欢的画,她告诉被试这是她本人画的。这就为每个被试制造了四种不同的情景。在

第一次讨论中，他们必须评价他们喜欢的但不是艺术系学生画的画。在第二次讨论中，他们讨论一幅他们不欣赏但不是艺术系学生画的画。在第三次讨论中，他们必须谈论一幅他们喜欢的画并是艺术系学生画的画。第四次讨论则是谈论一幅他们不喜欢的且是艺术系学生画的画。讨论的顺序进行了系统的变化。很明显，最尴尬的讨论是被试不得不讨论艺术系学生画的他们不喜欢的画。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一情景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对画表现了更积极的感情，尤其是通过夸大她们对她们不喜欢的画的某些方面的喜欢。性别差异也出现在被试和艺术系学生讨论他们喜欢并是她画的画时。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对艺术家夸大她们的喜欢。与狄保罗的日记研究相似，这一项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说他人导向的谎言。

莎妮（Saarni）（1984）已经指出，女性在还是儿童的时候已经倾向于说他人导向的谎言。7～11 岁的孩子收到了他们喜欢的礼物（例如甜食和钱），作为成人对他们帮助成人的奖赏。在这以后不久，他们又被叫去帮助，但是这次给他们的是那些没意思，更适合年纪更小的孩子的礼物。与男孩子相比，女孩了失望的程度要轻些，并且在接受沉闷的礼物时的反应更热情些。

研究已经表明，在女性和其他人的交往中，她们通常比男性更开放，更亲密，更有情感支持性。因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喜欢和女性交谈而不是和男性交谈（DePaulo, Epstein & Wyer, 1993；Reis，Senchak & Solomon，1985）。瑞斯（Reis），珊奇克（Senchak）和所罗门（Solomon）（1985）为这一种现象提供了几种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女性比男性更多地说他人导向的谎言，也就是说，女性更多地作恭维别人的评价，更经常避免说伤害别人的话。

最后，有证据表明女性和男性在对待说谎方面也是存在差异的。在说谎时，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感到不安（DePaulo, Epstein & Wyer, 1993；DePaulo, Kashy, Kirkendol, Wyer & Epstein, 1996；Wyer, 1997b）。狄保罗和可肯德（Kirkendol）（引自 DePaulo, Epstein 和 Wyer, 1993）让男性和女性说出曾经向别人说过的最严重的谎言和别人向自己说过的最严重的谎言。严重的谎言给女性留下的印象要比男性更深刻。当谈到在什么情景下，他们曾经向别人说过严重的谎言时，女性更比男性更多地描述了自己的内疚、忧虑和害怕。当想到他们被别人愚弄的时候，女性描述自己的痛苦比男性更多。与男性相比较，对女性而言，谎言对他们与说谎者的关系有更多的不良影响，女性会更可能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年龄差异

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说他人导向的谎言。路易斯（Lewis）（1993）举了一个 3 岁的小女孩的例子，当她收到她祖母给她的礼物时她表现得很热情，但是实际上她并不喜欢这个礼物。儿童被他们的父母鼓励着说各种类型的谎言。如果这个女孩当时没有积极地回应，她的母亲可能会鼓励她这么做。儿童也注意到其他人（例如，他们的父母）也说各种各样的谎言，于是他们开始模仿这一行为。

我们在儿童早期的时候也学会通过说谎来逃避惩罚（Lewis, 1993）。把不满 3 岁的孩子独自留在房间里，并要求他们不要回头看那些放在那里的玩具。然后偷偷地对孩子进行录像。5 分钟后，当实验者回来时，她问孩子“你偷看了吗？”虽然录像表明 90% 的孩子都偷看了，但是只有 38% 的孩子说了实话，承认他们已经

看了。对不同年龄的孩子做相似的实验,结果表明孩子年纪越大,越不可能承认他们做错的事情。举例来说,已经偷看过玩具的5岁的孩子没有一个承认的。

路易斯(1993)还描述了孩子为了避免惩罚学习说谎的过程。例如,告诉一个两岁的女孩不要吃饼干。稍后,当母亲问女孩是否已经吃了饼干时,她承认她已经吃了。于是她的母亲变得很生气并惩罚了她。只要经过几次这样类似的交往后,孩子就知道,如果她承认做错了任何事情,她都会受到惩罚。因此,她开始通过说谎来避免惩罚。但是,孩子迟早将会发现她的某些谎言会被她的父母识破。然后父母会告诉她说谎是不对的,如果她说谎,她将会受到惩罚。现在,孩子面临一个难题。如果她承认她做错了事情将会受到惩罚,如果她说谎也会被惩罚。她很快发现她的父母不会发现她的全部的不良行为。因此,对她来说,隐瞒做错的事情,只有在错误被发现的时候才承认是比较好的方法。

人格特点

研究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欺骗。我将区别四种不同类型的人,把他们分别称为操纵者、扮演者、好交际者和适应者。

操纵者

关于说谎者的刻板印象是自私、狡诈和喜欢控制。这是部分正确的(Hunter, Gerbing & Boster, 1982; Kashy & DePaulo, 1996; Vrij & Holland, 1999; Wilson, Near & Miller, 1998)。操纵者——那些在权谋和社会熟练度上得分很高的人——常常讲自我导向的谎言,当他们面临说真话的挑战时更倾向于坚持说谎,说谎时没有觉

得不安,认知上没有发现说谎复杂,看待他人比较挑剔,不在意传统道德,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欺骗并操纵他人他们会公开地说谎。权谋一词来源于意大利人,政治家和作家马基雅弗利(1469~1527)。在1513年他出版了《普林西比二世》(王子),在这本书里他呼吁建议一个由有力的统治者统治的联合的意大利,来保护国家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包括那些不道德的方法。在他1520年出版的书《战争之艺术》中,他概略地说明一些可能的有效方法。

在与人的交往中,操纵者是有计划的、聪明的。如果他们的受害人可能会报复他们就不去招惹那些人,如果他们可能会被识破他们就不会欺骗。在交谈中,他们倾向于支配,但是他们也显得放松、聪明和自信。他们通常比那些在权谋上得分低的人更受人喜欢,而且常常被别人当作好伙伴(Kashy & DePaulo,1996)。与这些调查结果相反,威尔逊、尼尔和米勒(Wilson,Near and Miller,1998)发现在权谋上得分高的人受到的负面评估更多。他们让那些在权谋上得分高或低的人写一篇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是讲他们发现自己与其他两位乘客在一起因为海难而到了一个荒岛上。然后把这些故事拿给读者评价。相对于低权谋的人而言,高权谋的人被认为更自私,更不关心别人,喜欢批判别人,傲慢,不值得信任,具有攻击性,不可靠和多疑。如果看了权谋高的人和权谋低的人所写的故事,这些调查结果也许并不令人惊讶。举例来说,一个权谋低的人写道:"其他两位乘客和我似乎相处得很好……如果我们立刻开始信赖,彼此将是十分有趣的"(p.210),而高权谋的人写道:"那两位乘客是冷酷的母狗,不断抱怨……如果我饿急了,我会想着如何用我有限的烹饪工具煮了他们"(p.210)。但是,这些例子

清楚地表明这样的事实,对高权谋的人的负面评价与他们经常说谎是无关的。

扮演者

有些人与其他人相比会更擅长管理他们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与之相关的有情绪控制、社会控制、表演和社会表达。情绪控制是指管理情感交流和非言语表达的能力(也就是隐藏真实感情的能力——举例来说,即使很不安的时候也保持平静的外表)。社会控制包括角色扮演能力、言语行为管理和自我表达的能力。扮演也是指某人的角色扮演能力,社会表达包括言语表达的技巧和言语流畅性。

好交际者

既然在社会交往中每天都有说谎发生,那么认为那些享受社交的人尤其擅长说谎则是有道理的。外向的和好交际的人对社会生活特别感兴趣。外向的人喜欢和别人相处,不害羞,对社会交往特别自信。社交性是指和他人亲近,喜欢与他人呆在一起而不愿独处的倾向。另一方面,一些人在社会背景下特别保守。可能是因为他们关注自己,关注他们独立面对自我的想法和反应(有很高的自我意识的人),或者因为他们有社交恐惧(也就是在别人面前会感到不安)或害羞(也就是和别人在一起时觉得尴尬和紧张)。社会卷入的程度不同对说谎技巧的影响很大。好交际的人比害怕交际的人更经常说谎(Kashy & DePaulo,1996),说谎时更不会感到不安(Vrij &Holland,1999),而且说谎持续的时间更长。关于说谎持续时间的发现来自于维吉(Vrij)和维英克(Winkel)的研究(1992 b)。一名警官通过谈话来确定谁拥有一套耳机。实际上,所有的被试在谈话前都发了一套耳机(但警官并不知道这一事

实),这些被试都被要求否认自己拿过耳机。警官关于这个问题询问了所有的被试。通过量表测量了被试的人格特点。几乎一半的(46%)有社交恐惧的人在谈话中承认那套耳机在他们的口袋里,而没有社交恐惧的人中只有 19% 的人承认他们有耳机。

适应者

在社交中感到焦虑和不安全的人没有必要避免说谎。有些人(那些有高度的公众自我意识或他人导向的人)有独特的对付不安全感的方式,即通过让他们自己适应他人。这些"适应者"有高度的动机想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凯西(Kashy)和狄保罗(DePaulo)(1996)发现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谎。关于适应者在说谎时相对放松的证据被维吉(Vrij)和荷兰德(Holland)发现了(1999)。在他们的实验中,学校的学生就他们正在学习的课程彻底地接受一名警探的询问。虽然没有一个被试学习过心理学,但是他们全都被要求假装他们正在学习这一课程。警探的问题类似"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已经学习了什么课程吗?""你能更详细地告诉我有关这些课程的事吗?""告诉我你课程作业的题目?""你的考试有哪些内容?""说出三个最有名的心理学家"以及"他们都做了些什么?"通过量表测量了被试的人格特点。调查结果显示,相比对照组而言,当他们面对挑战时,适应者更能坚持说谎,说谎时更少觉得不安,更少觉得说谎困难。

本章清楚地表明了说谎在日常交往中的复杂作用。认为说谎肯定是坏的传统的看法并不是正确的。如果人们彼此之间始终说实话,交谈可能会变成尴尬和不必要的粗鲁无礼,社交也容易变得混乱。我们对我们觉得亲近的人更容易说谎。在爱情的开始阶段我们说了很多谎言,而且我们对我们喜欢的人做出了很多不真实

的恭维。操纵者经常说谎,但是常被当作好伙伴。好交际者被人们认为社交熟练,但是他们经常说谎。社交退缩的人被认为在社交上是笨拙的,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诚实。我们也许注意到他们很少做那些其他人常做的恭维。

我们并不总是欣赏说谎。观众想知道政客在否认与一件贿赂丑闻有任何牵涉的时候,他是否说了实话;将军在签署停战协议前想知道他的对手是否可以信赖;老师想知道学生是否愚弄了自己;母亲想知道她的女儿是否真的已经完成了她的家庭作业;警探想知道嫌疑犯对自己不在场的辩解是否属实。如何识别谎言将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第一部分
非言语行为和欺骗

第 2 章
欺骗时的非言语行为

非言语行为在可信度评价中的重要性

假设你是面试一名女性求职者的考官组的一名成员。碰巧你和她的邻居认识。这名邻居已经告诉你，这名求职者之所以丢掉她现在的工作是因为她和她现在的雇主发生了极大的争执。在面谈的时候，这名求职者并不知道你认识她的邻居，也不知道你已经知道了有关她和她现在雇主的关系。如果你想知道她的回答是否诚实，你会对什么给予最大的关注呢？你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说话的内容上吗？或者她的行为举止？你或许会对她说话的内容给予更多的关注，将会检查她给出的信息是否和她的邻居的信息一致。你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在这种情形中，通过倾听说话的内容比观察他们的行为更容易看出他们是否说谎。现在，假设你不认识她的邻居，并且事先没有关于求职者的任何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识别谎言将会对她的非言语行为比对她的讲话内容给予更多的关注（Stiff, Miller, Sleight, Mongeau, Garlick & Rogan, 1989）。在这些没有信息用于查证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依赖非言语行为而不是说话内容来判断某人是否说谎。当警察开始他们的调查时，有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他们正在调查的案件的信息，因此根本不知道谁可能是罪犯。因此，他们可能决定询问案件发生

地区的很多人。在这样的的情景下,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非言语的风格可能将决定他们是否会被认为是重点嫌疑对象,以及是否会接受第二次询问(Greuel,1992;Kraut & Poe,1980;Rozelle & Baxter,1975;Vrij,Foppes,Volger & Winkel,1992;Walkley,1985;Waltman,1983)。当没有信息去证实的时候,观察者会对非言语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假设人们控制他们的非言语行为比控制他们的言语行为更困难(DePaulo,Rosenthal, Eisenstat, Rogers & Finkelstein,1978;Hale & Stiff,1990;Kalbfleisch,1992;Maxwell,Cook & Burr,1985;Stiff,Hale,Garlick & Rogan,1990;Vrij,Dragt & Koppelaar,1992)。他们假设,非言语行为线索可能会"泄漏"人们想要隐瞒的信息。这些假设是正确的。与言语交流相比,个体更不易控制他们非言语行为的某些方面(DePaulo & Kirkendol,1989;Ekman,1992;Ekman & Friesen,1969,1974)。弗洛伊德也这么认为,他写道(1959,p.94):"如果一个人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他确信没有一个凡人能保持住秘密。如果他的双唇紧闭,他会用指尖交谈。背叛无孔不入。"但是,在非言语行为的基础上识别谎言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容易,我们将会在第3章谈到。

假设一名海关官员在机场问一名海洛因走私者,他的手提箱里有什么东西。对于这位男子而言,可以很容易地在谈话中不提到海洛因,但是对他而言,保持正常的举止,以免在与海关人员的交谈中引起对方的怀疑则可能更困难一些。对学生而言,告诉监考人员掉在地上的课堂笔记不是她的也不会很困难,但是保持镇静对她就比较困难。

至少有四个原因说明为什么控制非言语行为比言语行为更困难(DePaulo & Kirkendol,1989;Vrij,1996)。

- 在情绪与非言语行为之间存在着某些自动连接(Ekman,1992),但情绪与说话的内容之间没有自动连接。但人们感到害怕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以一种几乎自动的方式突然向后躲,脸也变得扭曲。然而,当人害怕时不会自动地说某些话。假设一个女孩正在看电视而不是在做家庭作业,当她的父亲突然走进她的房间时,她会告诉她的父亲她已经做完作业了。说完这个她可能会感到恐惧,因为她意识到她的父亲可能会检查她是否真的做完。为了不暴露她的恐惧,她必须以某种方法控制非言语行为与恐惧之间的自动连接,而她无需烦恼自动的言语连接。
- 我们在使用文字方面比使用行为更熟练,并且熟能生巧。我们之所以在使用文字方面更熟练是因为在信息交流中,文字通常比行为更重要。当要求人们描述他们那天的活动,他们或许选择使用文字来描述做过的事情而不是使用手势。但是也有例外。例如,有时在描述物体的形状和大小(如灯的形状、CD 的大小)以及物体的位置(如球在那里)方面,用手比用文字更容易。
- 在信息交流中文字比行为更重要的事实使得人们更多地去注意他们说什么而不是他们的行为。一名教师或许知道他讲课的内容但很少了解自己上课时的举止行为。除非某人告诉他,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常常将目光放在教室后面的某一点上。接受警察询问的犯罪嫌疑人和接受面试的应聘者事后可能还记得起来他们曾经说过什么。但是,让他们完整地说出他们当时的举止行为——他们的手是怎样动的,是否移动过他们的脚,谈话时他们多久转一次脸,他们的声调是怎样的,他们的面部表情怎样——则很困难。

当有效地控制行为时,对行为的意识是十分必要。如果人

们不知道他们自然的行为是怎样的，他们就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要表现自然的行为，只能是他们知道他们自然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才行。就像人们拍照片。在拍照片前，有多少人被告知“不要显得这么蠢”？通常的情景是，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他们想看起来很自然，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样子是自然的。

- 人们不可能让行为保持沉默。比如一名嫌疑犯在接受警察询问的时候，出乎她的意料的是，警察对她的涉案情况知道得不少。这或许意味着她必须给出一个不同于她本来准备的说法。在言语上她还能有一点时间想想应付这样尴尬场景的恰当反应。而在非言语上，完全没有多余时间的可能性。在整个询问过程中，她都会表现出各种行为，即使当她保持沉默时，并且警察将会观察和解释这些行为。

既然控制非言语行为这么困难，那么它可能会是识别欺骗的一个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但是，有三点十分重要。(i)在说谎者和诚实者之间存在系统的非言语差异吗？(ii)观察者知道这些差异吗？(iii)当观察者注意某人的肢体语言的时候，他们能识别骗局吗？第一点是关于客观的或真实的谎言指示器，也就是已发现的与欺骗有关的非言语行为。后面的两点[也就是上面的(ii)和(iii)]是关于主观的谎言指示器，也就是观察者认为是与欺骗相关的非言语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否是欺骗的真正表征。客观的指示器将会在本章中讨论，而主观的指示器将会在第3章中讨论。术语“客观指示器”有点误导，因为它暗示欺骗和某个特定的行为模式有关。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不存在着类似皮诺奇的鼻子(Pinocchios nose)的东西。换句话说，典型的欺骗行为并不存在。

例如，一旦人们开始说谎，他们就挑眉毛，动手指，声音发颤，搓脚或者扭头，这并不是正确的。然而，一些行为与其他行为相比更可能在说谎的时候出现。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谈论需要观察哪些行为。

说谎者在说谎时可能经历的阶段

在说谎的时候，说谎者可能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情绪、内容复杂化和控制三个阶段（DePaulo，1988，1992；DePaulo，Stone & Lassiter，1985；Edinger & Patterson，1983；Ekman，1992；Köhnken，1989；Vrij，1991；Zuckerman，DePaulo & Rosenthal，1981）。每个阶段都可能影响说谎者的行为，并侧重于欺骗和欺骗行为的某个不同的方面。因此我把它们也称为方法。在我讨论三个方法之前，要重点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分类是人为的。谎言理应有所有的三个方面的特点，但不应该认为三个方法是完全独立的。

情绪方法

情绪方法认为欺骗能造成不同的情绪。与欺骗有关的三类最通常的情绪是负罪感、恐惧和兴奋（Ekman，1989，1992）。假设一名政客已经为一家公司游说而秘密地接受了来自公司的大量的钱。一名新闻记者觉出可疑，并向政客询问他与这家公司的关系。当政客否认其所做的丑行时，可能因为接受了非法的钱或者因为意识到欺骗记者是错误的而觉得有负罪感。他也可能感到恐惧，因为他可能担忧新闻记者会识破他在说谎，这也许会造成他的政治生涯的结束。另外的可能是，他因为有机会愚弄新闻记者而变

得非常兴奋。这些情绪的强度依赖于说谎者的个性和说谎时的情景(Ekman,1992;Ekman & Frank,1993)。一些人在说谎时可能比其他人少有负罪感。如前面所提到的,对操纵者而言,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说谎是自然的、可接受的方法,因此,他们在说谎时或许没有负罪感。某人体验的负罪感的强度也依赖于情景。如果说谎者的谎言有道德上的支持,他就不会有负罪感。举例来说,间谍为了保护他的国家的利益而说谎是完全可接受的,当他们的国家在二战中被占领的时候,一些人对德国军人说谎也很少有道德上的非议。

说谎者相信说谎是合法的也不会有负罪感。售货员为了卖出商品,会认为强调产品的优点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当他这么做时他不会有负罪感。如果说谎者认为他说谎的不良结果对受骗者而言不是很严重,他也会觉得没有什么负罪感。旅客退房时故意没有对旅馆提到她曾打过一个国际长途,如果这个长途的时间很长,那么她将会比打了短时间的长途有更多的负罪感。

说谎者感到恐惧的强度也依赖于几个方面。首先,它依赖于对谁说了谎。如果说谎者对一个擅长识别谎言的人说谎,那将比对一个傻瓜说谎更感到恐惧。其次,它依赖于说谎者自认为他或她说谎水平的高低。一些人是非常老到的说谎者,凭着经验他们知道自己愚弄他人是十分容易的,并且很少被识破。这将会增加他们的自信并减少他们说谎时的恐惧。最后,如果说谎者说谎所冒的风险很高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被识破的结果很严重,他将会感到更多的恐惧。当尼克松总统就水门事件对美国人民说谎时,其不良的结果肯定比小孩子否认拿过饼干严重。

如果知道受骗者很难识破谎言,则说谎者伴随说谎的兴

奋——也叫欺骗的快乐——将会增加。如果欺骗发生的时候有很多旁观者在场，兴奋感也会增加。想愚弄老师的女孩子，如果有其他的学生在教室，比只有她和老师在场会更感到兴奋。

负罪感、恐惧和兴奋可能会影响说谎者的行为。当说谎者在讲一个恶劣的谎言时，往往不敢正眼看被骗对象，因此负罪感可能会造成注视转移。恐惧和兴奋可能会带来有压力的表征，例如动作增加，口吃（例如“呣”，“嗯”）和口误（口吃，重复，漏词）增加或出现高音。情绪越强烈，这些行为就越有可能暴露谎言。

内容复杂化方法

除情绪之外，思考过程在说谎时也可能很重要，这是内容复杂化方法的重点。说谎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任务。一个说谎者必须想出一个可信的答案，不能自相矛盾，应该和观察者知道的或可能发现的事情相一致，避免说漏嘴。而且，他们必须记得他们说过的事情，以便当有人要求他们重述的时候能够说得和以前一样。因此，有时候犯罪嫌疑人陈述真实的案发现场比陈述虚构的案发现场更加容易。

证据已经表明人们在从事复杂的认知任务时更多地出现口吃和口误，语速更慢，停顿更多，在作出回答前要等很长时间（Goldman - Eisler，1968）。认知的复杂性也导致了手和手臂运动的减少以及注视转移的增加（Ekman，1997；Ekman & Friesen，1972）。手和手臂运动的减少是由于比较重的认知的负担造成了对肢体语言的疏忽，造成活动的全面减少。注视转移（通常对不动的点）的出现是因为总看着交谈对象会扰乱思考。内容复杂性对动作和注视转移的影响很容易观察到。问人们 3 天前吃的东西，然后观察他

们试图回忆吃过的东西时的行为。

很明显，说谎并不总是复杂的认知任务（McCornack，1997）。有时说谎比说实话容易。假设你的一个朋友送了一个你不喜欢的生日礼物。在这种情景下，假装喜欢可能比说你不喜欢要容易。如果你说实话，你还要解释你为什么不喜欢它，你可能会卷入和朋友的争论中，甚至会冒破坏彼此友谊的风险。

尝试控制方法

到现在为止，对说谎者如何行为的预测已经很明显了。说谎者可能会有情绪体验或者可能发现说谎很困难，而这将会造成情绪以及内容复杂化的行为表征。但是实际情景比这更复杂。说谎者可能害怕情绪或者内容复杂化的表征会暴露谎言，因此努力压制这些表征以避免被识破。这就是要在尝试行为控制方法中要强调的。说谎者可能担心给别人留下不诚实的印象，也可能特别急于给别人留下诚实的印象，也许甚至比他们说实话时还急切。试图走私东西的人可能比那些不走私东西的人更想给海关官员留下诚实的印象，因为对于走私者而言，识破后的风险比非走私者要高得多。如果海关官员让非走私者打开她的行李，对她没有什么害处。也许她会因为时间被耽误而苦恼，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不良后果。而对于走私者，如果一个海关官员检查他的行李，他将会惹上麻烦。

总之，说谎者比说实话者更努力地保持行为“自然”或者给别人留下诚实的印象。但是，这是不容易的。他们必须很好地抑制他们的紧张情绪，掩盖他们不得不努力思考的证据，知道如何才是自然的行为，并能够按他们想要的方式行为。尝试行为控制方法

假设许多说谎者在说谎时不能表现出他们说实话时的自然行为。

尝试控制方法认为无论说谎者怎么努力，一些行为还是会暴露谎言。最难控制的行为最有可能暴露谎言（Ekman & Friesen，1969，1974）。相对控制身体而言，控制面部会比较容易（这里指目光转移和笑容，不包括细微表情，细微表情更难控制，这在后面将会讲到）。面部在信息交流中十分重要。通过面部表情，人们能清楚地表达他们是否对某人的谈话感兴趣，是觉得快乐还是忧愁，是否理解别人所说的话，以及是否想说点什么（Ekman，1992）。面部的巨大的潜在的交流性意味着人们如果很好地练习使用它，就能控制它。另一方面，身体在交流中不是一个很显著的通道，并不太经常被别人注意和反馈。因此我们很少练习做这样的运动，因此也不太擅长控制它们。大概的情形是，当说谎者控制他们的行为时，他们可能表现的行为是他们已经设计好了的，演练过的，不太自然的行为。举例来说，说谎者可能相信动作会暴露他们的谎言，因此刻意地动作，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动作。这将会导致异常程度的动作的僵硬和抑制。因为人们在自然情况下的不必要动作很多（手，胳膊和手指的运动，腿和脚的运动等等）。和面部一样，声音也有很好的交流能力，是别人注意的明显的交流通道。举例来说，通过提高声音来强调我们正在说的事情，或者说明我们说的事情是很严肃的，并要求他人按照我们所说的做。因此，它也应该是一个可控制的通道。但是，事实上，声调对于发出者而言比面部表情更难控制（Ekman，1981）。因为在高压力下，声音特征是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Hocking & Leathers，1980）。

像大多数动作一样，声音的特性，例如口吃、口误、句词之间的停顿通常是无心制造的，在信息交流中不是很重要。因此，我们可

以假设人们并没有时常练习控制这些行为,不太擅长控制它们。说谎者很有可能会认为口吃、口误和说话停顿会使他们更像嫌疑犯。因此,他们会试着避免这样的不流畅。但是,这可能会造成听起来特别流畅,像演讲一样,而对大多数的人而言,讲话中有语病是正常的。

总之,尝试控制方法表明说谎者表现的行为,一方面是事先设计好的、僵硬的(类似人们在照相时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太流畅"。这尤其会在他们的行为和说话中出现。说谎者将倾向避免出现过多动作,说话尽量流畅,减少说话时的暂停、错误和中止。

人们努力制造令人可信的印象叫做印象管理。在大陪审团面前就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关系作证时,克林顿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印象管理的例子(Vrij,1998c)。贝蒂·柯莉(Betty Currie)(克林顿的个人秘书)去莫妮卡·莱温斯基家收回她从克林顿总统那里得到的礼物。问题是是否是克林顿总统教她这么做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克林顿总统指示这样做,则是最典型的"妨碍司法公正"的案件。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的调查组两次询问克林顿他是否给贝蒂·柯莉下过这样的指示。克林顿两次都否认了,但是每次他都有突出的行为。两次他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直直盯着录像机。尤其是第一次,他的行为十分突出。甚至在提问者还没有说完时,他就飞快地开口否认。在否认以后的沉默期间,他举止僵硬,呆呆地看着录像机。看起来他好像就这个方面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是,斯塔尔调查组没有问更多的问题。我不能说克林顿在这个谈话的时候说了谎。我不能那么说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否说谎。我要说的是在这个询问中的某个阶段,克林顿确实想给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的调查组和大陪审团留下一个诚实的印象。

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假设

这三种方法对欺骗行为的假设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举例来说,情绪方法假设动作(神经紧张的行为表征)会增加,而尝试控制方法和内容复杂化方法都假设欺骗时动作减少。但是,其推论是不一样的。尝试控制方法假设由于过度控制引起动作行为的减少,而内容复杂化方法则认为是因为疏忽肢体语言的使用而导致动作减少。情绪和内容复杂化方法认为口吃和口误的增加分别来自神经紧张和认知负担,而尝试控制方法认为说谎者将会尝试抑制这种说话混乱。

情绪和内容复杂化方法也假设因为神经紧张和认知负担而导致目光转移的增加。尝试控制方法认为说谎者将学会控制他们的注视行为,因此说谎者和说实话者之间在目光转移方面没有区别。

说谎者实际上将常常表现哪一种行为呢?下面我将给出答案。在描述说谎的这些客观的指示器之前,要提到两点。首先,这些方法只是表明情绪、内容复杂化和控制可能是欺骗的预示。没有一种方法声称这些表征的出现就一定意味着欺骗。下列的各个例子将会清楚地说明这点。一名男子被警官发现正试图用一个螺丝起子撬开一个自行车锁。这个行为至少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名男子可能丢失了他的车钥匙,也可能是他想偷自行车。警官问这名男子自行车是否是他的。男子开始挠头,并用一种尖锐而微弱的声音回答“是的”。他在说谎吗?这个很难回答。很显然,他出现了紧张的行为。但是,他为什么紧张则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因为他正试图偷车而紧张。但是,他说实话也可能会有紧张行为。

例如,因为警官的出现使得他紧张,或者因为他害怕警察不相信他丢失车钥匙的说法。

假如一个嫌疑犯一说到犯罪现场就不再慌张。她不慌张可能是因为她在说谎,她害怕被识破。但是,如果她是无罪的,她也可能会不再慌张,因为害怕警察会认为慌张是说谎的象征。

假如一名女子在飞机场过海关的时候,避免和海关官员的视线接触。有证据表明当人们不想被接近时会避免视线接触。当人们在街上不想和慈善募捐者搭话,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与募捐者有任何视线接触,因为一旦他们的目光和募捐者有了接触,他们将会冒着被募捐者接近的危险。因此当这名女子拼命想避免和海关官员视线接触时,很有可能是她不想接近海关官员。这可能会给官员留下嫌疑,但是并不一定意味着这名女子正试图走私。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她的丈夫正在机场等她,她正在赶路不想耽搁。

假如一名女孩子的父亲走进她的房间时,发现她正在看电视而不是在做作业,而女孩子一言不发,并且看起来很沮丧。对她的沉默和沮丧行为的一种解释是,她被她父亲当场抓住,现在正等待处罚。但是,如果她已经做完了她的家庭作业,这样的行为也可能发生。另一种对她的行为的解释是,她的父亲亲自来检查,显然是不信任她,她觉得很伤心。

总之,这些人所表现的行为使他们显得可疑(而且可能是欺骗的表征),但并不一定说明他们在说谎。我认为警察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点。在和几名警探讨论的时候,他们常常这样说:“我敢肯定他在说谎,因为我们讲到案件的时候,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以嫌疑人的行为为基础下这样的结论太不成熟了。当谈论案件的时候,嫌疑人不断地转头,通常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很难说嫌

疑人有没有说谎。因为即使是无辜的嫌疑人在谈到案件的时候也会有目光转移——例如因为他们很难接受被警察怀疑。因此为了发现这个人是否说谎，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例如问更多的问题，或者检查被访谈者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仅仅建立在别人行为基础上的关于说谎的结论常常是不可靠的。

其次，如果说谎者体验到情绪和内容复杂化，情绪表征、内容复杂化和尝试行为控制才可能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说谎者没有体验到任何的恐惧、负罪感或兴奋（或任何其他的情绪），那制造谎言就不难，欺骗的行为线索也就不太可能出现。在第 1 章中提到的狄保罗的日记研究中，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谎言都属于这类（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 Epstein，1996）。研究的被试指出他们的谎言通常是不严重的，他们很少花力气去计划它们，也不太担心可能被识破，他们很少感到不安，如果有第二次机会他们还是会说谎。他们还指出，他们大多数的谎言未被发现。这并不令人惊讶。当说这类谎言的时候，说谎者不太可能出现任何明显的欺骗行为表征。

因为同样的原因，当只注意某人的行为时，误报——说话者也不知道是不准确的——就可能不会被识别。一名女子错误地认为她在儿童时期曾被虐待，并去警察那儿报告自己声称的虐待，在她谈话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说谎行为表征，因为她不会经历下面的任何过程。例如，她没有理由感到有罪或害怕被别破，因为她认为她说的是事实，也不会体验任何的欺骗快乐。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当人们说谎时会有情绪体验，或者不得不思考他们的回答。在这种情景下，最可能会出现哪些行为呢？

说谎者的行为

在说谎的客观指示器研究中，通常要求被试对某些主题提供真实或虚假的报告。然后用一定的编码系统对他们的非言语行为进行分析，比较在说谎和说实话时，某些行为发生的频率。例如，贝拉·狄保罗(Bella DePaulo)，本领域一个卓著的、一流的研究者，要求被试以诚实的方式描述他们喜欢和讨厌的人，又以不诚实的方式描述相同的人——也就是，假装喜欢他们其实很讨厌的人和假装讨厌他们其实喜欢的人(DePaulo & Rosenthal，1979；DePaulo，Lassiter &Stone，1982)。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本领域另一位卓著、一流的研究者，给他的被试(学生护士)看一个有关多彩多姿的大海场景的令人愉快的影片，然后让他们向访谈者坦白地描述他们对影片的感觉，这些访谈者没有看过这个影片。然后他又给他们看了一个可怕的医学教育影片(其中有严重的烧伤和切割手术)，并要求他们向访谈者隐瞒自己的感觉，让访谈者觉得他们看的是另一部令人愉快的电影——例如漂亮的花儿(Ekman & Friesen，1974；Ekman，Friesen & Scherer，1976)。

因为被试只有在有情绪卷入或说谎需要思考的时候说谎的行为表征才可能出现，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中引入了一些风险或将内容复杂化。一般要求说谎者对某些主题自然地说谎，这比说实话要费力。为了提高实验的风险，如果被试说谎后能成功地逃脱则常常给予金钱的奖励。有时研究员也告诉被试，做一个良好的说谎者是未来生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指示器。顺便提一句，这是真的。例如，好的护士往往是好的说谎者。她们隐藏消极情绪的能

力(当她们和那些生命垂危的病人或者严重烧伤的病人等打交道时)在她们的工作中是非常有用的(Ekman,1992)。但是,无论研究者做什么,说谎者在实验室里面对的情景和在现实生活中说谎者必须面对的情景是不同的(例如,警察询问中的嫌疑犯,机场的走私犯或者面对多疑记者的腐败政客)。稍后我将再回到这个问题。

迄今为止,已经做了很多实验。对这些实验的回顾在表 2.1 中列出,而表框 2.1 则对所讨论的行为进行了概括和描述。

表框 2.1　非言语行为的概况和描述
声音特点
1. 口吃:使用诸如“ah”、“um”、“er”的词
2. 口误:字和/或句的重复,句子变化,句子不完整,说漏嘴等等
3. 音调:音调的变化,例如音调的升高或降低
4. 语速:在一定时间内所说的字数
5. 潜伏期:提问和回答之间沉默期
6. 停顿的频率:说话中沉默的频率
7. 停顿的时间:说话中沉默期的长度
面部特征
8. 注视:看着谈话对象的面部
9. 笑容:微笑和大笑
10. 眨眼:眨眼
动作
11. 自我控制:挠头、手腕等等
12. 说明:设计一些功能性的手脚运动来修改和/或补充言语内容
13. 手和手指运动:不移动胳膊的非功能性的手和手指运动
14. 腿脚运动:脚和腿的运动
15. 头部运动:点头和摇头
16. 躯体运动:躯体的运动(通常伴随头部运动)
17. 改变姿势:改变坐姿的运动(通常伴随躯体和腿/脚运动)

在有声的非言语行为和无声的非言语行为之间可以作一个区分。有声行为是与声音和说话有关的，而除此之外的都叫无声行为。表2.1中的第一个部分（声音特点）给出了两个明显的说谎客观指示器。首先，说谎者比说实话者容易音调较高。正如前面提到的，这可能是由于压力导致的（Ekman，Friesen & Scherer，1976）。但是，说谎者和说实话者之间，音调的差异通常是很小的（仅仅只有几赫兹），因此只有通过精密的仪器才能识别出来。

其次，与说实话者相比，说谎者说话停顿的时间似乎更长。这可能是因为需要仔细思考导致的。

关于口误、口吃和语速的数据是矛盾的。在大多数研究中，说谎时会发现口误和口吃的增加以及语速的减慢，但是一些研究发现了相反的模式——也就是，口误和口吃的减少以及语速的加快。根据下面的说法，这些矛盾的结果可能是因为谎言复杂性的不同。

关于潜伏期以及停顿的频率的结果也令人困惑。与口误、口吃和语速的矛盾结果不同的是，这些不同不能用谎言复杂性来解释。因此，我们不得不下这样的结论，潜伏期和停顿的频率与说谎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

表2.1 欺骗的客观的非言语指示器

	声音特征						
	口吃	口误	高音	语速	潜伏期	停顿持续时间	停顿的频率
Anolli & Cicery (1997)		>	>	—		—	>
Bond等人(1985)	—	—					
Bond等人(1990)	>	—	—				—
Buller & Aune (1987)			—	—			
Buller等人(1989)		<			—		<
Buller等人(1994a)	>	—			<		
Cody & O'Hair (1983)					<		
Cody等人(立即反应) (1984)	—	—		—	>	>	—
Cody等人(延迟反应) (1984)	—	>		—	—	>	—
Cody等人(1989)	—	>		—	—		—
DePaulo, Rosenthal等人(1982)	—	>		—			
P.J. DePaulo & DePaulo (1989)	—	—					
deTurck & Miller (1985)		>			>	>	
Ebesu & Miller (1994)	—			<			—
Ekman (1988)			>		<		
Ekman等人(1976)			>				
Ekman等人(1991)			>				
Feeley & deTurck (1998)	>	>		—	—		—
Fiedler & Walka (1993)	>		—	<			
Greene等人(1985)					<		

Hocking & Leathers (1980)	—	>		—	—		—
Höfer 等人(1993)	—	<		—	<		
Kalma 等人(1996)					<		<
Knapp 等人(1974)	—	—					
Köhnken (1985)	—	>		<			
Kraut (实验 1) (1978)	—	—			>		
Kraut (实验 2) (1978)					<		
Kraut & Poe (1980)		—			—		
Mann 等人(1998)	<	>	—	>	>		
Mehrabian (1972)		>		—			
Miller 等人(1983)	—	—			—		—
O'Hair 等人(1981)					<		
Riggio & Friedman (1983)	—						
Rockwell 等人(1997)			>[1]	<	>		
Stiff & Miller (1986)	—				—	—	
Stiff 等人(1994)					>		
Streeter 等人(1977)			>				
Vrij (1995)	<	—	>	—			
Vrij & Winkel (1991)	<	—	—	>			
Vrij & Heaven (困难反应) (1999)	>	>					
Vrij (简单反应) (1999)	<	—					
Vrij 等人(1999)	>	>		—	>		
Vrij & Mann (即将发表)	—	>		<		>	>
Young & deTurck (1996)		—			—		

表2.1 欺骗的客观的非言语指示器（续表）

	非声音特征									
	注视	笑容	自我控制	手势	手/手指	腿/脚	躯体	头部	改变姿势	眨眼
Akehurst & Vrij (1999)			—	—	<	—	—			
Bond等人 (1985)	>	—	—	>				—	—	
Bond 等人(1990)	—	—	—	—				—		—
Buller & Aune (1987)	<	—	<	—		—	—	—	—	
Buller等人(1989)	<	—	—	—				—		
Buller等人(1994a)		—						—		
Buller 等人(1994b)								<		
Cody & O'Hair (1983)	—	—	—	<		<			>	
Cody等人 (1989)	—	—	—	—	—			—		—
Davis & Hadiks (1995)				<						
P.J. DePaulo & DePaulo (1989)	—		—					—		
deTurck & Miller (1985)	—		>	>		—				—
Ebesu & Miller (1994)			—	—					>	—
Ekman (1988)		—	<	<		<				
Ekman & Friesen (1972)			>	<						
Ekman等人(1976)				<						
Ekman等人(1988)		—								
Ekman等人(1990)		—								
Ekman等人(1991)		—		<						
Feeley & deTurck (1998)	—	—	—	—		—			—	
Fiedler & Walka (1993)		>	—					<		

Greene 等人(1985)	—	—	—	<	<	<		<	—	
Hocking & Leathers (1980)	<	—	—	—		<		—	—	—
Höfer 等人(1993)	—	—	—	<		<	—	—		
Kalma 等人(1996)	<	—		<		>				
Knapp 等人(1974)	<	—	>	—		—		—		
Kraut (实验 a) (1978)		—	—				—		—	
Kraut & Poe (1980)	—	—	—	—			—		—	
Mann 等人(1998)	—	—	<	<	—		<	>		
McClintock & Hunt (1975)	—	—	>	—			>		>	
Mehrabian (1972)				—		<		—		
Miller 等人(1983)	<		—	—	—	—				
O'Hair 等人(1981)	—	<	>	—		—		>	—	
Riggio & Friedman (1983)	>	—	—	—		—		—	—	
Schneider & Kintz (1977)						—				
Stiff & Miller (1986)		—	—	—		—			—	—
Vrij (1995)	—	—	—	—	<	<	—	—	—	
Vrij & Winkel (1991)	—	—	<	<			—	—	—	
Vrij, Semin 等人(1996)			—	—	<	<		—	—	
Vrij, Akehurst 等人(1997)				—	<					
Vrij 等人(1999)	—	—	—	<	<	—				
Vrij & Mann (即将发表)	—	—	—	<	<		—	—		
Young & deTurck (1996)			>	—		<				—
Zuckerman 等人(1979)		<								

这些标志指示客观行为/欺骗的关系：>，欺骗时增加；<，欺骗时减少；-，与欺骗没有关系；空白，这一关系没有进行调查。

[1]知觉编码的音高。用听觉仪器测量的音高没有显示出说谎者和说实话者之间有任何差异。

表2.1 的第二个部分(非声音特征)也是令人困惑的。仔细看看说谎的三个客观指示器,会发现说谎者比说实话者更倾向于少移动他们的胳膊、手、手指、脚和腿。这些运动的减少可能是谎言复杂化的结果。也许是说谎者不得不努力思考而造成对肢体语言的疏忽。另外的一种解释是,说谎者设法制造诚实的印象,运动非常小心,尽量避免那些不必要的运动,造成了异常的僵硬和抑制。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所有的结果都不能说明人们在说谎时比不说谎时,都会出现音调的升高或者运动的减少。仅仅表明大多数说谎者是这样的。例如,我自己的实验结果显示,我们的 181 名被试中,有 64% 的人在说谎的时候出现了手、手指和胳膊运动的减少,而 35% 的人在说谎的时候出现了运动的增加(Vrij & Akehurst,1996a;Vrij,Winkel & Akehurst,1997)。

所有其它的非声音特征(例如目光转移,笑容,自我控制,改变姿势和眨眼)似乎并不总是说谎的可靠的指示器。这是一个突出的发现,这和人们持有的对说谎的非言语指示器的刻板观念相反,这点将会在第 3 章中讨论。通常,观察者期待说谎者出现神经紧张的行为和努力思考的行为。但是,说谎者常常没有出现这样的行为。举例来说,人们期待说谎者会转过脸去。也许人们期待说谎者目光转移是合理的,因为当他们在紧张或者努力思考时,目光转移是神经紧张和认知负担的指示器。因此说谎者至少可能愿意转过脸去。但是,目光转移并不是欺骗的可靠指示器。因为它是如此容易被控制。如果说谎者愿意,他们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地直视谈话对象。很显然,容易控制的行为永远无法成为欺骗的可靠的指示器。同样,在警察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见第 1 章),认为说谎者会把他们的手放在嘴前也是错误的。

有时候,在警察文献中会提到,眼睛运动提供了一个人是否说谎的信息。尤其是认为说谎者会经常往左边看。这一观念来自神经语言程序模型(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model),虽然那些提出这一模型的人从未提到眼睛运动与欺骗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缺乏眼睛运动能预示欺骗的证据。那些认为这种关系存在的人甚至从未提供任何支持他们观点的数据。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没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见 Vrij 和 Lochun[1997]关于警察文献的回顾引述)。

对于说谎者为什么在实验室研究中不出现显著的紧张行为模式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实验的时候他们的神经紧张度不够。可能的情况是,在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情景下,说谎的行为线索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风险很高的时候说谎者可能出现观察者期待他们出现的紧张行为,而在风险低的时候则不会。我稍后将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一些欺骗指示器被研究人员忽视可能是因为他们用来测量行为频率的评分系统不详细。或者他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举例来说,一些研究人员不去测量说谎和说实话时的行为发生率,而是去测量这些行为的持续时间。我认为测量持续时间是不够精确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研究员没有发现在说实话者和说谎者之间的差异,而其他人却能发现。例如,菲利(Feeley)和德特克(deTurck)(1998),耐普(Knapp),哈特(Hart)和丹尼斯(Dennis)(1974),克劳特(Kraut)和坡(Poe)(1980),米勒(Miller),德特克(deTurck)和凯尔伯佛雷斯德(Kalbfleisch)(1983),瑞吉(Riggio)和佛瑞德门(Friedman)(1983)以及史蒂夫(Stiff)和米勒(Miller)(1986)都是测量了行为的持续时间而没发现说谎者和

说实话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研究人员提供的新的评分方法能发现比前面提到的更多的说谎的客观的指示器，除了埃克曼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笑容这一指示器。表 2.1 表明笑容和说谎没有相关关系。然而，埃克曼和他的同事发现，如果能区别出真笑（felt smiles）和假笑（false smiles），笑容和欺骗是有相关关系的（Ekman，1988；Ekman，Davidson & Friesen，1990；Ekman & Friesen，1982；Ekman，Friesen & O'Sullivan，1988）。真笑包括所有人们能真正体验到的积极情绪的笑容，并可能会报告这一情绪。真笑伴随两种肌肉的运动，也就是大颧肌和眼轮匝肌，大颧肌把嘴角拉向颊骨，而眼轮匝肌则是升高脸颊，并把周围的皮肤挤向眼眶，形成眼袋和眼角的皱纹。假笑是故意做出来使别人相信自己体验到积极的情绪，但是事实上不是。在假笑中则没有眼轮匝肌的活动。如果没有这一肌肉活动的笑容就是假笑。但是，有这一肌肉活动的微笑并不总是真笑。这一肌肉的活动在假笑的时候可能出现，同样，这一肌肉在其他的感情体验方面也积极参与，像苦恼，悲哀或痛苦。当人们试图用假笑来掩饰这些情绪时，就可能出现眼轮匝肌的活动。但是，优秀的面部表现者可以使假笑看起来像真笑。埃克曼和他的同事发现说实话者的真笑比假笑多，而说谎者的假笑比真笑多。当没有发现真笑和假笑之间的区别前，说实话者出现笑容的频率和说谎者一样（Ekman，Friesen & O'Sullivan，1988）。真笑和假笑之间的其他区别还有就是假笑的出现是不和谐的，要不太早，要不太晚，而且持续时间更长。

保罗·埃克曼的工作还发现观察面部的细微表情也能得到关于说谎的有价值的信息（Ekman，1992）。情绪几乎是自动地激活脸上的肌肉活动。例如，愤怒会导致嘴唇的抿紧，眉毛降低。眉毛

的升高和靠拢,上眼皮的抬起和下眼皮的绷紧则是典型的恐惧的表现,而如前面所说的,快乐让嘴角上扬,形成眼袋,在眼角形成皱纹。如果一个人要否认他体验到的情绪,这个人就不得不抑制这些面部表现。因此,一个被吓坏的人不承认自己害怕,他必须抑制住典型表现恐惧的面部细微表情。这是十分困难,因为情绪的出现都是出乎意外的。例如,人们不会有意地选择害怕——它都是因为意外时间发生引起的,或者有特殊的想法。在接受警察的询问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发现警察知道的关于自己涉案的情况比她想像的要多得多,她会变得很害怕。当感到害怕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恐惧的面部表情,这会暴露谎言。因此一旦出现这一情况,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努力抑制这种情绪表现。一般来说,当这些表情出现后的 1/25 秒内人们能够抑制它们(Ekman,1992)。这是很快的,观察者可能会轻易错过(实际上,观察者只要在表情出现的时候眨一下眼就会错过)。对于没有经过训练的观察者而言,发现这次细微的表情是很困难的,但是埃克曼(1992)认为这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巧。

反之亦然。人们可以假装体验了实际上没有体验的某种感情。一位母亲可以假装很生孩子的气,但是实际上她根本不生气。为了让生气更真实,她将会装出生气的表情——也就是说,她将努力抿紧嘴唇。但是,对大多人而言,这种肌肉运动做起来还是有困难的。

同样,伪造一个与体验到的情绪不同的情绪也很困难。例如,一名不忠的丈夫在与妻子的谈话中意识到妻子对他的事情知道得不少,他会觉得很害怕,但他可能假装因为他的妻子不信任他而生气来掩盖他害怕的情绪。为了让自己更可信,他不得不抑制他害

怕的面部表情，取而代之的是生气的面部表情。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不得不降低眉毛（生气的表征），而他的眉毛本身想要抬高（恐惧的表征）（Ekman，1992）。注意细微的面部表情可能会提供一个识别谎言的机会。埃克曼的研究还表明训练有素的观察者通过注意这些细微的面部表情可以识别80%的真话和谎言（Frank & Ekman，1997）。如果同时考虑几个行为（手势和声调），对说实话者和说谎者的区别率会更高。在这种情景下，86%的真话和谎话能被识别（Ekman，O'Sullivan，Friesen & Scherer，1991）。

影响说谎者行为的因素

关于谎言的客观非言语指示器的结果也许有点让人失望。有人可能希望有研究能论证更多或者更好的指示器。但是，问题是并不存在典型的说谎行为模式。不同人显示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一些人因为声音线索而泄漏谎言，而另一部分人则由于语言线索，还有人是因为动作等等。因此，这个结论仅仅表明相对多的人因为声音的频率和手的动作而泄漏了谎言。而且，在不同的情景下行为也不同。本节我们将讨论欺骗行为的五个影响因素，也就是谎言的复杂性，说谎者的动机，说谎时的情绪，观察者的怀疑度以及个体特征。

谎言的内容复杂性

说谎有时候是很困难的。假设一名应聘者在上一个工作中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出乎她的意料的是，很多招聘者在面试的时候提到了这件蠢事。这名应聘者很想得到这份工作，不想承认这次失

误,因此她必须马上想出一个虚假的但看起来合理的解释。这么做并不容易。她不得不开动脑筋努力思考,这可能会导致她口吃和口误的增加以及语速的减慢。

但是,说谎者并不总是遇见意外。他们常常能预料他们会遇到什么类型的问题,因此能事先准备好让人信服的,看起来合理的答案。举例来说,当作案时,许多有罪的嫌疑犯可能会预计到警察将会询问他们这天的活动。因此他们预先对这个问题准备好了一个听起来合理的,似乎真实的答案。很明显,在这种情景下说谎不是太困难。当警察向他询问案件发生时他的活动时,有准备的有罪嫌疑犯只要把他事先准备好的答案说出来就行了。当说谎者有机会设计他们的谎言时他们的行为表现如何呢?有证据表明,相对于即时说谎而言,安排好了的谎言有一个较短的潜伏期和较快的语速(Zuckerman &Driver,1985)。说一则准备好的谎言比即时谎言更容易,出现思考的行为表征更少。霍夫(Höfer)和他的同事发现,准备好的谎言很少造成口误——甚至比说实话还要少(Höfer,Köhnken,Hanewinkel & Bruhn,1993)。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试必须回忆出他们刚刚看过的电影。欺骗的条件是要求他们在他们的叙述中加入实际上没有在电影中发生的细节。但是,霍夫等人指导和训练他们应该怎么说。研究发现,与说实话者相比,说谎者出现的口误较少。对这一发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这一项研究的说谎者或许面对是比说真话者更容易的任务。说谎者只是重复他们刚刚学会的答案,而说实话者必须想着电影并自己想答案。根据以前提到的,比较容易的任务不太有可能发生口误。第二,口误的减少可能受到说谎者过度控制行为的倾向的影响。他们可能已经想到口误会暴露他们的谎言,因此,设法制造诚实的

印象，试着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这将可能造成演讲的样子，听起来非常流畅。

有时说谎者无需捏造一个全新的答案，而只是需要隐瞒一些信息。当一个海关官员询问走私犯他们的手提箱中有什么时，他们要做的惟一的事就是隐瞒一些信息，不提到违禁品。我自己的一些研究调查了说谎者在这种情景中如何表现（Akehurst & Vrij, 1999；Vrij，1995；Vrij，Akehurst &Morris，1997；Vrij，Semin，& Bull，1996；Vrij & Winkel，1991）。在这些研究中，在说谎的情景中被试必须否认他们实际上持有的一套耳机。换句话说，他们的任务是隐瞒一些信息。把他们的答案与那些没有拿耳机说实话的被试的答案相比。在这些研究中，说谎者比说实话者出现的口吃较少，而且语速更快。尝试控制方式提供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正如前面提到的，说谎者要制造诚实的印象，因此试着避免出现口吃和语速太慢。这可能会造成异常快的语速和异常流畅的演讲模式。

总之，研究调查结果已经指出，较复杂的谎言会导致口吃的增加，口误和语速的减慢。较容易的谎言，例如事先准备好的谎言和隐瞒，不会导致这样的行为模式，甚至会导致相反的模式——也就是，口吃和口误的减少和语速减慢。最近，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谎言复杂性对出现口吃的慢化影响（Vrij &Heaven，1999）。与尝试控制行为模式一致，我们假定说谎者将会努力避免在说谎时出现口吃。我们认为只有在谎言比较容易的时候才能实现。被试观看了一对夫妇争执的录像。一开始出场的是男人，他坚持买卫星电视，以便他可以在家看足球而不必去酒馆看。后来女人出来，解释说他买卫星电视的惟一理由是方便他可以从酒馆把他的朋友带回家看体育频道。在看完这个录像带后，要求试被对录像某些方面说谎而

对其他的方面说事实。第一个谎言说起来相对容易，也就是对录像中的一个人的外表进行错误描述，而第二个谎言说起来就困难些，也就是捏造一个录像中的人买卫星电视的理由。与预想的一样，当谎言有认知困难时，说谎者的口吃更多（与说实话者相比），而说容易的谎言时，则口吃较少（与说实话者相比）。

受动机驱使的说谎者

说谎者的动机并不总是一样的。一个面对警察询问的杀人凶手可能比一个想让他妈妈相信他并不想吃花椰菜因为他一个小时前吃过了三明治的男孩有更强的隐瞒事实的动机。有很高的逃脱谎言动机的人可能与那些不关心结果的人的举止不同。朱克曼（Zuckerman）和卓文（Driver）（1985）通过元分析，比较了高动机的研究和低动机的研究。如果被试在说谎任务中表现良好就会得到金钱奖励或者是把说谎说成是对某些技巧的测试，则认为他们的动机高。分析表明，与那些低动机的说谎者相比，高动机的说谎者会出现更少的头部运动和姿势变换，说话更慢并带有较高的音调，而且说话更混乱。简而言之，要避免被识破的动机越高的说谎者，他们的行为愈有可能出卖他们。这一发现可能听起来让人惊讶，但很容易解释。高动机的说谎者的情绪经验比较强烈（例如有比较强烈的害怕被识破的恐惧），可能造成比较高的声调和较多的口吃与口误。除此之外，他们可能比动机低的说谎者更努力地思考（再一次避免被识破），可能会导致语速较慢，口吃和口误增加以及动作的减少。最后，他们也许更努力地尝试控制他们的行为，会使动作减少，行为僵硬。高动机说谎者出现更多的僵硬被称为动机损害效应（DePaulo & Kirkendol，1989）。

风险高的说谎

风险对说谎者而言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前面讨论到的，为了要提高实验室实验的风险，说谎常常被说成一个重要的技巧，并且许诺成功的说谎者会得到金钱或者其他的东西的奖励。虽然这会导致风险在一定范围内的提高——比大部分日常生活情景中的风险要高——但是很显然，与那些走私犯、有罪的嫌疑人，不忠的配偶，欺诈的商人和腐败的政客相比，实验室实验的风险并不是很高。不幸的是，实验室实验永不可能告诉我们当风险达到最高的时候说谎者的行为表现，因为如此高风险的实验在伦理上是不允许的。要去发现并观察那些现实生活中高风险的情景。但是，观察现实情景中的某人行为会引起其他的问题。通常在这些例子中，很难确定所谓的“基本事实”(ground truth)——也就是，确定某人是否在说谎。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有两种情景已经被调查过。一种情景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一次电视访谈，另一个是对某一名男子的谈话录像，他后来被确定为杀人凶手。

萨达姆·侯赛因

在海湾战争时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接受了 CNN 新闻记者彼得·阿拉特的访问(1991)。这个访谈持续了 94 分钟，并在 CNN 上播出。戴维斯(Davis)和哈迪克斯(Hadiks)(1995)对访谈时的侯赛因的行为进行了观察和评价。他们用了非常详细的评分系统测量他的手、双臂和躯体的每个动作。使用的评分方法比那些实验常用的更加详细。访谈期间讨论了例如以下的话题，伊斯兰国家的信仰，以色列，布什总统，做人肉盾牌的西方人质，登陆

伊朗的伊拉克飞机。戴维斯和哈迪克斯的观察发现侯赛因使用了多种手和手臂动作,而且在谈到某些话题时他用了一些特定的手势。当讨论以色列时,侯赛因使用了短线、垂直和强烈的左臂前戳的姿势,一些握着拳头,一些没有。这个行为模式只出现在他讨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时。当他谈到布什时,侯赛因最少抑制自己的行为。言语上,他给出了一个他不怎么在乎布什的印象:"我和人民说话,和人民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和布什先生。"然而,他谈论布什总统的时候会伴随明显的躯体运动以及强烈的手势。戴维斯和哈迪克斯解释说,这强烈的非言语行为证明侯赛因对布什强烈的个人仇恨。阿拉特还谈到了伊拉克飞机在伊朗的登陆。侯赛因告诉阿拉特:"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不站在我们这边。"然后他继续描述伊拉克飞机可能如何需要在邻国登陆。对于飞机是否会回国使用,他答到:"我们尊重伊朗的决定和规定。"在访谈的这一部分的整个过程中,侯赛因的行为都受到限制和约束。他慢慢地坐起来,明显地限制,甚至停止了他的姿势。戴维斯和哈迪克斯相信,侯赛因这个时候在捏造答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发现他正在说什么时,我们似乎越来越相信我们的感觉,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我们正在正确的轨道上解释伴随着他捏造的答案的笔直的坐姿和受限的手势"(Davis& Hadiks, 1995,pp. 37 -38)。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在这些现实的情景中,通常很难确定基本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确定侯赛因是否说谎。但是,下面关于凶手的案例被我们100%证实了(Vrij & Mann,即将出版)。

谋杀者

一个人失踪,几天以后被发现死亡。很清楚的是,被害人是被

谋杀的。一些证人分别告诉警察在尸体被发现前的几天,他们曾看到一名男子跟被害人说话。在他们描述的基础上,警察制作出了这名男子的画像。数月后,一名男子被逮捕并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询问。他是一名四十多岁的欧裔高加索人。他受教育很少,被捕时他是一名被雇用的蓝领阶级。他有一名女友但是独居。除了他与画像中的人面部相似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让警察相信他可能与本案有关。例如,这名男子曾经有过犯罪记录,以前在一些其他场合也接受过警察的询问。

警察对这名男子进行了全面的询问。在第一次面谈的时候,要求他说明在被害人失踪期间他的行踪。虽然询问是在被害人失踪好几个月后进行的,但是这名男子却能够非常详细地描述他那天的行为。他告诉警察他已经想到他会因为这个案件被警察询问,因此他已经通过检查他的日记来看那天他做过什么(即使一名无辜的嫌疑人也可能知道这个人是那天失踪的,因为媒体在失踪的那天开始以及失踪后的几天都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警察检查了男子所提供的每一个细节。一些中立的证人(包括他的雇主)可以证实他在那天早上的活动,但是没有人能证实他在那天其他时间他所声称的活动。这导致这名男子的嫌疑更大,因此对他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同时,这名男子一直否认他杀害过被害人,甚至宣称他从未遇见过被害人。在数个星期后,发现的物证有力地证明他是凶手。在这名男子的汽车中发现了一根来自被害人的头发。除此之外,包尸体的衣服的纤维也在他的车里找到。在这些物证面前,男子承认他杀害了被害人,并详细交代了案发经过。随后他被刑事法庭定为谋杀罪,并判终身监禁。

但是,凶手供认的时候并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对于他如何开

车从家里出来，在什么地方遇见被害人，他说了实话，这些可以被中立的证人所证实。但是，有证据表明他在如何遇见被害人方面说了谎。一些证人宣称在某个地方曾看到过他。除此之外，在那个地方发现了这名男子的东西（他承认是自己的东西）。尽管有物证，但是这名男子还是继续否认曾经去过那个地方。他承认他曾经接近过那个地方，但是并没有真正进入。

对已经证实是谎言或者实话的询问的所有部分都被拿来进行分析。有两个谈话片断——一个说谎话，一个说实话——来自他承认罪行以前的询问。实话包括他描述的被害人失踪那天早晨他的活动。正如前面提到的，证人可以证实这一部分。这一描述过程持续了 61 秒。而谎言持续了 67 秒，包括他对那天午后和傍晚的他的活动描述。他告诉警察说他在自己的城镇做了一些事情。事实上，他开着他的汽车去了他遇见被害人的另外一个城市。那天较晚的时候，他杀害了被害人。

另外四个片断——两个谎言和两个实话——来自他的供认。第一个说实话的片断持续了 26 秒，男子详细描述了他如何从高速公路的出口出来到他遇见了被害人的地方。证人可以证实这一部分。第二个说实话的片断持续了 27 秒，是对上个部分的重复。他供认时的第一个谎言是有关在他杀害被害人那天，他是何时离开在城镇的他的朋友家的。事实上，他离开朋友的房子的时间比他宣称要早几个小时。当他宣称他还在朋友家的时候，证人已经看见他和被害人在一起。因为他不得不解释这几个小时（也就是他到达他否认曾经过去的那个地方的几个小时），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谎言。这一谎言持续了 16 秒。第二个谎言则是他在哪里遇见了被害人。这一谎言持续了 32 秒。根据前面的描述，有有力的证

据证明他在他否认的那个地方看到了被害人。虽然我们有几个小时的录像，但是真正能用在研究中的只有几分钟。因为询问的其他部分没有事实根据。例如，凶手谈到了一个他与被害人谈话的细节以及他是如何杀死被害人的。但是，没有办法去证实他这部分话的真实性。

很显然，预知这名男子在警察询问时将会如何表现是十分困难的。尽管知道在这一情景下风险很高，我们还是不能预期凶手的行为会很紧张（“神经紧张”指的是目光转移，微笑，坐立不安等等，不包括面部细微表情），其理由有以下三条：首先，因为他有与警察打交道的经验（正如前面提到的，他曾因为其他的事情接受过警察询问），他可能知道表现一些典型的说谎行为（如坐立不安和视线转移）会引起警察的怀疑，因此他可能会努力控制自己的行为以便给警察留下一个诚实的印象（以前和警察谈话的经验也可能会减少接受警察询问的紧张。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案例中，谎言被识破的结果是十分严重的）。第二，我们可以假设这名男子隐瞒谎言的动机是十分高的，正如前面所说的，高动机的说谎者倾向于出现异常的僵硬，练习和设计自己的行为。我把这称为动机损害效应。第三，这名男子说谎的环境是很艰难的。在询问的开始阶段，警察就告诉他他是这个案子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此他可能认为警察会特别注意他所说的话，并会查证他提供的所有信息以发现他是否在说谎。于是，对于他而言，仔细思考他所说的话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失误都会给他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这样困难的情景下说谎需要消耗很多认知精力。因此，随着认知负担的加重，他忽略了身体语言，而不再刻意地抑制自己的紧张行为（例如坐立不安），于是会自动出现一

些紧张行为。表 2.2 显示了这名男子在供认罪行前和认罪期间的行为表现。

表 2.2　凶手在接受警察询问期间的行为

	1 供认以前	2 供认以后
声音特点		
高音	*	*
口吃	–	–
口误	>	>
语速减慢	>	>
潜伏期	*	*
停顿持续时间	>	>
停顿频率	–	>
非声音特点		
视线转移	>	<
笑容	–	–
眨眼	*	*
手势	–	<
自我控制	–	–

（续表）

	1 供认以前	2 供认以后
手/手指	–	<
腿/脚	*	*
头部	–	–
躯体	–	–
变换坐姿	–	*

>，说谎时增加

<，说谎时减少

–，与说谎无关

*，关系没有被证实

在凶手供认自己的罪行以前，在真实和虚假的陈述之间有一些差异。说谎时，凶手比说实话时出现了很多的视线转移，更多的口吃、口误以及语速变慢。这些行为模式是典型的正在思考的模式。显然，对于他而言，说谎比说实话要困难得多。这名男子在说谎时不得不努力思考，这也许有点让人吃惊。他知道他是一名嫌疑犯，也知道有充足的时间让他编谎。还有证据表明他曾有准备，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在欺骗警察时犯下的错误。除了准备以外，还有一个可能解释男子必须努力思考的理由是他不是很聪明（这是询问他的警探的看法）。有证据表明准备说谎或许对不是很聪明的说谎者没有好处（Ekman &Frank，1993）。

在凶手供认期间，在说实话和说谎之间也有一些差异。在说谎时，凶手出现比较少的视线转移，手势和手与手指运动较少，说

话出现停顿更多,时间更长,说话更慢,口误也比较多点。再申明一次,说话慢,长时间的停顿,更多的停顿,口误的增加都可以解释成在说谎时努力思考的表征。动作的减少也可能是谎言复杂化的结果。说谎时看着警察也可以被解释成要努力使警察相信他正在说实话。正如第3章中所说的,警察(大部分人)常常认为视线转移是说谎的一个表征。这名男子可能已经知道了这点,为了要留下诚实的印象,他直视了警探的眼睛。在与供认期间的行为相比较以前,解释他的注视行为什么如此不同是困难的。如果在供认期间他是为了让警察相信他,那他在供认之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只能猜测这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两次询问本身的差异可能影响了他的行为。在第二次询问中,警察刺探了这名男子。在早先的谈话中,警察已经告诉他,警方不相信他有关他如何遇见了被害人的说法。在供认之前的询问中都没有对这名男子进行刺探。警察问了他一个开放性问题("你在那天做了什么?"),男子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可能在被刺探以后他更努力地想留下诚实的印象。刺探是否通常会造成表现"诚实的行为"是一个开放的论题,下面的部分我们将进行讨论。

总之,凶手的行为模式表明他必须努力思考并试图控制他自己的行为。和我们期望的一样,他似乎并没有举止紧张。我们对他的行为解释得到了一些已经看过录像带的警察的支持。我们给一些警察看了那些我们已经分析过的询问片断,这些警察对这名男子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个案子。要求他们指出在什么地方他们觉得这名男子紧张,在控制他的行为和努力思考。我们没有告诉他们他什么时候说谎,什么时候说实话。结果表明这名男子在说谎的时候,他努力思考的样子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Vrij &Mann,即将发表)。

表 2.3　说谎的客观指示器和凶手在接受警察询问时的行为

	1 客观指示器	2 凶手的行为
声音特点		
高音	>	*
口吃	>1	–
口误	>1	>
语速减慢	>1	>
潜伏期	–	*
停顿持续时间	>	>
停顿频率	–	>
非声音特点		
视线转移	–	–
笑容	–	–
眨眼	–	*
手势	<	<
自我控制	–	–
手/手指	<	<
腿/脚	<	*

（续表）

	1 客观指示器	2 凶手的行为
头部	-	-
躯体	-	-
变换坐姿	-	*

>，说谎时增加

<，说谎时减少

-，与说谎无关

*，关系没有被证实

1，说谎时努力思考

表2.3用图表显示了说谎的客观非言语指示器（栏1）和被判定为凶手的行为（栏2）。从这张图表中我们能看出，两栏之间有相当多的重叠。很显然，处于高风险中的凶手表现的行为与实验室说谎者的行为是相符的。一方面，令人惊讶的是，在警察询问和实验室实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有相同的地方。凶手和实验室的说谎者也许都害怕被识破（凶手或许比实验的被试更害怕），当他们说谎时不得不努力思考，可能努力想留下诚实的印象。表2.3中的重叠部分表明在解释欺骗行为方面，这些相似性可能比那些明显的差异更重要。

尽管萨达姆和凶手的说谎风险都很高，但是他们说谎时都没有表现出紧张。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它反驳了警官和其他多数人认为说谎者一定会出现紧张行为的观点（见第3章）。很明显，这个并不意味着说谎者从不会紧张。也许正如下面将提到的，说谎者是有“个体差异的”。但是，这一发现表明，有经验的犯罪人（例如这

个凶手)或者那些在公众目光下生活给别人的印象很重要的人(例如萨达姆),他们说谎时出现紧张行为的可能性不大。

需要提醒的是(再一次),我所说的紧张行为,是指的视线转移,笑容,坐立不安等等,而不是我前面所提到的面部的细微变化。埃克曼发现这样的细微表情经常出现在高风险的情景下。

观察者的怀疑程度

有时候说谎者的陈述会受到怀疑。例如,记者不相信政治领袖说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的执政有什么违法的行为,法官不会相信流氓说他拿出匕首只是为了吓唬而不是刺伤他人。布勒(Buller)和他的同事,还有史蒂夫(Stiff)和米勒(Miller)认为说谎者一旦意识到他想欺骗的人不信任他们时,他们就会表现出"诚实的行为"(直视对方的眼睛,避免坐立不安等等)。这些研究者声称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但是对这些结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有些地方还是值得怀疑。这一项研究中,刺探导致了言语混乱和更长的停顿。但是,根据第 3 章的内容,这些行为是属于不诚实的行为。在第二项研究中,刺探导致了自我控制,这也不能制造诚实的印象。更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当说谎者被刺探时,他们努力表现出诚实的行为,但是有时候他们很显然没有做到。大多数情况是,说谎者被刺探以后就变得很紧张(因为害怕被识破),不得不努力思考(为了摆脱问题情景)。紧张可能会导致自我控制的增加以及言语更混乱,而努力思考则可能导致言语混乱。总之,虽然有一些研究者想让我们相信怀疑会导致"诚实"行为,但是主要的结果还是表明怀疑对行为的影响还是不确定的。布勒(Buller),史蒂夫(Stiff)和波根(Burgoon)(1996),还有列文(Le-

vine)和马克莱克(McCornack)(1996a,b)对怀疑对行为的影响有很好的研究。

个体差异

人格特点

正如第1章提到的,操纵者(好权谋者)认为说谎是他们达到目标所使用的合法的方法。因此,他们在说谎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内疚,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权谋者的行为与低权谋者有差异。易斯莱因(Exline)和同事(Exline,Thibaut,Hickey & Gumbert,1970)确实发现高权谋者比低权谋者有更多的目光接触(可能是由于具有较少的负罪感)。但是,其他的研究没有发现高权谋者与低权谋者有行为上的差异(Knapp,Hart &Dennis,1974;O'Hair,Cody & McLaughlin,1981)。

有更充分的经验支持这样的假设,性格外向者在说谎时与性格内向者相比,行为上有差异(Riggio & Friedman,1983;Siegman &Reynold,1983)。性格外向者说谎时比说实话时动作要少,而性格内向者说谎时动作较说实话时多。在说谎时,性格内向者比性格外向者有更多的混乱。性格内向者在社交中常常比性格外向者更觉得不安。不得不说谎的事实也许让他们更紧张,从而导致更多的动作和说话更不流畅。结果也可以用认知需求来解释。性格外向者常常是雄辩的,因此能很容易捏造谎言。性格内向者在社交方面常常更安静,更僵硬,可能发现捏造谎言比较困难。因此,与性格外向者相比,说谎对性格内向者是一件较复杂的任务,从而造成说谎混乱的增加。

表演能力也影响人说谎时的行为(Riggio & Friedman,1983;

Vrij, Akehurst &Morris, 1997)。一些人与其他人相比是更好的表演者。举例来说,一些人在他们烦恼的时候也能假装得很高兴。与差的扮演者相比,好的扮演者说谎时动作更少,可能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抑制自己的紧张行为。

人们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公众自我意识高的人(如第 1 章中的适应者)尤其渴望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们努力通过适应他们周围的环境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说谎时比说实话时出现的动作更少(Vrij, Akehurst &Morris, 1997)。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谎者可能意识到观察者将会通过观察他们的动作来识别他们的谎言。他们想通过抑制动作让观察者更难识别谎言。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由于他们不仅仅要欺骗别人还要思考如何给别人留下积极的印象,这增加了认知负担。认知负担的增加往往会导致运动的减少。

智力

说一个令人信服的和看似合理的谎言或者与观察者已知的事实不矛盾的谎言可能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尤其是当说谎者没有机会好好准备时。埃克曼和法兰克(1993)认为聪明的人在解决这样的困难的任务时比不聪明的人要好。正如前面提到的,智力的缺乏可能是这个凶手为什么在说谎话时没有说实话时那样流利,即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谎言。

结　论

当人们说谎时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呢?不幸的是,不可能给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主要的问题在于不存在与说谎相

关的典型的非言语行为。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情景下所有说谎者的行为并不相同,不同的说谎情景下的行为也不相同。本章在这方面显示的结果可能是令人失望的。对于测谎者而言,如果说谎者有典型的行为,例如视线转移或者把手放在嘴前将是十分有用的,但实际上这些行为是没有用的。

但是,有一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可能发生在说谎时。例如,一个走私者不太可能经过海关官员身边而不去看他一眼,因为说谎者通常不会出现视线转移。犯罪嫌疑人也不太可能一到自己的犯罪现场就慌张,因为说谎者通常不会显出慌张的行为。最有可能的是说谎者将会减少腿和脚的运动以及手和手指的细微运动(就像萨达姆和那名凶手一样),会在说话流畅性上,语速或情绪的细微表达上出现变化。这些线索很可能出现在说谎者体验到恐惧、负罪感、兴奋以及说谎需要心智努力时。

非言语行为与欺骗之间复杂的关系使得仅仅在某人行为的基础上做出他是否说谎的肯定结论变得非常困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因此,人们对某人的非言语行为的分析不会被用来做法庭证据。但是,对行为系统的、详细的观察可能对确定某些事情是否正在发生是有用,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调查。例如这名凶手的案子。为什么他一谈到他那天午后的活动就突然行为大变?行为方面的改变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在说谎,但是可以说明有某些事情发生了。这可能导致观察者努力构建事实(举例来说,通过搜寻证据来验证凶手的陈述,以及加强询问的力度)。这是一种策略。通过密集的侦查,警方在凶手的汽车里发现了被害人的一根头发,以及包裹被害人尸体的布料的一小块儿,这些打破了凶手的心理防线,最后凶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第 3 章
说谎时非言语行为的识别

人们如何看待说谎者的行为

前面的一章讨论了欺骗的客观的或真实的非言语指示器——也就是说谎者实际上是怎样行为的。本章要说明的是，典型的欺骗的非言语行为是不存在，虽然有研究表明有一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可能出现在欺骗的期间。本章还将会讲述欺骗的主观指示器——人们如何看待说谎者的行为，以及他们通过什么线索来识别谎言。我将说明人们（不仅是非专业人士还有专业测谎人员）对说谎者实际上如何行为常常有不正确的信念。当人们注意某人的行为时，他们通常对识别谎言感到无计可施。

有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paradigm）已经被用于欺骗的主观的非言语指示器的研究中。在第一个范式中，要求人们指出（通常是用一个调查量表）他们如何看待说谎者的行为。这深入考察了那些对与欺骗相关的线索的信念，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当人们试图识别欺骗时，人们真的会使用这些线索。举例来说，人们可能指出他们认为说谎者会转移视线，但是可能随后他们会判定视线转移的人是诚实的。第二范式被用于找出人们实际上在使用什么线索识别谎言。给观察者呈现录像带或录音带，并且要求他们判断其中的每一个人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然后找出那些在带子中出

现或没有出现的与这些判断相关的真实线索。对这些识别欺骗的线索的研究告诉我们,那些线索确实是人们用来识别某人是否说谎的。举例来说,如果在测谎者中存在这样的倾向,认为动作多的人比那些动作少的人更会说谎,则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把制造动作作为识别谎言的线索。但是,我们还不清楚人们是不是知道自己在使用这样的线索——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把制造动作作为识别谎言的线索。

欺骗的主观指示器的研究已经在很多的西方国家,包括德国(Fiedler & Walka,1993)、英国(Akehurst,Köhnken,Vrij & Bull,1996;West,1992)、荷兰(Vrij & Semin,1996)和美国中进行(DePaulo & DePaulo,1989;Ekman,1988;Riggio & Friedman,1983)。大部分是学校的学生做观察者,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的观察者是警察(Vrij,1993a;Vrij,Akehurst,Van Dalen,Van Wijngaarden & Foppes,1996;Vrij,Foppes,Volger & Winkel,1992;Vrij & Semin,1996)或海关官员(Kraut & Poe,1980)。尽管研究范式,研究地域以及观察者不同,调查的结果却是高度相似。看来,对于非言语行为与欺骗的关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察者(非专业人士和专业测谎者)都有着明确的、一致的信念。表3.1是对这些信念的总结。

观察者把欺骗与高音、说话混乱(口吃和口误),语速慢,长的潜伏期,长时间的停顿,较多的停顿,视线转移,笑容,眨眼和过多的运动(手势,自我控制,手、手指、脚、腿和躯体的运动以及坐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当被应用于日常生活情景中时,这些发现意味着海关官员认为走私者会避免和他们目光接触,警察相信有罪的嫌疑犯会坐立不安,父母相信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回答问题以前有停顿则是在说谎,而一位政客口吃就会引起新闻记者的怀疑。这

些大部分的行为都是紧张或内容复杂化的表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把这些行为和欺骗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他们或许认为说谎者会是神经紧张的或努力思考的，因此他们把这些线索作为神经紧张和内容复杂化的指示器。这种寻找紧张和内容复杂线索的倾向被称为代表性习惯思维（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Stiff, Miller, Sleight, Mongeau, Garlick & Rogan, 1989）。

我自己的研究（Vrij & Semin, 1996）表明，在所有的这些指示器中，视线转移或许是人们最依赖的一种（其次是自我控制和腿脚运动）。人们为什么会对说谎者转移视线有这么强烈的期待呢？首先是因为期待说谎时出现视线转移是合理的。观察者相信说谎者是神经紧张和努力思考的，而视线转移是神经紧张和认知负担的一个指示器。但是，那些依赖视线转移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是多么容易被控制。第二，我们对接受警察询问的嫌疑犯的研究（Mann, Vrij &Bull, 1998）发现，很多嫌疑犯在说谎时，与说实话相比，视线转移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视线转移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指示器。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模式是不稳定的。一些嫌疑犯说谎时视线转移更多，而另一些嫌疑犯在说实话时视线转移更多。在说谎和说实话时不同的视线转移模式也会出现在同一个个体身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被认定的凶手所表现的视线转移的模式（第 2 章）。在他认罪以前，他说谎时视线转移，而在他认罪的时候，他说实话时也出现了视线转移。当某种行为很容易被控制时，应该能想到这种行为模式是不稳定的。

庞德（Bond）和他的同事为欺骗的主观指示器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Bond, Omar, Pitre, Lashley, Skaggs &Kirk, 1992）。他们声称不是紧张行为或表明认知负担增加的行为引起了怀疑，而是

“奇怪的行为”——也就是说，非言语行为扰乱了正常的期待（也就是所谓的少发生启发）（Fiedler & Walka，1993）。这个奇怪的行为可能是紧张行为，但并不一定是。人们在谈话的时候常常看着彼此。互相看的频率和时间依赖于情景。举例来说，热情的夫妇比陌生人更经常看着彼此（Kleinke，1986）。研究已经表明，在正常的环境下，过度的视线转移和过度的凝视都可能造成可疑的印象（Bond，Omar，Pitre，Lashley，Skaggs &Kirk，1992；Desforges &Lee，1995）。异常的视线转移和凝视都会被认为是奇怪的，因而引起怀疑。因此，维持长时间凝视的嫌疑犯和总是转移视线的嫌疑犯都比中等水平视线转移的嫌疑犯更可能给警察留下深刻的印象。

巴斯开特（Baskett）和弗里德（Freedle）（1974）在实验中变化了反应潜伏期。他们发现，如果反应太慢或太快都会被判断成欺骗。惟一被判断为诚实的反应是有一个中等的延迟反应。因此，如果妻子回答关于她的外遇的问题太快或太慢都会引起丈夫的怀疑。人们一般认为，给出一个答案将会花一定的时间。如果反应潜伏期比预期的要短或长，都将会被认为是奇怪的，并因此引起怀疑。

尽管人们将注视和短潜伏期与欺骗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你问他们如何看待说谎者行为时，这些并不是他们期待说谎者出现的行为。维吉（Vrij）和塞敏（Semin）（1996）要求被试在一个调查表中指出，与说实话者相比，说谎者是否表现出“对交谈对象注视行为的增加”，“减少”或“不变”。大多数的被试填写“注视行为减少”。人们为什么会认为是视线转移（不是视线接触）呢？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对于人们来说，解释视线转移比解释目光接触要容易。注视厌恶可能是紧张或内容复杂化的结果，而视线接触只能被解

释为过度控制(见第 2 章)。当观察者思考欺骗行为时,更多的是想到神经紧张和内容复杂化,而不是过度控制。

庞德和维吉的结果不一致或许是与两个研究中使用的研究范式不同有关。我们研究的是与欺骗相关的信念,而庞德研究是对欺骗线索的知觉。根据前面提到的,人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在使用一些线索来识别谎言。但是,在对欺骗线索的信念和欺骗线索的知觉之间往往有着很高的相关(Zuckerman, Koestner & Driver, 1981)。庞德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它说明了表 3.1 中的研究的局限性。表 3.1 总结了观察者常常如何相信说谎者的行为,通常用什么线索来试着识别谎言。但是,庞德的研究没有说明人们显示不同模式的行为是为了制造一个诚实的印象。为了使对行为的知觉更精细,昂(Aune)、列文(Levine)、青(Ching)和吉本(Yoshimoto)(1993)发现,相同的行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价,这依赖于行为发生的情景。让判断者观看两个相似的录像中的一个,这两个录像是对一名女子进行婚介方面的访谈。在录像中,对这名女子的外表进行了操作,强调或降低了她想做别人伴侣的愿望。她的外表有时候看起来是那种典型的,年轻的,经常参加时髦的晚餐约会的女性,有时候则是非典型的。在两个录像中,这名女子都表现出与欺骗有关的典型的线索,例如转移视线,改变坐姿(两个面谈都有)。在两次面谈时,除了说别的事情以外,她都表示,她是爱冒险的人,她真的很喜欢这种陌生人约会(blind dating)。判断者评定说,当她的外表是那种典型的符合晚餐约会的情景时,她更少说谎。

表3.1　欺骗的主观的非言语指示器

	声音特征						
	口吃	口误	高音	语速	潜伏期	停顿持续时间	停顿的频率
Akehurst 等人(1996)	>	>	>	<	>		>
Apple 等人(1979)			>	<			
Baskett & Freedle (1974)		>			>,<		
Bond 等人(1985)	—	—					
Bond 等人(1990)	—						>
DePaulo, Rosenthal 等人(1982)	>	>		<			
DePaulo & DePaulo (1989)	>	—		<			
Ekman (1988)			—				
Fiedler & Walka (1993)	—		>	—			
Gordon 等人(1987)	>	>		>			
Kraut (实验1) (1978)	—	—			>		
Kraut & Poe (1980)		—			>		
McCroskey 等人(1969)		>					
Nigro 等人(1989)	>	>					
Riggio & Friedman (1983)	—	—		<			
Ruva & Bryant (1998)	>						
Stiff & Miller (1986)	>				—	>	
Streeter 等人(1977)			>				
Taylor & Vrij (1999)	>	>	>	>	>		
Vrij & Bull (1992)	>	>	—	>	>	>	>

表3.1 欺骗的主观的非言语指示器（续表）

	声音特征						
	口吃	口误	高音	语速	潜伏期	停顿持续时间	停顿的频率
Vrij, Foppes 等人(1992)	>	>					
Vrij & Winkel (1994)	>	>					
Vrij & Semin (1996)	>	>	—	>	—		
West (1992)					>		
Westcott 等人(1991)	>	>			>		
Woodall & Burgoon (1983)				<			
Zuckerman, Koestner 等人(1981)	>	>	>	>	>		
总计	>	>	>	—	>	>	>

	非声音特征									
	注视	笑容	自我控制	手势	手/手指	腿/脚	躯体	头部	改变姿势	眨眼
Akehurst 等人(1996)	<	>	>	>		>	>	>	>	>
Bond 等人(1985)	<	>	—	—				—	—	
Bond 等人(1990)	<	—	>	<				<		—
Bond 等人(1992)	<,>									
Brooks 等人(1986)	—									
Burgoon 等人(1985)	<									
P.J.Depaulo & DePaulo(1989)	—		—					—	>	

Desforges & Lee (1995)	<,>									
Ekman & Friesen (1972)			>							
Ekman (1988)		—	—	—		—				
Fiedler & Walka (1993)		—	—					—		
Gordon 等人(1987)	<	>	>	>		—	>			>
Hemsley & Doob (1978)	<									
Koppelaar 等人(1986)				>			>			
Kraut (实验1) (1978)		>	<				>		>	
Kraut & Poe (1980)	<	—	—	—			>		>	
O'Sullivan 等人(1988)				>		>				
Riggio & Friedman (1983)	—	<	>	—		—		<	—	
Rozelle & Baxter (1978)	<			>			>			
Stiff & Miller (1986)		>	—	—		—			>	—
Taylor & Vrij (1999)	<	—	>	>	>	>	>	>	>	
Vrij, Winkel 等人(1991)	<									
Vrij & Bull (1992)	<	—	>	>	>	>	—	>	>	>
Vrij, Foppes 等人(1992)	<	>	—		—			—	—	
Vrij & Winkel (1992a)		>	>	>						
Vrij, Akehurst 等人(1996)			>		>	>				
Vrij & Semin (1996)	<	>	>	>	>	>	—	—	>	
West (1992)	<		>			>			>	
Westcott 等人(1991)	>	>								
Zuckerman, Koestner 等人(1981)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这些标志指示人们对欺骗的行为线索的信念：>，观察者把行为的增加与欺骗联系在一起；<，观察者把行为的减少与欺骗联系在一起；-，观察者没有将行为与欺骗联系在一起；空白，这一关系没有进行调查。

说谎者是按观察者的期望行动的吗

既然人们对表明一个人说谎的行为有了他们自己的信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信念的准确性如何是一个值得疑问的事情。表 3.2 对说谎主观指示器（栏 1）和客观指示器（栏 2）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概括的比较。

表 3.2　说谎的主观和客观非言语指示器

	1 主观指示器[1]	2 客观（真实）指示器[2]
声音特征		
高音	>	>
口吃	>	>[3]
口误	>	>[3]
语速减慢	>	>[3]
潜伏期	>	–
停顿持续时间	>	>
停顿频率	>	–
非声音特征		
视线转移	>	–

（续表）

	1 主观指示器[1]	2 客观（真实）指示器[2]
笑容	>	–
眨眼	>	–
手势	>	<
自我控制	>	–
手/手指	>	<
腿/脚	>	<
头部	–	–
躯体	>	–
变换坐姿	>	–

[1] >，观察者将行为的增加与欺骗联系在一起

<，观察者将行为的减少与欺骗联系在一起

–，观察者没有将行为与欺骗联系在一起

[2] >，说谎时增加

<，说谎时减少

–，与说谎无关

[3] 当说谎很困难时

关于声音特征，表3.2显示这两栏之间有很大的重叠，表明观察者大致知道欺骗的声音特征。但是，表3.2中的一些客观指示器（口吃，口误的增加，语速的减慢）只是在说谎有难度时才出现（第2章）。简单的谎言（隐瞒或有准备的谎言）和这个行为模式没有关系，甚至可能和相反

的模式有关。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观察者知道这一点。

表3.2进一步表明关于欺骗的非言语指示器的信念大多数是错误的。与事实相比,观察者更多地将非言语行为与说谎联系在一起。举例来说,主观的指示器,如注视转移,躯体运动,自我控制和改变坐姿并不是说谎的真实的指示器。最后,观察者相信说谎是和手、手臂运动,腿脚运动的增加有关,而事实上,说谎是和手、手臂运动的减少(特别是非功能性的细微的手和手指运动)以及腿脚运动的减少相关。正如前面提到的,观察者期待紧张行为的出现,并认为是因为努力思考的结果,当实际上说谎者并不时常出现这样的行为。

客观和主观指示器之间为什么会有差异

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错误地假设说谎者出现的行为。

- 可能是经验的问题(Köhnken,1990,1996)。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在有些时候,当某人说谎时就会神情紧张,随后他也因为紧张被识别出在说谎。于是,谎言识别者可能错误地假设所有的说谎者的行为都是这样。几年前我和一个荷兰宪兵交谈时偶然发现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名荷兰宪兵和其他人一起在机场负责检查护照。这名宪兵官员告诉我他的组织很擅长识别谎言。为了验证他的观念,他给我看一个录像,里面有一些乘客,他们正在向一名宪兵官员出示他们的护照。其中一名外表明显紧张的女子引起了那名官员的怀疑。他仔细地检查了她的护照,并发现它是伪装的。我问,在录像带中,是否有拿着假护照但是表情不紧张的乘客。这个很难知道答案,因为这些乘客并不是每一个都

会接受检查。这很不幸,因为很可能有一些神情不紧张的乘客持的是假护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持假护照的人都会表现出紧张行为。

- 说谎的客观和主观指示器存在着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因为它给我们的印象是,但我们说谎时我们表现的行为和其他人说谎时的行为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说谎,我们倾向减少我们的动作,但是我们却认为其他人在说谎时,动作是增加的。为什么会不同呢?研究表明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不同的,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谎时的行为是怎样的。维吉(Vrij)、塞敏(Semin)和布尔(Bull)(1996)对他们的被试进行了两次访谈。一次访谈时他们说谎,另一次则说实话。在第二次访谈结束以后,要求被试在问卷中指出他们认为的他们自己在两次访谈期间的行为。这些答案与被试在两次访谈时的真实的行为相比较。结果发现,被试并不真正知道他们在访谈时的行为。实际上,他们说谎时比说实话时表现出较少的动作,但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在说谎时的动作更多。因此,当人们对别人的谎言进行识别的时候,他们会去寻找那些他们认为(错误地)他们自己说谎时的那些线索。
- 当人们表达他们对欺骗者行为的看法时,他们倾向于考虑紧张行为出现的情景,例如那些高风险的情景或者那些说谎者感到意外的情景。当他们在其他的不特殊的情景中时,他们的信念会不一样。最近,我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Taylor & Vrij, 1999;Vrij,1998 b;Vrij &Taylor,1999)。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要求观察者说出他们在一些特定的情景下关于欺骗行为的信念。举例来说,在一个研究(Vrij,1998 b)我引入了四个不同的场景,

对场景的风险和内容复杂性进行了系统性的操作。这些场景是关于一位闯了车祸的司机接受警察询问的。但是,这名司机不想承认,并告诉警察她是无辜的。在一半的情景中,车祸的结果是很严重的,其中有人丧生(高风险)。而剩下一半场景则只是一个小事故(低风险)。在一半场景中有目击证人,他指证司机(高认知要求),而另一半场景是警察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来认定事实(低认知要求)。被试能意识到在严重车祸场景中的后果比在小车祸中的后果更严重,但是他们在所有场景中都期望这名司机会出现紧张行为。很显然,观察者没有意识到说谎者表现的行为是依赖于情景的。

表框3.1 在警察询问中制造嫌疑犯

警察在对嫌疑犯进行询问的时候,与嫌疑犯的互动可能会引起警察行为的一些微妙变化。例如,警察可能会因为嫌疑犯给出或者拒绝给出信息而生气,这可能导致警察的行为表现发生细微的变化。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这最终会导致对嫌疑犯的印象更可疑(Akehurst & Vrij,1999)。一个警官在模拟警察询问情景下面谈了许多学校学生。在这些访谈中,警察的动作被操作,使得警察在实验条件下比在控制条件下出现更多的细微的手和手指运动。结果表明这样的操作会影响被询问者的动作。他们会"模仿"警察的行为,也就是说,实验条件下的被询问者比那些在控制条件下的被询问者出现了更多的细微的手和手指运动,这一现象叫做协调同步(interactional synchrony)。在一个后继实验中,向警探呈现了这些谈话(五个实验情景下的和五个控制情景下的面谈)的一个样本,并要求警探判断被询问者的嫌疑程度。结果表明,在实验情景下的被询问者比在控制情景下的被询问者给警探留下了更可疑的印象,这可能是因为在实验情景下的被询问者做出了较多的手和手指运动。但没有一个判断者发现在这些询问过程中警察也做出了较多的手和手指运动。

人们的测谎能力

很显然,人们的测谎能力是由环境决定的。当谎言被识破的消极后果不严重或者是这个谎言不需要很大的心理努力时,人们不太可能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来识别谎言。一个女孩告诉她的朋友她很喜欢这个朋友的衣服,但是实际上她并不喜欢,这个女孩可能没有任何行为可以暴露她的谎言。而当风险提高或者谎言的认知难度加大时,说谎就比较困难了。因此,在这样的情景下,谎言可能会被识破。在关于谎言识别的科学研究中,最经典的做法是给观察者(大多数是大学的学生)呈现录像或录音,要求他们判断其中的每一个人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在这些研究中,要求从"这个人在说谎"或"这个人没说谎"进行选择的模式造成了只要通过猜测就能有50%的概率回答正确。在大部分研究中,说谎者不得不马上编造一个谎言,这就加大了谎言认知的复杂性。而且,对那些没有成功说谎的人常常会有一些消极的后果,因此风险相对较高(当然不会像实际生活中那样高)。在大多数关于谎言识别的研究中,在第2章中讲到的谎言研究录像常常被作为呈现给测谎者的材料。

克劳特(Kraut)(1980)发表了对那些说谎研究的总结。在大多数说谎研究中,谎言识别的百分比(或者说准确率)从45%~60%,而偶然的概率是50%,平均准确率是57%。显然,人们并不擅长识别谎言(虽然在已经发表的许多研究中,识别的准确率稍微但显著超过偶然概率)。

理论上,测谎的准确性应该随着控制交流渠道的能力的变化

而变化。说谎者应该在使用面部表情欺骗别人时是最成功的(因为这是最容易控制的渠道;见第2章),而使用身体动作和声调线索最不易成功(因为这些渠道是比较不好管理的)。30多个研究的综合结果都支持这一假设(DePaulo,Stone & Lassiter,1985)。如果观察者仅仅只听声音或者只看躯体和手臂,他们识别谎言的准确率只稍微高于偶然概率,但是如果他们只是看面部线索(在这里我指只听见文字的声音;在这些研究中通常用声音过滤器来使测谎者听不清楚说话者在说什么),则他们的得分不会高于偶然概率。此外,如果观察者对面部线索和其他的渠道一起利用,与单独使用那些渠道相比,表现更差。也就是说,仅仅看身体运动,与同时看身体运动和面部表情相比,测谎者在测谎的准确性上更高。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强烈地依赖面部信息来识别欺骗,但是面部信息并不是说谎的可靠的指示器。以上数据表明,当人们试着识别谎言时,最好的方法可能是不要只注意面部,要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身体运动和声音的特点上!然而,这一个方法可能太死板,因为正如第2章提到的,面部情绪的细微表现也可能会暴露谎言(Ekman,1992)。

克劳特(Kraut)在1980年发表了他的总结后又发表了许多研究。附录3.1提供1980年以后的这些研究的情况。这些研究中包括把非专业人士(不是专业测谎人员)做观察者,让他们对他们不熟悉的人(不是朋友或爱人)进行谎言识别。包括专业测谎人员,朋友和爱人的研究将会进行单独的讨论。

附录3.1对39项研究进行了总结。准确率主要落在45%~60%的范围内,而平均准确率是56.6%。这几乎和克劳特(1980)发现的57%准确率相同。

如果识别谎言的准确性和识别事实的准确性分开计算，其结果往往表现出事实偏见（truth bias）（Köhnken，1989；Zuckerman，DePaulo & Rosenthal，1981）。也就是说，判断者可能更多地认为信息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其结果是认定真实信息的准确性比虚假信息的准确性更高。事实上，我自己的总结（附录 3.1）发现，观察者相当擅长识别实话（67% 的准确率），而不擅长识别谎言（44% 的准确率）。有四种可能的理由来解释事实偏见。首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真实情况的时候要比虚假情况多，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假设他们观察的行为是诚实的（这就是所谓的有效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O'Sullivan，Ekman & Friesen，1988）。第二，社会的交谈规则让人们避免怀疑。如果人们的交谈对象总是质问他们正在说的每件事，他们将会很快被激怒。想像一下，在交谈中，某人不断地用这样的话打断你："我不相信你"，"这不可能是真的"，或者"你可以证明吗？"这样的交谈可能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然后不幸的是，我们常常需要去质问另一个人正在说的话，要求更多的信息以便解释人们为什么在那个特别时候以这种方式行动，发现某人是否在说谎（见第 2 章）。第三，关于说谎者和说实话者如何行动，人们有着一些刻板观念。举例来说，大多数的人认为说谎者行为紧张而说实话者举止正常，当人们试着识别谎言时，他们常常受这些信念的指导。这就导致了识别事实比识别谎言更准确，因为他们对说实话者的刻板观念比对说谎者的刻板观念更准确。第四，人们可能不确定谎言是否真的发生。对于这样的不确定，最安全的，最有礼貌的方法就是相信他人说的所有的话（DePaulo，Jordan，Irvine &Laser，1982）。

影响测谎能力的因素

有很多因素影响人的测谎能力。其中的一些因素与测谎者有关，而还有一些因素与说谎者，或者说与说谎者和谎言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关。第三种因素与测谎任务有关，特别是那些测谎者在实验室背景下识别谎言与在现实生活情景下相比的可能的不利方面。我将首先讨论实验室背景。

实验室中缺乏真实性

在实验室实验中识别一个说谎者不同于在现实生活情景下识别谎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识别谎言任务在实验室之外比在实验室之内容易。一些不同使得任务更容易，而另一些不同则使得任务更困难（见 Zuckerman，DePaulo & Rosenthal，1981）。相比现实生活情景，实验室的谎言识别有以下局限性。

- 他们不得不很快地确定某人是否在说谎（通常在 10 秒内），而且没有时间思考他们的决定。
- 他们只能用很短的时间（通常不到 1 分钟）来观察假设的说谎者，而他们可能希望能更多地观察他们面前的这些人。但是，问题是这怎么可能呢？目前，我们正在分析警察和嫌疑犯的谈话录像（Mann，Vrij & Bull，作为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赞助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初步的发现是嫌疑犯所说的谎言通常是比较短的。一个理由是谎言经常是混在真实的叙说中的。嫌疑犯的大部分叙述都是正确的，而只是对某些细节（关键的）说了谎，例如事件发生的时间或者他们在事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例

如说“我当时是在那里，但我不是偷钱的那个人”）。另一理由是，谎言有时是由简洁、彻底的否认组成的（例如“我与这无关，我在家，很累，很早就上床睡觉了”）。换句话说，冗长的谎言是少见的，这使得实验室研究比人们想像的要现实一些。

- 他们是被动的观察者。他们只是观看录像，因此实际上没有机会真正与潜在的说谎者面谈。但是，这是否是一种局限性还值得怀疑。在史蒂夫（Stiff）、凯姆（Kim）和兰密施（Ramesh）（1992）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观察者实际上和潜在的说谎者进行了面谈。识别率并不比被动观察者的研究的准确率高。在布尔和他同事的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与潜在的说谎者进行了面谈的观察者和没有面谈的观察者的准确性得分（Bull，Strzyzewski & Hunsaker，1991）。结果发现，观察者在识别谎言（49%的准确性得分）方面比面谈者（29%的准确性得分）更准确。最近，菲利（Feeley）和德特克（deTurck）（1997）也发现观察者在谎言识别方面（50%）比面谈者（43%）更准确。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真正地去访谈某人对识别谎言是有害无利的。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首先，面谈者需要专注于面谈本身。举例来说，他们必须决定问什么，他们的问题如何措辞以及在谈话的什么时候问这些问题。除此之外，他们必须努力自我表达，必须倾听被访谈者的话，必须对他们的话做出反应。这需要认知资源，因此这些资源就不可能被用于识别任务上。另一方面，观察者并不是必须关注交谈的进程，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完全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谎言—识别的任务上。第二，面谈者较低的准确率可能是面谈者的事实偏见的结果。面谈者常常比观察者更容易信任潜在的说谎者。（Feeley & deTurck，1997；Granhag & Strömwall，1998）。对

于面谈者存在事实偏见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见 Burgoon 和 Newton[1991],Feeley 和 deTurck[1997]的一些意见)。

观察者的另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他们能彻底地观察潜在的说谎者——从头到脚的。而面谈者则不能,否则会给别人留下很奇怪的印象。交谈规则规定双方要彼此看着对方交谈。但是,眼睛运动却不能提供关于谎言的可靠的信息。观察者不必注意注视某人的面部,因此可以注意其他的更有用的信息。因此,让观察者在警察询问时坐在另一个房间通过录像连接进行观察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然后他们将会有更多的不被打扰的机会观察嫌疑犯。

说谎者的陈述或行为可能造成面谈者的反应——例如,要求进一步的解释。这有不同的方法,中庸的方法(例如"我不明白,可以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吗?"),积极的方法(例如"我确实相信你,但是我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或者消极的方法(例如"我不相信。你是不是在耍我?)。乍一看来,你可能认为进一步的询问有利于测谎者完成任务。说谎者被迫继续说下去,被迫给出更多的信息。很显然,说谎者说得越多,给出的信息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通过言语线索(自相矛盾或者说那些观察者已知是不准确的话)或者非言语线索犯错,暴露谎言。这个推论在探测阶段可能是正确的,但在进一步的询问的开始阶段则不是。一些研究表明,说谎者,至少在最初,进一步的解释能制造比较诚实的印象(Bull, Comstock, Aune & zyzewski, 1989; Bull, Strzyzewski & Comstock, 1991; Levine, McCornack & Aleman, 1997;Stiff & Miller,1986)。探测的类型(中庸,消极或积极的)对此没有影响。因此,说谎者最初都能得到比较诚实的印象,即

使他们被指责说谎。换句话说,探测最初对说谎者是有益的。

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史蒂夫和他的同事认为说谎者一旦意识到观察者的怀疑,他们就会表现出更多的"诚实行为"来回应(Bull,Stiff & Burgoon,1996;Stiff &Miller,1986)。列文(Levine)和同事(Levine & McCornack,1996a;Levine,McCornack & Aleman,1997)不同意这一观念,而我赞同列文他们的观念。正如第2章提到的,探测不会造成更多的诚实行为。除了其他的行为外,探测会导致更多的口吃和自我控制。最近,列文(Levine),马克莱克(McCornack)和阿雷曼(Aleman)(1997)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许多观察者相信当说谎者面对质疑的时候,他们继续说谎是比较困难的,相信当人们不改变以前的说法或者继续否认时他们有可能说实话。但是,还有另外可能的解释。测谎者相信说谎者面对质疑而坚持说谎将会很困难,因此他们期待说谎者出现神经紧张的行为或表明他们面对质疑不得不努力思考的行为。因此,只要说谎者不出现这样的行为,他们就能留下诚实的印象。

- 在实验室中,说谎者面对的风险并不是很高。因此他们说谎时出现非言语线索的可能性相对少些(见第2章)。很显然,欺骗行为的非言语线索越少,测谎者识别谎言将越困难。
- 观察者被要求识别他们不认识的人的谎言,而他们并不熟悉这些人的正常行为。熟悉潜在的说谎者确实能提高识别谎言的能力,这点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的地方进一步讨论。
- 但是,实验室的测谎者也有优点。
- 在实验室实验中,通常对被试进行随机取样,并且全都是"被迫"说谎。这些样本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是个差劲的说谎者,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从不说谎的人。这些无经验的说谎者可能比较容

易被识别。

- 实验室的说谎者被告知他们必须说的谎言的主题。这个主题可能是他们不熟悉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谎言可能局限于他们所知的主题上。
- 实验室的测谎者知道某人将会欺骗他们。因此，他们将会注意并仔细观察那些假设的说谎者。在日常生活中，当有人对他们说谎时，人们常常并不知道，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没有留意到。实际上，人常常是不太留意这些，因为他们通常有很好的信任感——也就是说他们经常假设其他人说的是实话。很显然，如果人们有太多想当然的想法，他们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测谎者。减少轻信感的一个方法就是告诉测谎者，人们比他们想像的更经常欺骗他们。研究已经指出，这样的干预能降低人们的信任感，但是不能提高人们在测谎方面的准确性（Stiff, Kim & Ramesh, 1992; Toris& DePaulo, 1985）。换句话说，这些信息的结果是使得测谎者不太相信别人的陈述，包括那些真实的陈述。解释这些研究结果并不困难。人们被告知他们太信任别人了，但是没有被告知应该从何处识别谎言。因此，菲利（Feeley）和杨（Young）（1997）正确地指出要使人们成为更好的测谎者，仅仅告诫他们不要有太多信任感是不够的，还应该告诉他们从何处着手去识别谎言。
- 实验室的测谎者有机会仔细观察那些假设的说谎者，常常可以从头到脚地观察。当缺乏暴露谎言的细微的动作时，仔细观察可能对测谎非常有用。根据前面提到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某人从头到脚地观察别人会显得很怪异。

总之，实验室对测谎者而言既有利也有弊。因此，很难说在实

验室测谎比在实验室外测谎是更容易还是更困难。但是，无论怎样，由于现实生活和实验室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实验室结论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识别谎言可能要稍微谨慎一些。

测谎者的特点

专业测谎人员

大部分关于测谎的研究都是使用大学生来做测谎者。他们比那些专业测谎人员，例如警察、警探和海关官员的经验可能要少。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专业人士与这些大学生相比，是更好的谎言识别者，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经验。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有 8 个研究是使用专业人员作为测谎者的。这些研究列在表 3.3 中。

表 3.3　专业的测谎人员的准确性得分

	正确率(%)		
	实话	谎言	总计
DePaulo & Pfeifer(1986)(联邦法执行官，有经验的)	64[1]	42[1]	52
DePaulo & Pfeifer(1986)(联邦法执行官，新手)			53
Ekman & O'Sullivan(1991)(特工人员)			64
Ekman & O'Sullivan(1991)(联邦心理测试人员)			56
Ekman & O'Sullivan(1991)(警员)			56
Garrido, Masip, Herrero, Tabernero & Vega(1998)(警员)	26	69	49

（续表）

	正确率（%）		
	实话	谎言	总计
Köhnken（1987）（警员）	58	31	45
Vrij（1993a）（警探）	51	46	49
Vrij & Graham（1997）（警员）			54
Vrij & Mann（即将发表）（警员）	70	57	64
Vrij & Mann（1999）（警员）		50	

[1] 有经验者和新手加在一起的正确率。

狄保罗（DePaulo）和菲佛（Pfeifer）（1986）要求他们的被试——258 名联邦法执行官，其中有经验者（$n = 114$），新手（$n = 144$）——对录音磁带进行谎言识别，这个磁带是关于目标个体在陪审团面前回答关于他们的态度和意见的问题。在埃克曼（Ekman）和奥沙利文（O' Sullivan）的说谎任务中，要求观察者（包括 34 名特工人员，60 名联邦的心理测试人员［polygrapher］和 126 名警员）对录像带中的护士进行谎言识别，这些护士谈了她们看完一部影片后的感受。在加里多（Garrido）和同事（Masip，Herrero，Tabernero 和 Vega）的研究中（1998），来自一个西班牙警察学院的 121 名警察学员观察了一名女性对她自己先前看的一部影片的陈述，包括真实和虚假的陈述。克肯（Köhnken）向 80 名警员呈现了

人们回忆看过的影片(关于一次盗窃和一次斗殴)的录像。维吉向91位警探呈现一个人否认自己拿了一套耳机的录像。维吉和格雷厄姆(Graham)(1997)有一个相似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有29名警察参加。维吉和曼(即将发表)向65名警察呈现了一名被判定为凶手的嫌疑人接受警察询问的录像片断(这个案例已经在第2章中讨论过了)。维吉和曼(1999)向52名穿制服的警察呈现了录像,这些录像是关于现实生活中的记者会上一些人要求公众帮助他们寻找亲人或者杀害亲人的凶手,而事实上,他们最后被认定为凶手。表3.3列出了这些研究所得到的准确率。

表3.3表明专业测谎人员的准确率大概在45% ~60%的范围内,而偶然概率则是50%。平均准确率是54%,这与以大学生做观察者的研究的准确率(56.6%)相似。因此,我们可能得出结论,专业测谎人员并不是比大学生更擅长识别谎言。狄保罗(DePaulo)和菲佛(Pfeifer)(1986)所进行的三项研究,埃克曼(Ekman)和奥沙利文(O'Sullivan)(1991),加里多(Garrido)和同事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也支持这一结论。在这些研究中,大学生也被作为观察者。狄保罗(DePaulo)和菲佛(Pfeifer)(1986)发现,联邦法执行官(包括新手和有经验的官员)与大学生在识别谎言方面是一样好的(也许说一样差更恰当点)。埃克曼(Ekman)和奥沙利文(O'Sullivan)发现,只有特工人员在识别谎言方面比大学生好些。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将回到这一话题。加里多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在识别谎言方面比警察更好。有趣的是,在埃克曼(Ekman)和奥沙利文(O'Sullivan)的研究中准确率是相当低的。观察者面对着一些被剪辑过的录像,录像中的人面对的任务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当这些人看见解剖和烧伤的时候他们必须说他们很愉快,其

次风险很高，因为他们被引导地相信完成说谎任务和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有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景下也有很多人能够成功地避免了谎言被识别。

维吉和曼进行的研究也很有意思，因为这是目前为止惟一的观察者面对现实的和高风险的谎言的研究。也就是被认定的杀人凶手的录像带或者影片，是关于一些人的新闻发布会，这些人后来被认定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这两个研究中的观察者没有一个人知道案件的情况）。在杀人凶手的研究中得到的准确率比其他大部分研究的准确率要高一些，这表明在识别现实生活中的谎言要比识别实验室的谎言容易一些。但仔细研究结果会发现这一结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一高的准确率（64%）是因为观察者对凶手的真话识别率（70%）高于谎言识别率（57%）造成的。记者会研究发现，谎言识别率很低（50%）。因此，即使在现实环境中，警察的谎言识别能力也只是一般。在表 3.3 中列出的谎言的平均识别率（49%）要稍低于真话的平均识别率（54%）。

在狄保罗（DePaulo）和菲佛（Pfeifer）以及加里多（Garrido）和同事们进行的一些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警察与大学生相比，在做出判断时更自信，这表明在识别谎言方面，专业人员比非专业人员更自信但是并不更准确。

自信。专业测谎人员有着高度的自信，认为他们自己能够识别谎言，这在他们识别谎言的工作中是有害的。因为个体越是认为自己有能力识别谎言，就越有可能不去积极仔细地观察别人的行为。高的自信往往导致在有限的信息上匆忙做决定。假设以下的情景。某人准备坐车去度假。但是不幸的是，当正准备出门的时候天气突然变坏。在这种情景下，一个谨慎的司机可能会比一

个有经验的司机更多地去获得关于路上环境的信息，因此可能对是否要驾车出去做一个更周密的决定。例如，这个谨慎的司机会听天气预报以确定情况的发展。有经验的司机可能会依赖不充分的惯性思维，例如“这天气不会一直这么坏”或者“这里的天气很坏，可当我达到度假目的地的时候可能就会好转”等等。在测谎中使用惯性思维基本上是错误的。正如前面第2章提到的，谎言和非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并不能简单转化为惯性思维。

反馈的缺乏。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在测谎方面似乎和非专业人员一样不准的事实，说明专业人员显然没有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学会如何解释那些非言语行为。一种解释是他们通常收到他们的决定是准确的反馈。只有当测谎人员收到充分的反馈结果——也就是关于他们的真话/假话判断是对还是错的充分信息——以后，现实生活中的测谎经验才有可能得到深入的了解。在现实的生活中，这样的结果反馈常常是缺乏的(DePaulo & Pfeifer,1986)。举例来说，对于海关关税官员，他们工作中好的反馈是指他们拦住并搜查的旅行者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在走私，但是也包括那些没有被他们拦住的走私者。而对后者的反馈常常是缺乏的。他们几乎从不能发现他们没有搜查的那些旅行者是不是也在走私，因此他们不能从这样的案例中学到什么①。

一般的情况是，多数海关官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抓获了很多走私者，因此人们会认为他很擅长识别谎言。但是将那些成功骗过这名官员的走私者的人数考虑进来后，就会发现这名官员其实并没有那么成功。

---

①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调查海关官员有多善于识别走私者。让这些海关官员随机拦住100名旅行者，然后让这些官员针对每名旅行者说出他们是否认为这名旅行者想走私。然后，检查这所有的100名旅行者，得出这名官员的直觉的正确度。

一项由维吉和塞敏(1996)进行的研究验证了这一反馈观念。他们通过量表来调查各类人对谎言的非言语指示器的看法。这些人包括大学生、海关官员、监狱守卫、穿制服的警察、警探和囚犯。这些团体之间表现出了差异,包括在视线转移、手和手指运动的看法上的各项差异。

视线转移(图 3.1)并不是欺骗的一个可靠的指示器——也就是说,说谎者和说实话者常常表现出相似的视线转移的模式。但是,许多学生、海关官员、穿制服的警察和警探都认为视线转移与欺骗有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实际上是没有的)最常被囚犯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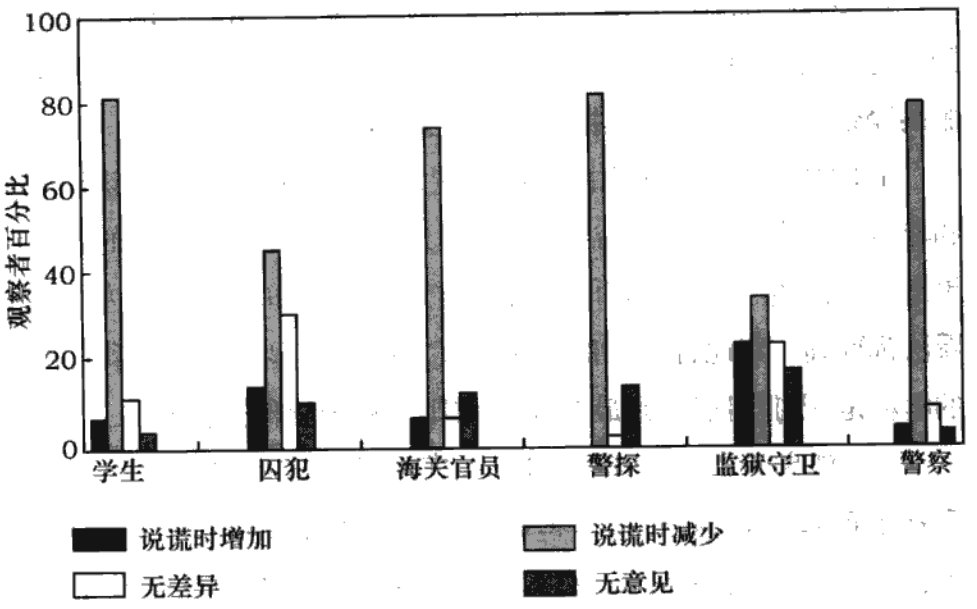

图 3.1　注视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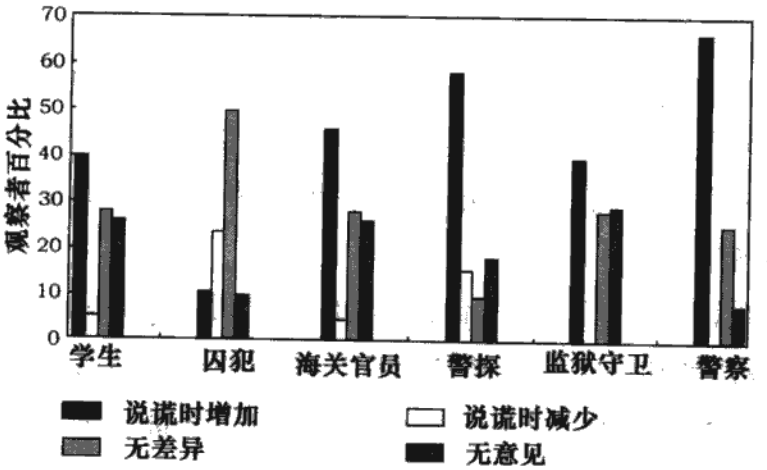

图 3.2 手和手指运动

很多人在说谎的时候手和手指运动会减少。相当多的囚犯都提到了这种相关(图 3.2)。另一方面,大学生、海关官员、监狱守卫、穿制服的警察、警探认为说谎时这些运动会增加。

有两个例子说明囚犯比专业测谎人员和非专业人员在认识欺骗和非言语行为的关系上更准确一些。这一观念被这一研究的其他结果进一步证实。囚犯比其他任何一类人对欺骗和非言语行为关系的看法都准确。其他各类人的看法相互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囚犯可能得到最充分的反馈。我们这样陈述道:

"罪犯生活在一个比"正常"人有更多谎言的文化背景下。对于每个囚犯而言,和其他罪犯以及黑社会的那些坏人呆在一起,处于虚假、欺骗、威胁、许诺、犯人等中,其中很多都是虚假或不真实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成功或者适应,需要部分依赖于你能识别出别人的谎言的能力。"

我进行的第二个研究进一步证明专业测谎人员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哪种非言语行为线索能够表征说谎(Veij,1993a)。在这个

研究中，要求 91 名警探观看比较短的对 20 名学生的面谈录像，学生谎称或者没有谎称他们自己拿了一套耳机。要求警探指出他们谁说了谎话，谁没有。关于这 20 名被试的信息我知道一些——例如，他们在谈话时的行为，因为视线转移、笑容、口吃、口误、高音、以及躯体、头部、手、手指、胳膊、腿、脚运动都被进行了评定。另外，还测量了身体特点（性别和穿衣风格）和个性特点（社交焦虑和公共自我意识）（这些特点是通过访谈前让学生完成的量表得到的）。首先，结果表明，警探并不擅长于识别学生的谎言。他们的准确率是 49%，接近偶然概率水平（50%）。第二，有意思的是，虽然警探没有成功地识别出说谎者，但是他们之间认定某人说谎或者说实话的一致性很高。因为很多警探做出了相似的判定，他们的判断肯定是在相同的线索基础上做出的，或者用的同样的方式加工线索。因此，检查警探加工线索的方式似乎是合理的。为了确定这点，我使用了一种叫回归分析的统计检验方法，这一方法对警探用来做判定的线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又叫谎言识别线索，见本章开头部分）。结果见图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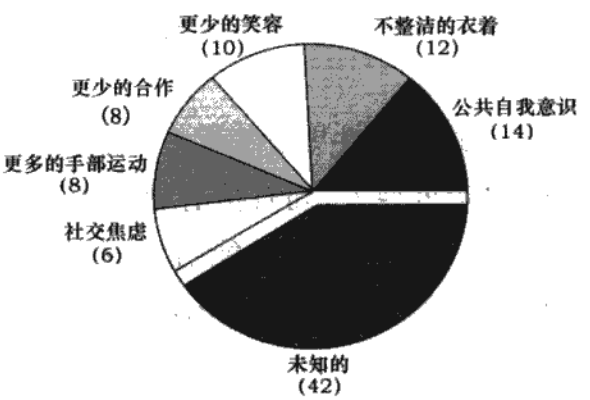

图 3.3　警探所用的线索

对录像中20名学生的行为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说谎者和说实话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说谎者实际上比说实话者更少做出手和手指动作。因此警探可能通过注意手和手指动作来识别说谎者。图3.3表明警探确实观察了手和手指动作,但是他们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为他们认为手和手指动作增加的人说谎。他们还受学生的笑容的影响,而笑容并不是识别谎言的一个可靠的指示器。学生的个性特点也对警探的判断起了很大的影响。表现出社交焦虑的学生与那些没有表现出社交焦虑的学生相比,更多地给警探留下了不诚实的印象,而在公共自我意识方面得分高者比那些得分低者更让人信任。看起来,警探把那些低公共自我意识和高社交焦虑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解释成说谎行为,而不是正常的行为。甚至穿衣的风格对警探的判断都有影响。那些衣着良好的学生比那些衣着不好的学生更多地留下诚实的印象。很显然把衣着风格作为判断谎言的基础是令人疑惑的。最后,警探将说话的内容也考虑在内。在整个访谈中更合作的学生比那些不太合作的学生给警探留下更诚实的印象。警探所使用的测谎的指示器中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因此他们被学生所欺骗就不足为奇了。

观察者的性别

女性的非言语表达比男性更清楚有力。他们比男性更多地向别人微笑和注视,更亲近他人,而且更有感触性(DePaulo, Epstein & Wyer, 1993)。结果是女性比男性能引发更多的温暖。女性比男性能更好地用面部表情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觉。他们也能更好地读懂别人的非言语行为——也就是,她们比男性更擅长于理解他人传达的信息(Hall, 1979, 1984; Rosenthal & DePaulo, 1979)。她们在阅读人们最容易控制的面部表达时比男性占优势(见第2

章)(DePaulo,Epstein & Wyer,1993)。当观察和解释非言语线索时,女性要花较多的时间,而且,她们在识别谎言的过程中更多地使用线索(Hurd & Noller,1988)。

霍尔(Hall)(1979,见 DePaulo,Epstein & Wyer,1993)在 11 个国家考察了女性在理解非言语信息上对男性的优势。她发现,似乎在最受压迫的国家(例如,在那些女性少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国家)中的女性最熟练。适应倾向可能能解释这一现象。许多社会的女性角色暗示她们必须比男性更需要适应他人。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释人们的非言语行为可能在帮助她们适应这方面非常有价值。

虽然女人在解释非言语信息方面优于男性,但是她们在识别谎言方面并不好于男性(DePaulo,Epstein & Wyer,1993;Hurd & Noller,1988;Manstead,Wagner & MacDonald,1986)。然而,马克莱克(McCornack)和帕克斯(Parks)(1990)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擅长于识别伴侣所说的谎言。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多疑,而且更经常地认为别人说的是实话(DePaulo,Epstein & Wyer,1993)。以下的解释听起来是合理的。女性比男性更擅长于对别人传递的信息进行解码。但是,在说谎时,说谎者试图隐藏他们的真实感觉和想法。当识别谎言的时候,观察者不应该看人们所要表达的而是应该看他们要隐藏的东西。但是,在这方面,女性并没有得到比男性更好的训练。当她们试图测谎时,她们可能更多地受别人传递的信息的影响。这使得她们比男性更轻信别人。

说谎者的特点

与说谎者的熟悉度

在大多数识别谎言的研究中,都要求观察者去识别那些他们

不认识的人说的谎言。虽然这确实也常常发生在现实情景中(例如,判断店员或政客)。但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要识别那些我们熟悉的人的谎言。认为我们识别熟悉的人的谎言比识别陌生人的谎言要容易的想法似乎是合理的。举例来说,我们对我们认识的人的正常行为很熟悉,因此即使他们的行为出现很微小的变化我们都能发现。研究一致指出,当人们对他们要判断的人的真实行为熟悉以后,他们就能更好地识别谎言和实话(Brandt, Miller & Hocking,1980a,b,1982;Feeley,deTurck & Young,1995)。举例来说,菲利(Feeley)和他的同事让一些观察者和他们要测谎的那些人进行了基线访谈(baseline interview)。他们的准确率(72%)比那些没有进行基线访谈的观察者(56%)要高。但是,奥沙利文(O'Sullivan),埃克曼(Ekman)和弗里森(Friesen)(1988)发现,只有基线信息是真实的时候,这些信息才能有利于观察者。他们认为,因为观察者倾向于假设他们观察的行为是诚实的(习惯性思维),他们更可能认为第一个行为(也就是基线行为)是诚实而并非不诚实。如果第一个行为是诚实的,那么认定后面的不同的行为为不诚实的行为则变得比较容易。但是,如果第一个行为实际上是虚假的,但被错误地标定为是诚实的,那么对后来的行为就可能出现错误的判定。

还没有证据证明对朋友或爱人的谎言识别比对陌生人更容易(表3.4)。在表3.4中所列出的研究,其平均准确率是58%,稍高于陌生人的平均准确率(56.6%;附录3.1)。米勒(Miller)等人(1986)提到了鲍切勒(Bauchner)的一项研究,这一研究发现朋友间识别彼此谎言的准确率是74%。这么高的准确率在陌生人研究中从未发现过。然而,这一个发现没有在其他的研究中被证实。

布尔和他的同事(Buller,Strzyzewski & Comstock,1991a)发现,观察者判断朋友或陌生人说实话和谎言的准确率没有差异。米勒(Millar)和米勒(Millar)(1995)发现,观察者评价朋友(46%击中率)没有评价陌生人(54%击中率)那么准确。卡门德拉(Comadena)(1982)发现,在判断朋友和爱人的准确率之间没有差异。

表 3.4　非专业观察者判断朋友或爱人的准确率

	准确率(%)		
	实话	谎言	总计
Bauchner(朋友)(引自 Miller,Mongeau & Sleight,1986)			74
Levine,McCornack & Park(1998)(未婚伴侣)	82	34	58
McCornack & Levine(1990)(未婚伴侣)			58[1]
McCornack & Parks(1986)(未婚伴侣)			59
Millar & Millar(1995)(研究 1:朋友和亲戚)			46[2]
Millar & Millar(1995)(研究 2:朋友和亲戚)			51[2]

[1] 所有环境的混合。

[2] 声音和录像信息环境。

在一系列的研究中,马克莱克(McCornack)和列文(Levine)发

现，即使谎言是亲密的人说的，也很难被识别（见表 3.4）。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当关系变得更亲密的时候，伴侣之间发展出强烈的判断对方说的是实话的倾向，称为关系型事实偏见习惯思维（relational truth - bias heuristic）（Levine，McCornack & Park，1999）。马克莱克（McCornack）和帕克（Park）已经提出并验证了这一模型（见 Levine & McCornack 的描述，1992）。一旦两人之间的关系增强，他们将会更自信地认为他们能发现彼此谎言（“我非常了解这个人，我能够识别他或她是否在说谎”）。然后高度的自信将会形成认为另一个人或许不敢说谎的信念（“另一个人最好当心，我将会识别他对我说的每一个谎言”）。这将会导致他们花越来越少的精力去发现某人是否在说谎（“我无需太烦恼。另一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对我说谎”）。（Stiff，Kim & Ramesh，1992）。很显然，某人花越少的精力去识别欺骗，就越容易被骗过。

但是，这些调查结果与狄保罗（DePaulo）和凯西（Kashy）（1998）的日记研究的结果相反。他们在他们的研究（第 1 章中已经说到）中发现，对那些个体感觉亲近的人说谎比对那些感觉不亲近的人说谎更容易被识别。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马克莱克（McCornack）和列文（Levine）的研究中，观察者为了识别谎言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伴侣的非言语行为上，他们的研究表明观察者不是很擅长用非言语行为测谎。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不是仅仅局限于观察别人的行为，他们还常常有机会检查人们说的是否是真的。而狄保罗研究的被试可能是通过检查说谎者提供的信息来识别谎言的。

查哈尔（Chahal）和卡西迪（Cassidy）（1995）让社工、教师和学生观看儿童（8 岁）的录像，他们有的说谎，有的没有说谎。对每个

孩子，判断者必须判定他或她是否在说谎。因为社工和老师对孩子的经验更多，所以研究人员假设社工和老师比学生能更好地完成这一谎言识别任务。他们的假设没有得到证实，但是他们却发现，有孩子的判断者（他们识别了 82% 的谎言）比没有孩子的判断者（他们识别了 52% 的谎言）是更好的谎言识别者，这表明有自己的孩子能有利于识别孩子的谎言。

对主题的熟悉度

当谎言识别者对说谎者讨论的主题很熟悉的时候，识别谎言就比较容易（Levine，McCornack & Aleman，1997）。但是当说谎者讨论熟悉的主题与不熟悉的主题相比，谎言识别者并不能更好地解释非言语行为，但是对通过检查说话的内容来识别谎言而言，熟悉主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一个人知道图书馆现在是开着的，当她的儿子告诉她图书馆关了，她就能很容易地识别儿子的谎言。

说谎者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们倾向于对他们的伴侣和他们不是很熟悉的人说不同的谎言（Metts，1989）。人们说的大多数的谎言是直接的谎言（见第 1 章）。但是，人们不太可能对他们的伴侣说直接谎言，因为他们相信那样风险太大，他们的伴侣最终将会发现他们正说谎。而且，他们已经意料到了谎言一旦被识破就要面临的问题，否则你如何解释你对你的伴侣说谎呢？因此告诉伴侣的谎言常常是技巧的谎言，例如隐瞒。这类谎言很难被识别，因为没有给出可供检查的信息。如果这类谎言被识别了，也很容易去解释。说谎者可能说他们忘记说了，或者说他们之所以没有说是因为他们以为对方不感兴趣，等等。

对交流风格的熟悉度

如果谎言识别者熟悉说谎者的交流风格，那么对识别谎言是

有利的。举例来说,当人们和有魅力的人说话时比对没有魅力的人说话时更有一种较开放的交流风格。这意味着对有魅力的和没有魅力的人而言,使用的是不同的交流风格(DePaulo,1994)。狄保罗、唐(Tang)和史通(Stone)(1987)考察了这是否会对识别谎言有影响。他们要求被试对有魅力的和没有魅力的交谈对象说实话和谎话。这些陈述被录像,并呈现给有魅力和没有魅力的观察者。在录像带上,只能看见潜在的说谎者,没有说明谎言是对有魅力的还是对没有魅力的人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魅力的观察者在识别对有魅力的人说的实话和谎话方面比较好,而没有魅力的观察者在识别对没有魅力的人说的实话和谎话方面更正确。因此有魅力的人或没有魅力的人在他们熟悉的风格中能更好地识别谎言。

当谎言识别者对那些属于他们文化或者属于另外一个文化的人的谎言进行识别时,有着相同的模式(Bond,Omar,Mahmoud & Bonser,1990)。当告诉观察者和他们说话的人是和他们自己一个种族时,会发现观察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出谎言和实话,然而,当种族不一样时,观察者则不能区别出谎言和实话。例如,一名美国的观察者,当他们被告知他的观察对象是美国人时,他识别谎言和实话的准确率要高于偶然概率,但是,当他被告知他的观察对象是约旦人时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而约旦的判断者则恰好相反。当他们被告知他的观察对象是约旦人时,他识别谎言和实话的准确率要高于偶然概率,但是,当他被告知是美国人时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观察者不得不对没有声音的录像带评定真实的和虚假的陈述)。

说谎者的年龄

说谎是必须去学习的技能。举例来说,识别年纪小的孩子谎

言比识别年纪大的孩子的谎言要容易(DePaulo,1991;Feldman,Jenkins & Popoola,1979)。说谎变得越来越有技巧的过程在成人初期还不会结束。谎言识别者已经发现对一个 79 岁的人说的谎言比一个 19 岁的人说的谎言识别起来更困难(Parham,Feldman,Oster & Popoola,198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年轻的孩子不擅长说谎。恰恰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擅长说谎。例如,在我们的研究(Vrij &Van Wijngaarden,1994)中,让 5 岁和 6 岁的孩子去尝两种饮料,即柚子汁和橘子汁。要求他们在喝完以后告诉访谈者每一种饮料都很好喝,而不管实际上味道如何。用录像机记录下这些访谈。在两次访谈完成以后,要求每个孩子说出他们对两种饮料真正的感觉。实际上,他们几乎全都讨厌柚子汁而喜欢橘子汁。随机地选取一些孩子的录像,他们在一个访谈中说的是实话而在另一个访谈中说的是谎话,然后把这些录像放给成人看。在看完每个录像片断以后,都要求成人指出孩子是否真的喜欢这种饮料(我们为了不让观察者通过饮料的颜色来判断,我们改变了饮料的颜色)。只有 56% 的实话和谎言被识别出来。

在另外的一项研究(Westcott,David &Clifford,1991)中,让 7 ~ 11 岁的孩子对一次博物馆参观进行描述。一些孩子实际上去过那里,因此他们是真实地描述了这次参观。但是,其他的孩子从未去过博物馆,但看过有关的影片。他们被要求假装他们实际上是到过博物馆的。对每个孩子,判断者必须指出他或她是否在说实话。这些判断者只能识别 59% 的实话和谎言。

杰克森(Jackson)(1996)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了有技巧的孩子是多么善于说谎。给年纪在 11 和 12 岁的孩子看一部关于一个黑猩猩的故事的电影,然后对这些孩子就电影的一些情况进行访谈。

另一组相同年龄的孩子没看过电影，但他们必须在访谈中假装已经看过了。把访谈的录像给律师和学生看。结果发现，没有看过电影的孩子非常成功地欺骗了律师和学生。只有31%的律师和25%的学生意识到这些孩子的陈述是虚假的。这个百分比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孩子面临的任务并不容易。但是，在说谎情景下的大部分孩子以前曾经看过了有关黑猩猩的电影，而且也曾经谈论过一些相关的经历。

一些说谎的孩子使用了一个很聪敏的策略（虽然他们可能是无意识这样做的）。问所有的孩子他们是否喜欢他们刚才看的有关黑猩猩的电影。那些实际上看过电影的孩子比那些实际没有看电影的孩子更多地说喜欢这部电影。那些说不喜欢这个电影的说谎者在随后的访谈中用到了这一策略。当要求他们描述电影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他们答复说他们记不起这些细节了，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个电影因此没有仔细看。总之，他们为他们不能说出细节提供了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理由。

说谎者的个性

阻碍谎言识别的一个因素之一就是一些个体的非言语行为给别人的印象是他们在说实话（诚实态度偏见），而其他人的正常行为却给别人他们在说谎话的印象（不诚实态度偏见）。这和个性特点有关。

例如，善于自我表达的人，不管他们宣称的是否是事实都会显得可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善于说谎，而是他们能很自然地解除别人的怀疑，使他们更容易让他们的谎言得以逃脱（Riggio，1986）。

有很强的公众自我意识的人也容易给其他人留下可信的印象，无论他们是否在说实话。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行动能够给

别人留下可信的印象。例如,在第2章中提到的,这些人在说谎的时候倾向于控制那些观察者认为与说实话相关的动作。他们也是经常说谎的人(见第1章)。

另一方面,个性内向,有社交焦虑的人,给别人的印象比较不可信。对有社交焦虑的人而言,个性内向、社交笨拙、神经紧张或恐惧是自然的,但是会被观察者解释为欺骗的指示器。如果这些结论应用于专业测谎人员,例如海关官员,他们就没有理由不去更多地查看那些个性内向的和有社交焦虑的人,而不是更多地查看那些个性相反的人。但是,是否有某种类型的人会更多地从事走私行为呢?个性内向者并不经常说谎(见第1章),而且他们比外向者更少犯罪(Eysenck,1984)。此外,有社交焦虑的人是那种一旦面临挑战就不再坚持说谎的人(见第1章)。

在第一章中我们还指出,在权谋上得分高的人经常说谎。可以认为他们是非常善于说谎的,因为他们不会因为说谎而有负罪感。但是与识别那些权谋得分低的人说的谎相比,识别那些得分高的人的谎言既不更容易也不更困难(Manstead,Wagner & Macdonald,1986)。

表框3.2 测试你给别人留下了什么类型的印象的小测验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发现你是否给别人留下了可信的印象。吉欧(Riggio)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83)发现,擅长用面部表达基本感情(快乐,忿怒,恐惧,惊奇,悲哀和厌恶)的人比那些不擅长用面部表达的人能给观察者留下更可信的印象。因此试着用面部表达你的基本感情,然后让别人去判断你要表达的感情。别人判断正确的百分比可能是你给别人留下印象的可信度的表征。

说谎者的种族

我已经提到，如果谎言识别者和说谎者的种族背景不一样，那么测谎将会更困难。研究表明，无论黑人嫌疑犯有没有说实话，他们给白人警察留下的印象要比白人嫌疑犯给白人警察留下的印象更可疑。这是因为白人嫌疑犯表现的行为与黑人嫌疑犯的行为不同（Vrij，1991；Vrij & Winkel，1990，1991；）。

研究已经指出，非言语行为是受文化调节的，因此要用文化背景知识来解释非言语行为（Ruby & Brigham，1997；Vrij，1991）。例如，谈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在西方文化中是礼貌而在其他很多文化中是无礼的表现，尤其是对那些权威人士例如警察。这就是为什么非裔美国人比白种美国人更多地表现出视线转移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在荷兰的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比当地土生土长的荷兰人更多地表现出视线转移的原因。其他的研究者也发现非裔美国人比白种人的动作更多。

和其他同事一起，我在荷兰的模拟警察询问中考察了当地的白种荷兰人和苏里南黑人（来自苏里南的，但现在在荷兰居住）（Vrij，1991；Vrij & Winkel，1990，1991；Vrij，Winkel & Koppelaar，1988）。在一个购物中心找来荷兰人和苏里南人做被试，考察他们在接受警察询问时的表现。同意参加研究的购物者在一个移动的实验室中接受一名穿制服的警官关于一套耳机的询问（我们用了两名访谈者，一名是一个苏里南警官，一名是土生的荷兰警察。实际上我们只对一半的购物者每人提供了一套耳机，并让他们把耳机藏起来，而且在访谈时否认拥有耳机）。

所有的访谈都用隐蔽的录像机录下来，并随后对购物者的行

为进行评分(访谈结束以后我们会告诉被访谈者录像的事情,并征得他们同意,让我们在研究中使用这些录像)。研究的结果表明,在荷兰和苏里南"嫌疑犯"之间有许多行为差异。荷兰人和苏里南人之间的差异列在表 3.5. 的第三栏中。

表 3.5　欺骗的主观和客观非言语指示器以及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非言语差异

	1 主观指示器[1]	2 客观(真实)指示器[2]	黑人和白人 之间的差异[3]
声音特征			
高音	>	>	*
口吃	>	>	–
口误	>	>	>
语速减慢	>	>	>
潜伏期	>	–	*
停顿持续时间	>	>	*
停顿频率	>	–	*
非声音特征			
视线转移	>	–	>
笑容	>	–	>
眨眼	>	–	

（续表）

	1 主观指示器[1]	2 客观（真实）指示器[2]	黑人和白人 之间的差异[3]
手势	>	<	>
自我控制	>	–	>
手/手指	>	<	*
腿/脚	>	<	*
头部	–	–	–
躯体	>	–	>
变换坐姿	>	–	–

[1] >，观察者将行为的增加与欺骗联系在一起

<，观察者将行为的减少与欺骗联系在一起

–，观察者没有将行为与欺骗联系在一起

[2] >，说谎时增加

<，说谎时减少

–，与说谎无关

[3] >，行为在黑人中比在白人中更经常出现

–，行为在黑人和白人间没有差异

*，没有考察

苏里南人无论是否在说谎都会出现更多的口误、说话更慢、说话带有高音、出现更多的视线转移、更多的笑容、自我控制，手势和躯体运动。

表3.5第三栏的结果与欺骗的主观指示器（栏1）的结果有很大的重叠，典型的黑人行为与黑人给白人留下可疑印象的行为是

吻合的。这在跨文化的警察询问中可能容易导致跨文化的非言语交流错误。也就是说,典型的黑人的非言语行为模式可能被白人观察者解释成为试图隐瞒事实。这一观念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得到了检验(Vrij & Winkel(1992a, 1994; Vrij, Winkel & Koppelaar, 1991)。模拟警察询问的场景被录像下来,其中白人(本地荷兰人)和黑人(苏里南人)扮演者表现出了典型白人或典型黑人的非言语行为。例如,扮演者在一个版本中表现出典型的黑人注视行为(在一分钟的询问中他们转移视线的时间达35秒之久),而在另一版本中则是典型的白人的注视行为(他们每面谈一分钟转移视线26秒)。他们在一个版本中表现了典型的黑人动作(他们每面谈一分钟就出现了7.5次自我控制以及手和手指运动),而在另一个版本中则是典型的白人动作(他们每面谈一分钟只出现了4次自我控制以及手和手指运动),等等。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得到了典型的"白人"和"黑人"行为的标准数据。录像开始是对街道和客厅的扫描。通过现场评论,告诉观看者有一名年轻的女人已经被袭击和抢劫,警察认为罪犯就住在这条街上。因此,警察正在挨家访问,并对所有的男性进行简短的询问。后来,一名男子出现在视野中,和一名警官说话(始终看不到这名警察)。把这个询问呈现给荷兰裔白人警官看,并要求他说出这名男子给他留下什么可疑的印象。结果如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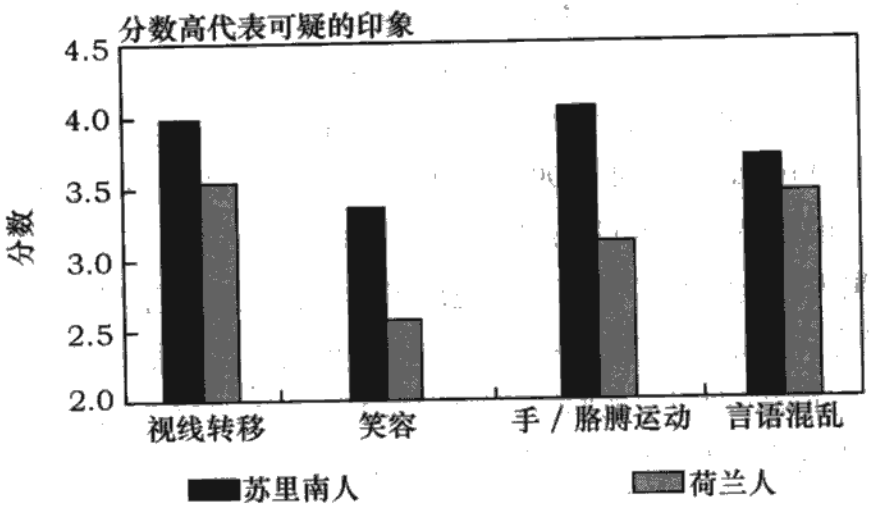

图 3.4　跨文化非言语交流错误

图 3.4 显示了一个稳定的模式。在所有的研究中，当行为人表现出黑人的非言语行为，比他们表现出白人的非言语行为更可能留下可疑的印象。举例来说，关于动作的实验表明当嫌疑犯表现出典型的黑人的非言语行为（相对多的运动）时，72% 的人会受到怀疑，而同样的嫌疑犯，当他们表现出典型的白人的非言语行为（较少的运动）时，只有 41% 的人受到怀疑。有趣的是，人种背景对警官的印象没有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发现白人嫌疑犯和黑人嫌疑犯一样可疑。但是，无论是白人嫌疑犯还是黑人嫌疑犯，如果他们表现出了黑人的非言语行为时，比他们表现出白人的非言语行为会产生更多的可疑的印象。这些研究结果都支持这一假设，就是跨文化的非言语交流错误在警察询问期间确实存在，并且黑人的典型非言语行为模式被白人观察者解释为欺骗的表征。

为什么人们在测谎方面如此不熟练

这章和前面的一章对人们为什么不善于测谎提供了几个解释。在这一部分,我将进行简短地总结。一些解释认为观察者犯下了不必要的错误。因此告诉观察者他们经常犯错误会提高他们的测谎技巧。下面的部分我们将讨论训练是否能够使人成为更好的谎言识别者。

- 人们难于识别谎言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事实(Ekman,1993)。举例来说,根据第1章提到的,人们常常不想知道他或她刚刚送给主人的礼物,主人是否真的喜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对他们没有好处。因此,当主人告诉客人他们真的喜欢这个礼物时,客人就会急于相信。而且,当别人恭维他们所做的事情或者他们的外表时,人们常常很高兴。因此他们不会努力去发现这些赞美他们的人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许多环境中,人们确实需要发现某人是否在说谎,但是,即使是识别谎言动机很高的人也是相当容易被欺骗的。剩下的几点将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 不存在典型的欺骗行为——也就是说,没有行为或者一组行为是所有说谎者都有的。欺骗行为有赖于个体的个性和说谎时的环境。很显然,不存在着普遍的欺骗行为的事实使得观察者很难决定从何下手。
- 说谎者和说实话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是非常小的。弗洛伊德的观念"背叛无孔不入"(见第2章)并不总是正确的。很显然,差异越小就越难识别它们。
- 交谈规则阻碍着谎言识别者恰当地分析一个被控说谎的人。当

观察者不断地问问题时，说谎者继续说谎将会变得很困难。我们在第 2 章中已经提到，说谎者必须避免说话自相矛盾，不应说那些观察者已经知道不是事实的事情，必须记住他们已经说过的事情以防某人要求他们重复或澄清。而且，说谎者必须始终控制他们的行为以免可能由于神经紧张或内容复杂而暴露谎言。而当观察者不断地问问题迫使说谎者不断说谎时，这些困难将会增加。但是，正如本章早些时候提到的，如果交谈对象对某人说的任何事情都质疑的话，那么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激怒。如果谎言识别者有机会对潜在的说谎者从头到脚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十分有利的，因为身体运动可能会暴露谎言。这种从－头－到－脚的观察在交谈中是非常不寻常的，会给别人留下奇怪的印象。我们常常会限制我们的眼睛看交谈对象的眼睛。但眼睛运动不能提供关于说谎的可靠信息。

- 观察者的判断常常被各种的系统错误和偏见所影响。观察者可能不是积极仔细地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转为依靠相对不谨慎的判断规则，这些规则常常被贴上认知惯性思维的标签（Levine, McCornack &Park，1999）。例如有效惯性思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的是面对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陈述，因此他们常常会假设他们观察的行为是诚实的（这一行为导致事实偏见）。少见惯性思维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把那些奇怪的或少见的行为判定为欺骗行为，而不管他们实际上是否是欺骗行为。关系事实偏见惯性思维的发生是因为随着关系变得更亲密，伴侣会出现比较强烈的判断对方是诚实的趋向判断。最后，代表性惯性思维，人们相信紧张行为和表明内容复杂的行为表征着欺骗。总之，人们常常使用那些错误的线索来识别谎言，因为实际上说

谎者并不是常常会出现这些行为。

- 即使人们出现紧张行为或表明内容复杂的行为，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在说谎（Bond & Fahey，1987）。一个诚实、无辜的嫌疑犯，由于担心警察不信任他也可能因为恐惧表现出与有罪的嫌疑犯因为害怕被识别而表现出的一样的紧张行为。
- 观察者常常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对行为的影响。举例来说，个性内向者和有社交焦虑者时常给观察者留下不诚实的印象，黑人也是这样（至少在白人观察者眼中是这样）。这些人群自然表现的行为常常被观察者错误地解释为说谎。

对人们测谎的训练

布尔（Bull）（1989）发表了关于训练人们测谎的前景的悲观观念。他指出，大量的警察招募广告和警察训练书籍都暗示通过行为线索识别谎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这些线索的训练能够提高对谎言的识别能力。布尔考察了已经出版的关于训练效果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训练有效的证据。他得出结论，“看来，一些警察招募广告和警察训练书籍是在欺骗读者，除非权威期刊发表的文章能够指出这样训练能提高谎言的识别。”（Bull，1989，p. 83）

据我所知，作为对布尔的挑战的回应，已经有 11 项研究已经在权威期刊上发表，它们考察了训练对谎言识别的影响。它们大部分都列在附录 3.2 中。

在所有的研究中，都给观察者播放对许多说真话或者谎话的人的短的访谈录像或录音。通常，有三个不同的程序被用于训练期。一些研究用了“集中程序”，让他们的判断者只注意特定的线

索而忽略其它的(即那些不表征欺骗的线索)。举例来说,狄保罗(DePaulo)、莱西特(Lassiter)和史通(Stone)(1982)要求他们的被试在"声音的音调"条件下注意说话者如何说,而不是他们说话的内容或他们说话时的表情(这一项研究没有列在附录3.2中,因为作者没有提供准确率)。德特克(deTurck)和他的同事用了一个相似的程序。其他的研究用了"信息程序",为判断者提供一些关于某些行为与欺骗之间的客观的关系的信息。例如,费德勒(Fiedler)和沃尔克(Walka)(1993)告诉他们的判断者说谎时常伴随着高音。维吉(Vrij)(1994)以及维吉(Vrij)和格雷厄姆(Graham)(1997)用了相似的程序。最后,在一些研究(Fiedler & Walka 1993;Vrij,1994;Zuckerman,Koestner & Colella,1984,1985)中,给观察者提供结果反馈——也就是说,观察者在学习期间,每看完一个片断就被告知他们刚刚作出有关陈述是真是假的判断实际上是否正确。

在有些研究中,不只给出一个类型的信息。例如,费德勒(Fiedler)和沃尔克(Walka)除了给一组观察者提供一些关于某些行为与欺骗之间的客观的关系的信息之外,还给另一组观察者多提供了结果反馈的信息。在一些研究中,不同的观察者要观看不同的录像。例如,在朱克曼(Zuckerman)等人(1985)的实验中,一些观察者只看见了说谎者的面部,而另一些观察者只听到他们的声音,还有一些能同时看见面部和听到声音。所有研究中的观察者都是大学生,除了克肯(Köhnken)(1987),维吉(1994)和,维吉(Vrij)和格雷厄姆(Graham)(1997)进行的研究以外,他们的研究是用警察作的被试。

从附录3.2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谎言识别者在测谎技巧

方面都有提高,无论他们得到了什么方法的训练。因此,改善人们识别谎言的能力是可能的。在三项研究(Köhnken,1987;Vrij,1994;Vrij & Graham,1997)中,信息损害了判断者识别欺骗的能力。有意思的是,有三项观察者是警察而不是学生的研究表明,学生从这些信息中比警察获益更多。这个观点得到了事实的支持,在维吉(Vrij)和格雷厄姆(Graham)(1997)的研究中,学生因为获得信息而确实成为了更好的谎言识别者,而警察在获得信息以后的表现则差些。我思考了为什么警察似乎不能从获得的信息中受益的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获得的信息太复杂了让他们难于理解。在维吉(Vrij)和格雷厄姆(Graham)(1997)的研究中应该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对于那些不熟悉个性理论的人而言,他们获得的关于个性特点与欺骗行为的关系的信息也许是太复杂了。这个实验的学生观察者(他们从信息中受益)是心理学的学生,并已经熟悉了个性理论(但并不熟悉个性特点与欺骗之间的关系)。而且,克肯(Köhnken)(1987)还用信息的复杂性来解释他的研究中为什么训练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信息为什么会造成较低的准确性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在维吉(Vrij)(1994)的研究中被解释成是因为警察拒绝使用获得的信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信息。获得的信息说,说谎者的手和手指方面动作会减少。这与警察的传统观念相反,因为他们相信手和手指动作的增加表征着欺骗(Vrij & Semin,1996)。

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效果是有限的。受过训练的观察者的平均的准确率是57%,而未经训练的观察者达到了54%的准确率。在大多数的研究中,受过训练的观察者的准确率不超过65%。但是,在解释这些结果的时候应该考虑这样的事实,即在这些实验中

的训练期是短时间的，并且不全面的，因此也没能提供谎言识别的高度复杂的特征。更全面的和更复杂的训练程序可能能产生较好的效果。我认为，这样的训练程序应该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例如，不要告知观察者那些是欺骗的客观的指示器，因为并不是每个说谎者都会表现出这些行为。我认为，应该通过咨询优秀的谎言识别者来开发出更好的训练程序。研究已经指出，这些优秀的谎言识别者确实存在。正如以前提到的，特工人员与其他人相比在识别谎言方面是比较好的（见表 3.3）。举例来说，53% 的特工人员能达到至少 70% 的准确率，29% 的特工人员能达到 80% 的准确率或更高（Ekman & O'Sullivan，1991）。在维吉和曼（即将发表）关于那名有罪的凶手的研究中，29% 的谎言识别者（警察）获得的准确率至少是 80%，9% 的识别者达到了 100% 的准确率。因此，这些人似乎能相当准确地识别谎言。

很明显，只有当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优秀的谎言识别者测谎时使用哪些线索我们才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然后不幸的是，这些线索仍然是未知的，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已有的研究能发现是什么能使一个人成为一名好的谎言识别者。在询问犯罪嫌疑人方面，测谎能力与性别、年龄或经验没有相关（Ekman & O'Sullivan，1991；Vrij &Mann，即将发表）。男性和女性一样熟练，年长的谎言识别者并不比年轻人好，在询问嫌疑犯方面经验丰富的人也不比那些缺乏经验者强。识别谎言的能力也与自信没有相关关系（见 DePaulo，Charlton，Cooper，Lindsay & Muhlenbruck1997 年对准确性和自信相关性的元分析）。不正确的谎言识别者和正确的谎言识别者一样自信。好的谎言识别者将会是好的说谎者，这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还不清楚这是否是正确的，因为研究的结果是矛盾的。

狄保罗(DePaulo)和罗森塔尔(Rosenthal)(1979)发现好的说谎者和成为一个好的谎言识别者之间没有相关,但是曼斯台德(Manstead),华格纳(Wagner)和麦克唐纳(MacDonald)(1986)反驳了这一观念。

埃克曼(Ekman)和奥沙利文(O'Sullivan)(1991) 的初步结果表明,好的谎言识别者对不同人使用不同的线索(例如,他们在识别第一个人时使用与说话相关的线索,对第二个人使用与声音相关的线索,对第三个人使用与身体动作相关的线索)。而不正确的谎言识别似乎使用"经验法则"策略,对不同的人测谎用同一个线索。维吉和曼(即将发表)也发现,好的谎言识别者比差的识别者更少依赖刻板的信念,例如"说谎者会视线转移"和"说谎者很慌张"。正如前面提到的,刻板的经验法则策略注定是失败,因为不同的人在说谎时表现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埃克曼和他的同事发现,观察者识别面部细微情绪表达(用一个特定的细微表达测验测量)的能力和他们在谎言识别任务中的谎言识别能力有正相关(Ekman & O'Sulhvan,1991;Frank,Ekman,1997)。换句话说,好的谎言识别能熟练地注意到面部的细微情绪表达。

另外,更多地利用谎言识别者已有的技巧可能也是一个好主意。有证据表明人们有一些固有的对欺骗的知识,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DePaulo,1994)。举例来说,人们为了确定某人是否说谎,会大声地说他们的看法,如果他们认为信息是谎言而不是事实,那么他们听起来就比较不自信,而如果他们认为这信息是真实的,他们很可能会提到这信息是捏造的可能性(DePaulo,1994;Hurd & Noller,1988)。

建　议

观察者——不仅是非专业人士还有专业测谎人员——常常有不正确的关于欺骗线索的信念，而且在对欺骗者非言语行为基础上的欺骗识别并不是很成功。识别欺骗能力的缺乏也许并不令人惊讶，要知道在欺骗时表现出来的非语言行为依赖于个体的特点，谎言的类型和说谎时的环境，而且说实话者和说谎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是很小的。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困难，但是得出结论说通过观察人的非言语行为来识别欺骗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对的。正如在第 2 章中提到的，法兰克（Frank）和埃克曼（Ekman）（1997）提到，通过观察情绪表达可以发现 80% 的事实和谎言。在我们最近一个研究中（Vrij，Edward，Robert & Bull）（1999），通过观察受内容复杂化影响的行为（反应潜伏期、口误、口吃、手，胳膊和腿脚的运动）可以正确地区分 81% 的真话和谎言。

对于很多人来说提高他们识别说谎者方面的技巧是可能的，因为很多谎言识别者犯的错误是可以很容易地避免的。而且，一些人在通过观察非言语行为识别谎言方面是相当准确的。这意味着非言语谎言识别是一种艺术——也就是说是一门能够被学习的技巧。需要进行很多研究来发现这些个体使用那些线索，以及指导他人使用这些线索有多困难。目前，帮助专业测谎人员消除他们那些对欺骗线索不正确的、刻板的信念是有用的，这些信念会导致不好的效果。例如跨文化非言语交流错误。

针对那些想通过行为线索测谎的人，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列

在表框3.3中。

表框3.3　对通过行为线索识别欺骗的指导

1　如果说谎者体验到恐惧，负罪感或兴奋（或其他任何情绪），或者如果这一谎言很难捏造，谎言可能能通过非言语行为识别。

2　注意说话内容与非言语行为之间的不和谐，并努力去解释这些不和谐是十分重要的。要始终记得某人说谎的可能性，但是也要记住说谎只是对不和谐的一种可能的解释。

3　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偏离这个人的"正常或通常的"行为模式的行为上，如果我们知道那些"正常或通常的"行为。应该对这些偏离行为进行解释。每个偏离行为可能都意味着这个人在说谎，但不应忽视对这些偏离行为的其他解释。

4　当其他所有的可能的解释都被否定后，才能作出不诚实的判断。

5　应该鼓励被怀疑的对象说话。否定关于这个人行为的其它的看法是必要的。而且，说谎者说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因为言语的及[或]非言语的线索最后暴露他们的谎言（因为他们不得不始终注意他们说话的内容和非言语行为）。记住，探测本身可以引起行为的变化。

6　对欺骗的线索存在着一些刻板观念（例如视线转移，坐立不安等等），研究已经显示，这些线索是不可靠的欺骗的指示器。真实的指示器在第2章中已经列出。这只能是指导性的，但要记住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欺骗的时候表现出这些线索，这些线索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欺骗，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

附录 3.1 非专业观察者判断陌生人的准确率[1]

	准确率（%）		
	谎言	实话	总计
Bond, Kahler & Paolicelli (1985)			63
Bond, Omar, Mahmoud & Bonser (1990)			56[2]
Bond 等人 (1992)（实验 1）			50
Bond 等人 (1992)（实验 2）			55
Bond 等人 (1992)（实验 3）			52
Brandt, Miller & Hocking (1980a)			38
Brandt, Miller & Hocking (1980b)			42
Brandt, Miller & Hocking (1982)			31
DePaulo & Pfeifer (1986)			54
deTurck (1991)			54
deTurck, Feeley & Roman (1997)			57
deTurck, Harszlak, Bodhorn & Texter (1990)			64
deTurck & Miller (1990)			53
Ekman & O'Sullivan (1991)			53
Feeley & deTurck (1995)	72	54	63
Feeley & deTurck (1997)			49
Feeley, deTurck & Young (1995)			56
Fiedler & Walka (1993)	55	51	53
Frank & Ekman (1997)（实验 1）			58[3]
Frank & Ekman (1997)（实验 2）			60
Garrido, Masip, Herrero, Tabernero & Vega (1998)	51	66	59
Granhag & Strömwall (1998)	69	44	57
Lane & DePaulo (1999)			59
Levine, McCornack & Park (1999)（研究 2）	70	38	54
Levine, McCornack & Park (1999)（研究 3）	69	27	48
Littlepage & Pineault (1985)	82	30	56[4]
Mei-tai Fan, Wagner & Manstead (1995)			58
Millar & Millar (1995)（研究 1）			54[5]
Millar & Millar (1995)（研究 2）			61[5]
Millar & Millar (1997)			49
Miller 等人 (1981)（研究 1）			55[6]
Miller 等人 (1981)（研究 2）			56[7]
Miller, deTurck & Kalbfleisch (1983)			51[8]
O'Sullivan, Ekman & Friesen (1988)	69	48	54
Smith, Archer & Costanzo (1991)			60
Stiff & Miller (1986)	67	41	54
Vrij & Graham (1997)			42
Zuckerman, Koestner & Alton (1984)			62
Zuckerman, Koestner & Colella (1985)			58[9]

[1]只使用了控制情景。
[2]约旦人和美国人一起判断。
[3]犯罪录像和评论录像的混合得分。
[4]即时的和准备好的交谈混合。
[5]声音和图像信息情景。
[6]声音和视觉情景，真实的和情绪化的陈述混合
[7]现场情景。
[8]所有的情景混合。
[9]只有面部，只有说话的声音，以及面部加上说话的声音情景混合。

附录3.2　训练观察者对谎言识别准确性得分的影响

	训练			
	无 (%)	1 (%)	2 (%)	3 (%)
deTurck (1991) (183名学生)	54	69[1]		
deTurck, Feeley & Roman (1997) (165 名学生)	57	55[2]	62[3]	64[4]
deTurck, Harszlak, Bodhorn & Texter (1990) (188 名学生)	55	64[1]		
deTurck & Miller (1990) (390 名学生)	53	61[1]		
Fiedler & Walka (1993) (72 名学生)	53	65[5]	65[6]	
Köhnken (1987) (80 名警探)	47	42[7]	48[8]	40[9]
Vrij (1994) (360 名警探 一次访谈)	49	52[10]	54[11]	
即时的两次访谈，全像[12]	51	47[10]	47[11]	
即时的两次访谈，只有手部[12]	44	56[10]	60[11]	
Vrij & Graham (1997) (40 名学生)	42	55[13]		
Vrij & Graham (1997) (29 名警探)	54	48[13]		
Zuckerman, Koestner & Alton (1984) (132名学生)	62	70[14]		
Zuckerman, Koestner & Colella (1985) (117 名学生)				
只有面部[15]	53	59[16]		
只有说话的声音[15]	61	63[16]		
面部加上说话的声音[15]	59	65[16]		

[1]要求观察者注意信息的持续时间，反应潜伏期，停顿，不流畅，自我控制和手势。

[2]要求观察者注意说话时的口误，停顿，反应潜伏期和信息的持续时间。

[3]要求观察者注意自我控制，手势，头部运动和耸肩。

[4]要求观察者注意口误，停顿，自我控制和手势。

[5]提供了关于欺骗与笑容，头部运动，自我控制，音调，语速，停顿和通道失调之间关系的信息。

[6]脚注5中的信息以及结果反馈。

[7]要求观察者注意在头部运动，眨眼，注视，手势，自我控制，躯体运动，腿脚运动方面的变化。

[8]要求观察者注意在语速，停顿，口误和口吃方面的变化。

[9]观察者接受了标准－基础内容分析（见第5章），要求他们把重点放在逻辑一致性，细节的数量，特殊的细节以及自发改正上。

[10]提供了关于欺骗与手和手指运动的关系的信息。

[11]脚注10中的信息以及结果反馈。

[12]观察者同时接受真实的和虚假的陈述（例如让他们同时看两个录像片断）。在观看全像的情景下，能看见被试的全身；在只有手部的情景下，只能看见被试的手部。

[13]提供的信息是，对于高或低公众自我意识和对于好的或差的说谎者而言，欺骗与手和手指运动的关系。

[14]给出了结果反馈。只报告了“经过8个传话者后的反馈”的情景。

[15]观察者只看见被控的说谎者的面部（只有面部），或者只听见他们说话（只有说话的声音），或者同时接受面部和说话的声音（面部加说话声音）。

[16]提供了结果反馈。

第二部分
欺骗的言语特征

第 4 章
关于言语特征的最初研究

有时候，观察者知道说谎者所说的话是假的。举例来说，一个男孩告诉他的母亲他整个下午都呆在家里，但他的母亲知道这是假的。因为那天下午她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不得不回家一趟，她当时注意到男孩不在家。这个男孩说了一个一看就能看透的谎言，因为他的说法和事实相反。这个例子表明，说话内容可能是识别欺骗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听者把所谓的说谎者所说的话与他或她已经知道的事实相比较，来检查这些所谓的说谎者的陈述是否和这些细节相矛盾。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听者并不知道事实，或者说谎者讲述的内容和听者知道的事实吻合。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刚才所说的方式是不能识别谎言的。于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话内容的其他方面是否能够揭露欺骗。例如，说谎者总倾向于说某些事情吗，或者他们倾向于避免说某些事情吗，以及当谎言识别者注意说话内容时他们能够识别出说谎者吗？这些问题将在本章和后面两章中进行讨论。与非言语行为和欺骗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存在典型的言语欺骗行为。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说谎者都会说某些事情或者避免说某些事情。但是，一些言语标准似乎能区别出虚假的和真实的陈述。

测量陈述真实性的言语技术的尝试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目前为止，陈述有效性评价（SVA）是最常用的技术，这一技

术将会在第 5 章中谈到。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真实监控，并把它作为识别谎言的另一种言语技术。他们的研究结果将会在第 6 章中谈到。对欺骗的言语特征的研究开始于引进陈述有效性评价之前。特别是对欺骗与消极的陈述，似真答案，无关信息，过分概括的陈述，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直接反应和反应长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似真答案是陈述有效性评价的标准之一，因此也会在第 5 章中进行讨论）。我现在将对关于这 7 个特征的研究进行描述。某些特征提供了关于欺骗的信息——也许不仅仅是观察者倾向于相信这点。对这 7 个特征的描述见表框 4.1。

表框 4.1　对言语特征的概括和描述

言语特征	描述
1 消极的陈述	表现对物，人或观念的厌恶的陈述，例如否定的和蔑视的陈述，以及表明消极心情的陈述
2 似真答案	有道理的和听起来可信、合理的陈述
3 无关信息	与上下文无关的，没有被要求的信息
4 过分概括的陈述	使用例如“总是”，“从不”，“没人”，“每个人”这样的词汇
5 自我指涉	使用提及说话者自己的词语，例如“我”，“我的”等等
6 直接答案	中肯和直接的陈述（例如，“我喜欢约翰”要比“我喜欢约翰的陪伴”直接得多）
7 反应长度	答案的长度或说话的字数

我们假设,说谎时影响非言语行为的那三个方面(也就是情绪、内容复杂性和尝试控制)也同样将影响这七个言语标准。

情　　绪

说谎者有时会有负罪感,可能是因为他们说谎,或者与他们说谎的主题有关。例如,当孩子向父母说谎时他们会有负罪感,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说谎是不对的。当不忠的丈夫否认自己有外遇时可能会有负罪感,因为他对有这样的浪漫史觉得内疚。说谎者可能也害怕被识破。这种负罪感和恐惧的结果可能使得欺骗者不想把自己和他们的谎言联系起来,因此他们会提供间接的,过分概括的或者不明确地指向自己的答案。因此,对问题"你是否抽过烟?"的答案可能是"没人在这屋子里抽烟"。克林顿总统在葆拉·琼斯(Paula Jones)案中被问及,当莫妮卡·莱温斯基告诉某人她与他从1995年11月开始就有染时她是否说了谎,克林顿回答到:"这当然不是事实,也不会是事实。"(《独立报》,1998年7月30日,p.14)。

负罪感和焦虑都是消极情绪,他们可能会导致说谎者容易被激怒或者不愿合作。激怒的指示器可能是出现消极的陈述。举例来说,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丑闻中说"我不是一个骗子"而不是说"我是一个诚实的人"(DePaulo,1998,引自《星期日泰晤士报》,1998年5月24日,p.14)。当一名与人通奸的妻子被问及有关的桃色事件时可能会变成很生气,甚至被激怒(例如冲她的丈夫大叫,责问他竟敢不信任她)。一个偷糖果的男孩可能通过声称自己根本不喜欢那些糖果而表达他的愤怒。不合作可能会导致简短的

回答。有更多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会认为说谎者会比说实话者给出更简短的回答。这点将会在第5、6章中谈到。

内容复杂化

有时候,说谎比说实话更困难(例如,当说谎者需要立即想出一个答案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擅长说谎。因此,虚假的陈述可能比较短,听起来也不怎么令人信服和难以相信。因为缺乏个人体验,在大多数情况下说谎者不会提及他们自己。假设一个男孩没有去动物园(但他告诉他的父母他去了动物园),而实际上他去了电影院。当他被问及在动物园的经历时,他可能对去动物园只给出了一个简短而客观的报告。而真的去过动物园的孩子则会添油加醋地描述他们的个人体验,例如"爬行动物的房间里很热","猴子的气味很难闻","老虎把我吓坏了",等等。

尝试控制

说谎者常常努力地想给观察者留下诚实的印象。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不能提供充足的信息,就可能会显得很可疑。因此他们急于提供信息,但是当他们不知道应该提供什么信息时就会觉得很困难。当欺骗者不能提供某些信息时,作为替代信息,一种可能是提供一些无关的信息。当父母问男孩参观动物园的情况时,男孩想隐瞒和朋友去电影院的事情,就会和父母说一些他和朋友讨论的事情。

对欺骗的主客观言语标准的回顾

关于说话内容的研究结果相当一致，并且，支持大多数的假设的说谎者和说实话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在表4.1中可以看到，说谎者容易发表较消极的陈述；以及较少的自我指涉，而且他们的答案往往比较短，比较间接的，听起来不太真实。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说谎者更可能提供无关信息或者过分概括的陈述。

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8月17日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对他的调查听证会上一些回答是难以令人相信的，而另一些回答是不直接的。举例来说，克林顿被问及，在葆拉·琼斯(Paula Jones)案中，除了他的律师是否还有其他人告诉他莫妮卡·莱温斯基在琼斯案中已经被传唤。他宣誓以后的回答是"我不这么认为。"这个答案与斯塔尔调查弗农·约旦(Vernon Jordan)(克林顿朋友)的证言相矛盾，因为约旦说他和克林顿总统讨论过莱温斯基被传唤的事情。当他们向克林顿总统质疑这个矛盾时，克林顿说他正在努力回忆是谁第一个告诉他关于莱温斯基被传唤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答案。因为，在这个案子中，人们期待的答案是那个人的名字而不是"我不这么认为"。

在他的证言中，克林顿读了一份陈述，在其中他承认曾经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约会过，并且确实有过不正当的接触。但是他否认曾有过莫妮卡·莱温斯基在她的证词中描述的那些特殊的性行为。斯塔尔的调查小组引述了莫妮卡·莱温斯基对这些特殊的性行为的几个陈述，并问克林顿总统，莫妮卡·莱温斯基说这些行为

表4.1 欺骗的客观的言语指示器

	消极陈述	似真答案	无关信息	过分概括的陈述	自我指涉	直接答案	反应长度
Anolli & Ciceri (1997)							>
Bond 等人(1985)	—				—		
Burgoon 等人 (1996, 研究 1)					<	<	
Burgoon 等人 (1996, 研究 2)					<	<	
Cody & O'Hair (1983)							<
Cody 等人 (1989)				>			
DePaulo, Rosenthal 等人 (1982)	>			—	<		
DePaulo 等人 (1984)[a]						<	
DePaulo & DePaulo (1989)	—		—	—			
deTurck & Miller (1985)							<
Dulaney (1982)					<		
Ebesu & Miller (1994)				—	<	<	<
Feeley & deTurck (1998)					—		<
Greene 等人 (1985)							<
Knapp 等人 (1974)	>			>	<		

表4.1 欺骗的客观的言语指示器(续表)

	消极陈述	似真答案	无关信息	过分概括的陈述	自我指涉	直接答案	反应长度
Kraut (1978)		<					<
Kraut & Poe (1980)			—			—	
Miller 等人 (1983)							—
O'Hair 等人 (1981)							<
Riggio & Friedman (1983)		<					
Roberts 等人 (1998)					<		
Rockwell 等人 (1997)							<
Sporer (1997)							—
Stiff & Miller (1986)		<			—		—
Vrij 等人 (1999)							<
Young & deTurck (1996)							—
Zuckerman 等人 (1979)					<		
Zuckerman, DePaulo 等人 (1981)[b]	>		>				<

>, 在欺骗的时候比在说实话的时候，言语特征更常出现；
<, 在欺骗的时候比在说实话的时候，言语特征更少出现；
—, 语言特征和欺骗没有关系。
[a] 见DePaulo, Stone 和 Lassiter (1985).
[b] 对未发表的研究的总结

发生过是否是在说谎。克林顿的回答不是直接的。他没有回答“是”或“不是”，而是说“我在我前面的陈述中已经说过了。”

这些答案或许使得克林顿总统的证言很可疑，但是因此就判定他说谎是不正确的。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不存在典型的言语欺骗行为，某些言语标准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在说谎。可能有其它的理由解释克林顿为什么给出这样的答案。例如，假设他对这件桃色事件说的是事实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在说谎。甚至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对莫妮卡·莱温斯基是否说谎的问题回答说“是”对克林顿总统而言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公开地指控莱温斯基在宣誓后说谎，也许他不想这么做。

到目前为止，对欺骗的主观言语指示器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因此，我们在下结论的时候必须谨慎。表 4.2 表明尤其是简短的陈述，间接的反应和听起来似乎不合情理的答案能增加怀疑。我询问了学生、囚犯以及例如警官，警探，监狱守卫和海关官员的专业测谎人员关于欺骗的言语特性的信念。正如表 4.2 中看到的，囚犯和专业测谎人员没有将任何可识别的言语标准和欺骗联系在一起，而学生相信说谎者会更多地做出过分概括的陈述以及给出更间接的反应。正如前面提到的，说谎者实际上有做出间接反应的倾向。

表4.2 欺骗的主观的言语指示器

	消极陈述	似真答案	无关信息	过分概括的陈述	自我指涉	直接答案	反应长度
Akehurst 等人 (1996)		—				<	<
Bond 等人 (1985)	—				<		
Bond 等人 (1990)	<						—
DePaulo, Rosenthal 等人 (1982)	>			>	<		
DePaulo 等人 (1984)[a]						<	
DePaulo & DePaulo (1989)	—		—	—			
Kraut (1978)		<					
Kraut & Poe (1980)			>			<	
Stiff & Miller (1986)		<			—		<
Stiff 等人 (1989)		<					
Taylor & Vrij (1999)							>
Vrij & Bull (1992)	>		>	>	—		
Vrij (1993b) (学生)	—		—	>	—	<	
Vrij (1993b) (囚犯)	—		—	—	—	—	
Vrij (1993b) (专业人员)	—		—	—	—	—	
Westcott 等人 (1991)		<					
Zuckerman, DePaulo 等人 (1981)[b]							—
Zuckerman, Koestner 等人 (1981)	—		>		—		<

>, 在欺骗的时候比在说实话的时候，言语特征更常出现；
<, 在欺骗的时候比在说实话的时候，言语特征更少出现；
—, 语言特征和欺骗没有关系。

[a] 见 DePaulo, Stone and Lassiter (1985)。

[b] 对未发表的研究的总结。

结　论

一些言语的标准更可能发生在虚假陈述而不是诚实陈述中。说谎者更多地提供消极的陈述，不合情理的答案，更简短的反应，较少出现自我指涉和间接的答复。虽然目前已经进行的研究的数量有限，但是很显然，相对而言，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这与对欺骗的非言语指示器的研究相反，关于非言语指示器的已经被报告的研究之间，研究结果更多的是相互矛盾。这表明欺骗和这些言语标准之间的关系比欺骗和大多数非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更清楚些。因此，当谎言识别者识别欺骗的时候，考虑这些言语标准可能是有用的。虽然观察者不把一些言语标准（例如否定的陈述和自我指涉）与欺骗联系起来时，但这些标准确实看起来与欺骗有关。这个情景与我们在第2、3章中看见的正好相反——观察者更愿意将非言语行为和欺骗联系，而事实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似乎观察者更趋向高估了通过观察某人的行为来识别谎言的可能性，而低估通过观察说谎者的说话内容识别他们的可能性。观察者可能通过更多地注意某人所说的内容来提高他们识别谎言的技巧。但是，有一个问题。一旦说谎者洞察了言语标准和欺骗关系，他们可能会试着改变他们的说话内容，以这样的方法使得那些言语指示器变成比较不明显。不能排除说谎者真的能做到这点的可能性，因为正如在第2章中谈到的，人们通常能很好地控制他们说话内容，我将在第5章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在本章，我们还将讨论个性特性对言语指示器可能的影响。举例来说，善于雄辩的或聪明的人也许比那些不善于雄辩或不聪

明的人更少出现言语指示器。有一些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狄保罗(DePaulo)和狄保罗(DePaulo)(1989)比较了销售人员的虚假和诚实的陈述。在他们的虚假和诚实的陈述之间没有发现任何言语差异(见表4.1)。可以假设销售人员是善于雄辩的个体。因此,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善于雄辩的人可能比不善于雄辩的人出现更少的欺骗的言语指示器。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以大学生为被试的,我们可以假设他们的智力可能高于平均水平。我们可以从表4.1中看到,学生在说实话和说谎言时确实出现了一些言语差异。很显然,较高的IQ并不能保证欺骗的言语指示器不会发生。

第1章显示,权谋得分很高的人为了达成他们的目标经常说谎。因此可以假设在权谋上得分高的人有很高的说谎技巧。但是,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举例来说,莱普(Knapp)和同事,以及O'Hair和同事没有发现低权谋者和高权谋者之间的言语行为的差异(Knapp,Hart & Dennis,1974;O'Hair,Cody & McLaughlin,1981)。Riggio和Friedman(1983)没有发现在性格内向者和性格外向者之间或好的行为表演者和差的行为表演者之间在不合情理的答案方面有差异。

最后,谎言发生的环境会影响言语欺骗行为。举例来说,当时说的谎言可能比那些事先设计好的谎言包含更多欺骗言语指示器。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关于这个方面的调查研究。

第 5 章
陈述有效性评价

陈述有效性评价(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也叫 SVA)是迄今为止测量言语陈述真实性的最常用的技术。这项技术在德国已经被发展成为在性侵犯案中决定儿童证人证言的可信度的技术①。这项技术专门针对性虐待和儿童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判定一起性虐待案常常是很困难的。常常没有医生或物理证据。声称的被害人和被告给出的证言常常是相反的,而且常常没有其他的证人告知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对被告和声称的被害人的可信度的了解很重要。如果声称的被害人是孩子,那么他们就处于一个很不利的位置,因为成人有着不信任孩子的陈述的倾向(Ceci & Bruck,1995)。最近,已有研究关注 SVA 是否对评价成人和除了性虐待以外的案件的被告的证言有用。本章将对 SVA 进行详细的描述,并提供已经有的关于它的准确性评价的研究概况。研究结果显示,利用 SVA 能够使人们识别欺骗的水平高于偶然概率。但是,这项技术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意味着 SVA 并不是像我们想像的,像在德国的个别应用中那样毫无争论。首先,我将对 SVA 发展的历史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

①儿童证人关于性虐待的陈述有多少是不正确的还不清楚。美国估计的无效的性虐待报告的概率在 6% ~60% 之间(Graig,1995)。无效的性虐待的报告案件包括迫于成人和[或]类似的人的压力而提供一个虚假的报告,错误地认定犯罪者和直接捏造事实。

陈述有效性评价的历史

1954 年,西德最高法院召集了一个小型的专家听证会。最高法院想评价心理学家在认定儿童证人证言可信度方面有多大的帮助(尤其在性侵犯案件的审判中)。外国心理学家乌都·安乔吉(Udo Undeutsch)报告了他研究的一个案例,声称被强奸的被害人只有 14 岁。最高法院的五名法官:

"对这个案例印象深刻,并且深信在评估儿童或青少年证人的证言方面,进行法庭外检查的心理学专家比那些在法庭审判的正式气氛下的事实发现者有另外的、更好的资源"(Undeutsch,1989,p. 104)。

结果,在 1955 年德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规定,在所有有争议的儿童性虐待案中都要求使用心理访谈和可信度评价。这导致在许多案件中传唤心理学家作为专家。艾琛(Arntzen)(1982)估计在 1982 年以前有 40,000 多案件中使用了专家证言。在西德和瑞典这也导致出现了各种评价性虐待的声称被害人的证言的可信度的内容标准。在瑞典和德国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史德拉(Steller)和克肯(Köhnken)(1989)汇编了一系列这样的内容标准,并且描述了一种评价陈述真实性的一套程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陈述有效性评价或者 SVA。

SVA 在德国法庭上得到了很好的确立。原告和被告的律师都很少质疑这种评价的有效性,尽管允许他们能质疑(克肯(Köhnken),1997,《人际沟通》)。原告和被告也都被允许质疑或者不信任 SVA 证据——例如,通过发现专家证人推理中的弱点,

通过法庭上的专家交互检查,或者通过聘请另一位专家就专家意见的性质提供建议[克肯(Köhnken),1997,《人际沟通》]。在德国,人们还没有正式的途径成为一名专家。目前,"法庭任命你是专家,那你就成为专家"(克肯,1997,《人际沟通》)。这种情况在今后将可能会改变,因为德国心理与法律学会现在开始进行一项官方的培训计划来让心理学家成为SVA专家[克肯(Köhnken),1997,《人际沟通》]。

目前,SVA在其他的欧洲法庭也被作为证据使用,例如荷兰(Vrij & Akehurst,1998)。但是,SVA评价在英国法庭是不被承认的(Vrij & Akehurst,1998)。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对在法庭上使用SVA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例如,汉斯(Honts)(1994),拉斯金(Raskin)和埃斯普林(Esplin)(1991b),尤尔(Yuille)(1988b)支持在法庭上使用SVA的结论,而其他的人(Boychuk,1991;Lamb,1998;Ruby & Brigham,1997;Well & Loftus,1991)则持怀疑的态度。SVA的结论也在北美的一些法庭上以专家证言的形式作为证据使用(Ruby & Brigham,1997,1998),但是这比在德国要少见得多。SVA在北美的主要价值在于用来指导警察的调查和起诉裁量(prosecutorial discretion)(Raskin & Esplin,1991b)。总之,对于SVA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在某些国家这项技术比在其他的国家更常使用。

陈述有效性评价（SVA）

SVA 由三个要素组成：

1 一个结构化的访谈；

2 一个标准基础内容分析（CBCA），系统地评价获得的陈述的内容和质量；

3 通过一套问题（有效性检查列表）来评价 CBCA 的结果。

结构化访谈

第一阶段包括对儿童进行访谈。进行一次恰当的访谈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儿童进行访谈就尤其困难。儿童对过去的事件的描述特别不完整（Bull，1998）。这使得访谈者要问一些特定的问题来引发进一步的，常常是关键的信息。合乎逻辑的策略是问那些适合访谈者理解案件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能有诱导性。一种具有诱导风格的访谈可能造成被访谈者提到一些从未发生的事情。儿童比成人更易受诱导性访谈风格的影响。下面关于一名成人和一名不爱说话的儿童之间“交谈”的例子也许看起来很熟悉：

成人：“你今天去哪儿了？”儿童没有回答。“你也许是去看奶奶了，你到她家了吗？”儿童点点头。“好，很好，你喜欢奶奶那里吗？”儿童又点了点头。“是，你喜欢那里？”儿童再一次点头。事实上，儿童并没有拜访过她的奶奶。

在这样的诱导性访谈风格中，成人回答了他们自己的问题，在许多情景下这不会有什么危害。但是，如果这发生在刑事案件中，

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人们基于心理学的原则设计出了一项特殊的访谈技术，以自由叙述的风格从被访谈者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Bull，1992，1995，1998；Lamers - Winkelman，1995；Soppe，1995a，1997）。

SVA 访谈常常被录像。然后将访谈录像转写成文字，这些文字记录被用于进行标准基础内容分析（criteria - based content analysis）。除此之外，录像带还能用于认定访谈者任何的偏见效应，并使得这些认定更容易（Honts，1994；Lamb，Sternberg & Esplin，1994；Yuille，1988 b）。然而，在文字记录的基础上的内容分析比在录像带基础上的内容分析更好。评价人必须指出 19 种不同的标准是否出现，因此在书面记录的基础上进行比在录像带的基础上进行评价更容易。使用书面记录排除了在判断陈述真实性时把被访谈者的非言语行为考虑在内的机会。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利的（Landry & Brigham，1992）。另一方面，在录像带上出现的非言语信息可能会分散 SVA 评价人的注意力。正如我们在第 3 章中看见的，许多观察者对欺骗行为有着不正确的，刻板的信念，并且在以某人的行为为基础识别欺骗时常常会出现不正确的判断。这也许使得使用录像带不太有利。

内容分析

SVA 的第二阶段是系统地评价访谈中获得的陈述的可信度，即所谓标准基础内容分析（criteria - based content analysis，CBCA）。表 5.1 提供了评价中使用的 19 种标准的概况（一些研究人员只使用标准 1 ~ 14，我们稍后将会谈到）。受过训练的评价者仔细检查陈述，并且一一判断 19 种标准是否出现，常常使用的是3 分

表 5.1　陈述的内容标准分析[1]

一般特征

1 逻辑结构

2 无组织的叙述

3 细节的质量

特殊内容

4 语境铺垫

5 对交互行为的描述

6 话语复述

7 事件中料想不到的复杂化

8 异常的细节

9 多余的细节

10 正确报告的细节被误解

11 相关的外部联系

12 主观的心理状态的描述

13 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归因

动机——相关的内容

14 自发改正

15 承认记忆的缺乏

16 对自己的证言有怀疑

17 自我否定

18 宽恕犯罪者

罪行——特定要素

19 罪行的细节特征

[1] 选自史德拉(Steller)和克肯(Köhnken)(1989)。

量表。如果标准没有出现就记为“0”,如果出现就记为“1”,如果明显地出现就记为“2”。CBCA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这个假设最先是由安乔吉提出来的(1967),也就是来自于真实经验记忆的陈述与基于创造或幻想的陈述,在内容和质量是不同的。这也被称为安乔吉假设(Steller,1989)。陈述中每出现一个标准就提高了陈述的质量,并且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假设——这份陈述是建立在真实的个人体验的基础上的。CBCA不是“言语测谎仪”——也就是说,它不是搜寻“谎言症状”。某个标准的缺乏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陈述是假的(Yuille,1988 b)。下面我们将给出19种CBCA标准和以及为什么说这些标准不太可能出现在谎言或幻想中。

一般特征

陈述的一般特征包括那些与陈述整体有关的标准。

1. 逻辑结构。如果陈述基本上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陈述是连贯的和符合逻辑的,不同的部分不会不一致或相差太多,那么就是有逻辑结构。

2. 无组织的叙述。如果整个陈述的信息是分散的,而不是以一种结构化的,连贯的时序性的方式说出来,那么就是有无组织的叙述的标准。但是,陈述就整体上而言不应有不一致的情况(标准1)。尤其当人处于不安时,这种无组织的重复叙述就会出现。举例来说,某人可能先讲核心事件(“我的钱被偷了,我被抢劫了”)然后可能回到最开始(“我当时在商店里,我付完账后把我的钱包放回我的袋子里”),然后讲述稍后发生的事情(“那家伙跑得很快,我追不上他”),然后又回到开始(“我的袋子当时一定是开着的”),等等。维英克(Winkel),维吉(Vrij),科普勒(Koppelaar)和

冯·德·斯丁(Van der Steen)(1991)发现,受情绪困扰的成人强奸案的被害人倾向于以非常无组织的和不连贯的方式陈述。如果某人已经把同样的事情讲了好几遍或者他常常想起这件事,那么这一标准就不太有用,因为说太多或想太多会使得人们以时序性的方式讲述。

3. 细节的质量。这一标准要求陈述必须富有细节——也就是应该出现对地点,时间,人,物和事件的特定描述。举例来说,"我在艾伯特路的红绿灯附近使用提款机。当时天开始变黑,正下着毛毛雨,也很冷。提款机附近相当热闹,至少有八九个人在那里站着。然后,我取完钱后,这个家伙走近我,把一把刀放在我脸前,抢过我的钱就往街角跑了。我大声喊叫'拦住他,他抢了我的钱',但是没有人帮我,真是难以置信",这样的陈述就符合这一标准。并且,苏皮(Soppe)和同事认为,如果讲述的是真实的而不是捏造的,那么要求详述一些细节可能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信息(Soppe,1995 b;Soppe & Hees - Stauthamer,1993)。

特殊内容

特殊内容是指陈述中的特定段落,为了表现陈述的具体和生动。

4. 语境铺垫。如果有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发生的行为与其他的行为和[或]习惯相连,则出现语境铺垫。举例来说,一名被害人描述了罪行发生在午餐时间的一个公园里,当时他正在遛狗。

5. 对交互行为的描述。如果陈述中包含了关于至少是声称的犯罪者和目击证人之间的交互行为的信息,就满足了这一标准。例如,"我对他说滚开,但是他没有走开,反而笑起来,然后我哭了

起来”就符合这一标准。

6. 话语复述。如果话语或者交谈的一部分以最初形式被复述,并且不同的说话者可以从被复述的对话中识别出来,则出现了话语复述。这一标准并不是说对说话的内容简单报告就可以满足的;至少一个人的话语被生动地复制才能满足这一标准。因此,“我对他说‘不要这样’”满足这一标准,但“然后我们谈到了体育运动”则没有满足这一标准。

7. 事件中料想不到的复杂化。如果在事件中包括有某些料想不到的因素则这一标准出现了。举例来说,可能提到,在犯罪地的时候,声称的犯罪者的汽车警报响了,或者声称的犯罪者在发动他的汽车时出现问题,等等。

8. 异常的细节。异常的细节是指关于人,物或事的细节异常和[或]独特,但是在上下文中是有意义的,例如对犯罪者手臂上的文身的描述,或者一名证人说犯罪者有口吃的细节,等等。

9. 多余的细节。如果证人描述的与声称相关的细节对于指控而言不是必要的,则出现多余的细节,例如一名儿童证人描述的成人犯罪者想要除掉进入卧室的猫因为他(成人)对猫过敏的细节。

10. 正确报告的细节被误解。如果证人说到细节超过证人的理解能力,则满足这一标准——举例来说,一名描述成人的性行为孩子,但是把性行为归于打喷嚏或伤痛之类。研究已经指出,大多数的小于 8 岁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对性行为详细的了解(Gordon, Schroeder & Abrams,1990;Volbert & Van der Zanden,1996)。

11. 相关的外部联系。如果报告的事件不是声称的犯罪的一部分,但是与这些罪行相关,则相关的外部联系就出现了——举例

来说，如果被访谈者说到犯罪者和其他的女人之间的性行为。

12. 主观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如果证人描述了在事件发生时的感觉或想法，就出现了这一标准，例如她当时有多害怕，或者当一切都过去以后她是如何恢复过来的，等等。这一标准也包括对认识的报告，例如一名证人提到，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她如何想着逃脱的事。

13. 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归因。如果证人描述了犯罪者在事件中的感觉、想法或动机这一标准就出现了（“他也很紧张，他的手在抖”，“他实际上很喜欢它！他一直在微笑！”或“因为在他开始碰我之前，他关闭了所有的窗户，并且把音乐声弄大，所以他当时想到了我可能会尖叫的可能性”，等等）。

动机——相关的内容

动机——相关的内容是指证人陈述的方式。和“特殊内容”一样，它涉及的是陈述的某些段落。

14. 自发改正。如果对以前提供的材料自发地提供改正或者信息添加，就满足这一标准（自发意味着没有任何访谈者的干扰）“当时大约是2点钟，等一下，可能要更晚一点，因为当时天已经开始变暗了”就是一个改正的例子，“我们坐在他车上，他开得很快，随便说一句，他的车是沃尔沃的（Volvo），他开得太快了，以致在遇到一个红绿灯时几乎不能停车”就是一个添加的例子。

15. 承认记忆的缺乏。如果证人通过说“我不知道”或“我不记得了”或者通过类似这样的回答“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在车上，其他的都不记得了”来自发地承认中记忆的缺乏，这一标准就出现了。在回答一个直接的问题时，“我不知道”或“我不记得了”这样的答案不能算做承认记忆的缺乏。

16. 对自己的证言有怀疑。如果证人表达他担心自己陈述的一些部分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也许”,“我不确定”,等等)或难以置信(“你知道,这事是如此怪异,他看起来是如此好的男人,周围的人都喜欢他,我曾经认为没有人会相信”),这一标准就出现了。

17. 自我否定。如果证人提到自己没用或者自我谴责的细节,就出现了自我否定。例如“很明显,我把门大开着真是蠢,因为能很清楚地看见我的钱包放在书桌上。”

18. 宽恕犯罪者。如果证人倾向于为犯罪者找借口来赞同那些声称的犯罪者或者不去谴责他或她,那么就出现了宽恕犯罪者——例如,一名女孩说她现在对被告可能会被监禁感到很难过,因为她认为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她。

罪行—特定要素

罪行—特定要素是指与特定的罪行相关的要素。它们与“特殊内容”的分类不同,因为它们与陈述本身的一般生动性无关,而是与特定的罪行有关。

19. 罪行的细节特征。如果证人以某种专业人士知道的某类罪行典型发生的方式描述事件,那么这一标准就出现了。举例来说,我们知道,近亲相奸的案件过程与被一个陌生人袭击的动态氛围是不同的,因为前一类型的犯罪比后一类型的犯罪常常包括较少的暴力和较少的来自被害人的抵抗(Soppe & Hees - Stauthamer, 1993)。拉斯金(Raskin)和埃斯普林(Esplin)(1991b)将 CBCA 中的标准 19 引入到列表有效性检查部分(稍后会谈到),他们认为这一标准与陈述本身的一般生动性无关而是与特定的罪行有关。

至少有七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些标准不太可能出现在虚假的陈述中。

- 捏造故事的人往往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创造那些相关的特征。举例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来进行复杂化或话语的复述,或者提到交互行为,或者描述他们的自己的或其他人心理状态。
- 捏造者有时有足够的创造力来考虑将这些特征放到他们的故事中,但是因为他们意识不到判断者会用这些特征来评价陈述的真实性,因此他们没有将这些考虑在内。
- 捏造者有时缺乏某些相关的知识,因而不能将某些标准放入他们捏造的叙述中。尤其是对于标准 10,因为如果对性知识没有充分地了解是不可能有关于性行为的细节描述的。
- 将许多标准纳入到一个虚假的陈述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无组织的叙述。以时间顺序(先发生什么,然后发生什么,然后他说了这些,等等)来讲述一个虚假的故事比故意以一种无组织的方式陈述要容易。
- 捏造者有时不想提供太多的不同细节,因为他们害怕他们会忘记他们已经说过的事情。忘记曾经说过的东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总是有要求捏造者重复他们曾说过的话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说谎者一定要能够重复相同的叙述,并且细节不变,在重要的问题上不自相矛盾。很显然,说谎者开始说得越少,越容易记住他们第一次说的话,就越不可能在以后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 捏造者有时不提供很多的细节是因为他们害怕观察者将会检查这些细节,并会发现他们在说谎。每提到一个细节就会给访谈者提供一个检查叙述是否真实的机会。我们在第 2 章中提到的那个杀人凶手的案例中就看到了这一情况。凶手详细地描述他在午后和傍晚时所做的事情,给警察提供了很多可检查的细节。

当警察没有发现任何证明他的描述的证据时，他作为嫌疑犯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对访谈者而言，不提供细节会使任务变得更困难。

- 捏造者有时不想纳入某些特征（例如，承认记忆的缺乏，对他们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特性会使得他们的叙述听起来比较不可信和不令人信服。那些想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也不太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为其他人开脱，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降低别人被发现有罪和[或]被定罪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说谎者知道观察者在使用 CBCA 标准来评价陈述的真实性的话，那么他们常常可能试着将一些标准考虑进来，以便留下诚实的印象。我稍后将会谈到这一问题。

有效性检查列表

要对一个陈述的真实性做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光靠 CBCA 本身是不够的。即使捏造的叙述可能很丰富，并包括许多详细的信息——例如，因为访谈者对访谈进行了多次指导，并弥补了很多缺点，或者因为被访谈者准备得很充分，或者因为其他人已经指导了被访谈者该如何陈述，等等。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一份真实的陈述也可能是质量不高并缺乏细节的——例如，因为被访谈者非常年轻，或者不擅长言语表达，或者因为太紧张而话不多，或者是因为访谈者没有给被访谈者足够的机会把故事说完整，等等。

这就意味着 CBCA 不是一个标准化的测试。一个标准化的测试要有一个明确的常模，这个常模给测试提供了心理学的平均值，并且使得解释成为可能（Kline，1993）。智力测验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如果一个人得了 130 分，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聪明，

并且他们比得 70 分的人更聪明。没有常模,就不可能精确计算出测验分数的平均值。因此,测试的标准化是必要的。为了组织和标准化 CBCA 评价,有效性检查列表出现了(Steller,1989;Steller & Boychuk,1992)。有效性检查列表见表 5.2。通过系统地解释列表中每一项,评价者能探究和考虑 CBCA 结果的所有可能的解释。评价者对每项的否定回答与 CBCA 的结果是相一致的。而每个肯定的回答都会产生一个对 CBCA 结果恰当性的疑问。有效性检查列表由下列 11 个问题组成。

表 5.2 有效性检查列表[1]

心理学特征

1 语言和知识的不恰当

2 感情不恰当

3 暗示的感受性

访谈特征

4 暗示性的,引导性的或强制性的提问

5 访谈中所有的不恰当

动机

6 报告的可疑动机

7 最初揭发或报告的可疑的背景

8 虚假报告的压力

调查的问题

9 不符合自然规律

10 和其他的陈述不一致

11 和其他的证据不一致

[1] 来自史德拉(Steller)(1989)。

心理特征

第一类型的问题涉及到被访谈者的个人特征。

1. 语言和知识的不适当。这一项是指证人所使用的语言和表现的知识是否已经超过他或她的同龄人的能力，超过了证人应该从事件本身得到的内容的范围。当出现这一情况时，它可能表明有其他的人在证人准备陈述时施加了影响。例如，为了获得监护权，一名女性可能让她的孩子虚假地控告她的前任丈夫在过去和孩子有近亲相奸的关系。

2. 感情不适当。这一项是指证人在接受访谈时所表现的感情（常常是通过非言语行为）是否与对证人所声称的经验相等。举例来说，性侵犯会在情绪上对被害人造成困扰，并可能使得被害人不安。因此当对他们进行访谈时，人们通常期望从一个真正的被害人身上看到明显的情绪表现。缺少这些情绪可能意味着陈述是虚假的。

3. 暗示的感受性。这一项是指在访谈期间证人是否表现出对任何暗示的感受性。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受暗示。用上面提到的那个事实上没有去看祖母的孩子为例，有些孩子也许真的会说实话，说他们没有去看望他们的奶奶。尤尔（Yuille）（1988b）以及兰德（Landry）和布里汉（Brigham）（1992）建议在访谈结束时询问证人一些引导性的问题，以便对他们的暗示的感受性做出评价。很显然，这些引导性的问题应该询问一些周边的信息而不是核心信息。例如，访谈者可能会暗示孩子说在被告的客厅里有一个鱼箱（访谈者知道那不是事实），然后观察孩子的反应。如果孩子接受这些特别设计的问题的暗示，这可能说明他或她受暗示的程度很高。

访谈特征

访谈特征(第4和5项)是指访谈者的风格或访谈的方式。

4. 暗示性的,引导性的或强制性的访谈。人们应该考察访谈者是如何进行访谈的,他们是否对被访谈者进行了暗示,他们是否对被访谈者施加了任何类型的压力,等等。即使一个孩子接受了在访谈结束前故意被问到的那些有暗示性的问题(见第3项),也并不意味着他或她在没有暗示性的访谈中不能提供一个全面而正确的陈述。如果访谈是暗示性的,引导性的或强制性的,就不应该使用SVA来分析。

5. 访谈中的所有的不足。除了暗示之外的其他因素也都决定了访谈的质量。例如,儿童被访谈者常常不一定知道,当他们不知道问题答案时,他们可以回答说"我不知道"。儿童(成人也是)都有回答问题的倾向而不是承认自己记忆或知识的缺乏,即使当他们对答案不确定时。这当然会导致造假。因此,访谈者在访谈的一开始就让被访谈者知道"我不知道"这样的答案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应该说"我不知道",这点很重要(Milne & Bull, 1999;Mulder & Vrij, 1996)(要了解更多的访谈心理学可以参见Memon和Bull,1999)。

动机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证人报告事件的动机。

6. 报告的可疑动机。这一项是指证人在报告事件方面是否存在可疑的动机。常常有可能是另一个人鼓励证人去报告事件。因此,了解证人和被告之间关系以及了解控告对所有涉及到的个体的可能结果都是很重要的。有关的背景可能是孩子父母之间的监护/探视权之争或离婚。

7. 最初揭发或报告的可疑的背景。这一项是指陈述的起源和历史，特别是第一次报告时的背景。要探究最初的控告发生的背景中可能的可疑的因素——例如，第一次报告是否是自愿的，谁（如果有人）让证人去报告的（男友，女友，父母，老师，心理学家，等等）。

8. 虚假报告的压力。这一项涉及的问题是是否有其他人暗示，指示，强迫或强制证人制造一个虚假的报告，或者夸大真实报告中的某些因素。

调查的问题

第四类涉及陈述与犯罪类型以及以前的陈述的关系。

9. 不符合自然规律。这一项是指所描述的事件不切实际的可能性。如果某人说她在近亲相奸中怀孕了，人们可以通过了解证人当时的年龄来检查这是否可能。

10. 和其他陈述不一致。对某一事件常常存在不止一份的证言。证人可能就这一事件在以前接受过访谈，或者其他的人也可能接受了关于这件事的访谈。这项是指陈述的主要方面与这名证人或者其他证人的另一份陈述不一致或相互矛盾的可能性。

11. 和其他证据不一致。这一问题是指陈述中的主要内容与可靠的物理证据或其他的具体证据相互矛盾的可能性。

说实话者说些什么

CBCA 研究的文献综述

虽然，正如我早先提到的，SVA 已经在一些国家中被作为法庭

证据使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检查 SVA 准确性的研究还进行得很少。SVA 是针对儿童而发展出来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一项研究是调查 SVA 评价在非常小的儿童身上使用的准确性的。虽然,在几项研究中包括了非常小的儿童的陈述,但是他们没有单独报告在那群孩子中的 SVA 评价的准确性。莱蒙斯 - 温克尔曼(Lamers - Winkelman)的研究是个例外(Lamers - Winkelman,1995;Lamers - Winkelman & Buffing,1996)。但是,她的样本中没有包括那些提供虚假报告的孩子的陈述。

SVA 的准确性可以通过实验室研究或现场研究得到。在实验室实验中,要求被试说谎或者说实话(例如,关于他们刚刚看过的一个电影),随后评价者对他们的陈述用 CBCA 技术进行评价。这一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科学家明确地知道那些被试在说谎,那些被试在说实话。但是,实验室实验的问题在于它们不同于现实生活情景。某人回忆一个刚刚看过的电影是不同于描述一个真实的性虐待的经历的。因此安乔吉(1984)认为,因为缺乏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实验室研究在考察 SVA 分析的准确性方面的作用不大。他建议通过进行现场研究来评价这一技术的有效性。

在现场研究中,考察了真实的性虐待案件中的儿童的陈述。这一类型研究的优点在于它是真实的,因为它研究的是真实案件。但是,它的缺点是,在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中,要检查"基本事实"——也就是说,建立所谓的基本事实,实际上是不可能(Raskin,1982)。换句话说,在现实生活的案件中,很难确切地知道那些人说的是实话,那些人说的是谎言。所谓的犯罪者的供述常常被用来做基本事实。史德拉(Steller)和克肯(Köhnken)(1989)认为用供述做基本事实存在着几个问题。史德拉(Steller)

和克肯(Köhnken)写道:

"(在德国)如果没有归罪或免罪的证据存在,则需要由心理学专家得到的陈述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归罪的陈述被判断为是诚实的,那么被告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并且,如果没有机会避免一个有罪的判决,那么最好的策略就是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罪行,因为这常常被法庭认为是悔过的表现,会造成减少处罚……另一方面,如果专家证人判定证人大部分的陈述是虚假的,那么被告没有理由承认犯罪。因此,供认的可能性可能受判断本身的影响,尝试通过供述来使得这种判断有效是很重要的"(Steller & Köhnken,1989,p.239)。

见古德琼森(Gudjonsson)(1992),凯森(Kassin)(1997)和维吉(Vrij)(1998a)关于虚假供述的文献研究。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15项研究(3项现场研究和12项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用CBCA方法来评价陈述,并且评价每一个标准在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之间是否有不同。结果见表5.3。一些研究人员只是发表了CBCA总分,而没有给出每个标准的数据。他们的结果如下。

表5.3 说实话的客观的言语特征（标准基础内容分析）

	CBCA标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现场研究																			
Boychuk (1991)	>	>	>	>	>	>	>	>	>	—	>	>	—	>	—	—	—	>	—
Esplin 等人(1988)	>	>	>	>	>	>	>	>	>	—	>	>	>	>	>	—	—	>	>
Lamb 等人(1997)	—	>	>	>	>	>	—	>	—	—	—	—	—	—					
实验室实验研究																			
Akehurst 等人(1995)[1,2]	>	—	>	—	>	>	—	—	—			>	—	—					
Höfer 等人(1996)[1]	>	—	>	>	—	>	>	—	—			>	—	—					
Köhnken 等人(1995)[1]	—	>	>		—	—	—	—	—	—			—	—	>	—			
Landry & Brigham (1992)[1]	<		>	>	>	>	—	>	>			>	<	>	>	>	—		
Porter & Yuille (1996)[1]	>	—	>	—	—	—	—	—	—	—	—	—	—	—	>	—	—	—	—
Ruby & Brigham (1998)[1,3]	>	<	—	<	>	—	>	>	>		<	<		>	>	—	<		
Steller 等人(1988)	>		>	>	—	—	>	>	>	>	>	>	—	—	—		<	—	
Vrij & Heaven (1999)[1]			—													>			
Vrij 等人(1999)[1]	—	—	>	>	>	>	—	>	>			—	>	>	—	—		—	
Vrij 等人(即将发表)[1]	—	—	>	—	—		—	>	—				>	>	—	>			
Winkel & Vrij (1995)	>	>	>	>	>				—		>			—	—	—			
Zaparniuk 等人(1995)[1]	—	>	—	—	—	—	—	—	—	—	—	—	—	—	—	—	—	—	—

>,言语特征更常出现在诚实的而不是虚假的陈述中；
<,言语特征更常出现在虚假的而不是诚实的陈述中；
—,言语特征和说谎/说实话之间没有关系；
[1]使用的是成人的陈述；
[2]成人和儿童的结果混合在一起，因为年龄组之间没有差异；
[3]白人和黑人的结果混合在一起。
Porter & Yuille (1996)使用的是犯罪嫌疑人的陈述。

现场研究

根据莱肯(Lykken)(1988)的说法,一项科学可信的现场研究应该满足以下标准:(i)研究中所选择的案例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样本;(ii)陈述应该来自于真实环境下进行的访谈;(iii)陈述应该分别由至少两名评价者打分,这两名评价者应该对案件情况是盲的(也就是他们不知道基本事实);和(iv)把这些得分与基本事实比较,这些基本事实是由一些独立于研究结果的标准(例如物理证据)建立起来的(见 Horowitz, Lamb, Esplin, Boychuk, Reiter - Lavery & Krispin(1996)在儿童性虐待研究中关于建立基本事实标准的讨论)。只有由拉姆(Lamb),史腾柏格(Sternberg),埃斯普林(Esplin),赫许可维兹(Hershkowitz),奥巴赫(Orbach)和霍威(Hovav)(1997)所进行的研究符合这四个科学的标准。这些研究人员在以色列收集了由 50 名年轻调查员对声称的性虐待被害人所做的 1187 次访谈。他们使用了满足下列四项标准的所有案例(共 98 例):(i)声称的攻击者是已知的;(ii)声称的受害人在 4 ~ 13 岁之间;(iii)声称的事件包括实际接触;(iv)有充分的独立的证据。陈述由超过一个人以上的评价者评价,而且这些评价人只有机会接触这些陈述,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基本事实由医学证据,嫌疑犯陈述(供述)和证人陈述建立。这项研究的惟一可能的缺点是,对儿童进行访谈的访谈者对案件以前情况的了解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访谈风格。对表 5.3 中的另外两项现场研究的调查结果应该小心地进行解释。

第一个 CBCA 研究是由埃斯普林(Esplin),波伊卡克(Boychuk)和拉斯金进行的一项现场研究(1988,见 Raskin 和 Esplin 的描述,1991a)。这项研究的问题在于只有一名评价者对记录进行

评分，并且基本事实不是建立在独立的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这将在下面谈到。他们分析了40名声称的被性虐待的儿童（在3～15岁之间）的陈述。这些案件中有20个案件是“被证实了的”，另20个案件被归类为“可疑的”。记录下来的陈述被一名接受过CBCA训练的评价者进行评价，这名评价者对被试的整体情况是盲的（包括被证实的或可疑的）。如果标准没有出现则记为0分，如果出现了就记为1分，如果明显地出现了则记为2分。那么，CBCA可能的得分范围在0～38之间。这一研究的结果是突出的。被证实的案件的CBCA得分是24.8，而可疑的陈述的得分是3.6。而且，被证实的组和可疑的组的得分的分布没有任何重叠。可疑的组的最高得分是10（一个孩子得了10分，而三个孩子得了0分），而被证实的组的最低得分是16（一个孩子得了16分，而最高的得分是34）。通过评价在每个标准上的两组的差异，发现在可疑的组和被证实的组之间，19个标准中有16个标准出现了差异，并且都在预期的方向上。也就是说，在被证实的案例中比在可疑的案例中，标准更经常出现，这有力地证实了安乔吉的假设（表5.3）。

维尔斯（Wells）和罗芙托斯（Loftus）（1991，p.139）把埃斯普林（Esplin）和他的同事的调查结果作为“我们遇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心理学研究”，莱蒙斯－温克尔曼（Lamers－Winkelman）（1995）把这一结果描述为“好得难以置信”。维尔斯和罗芙托斯为它提供了其它可能的解释。首先，两组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在这两组之间的年龄差异引起的。的确，“被证实的”组（平均9.1岁）的儿童比“可疑的”组（平均6.9岁）的儿童年纪更大。而且，可疑的组包括了来自不满5岁的儿童的8份陈述，而“被证实的”组只包含了一份来自5岁以下儿童的陈述。第二，作为研究的“可疑的案件”

的独立标准是“司法免诉(judicial dismissal)”,“不起诉”“无被告供述”和“被告坚持否认”。维尔斯和罗芙托斯认为这些标准不是独立的案件事实。司法免诉,不起诉,无被告供述和被告坚持否认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报告是虚假的(正如研究人员指出的),而且还因为儿童常常是不令人相信的,即使他们说的是事实,并且性虐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儿童可能不令人信任,因为他们可能缺乏合乎逻辑的推理,他可能因为受惊吓到一定程度而不能加工那些外围的细节,也可能因为他们的言谈技术贫乏,等等。因为他们是不让人信服的证人,检察官可能不进行指控(起诉的缺乏),法官可能觉得不太可信(司法免诉),被告方律师也不太可能建议他们的委托人承认指控(被告没有供述和坚持否认)(Wells & Loftus,1991,p. 169)。”

因为 CBCA 的许多标准都与被试的可信度有关,因此对不可信的儿童 CBCA 评价可能将会很低,并且将会导致 CBCA 评价者认为报告是虚假的。第三,也许研究所选用的案件是一些极端的案件,当对越不确定的案件进行评价时,就越可能出现不显著的结果。

波伊卡克(Boychuk)(1991)在她后来的研究中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三个评价者对 75 名 4 ~ 16 岁的孩子的陈述进行评价,这三个评价者对案件的情况并不了解,波伊卡克(Boychuk)在她的样本中加入了第三个组(除了“被证实的”和“可疑的”组以外),即“可能被虐待”组。“可能被虐待”是指那些没有医学证据,但是有被告供述或者来自高等法院的刑事制裁。不幸的是,在她全部的分析中(包括表 5.3 中的那个),她把被证实的组和可能被虐待的组合在一起。通过评价两个组在每个标准上的差异,波伊卡克(Boychuk)发现的差异没有埃斯普林(Esplin)和他的同事发现的

差异明显(表5.3),但是所有的被发现的13种差异都在预期的方向。也就是说,标准在被证实的案例中比在可疑的案例中更经常出现,再一次验证了安乔吉的假设。

拉姆和他的同事分析了98名声称的性虐待的儿童被害人(年纪在4~12岁之间)的陈述的真实性。根据独立的证据(例如医学证据,供述和多道测谎测试),76名儿童的陈述被归为可信,13名儿童的陈述被归为不可信,剩下的9份陈述被归为可疑(对可疑的一类没有进行分析)。他们发现的差异比波伊卡克(Boychuk)和埃斯普林(Esplin)以及同事发现的差异更不显著(部分是因为评价没有包括所有的19个标准)。但是,这次所有的差异也都在预期的方向上,也就是说,标准在可信的组中比在不可信的组中更经常出现。与埃斯普林(Esplin)和同事一样,他们也计算了他们的两个组的平均的CBCA得分。如果一个标准在陈述中没有出现则记为0分,如果出现了则记为1分。这一研究中只使用了14项标准,这意味着CBCA的总分可能在0到14之间。有意义的是,标准在被证实的案例中(6.74)比在可疑的案例中(4.85)出现得更多。但是,这一差异比埃斯普林(Esplin)及其同事发现的差异要小。

克雷格(Craig)(1995)也没发现大的差异。他调查了年纪在3~16岁的儿童的48份陈述,这些儿童都是声称的性虐待的被害人。如果被告供述了罪行和[或]没有通过测谎测试,那么这份陈述就被归为"被证实的"。如果孩子提出了详细、可信的撤回以前说法的声明,和[或]被告通过了测谎测试,那么这份陈述被归为"高度可疑的"。被证实的案例的平均CBCA得分(7.2),稍高于可疑案例的平均得分(5.7)。本研究只使用了14项标准,可能的总分在0到14之间。

莱蒙斯－温克尔曼(Lamers－Winkelman)(1995)调查了 97 名年纪在 2～12 岁的儿童的陈述。所有的这些儿童都是声称的性虐待的被害人。比较“被证实的组”的陈述与“可能被虐待组”的陈述,没有“可疑的组”。比较两个组发现了一个差异。与“可能被虐待组”的陈述相比,被证实的组的陈述包含了更多的关于犯罪者心理状态的信息(标准 13)。

总之,所有的现场研究都支持安乔吉的假设。但是,真实的和可疑的陈述之间的差异并不总是很大。

也许,标准出现的频率和标准的区分能力一样重要。一个能很好区分真实和虚假陈述的标准,如果很少出现在陈述中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前三项标准(逻辑结构,无组织的陈述和细节的质量)的好处在于它们可能出现在所有的陈述中。其他的标准,例如特殊的细节,只有当有特殊事件发生时才会出现。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的现场研究已经表明,特别是标准 10(正确报告的细节被误解),标准 16(对自己的证言有怀疑)和标准 17(自我否定)很少出现在陈述中。标准的出现也依赖于证人的年龄,这点我们将在稍后讨论。

实验室研究

虽然 SVA 是明确地针对儿童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用儿童做被试的实验室研究并不是很多。只有三个研究(Akehurst, Köhnken & Höfer, 1995; Steller, Wellershaus & Wolf, 1988; Winkel & Vrij, 1995)确实是用儿童做被试的。而在其他研究中,都是用成人来做被试。对于 CBCA 评价是否可能用于成人的陈述还存在着争议。一些学者仍然将 CBCA 描述成只能用于评价声称的性虐待案的儿童被害人的陈述的技术(Honts, 1994; Raskin & Esplin, 1991b)。的

确,像标准 10(正确报告的细节被误解)这样的标准只可能是对年幼的儿童有用。这一观点的结果是,对 CBCA 的实验室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出于伦理和合法性的原因,不能为了得到性虐待的被害人而在实验室中进行性犯罪行为。

其他人则主张将这项技术用于评价除了性虐待以外的其他犯罪的嫌疑犯或成人证人的证言中(Köhnken, Schimossek, Aschermann & Höfer, 1995; Ruby & Brigham, 1997; Steller & Köhnken, 1989)。他们指出安乔吉的假设既不能被局限于儿童,证人和被害人,也不能局限于性虐待。

在 12 项实验室研究中有 11 项研究的被试是现场证人。他们目击了一件特殊事件,然后被指导着对这件事说谎或者说实话。只有在波特(Porter)和尤尔的研究中(1996),被试是有罪和无罪的"嫌疑犯"。

与现场研究相比,实验室研究的说谎者和说实话者之间的差异很小(见表 5.3)。但是,几乎所有的差异都是在预期的方向上,标准在真实的报告中比在虚假的报告中更常出现,这也证实了安乔吉的假设。在卢比(Ruby)和布里汉(Brigham)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调查结果都与一般模式不同。对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我只能采用思辩的方法。首先,他们使用的评价者只接受了非常短时间(45 分钟)的 CBCA 评分训练,因此可能不能被归为有经验的判断者或者"CBCA 专家"。第二,兰德(Landry)和布里汉(Brigham)把在逻辑结构和他人心理状态归因上的意外的调查结果解释为可能是被试努力想使他们虚假的陈述看起来可信,要这样做的一个很明显的方法就是要确定某些标准例如逻辑结构的存在。这意味着说谎者能影响 CBCA 的评价。我稍后将会谈到训练人们对 CBCA 评价作假,并愚弄 CBCA 专家。

表5.3进一步表明,在儿童和成人的真实陈述中标准会更频繁地出现。埃克赫斯特(Akehurst)及其同事的研究是证明这点的最直接的例子,因为他们的研究包括成人和儿童的陈述。他们发现,在两个年龄组之间不存在差异,同时还发现在两个年龄组中标准更多地出现在真实报告中。波特和尤尔(1996)的研究表明,一些标准在无罪的嫌疑犯的陈述中比在有罪的嫌疑犯的陈述中更常出现。这些调查结果证实了CBCA评价是不仅仅局限于性虐待案件的儿童被害人的陈述的,也可以被用于不同的情景和其他类型的被访谈者。

对19项标准中的每一项的经验证据进行检查,就会发现标准3得到的证实最大。说实话者比说谎者在陈述中包括更多的细节。语境铺垫(标准4),对交互行为的描述(标准5),话语复述(标准6)和异常的细节(标准8)都是那类在真实陈述中比在虚假陈述中更常出现的细节。我为此已经提供了一些解释。就是,说谎者缺乏捏造这些细节的想象力,他们没有提到这些细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细节会用来评价他们陈述的真实性,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提供这些细节,或者他们不想提到太多的细节,因为这将增加他们自相矛盾的可能性,或者当访谈者检查他们所说的话时会发现他们在说谎。

无组织的叙述(标准2)也得到了相当的证实。与说实话者相比,说谎者更倾向于按时间顺序(最先发生什么,然后发生什么,接下来发生什么……)来陈述。说谎者的陈述可能更有结构性,因为他们很难以一种无组织的方式捏造谎言,尤其是当某人不得不当时就捏造谎言时。与以时间顺序陈述相比,一点一点的陈述可能会使说谎者增加自相矛盾的可能性。在扎帕留克(Zaparniuk),尤

尔和泰勒的研究中(1995),无组织的叙述的差异是说实话者和说谎者之间发现的惟一的差异。而且,仅仅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他们就能正确地区分70%的谎言和90%的事实!

到目前为止,一些标准例如标准10和标准16~19,已经得到了一些证实。标准17(自我否定)还没有得到任何证实。一些研究人员,例如拉姆和克雷格,没有调查标准15~18,也许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说谎者想在他们的叙述中加入这些标准的话,能很容易就做到。我稍后将谈到这个问题。

很多其他的研究特别注意真实的陈述和虚假的陈述在一致性(标准1);细节的质量(标准3)和语境铺垫(标准4)上的差异。通常,这些研究为安乔吉的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大多数的研究发现,说真话常常与一致性(DePaulo, Stone & Lassiter(1985)的文献综述),丰富的细节(Burgoon, Buller, Guerrero, Afifi & Feldman, 1996; Jones & McGraw, 1987; Jones & Mc-Quinston, 1989; Köhnken & Wegener, 1982; Lindsay & Johnson, 1987)和语境铺垫(Alonso-Quecuty, 1991; Johnson & Foley, 1984; Johnson, Foley, Suengas & Raye, 1988; Johnson & Raye, 1981)相关。但是,一些研究对细节的数量的调查结果相反(Neisser, 1981)。

用CBCA识别实话

基于CBCA标准列表进行评价的评价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区分说实话者和说谎者?研究指出,对CBCA熟悉的评价者比那些对CBCA不熟的评价者能取得更高的准确率(Landry & Brigham, 1992; Steller, Wellershaus & Wolf(1988)引自Steller,

1989)。这意味着利用 CBCA 能提高评价陈述真实性的准确性。我稍后将会谈到这一问题。表 5.4 列出了目前为止所有的已报告的关于 CBCA 的准确率的研究。在实话和谎言的分类之间做了一个区分。本表也指出了这些研究是关于成人的还是儿童的。

表5.4　用CBCA评分方法识别谎言和实话的正确率

	实话 (%)	谎言 (%)	总计 (%)
现场研究			
Esplin等人(1988)(儿童)[1,2]	100	100	100
实验室实验研究			
Akehurst等人(1995)(成人和儿童)[3]	73	67	70
Akehurst等人(1995)(成人)[3]			90
Akehurst等人(1995)(儿童)[3]			71
Höfer等人(1996)(成人)[3]	70	73	71
Köhnken等人(1995)(成人)[3]	88	82	85
Landry & Brigham (1992)(成人)[2]	75	35	55
Porter & Yuille (1996)(成人)[3]	77	80	78
Ruby & Brigham (1998)(白人成人)[3]	72	65	69
Ruby & Brigham (1998)(黑人成人)[3]	67	66	67
Sporer (1997)(成人)[3]	70	60	65
Steller等人(1988)(儿童)[2]	78	62	70
Vrij (1999)(成人)[3]	77	74	75
Vrij等人(即将发表)(成人)[2]	80	60	70
Vrij等人(即将发表)(成人)[3]	53	80	67
Yuille (1988a)(儿童)[2]	91	74	83
Zaparniuk等人(1995)(成人)[4]	80	77	78

[1]术语谎言对Esplin的现场研究不是很恰当，因为我们不知道被试是否意识到他们没有说实话。
[2]击中率由CBCA评价者得出。
[3]击中率由差异分析得出。
[4]击中率通过决定原则“前五个标准都出现，并加上其他两个任意的标准”得出

研究结果是混乱的。埃斯普林(Esplin)及其同事的现场研究可能得到了最高的准确率(1988),即 100%(对每份陈述都做出了完美的分类)。另一方面,兰德(Landry)和布里汉(Brigham)(1992)获得了 55% 的准确率,只略高于假设的偶然概率(50%)。其他得到的准确率在这二者之间,范围从 65%[施波雷(Sporer)的研究]~90%[埃克赫斯特(Akehurst)及其同事的研究]。

"识别实话"和"识别谎言"之间的差异表明了事实偏见的存在,也就是 CBCA 在识别实话方面比识别谎言方面更成功。正如在第 3 章中谈到的,如果人们通过观察非言语行为来识别实话和谎言的话,事实偏见也会出现。也许 CBCA 研究中的事实偏见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事实上 CBCA 是一种查证事实的方法而不是识别谎言的技术。在识别谎言上的较低的击中率暗示着相对多的虚假陈述会被 CBCA 评价者判断为是真实的。换句话说,许多说谎者被 CBCA 估价者认定为是说实话的人。我稍后将会谈到这个问题。最后,调查结果没有显示出在评价儿童和成人的陈述的正确性之间的差异,再次表明 CBCA 分析不一定要局限于儿童的陈述上。

影响 CBCA 标准在陈述中出现的因素

很多的因素能影响 CBCA 标准在陈述中的出现。到目前为止,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因素上。

儿童的年龄

8 岁以下的儿童的陈述比那些年长的儿童的陈述所包括的标准要少(Boychuk,1991;Craig,1995;Hershkowitz,Lamb,Sternberg & Esplin,1997;Lamb,Hershkowitz,Sternberg,Esplin,Hovav,Manor &

Yudilevitch, 1996; Lamers-Winkelman, 1995)。这并不令人惊讶。认知能力和语言运用在整个儿童时期都在发展,这使得他们对目击的事情提供详细的叙述逐渐变得容易。波伊卡克(Boychuk)比较了来自不同的年龄组的儿童陈述的 CBCA 得分,发现标准 5(对交互行为的描述)和标准 15(承认记忆的缺乏)在较年长的儿童(8 ~ 16 岁之间)的陈述比在较年轻的儿童(4 ~ 7 岁之间)的陈述中更经常出现。她也发现,较年轻的孩子不能表现出标准 13(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归因)。后者的发现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事实上,8 岁以下的儿童只能以他们自己的角度看待世界(Flavell, Botkin, Fry, Wright & Jarvis, 1968)。克雷格(1995)发现,对年长的儿童(10 ~ 16 岁)而言,在陈述中的标准出现的数量比那些年轻的儿童(3 ~ 9 岁)更多。但是,CBCA 标准有时确实会在非常小的儿童的陈述中出现。莱蒙斯 - 温克尔曼(Lamers-Winkelman)分析了非常小的儿童的陈述(2 ~ 3 岁),发现大部分的标准有时甚至会在这些非常小的儿童的陈述中出现。只有多余细节(标准 9),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归因(标准 13),对自己的证言有怀疑(标准 16)和自我否定(标准 17)从不出现。

访谈者的风格

访谈的风格对访谈中出现的细节数量有影响。开放式邀请("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你是否有别的事情想告诉我?"等等)比命令式的言辞能产生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让被访谈者的注意力放在被访谈者以前没有提到的细节上,或者强迫将被访谈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或她先前已经提到的细节上(Hershkowitz, Lamb, Sternberg & Esplin, 1997; Lamb, Esplin & Sternberg, 1995; Lamb, Hershkowitz, Sternberg, Esplin, Hovav, Manor & Yudilevitch,

1996; Sternberg, Lamb, Hershkowitz, Esplin, Redlich & Sunshine, 1996; Sternberg, Lamb, Hershkowitz, Yudilevitch, Orbach, Larson, Esplin & Hovav, 即将发表)。

访谈的数量

被访谈者接受访谈的数量与被访谈者给予的信息量是相关的。例如,儿童在第二次接受访谈的时候可能比第一次提供更多的细节(Goodman & Schwartz-Kenney, 1992; Yuille & Cutshall, 1989)。对此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儿童在和他们不认识的访谈者进行第一次访谈时可能觉得不舒服,因此他们不敢多说。另外,他们可能不信任访谈者,因此也不愿多说。在第二次访谈时,儿童可能觉得舒服点,或者他们可能更信赖访谈者一些,这可能导致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波伊卡克(Boychuk)的现场研究发现,访谈进行得太多也会对被访谈者提供的信息造成负面的影响。她比较了接受一次,两次,三次或至少四次访谈的儿童的 CBCA 得分。接受过至少四次访谈的儿童的访谈比其他儿童的访谈要贫乏。作为对她调查结果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波伊卡克(Boychuk)认为儿童在经过几次访谈以后,懒于对同一个主题再说什么,并懒于把整个故事再回忆一遍。总之,这些调查结果表明一定数量的访谈(最多 2 ~ 3 次访谈)是恰当的。

认知访谈

为了增加从访谈中得到的信息量,人们设计了专门的访谈技术。其中的一项访谈技术就是所谓的认知访谈,它最初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费希尔(Ron Fisher)和盖兹门(Ed Geiselman)(1992)提出的。现在,这项技术常常被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警察用于对证人的访谈中。这项技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时候储存在人们记

忆中的信息，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够当时就被提取出来。使用这项建立在记忆回忆和提取的心理学原理上的特殊技术，人们能够很好地回忆起他们起初回忆不起来的信息。人们已经多次发现，接受这项访谈技术的人比那些没有接受这项访谈技术的人能提供更多的信息（Köhnken，Milne，Memon & Bull，即将发表）。并且，还发现使用认知访谈得到的证人陈述比那些使用标准访谈技术得到的陈述的 CBCA 得分更高（Köhnken，Schimossek，Aschermann & Höfer，1995；Steller & Wellershaus，1996）（更详细的关于认知访谈技术的资料见 Memon（1998））。

压力事件

调查人们对非常大的压力事件的记忆程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从伦理上说是不能为了研究的目的而制造大的压力事件的。因此，为了研究人们对压力事件的记忆，研究人员主要依赖于真实生活中的案件。但是，我们常常不清楚在这些案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这使得研究人员不能确定某人对事件的回忆是否是完整的和正确的。彼得（1991）调查了儿童对压力的事件的报告内容，但是他并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他调查了儿童对看牙医、注射疫苗或目睹的窃盗的陈述。他的调查结果显示，压力有时会损害对事件的记忆。但是，在文献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证明人们能够对他们卷入的压力事件给出一个详细的陈述。例如，佩诺斯（Pynoos）和埃斯（Eth）（1984）访谈了那些目击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被谋杀的40名儿童。他们发现，这些儿童能够正确地回忆一些他们目击的细节。另外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些目击他们的母亲被强奸的儿童仍然可以把这一事件记忆得很好（Pynoos & Nader，1988）。钟斯和克鲁格曼（Krugman）（1986）发现，一个被陌生

人绑架，性虐待并被弃置深坑的3岁女孩可以对事件和陌生人提供详细的描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关在艾黎卡（Erika）集中营的人们在40年后仍能详细说起对这一时期的记忆（Wagenaar & Groeneweg，1990）。在这一研究中，囚犯就他们被关在集中营的事情接受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在1943～1947年期间，另一次是1984～1987年期间。研究发现对大部分的集中营记忆都保持得很好，虽然有时，一些特殊的和重要的细节被忘记了。被忘记的内容包括被虐待的事情，以及目击他人被谋杀的事情。

有效性检查列表的评价

目前，还没有进行过对有效性检查列表（表5.2）的效力的研究。对CBCA的实验室研究的有效性检查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这类研究中的环境常常是标准化了的。但是，在前面提到的CBCA的现场研究中，没有报告对CBCA评价的有效性检查（或者可能没有进行过）。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去质疑一些有效性检查列表标准的正确性，例如“感情不恰当”（标准2），“暗示的感受性”（标准3）以及“和其他陈述不一致”（标准10）。

标准2是指如果一个被访谈者不带任何情绪特征地报告虐待的细节，那么与带着明显情绪特征的陈述比，更不值得信任。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消极经历时都会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我自己的一项实验室研究（Vrij & Fischer，1995）表明，一些“被害人”表现出明显的痛苦的情绪特征，而其他的被害人则没有。李特曼（Littmann）和斯维斯

克(Szewczyk)(1983)进行的一项现场研究发现,在访谈期间表现出痛苦的情绪并不是陈述有效性的一个有效的指示器。因此我认为,在被害人是否表现情绪的行为的基础上做出结论是不恰当的。

标准 3 是关于暗示的感受性。一些证人比其他人更易受访谈者暗示的影响,并且可能提供那些证实访谈者的想法的信息,而事实上这些信息是虚假的。因此,正如前面提到的,尤尔(1988b)以及兰德(Landry)和布里汉(Brigham)(1992)建议,在访谈结束时问证人一些引导性问题,以评价证人对暗示的感受性。他们建议问一些关于周边信息的问题(例如,"当你和你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哪个朋友也在那里,是克莱尔还是莎拉?"而访谈者知道当时没有朋友在场)。很明显,对核心信息是不能问任何问题的,因为这可能会扭曲被访谈者的记忆。也就是说,问题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一件事件的记忆,人们可能会回忆出那些从未发生的事件而仅仅只是因为访谈者暗示他们这些事件确实曾发生过。罗芙托斯和帕默(Palmer)进行的一项研究(1974)是这一现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被试观看了一个有关交通事故的影片,然后对他们提问,问题包括"当汽车相互接触(contacted)时,车速大约有多快?"另一些被试观看同样的影片,但是他们的问题中的动词"接触"被"撞了一下(hit)"、"碰撞(bumped)"、"猛撞(collided)"、"撞碎(smashed)"所替代。即使所有的被试看的都是同样的影片,问题的用词还是影响了他们的答案。他们估计的车速(每小时的英里数)分别是 31、34、38、39 和 41。一星期后,问被试是否在事故现场看到了被撞碎的玻璃。虽然正确的答案是"没有",但是在那些曾被给出"撞碎(smashed)"动词的被试中,有 32% 的人说他们看到过碎玻璃。因此,问题的用词已经影响了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只询问与

周边信息相关的问题也可能带来问题，因为儿童对核心部分的暗示比对周边部分的暗示有更大的阻力（Goodman，Rudy，Bottoms & Aman，1990）。而且，他们对压力大的事件（可能是核心事件）暗示比压力小的事件（有可能是周边事件）的暗示的阻力更大（Davies，1991）。因此，如果一个被访谈者接受一个有关事件周边部分的引导性问题时，并不意味着在谈论更重要的内容时不会对暗示出现阻力。这一标准似乎假设，暗示更多的是由个体差异而不是因为环境造成的。这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假设（Milne & Bull，1999）。

标准 10 是关于同一个证人提供的不同的陈述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如果被访谈者的两份陈述相互矛盾，则其中一份陈述实际上可能是捏造的。在我看来，这个观念是不对的。研究已经表明，儿童所做的前后矛盾的陈述并不一定意味着陈述是被捏造的（Moston，1987；Poole & White，1991）。相互矛盾的陈述也可能是重复问题的结果。特别是儿童，他们很可能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两个不同的答案，因为他们可能认为“如果相同的问题问两遍，那么我以前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一定是错的”。因为这种情景经常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孩子的这种推论是有道理的。父母和老师常常在他们得到的答案是错误时向儿童重复他们的问题。举例来说，当父母和儿童一起阅读一本有关动物园的画册时，以下这种交谈经常会出现：“那是什么？一只猫吗？它是一只猫吗？不是，仔细看看。这是什么，它不是比猫大一点吗？对，它是一只老虎！做得好！”总之，被访谈者做出不一致的或相互矛盾的陈述可能是因为问题重复问题造成的。因此在判断不一致或相互矛盾的时候，这一访谈者因素应该考虑在内。

使用 SVA 中的问题

与 SVA 相关的问题由两个缺点造成。首先,SVA 不是一个标准化的工具,第二,这一方法缺乏理论上的支撑。我现在要讨论的前四个问题全部都与缺乏标准化有关。

标准的数量

目前,还没有正式的 CBCA 判断规则来确定一份陈述是否真实。不同的专家使用不同的规则,而且其中的一些规则非常详细。依照尤尔(引自 Horowitz,1991)的观点,如果陈述能满足前五个标准以及后面的任何两个标准,就可以把陈述归为诚实的一类。拉斯金(Raskin)(引自 Zaparniuk,Yuille & Taylor,1995)认为如果在陈述中出现标准 1 ~ 3,以及剩下的标准中的任何 4 个,则陈述是真实的。克雷格(Craig)(1995)认为陈述要包含超过 5 个的标准才可能是有效的。造成"标准项目的数量"问题更复杂的一个因素是当评价陈述时,并不是所有的专家都使用了所有的 19 条标准。但是,一些专家确实是在使用判断规则,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这意味着可以只在 CBCA 结果的基础来评价陈述的真实性,但是这些专家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陈述的丰富性,并因此可能会影响 CBCA 的得分。因此,我同意莱蒙斯 - 温克尔曼(Lamers-Winkelman)(1995),一位荷兰的 SVA 专家的看法,他说使用判断规则是不恰当的。史德拉(Steller)(1999,人际沟通)和克肯(Köhnken)(1999,人际沟通)也强烈地反对使用判断规则。

标准的权重

史德拉(Steller)和克肯(Köhnken)(1989)指出,一些标准可能

比其他标准在评价真实性方面更有意义。举例来说，在陈述中出现了正确但误解了的细节（标准 10），例如一个描述成人的性行为的孩子可能把它归为一个喷嚏或者一个伤痛，这显然比描述所谓的性侵犯的地点（标准 4）更有意义（但是标准 10 的问题并不经常出现在陈述中）。

确定个别 CBCA 的重要性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进行实验室研究，特别是检查那些标准在说实话者与说谎者之间的差异。正如前面提到的，尤其是无组织的叙述（标准 2），细节的质量（标准 3），语境铺垫（标准 4），对交互行为的描述（标准 5），话语复述（标准 6）和特殊的细节（标准 8）标准的出现。

克肯（Köhnken）（1999，《人际沟通》）指出，在实验室研究中用个别 CBCA 标准的差异值（在真实与虚假的陈述之间）作为这些标准在现实生活评价中的差异值的指示器。根据克肯（Köhnken）的说法，标准的差异值可能很依赖被评价的事件的类型。因此，一些标准可能对实际生活中评价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们在实验室研究中的作用不是很突出。

既然关于标准的数量和标准的权重存在着上述问题，那么 CBCA 研究人员就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实话——谎言进行区分。在一些研究中，CBCA 评价者完全凭他们自己做出实话——击中分类（见表 5.4）。在其他的大多数研究中，CBCA 评价者对陈述进行评分，但是却利用计算机统计分析程序进行实话——谎言区分。这两者主要的不同在于，CBCA 评价者可以给出个别标准的不同的权重，而计算机分析不能做到这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CBCA 评价者的分类会更正确。在陈述中的一个特殊的因素（一个理解错误的细节，一个特殊的细节，复杂的交互行为的详细描述，等等）都可

能使得专家相信这份陈述是真实的。但是在计算机分析中，不能给这样的细节以特别的权重。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证明专家更有效。从表 5.4 中可以看出，基于评价者分类的研究中的击中率与基于计算机分析分类的研究中的准确率是相似的。检查专家和计算机分析的决策的差异的一个可靠的方法就是在同一个研究中比较专家和计算机的分类。只有维吉（Vrij）、奈勒（Kneller）和曼（Mann）（即将发表）在他们的实验中进行了这样的比较。专家在识别实话方面更准确（专家和计算机的击中率分别是 80% 和 53%，表 5.4），而计算机在识别谎言方面更正确（专家和计算机的击中率分别是 60% 和 80%）。专家和计算机之间的击中率的差异证实了这样的想法，即专家并不是仅仅依靠 CBCA 得分来进行分类，也使用了一些类型的权重系统。但是，这种权重过程并不能提高所有的击中率。

外部因素的影响

要确定有效性检查列表中的每一个因素对证人叙述的影响的准确性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访谈风格时常对证人报告的信息的数量有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证人将必然会在某个特定的访谈中受到某种访谈风格的影响。而且，即使证人受到了访谈风格的影响，要精确地确定这一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某个特定因素在个别的报告上的精确影响永远是无法确定的——它只可能被估计。很明显，在这些估计中常常也会犯错误。也可能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它们没有列在有效性检查列表中，但确实影响了人们的叙述。

SVA 评估是主观的

以上的部分说明了 SVA 评估是主观的。这意味着它们依赖于个别评价者的解释。因此，了解不同的评价者评价同样的陈述时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相同的结果则很重要。SVA 结论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当不同的评价者对相同的材料做出不同的结论时，就不宜使用 SVA。在评价者之间可能存在两种形式的评价者间的一致。第一，不同的评价者可能在 CBCA 总分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评价者可能对陈述中出现的标准的数量是一致的。第二，评价者之间关于标准出现或缺乏的看法一致。研究已经指出，评价者之间 对 CBCA 总分的看法的一致性是相当高的，也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有时候，对于每个标准，评价者之间的一致性却很低①。

检查可靠性的另一个方法就是让同一个评价者在不同的时间

---

①关于全面报告评价者间的一致性率的研究得到了相当高但不完美的评价者间的一致性率（Anson，Golding & Gully 1993；Boychuk，1986；Höfer，Akehurst & Metzger，1996；Steller，Wellershaus & Wolf，1988）（这些研究报告了对每个标准出现的一致性百分率）。有更多的研究报告了每个标准在评价者间的一致性率，有时候一致性率是相当低的。举例来说，Höfer，Akehurst 和 Metzger（1996）必须（从 15 个使用的标准中）删除三个标准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没有显著的评价者间的一致性。Akehurst，Köhnken 和 Höfer（1995）因为相似的原因也不得不删除三个标准。Anson，Golding 和 Gully（1993）认为他们每个标准的低的评价者间的一致性率是因为他们给评价者提供了录像带，而这些录像带影响了判断的可靠性，尤其是因为 CBCA 系统是针对使用手写记录设计的（见第 3 章关于录像带如何干扰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使用手写记录和 CBCA 总分，CBCA 就是一项令人满意的可靠的评价技术，虽然还可以做一些改进。Horowitz，Lamb，Esplin，Boychuk，Krispin 和 Reiter-Lavery（1997）在他们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尤其是标准 8（特殊的细节），标准 9（多余的细节），标准 11（相关的外部联系），标准 14（自发改正）和标准 15（承认记忆的缺乏），需要定义得更清楚。见 Tully 和 Horowitz 最近关于高水平的评价者间的一致性的重要性的争论。

对同一份陈述进行两次评价，检查这两份评价之间是否一致。霍洛维茨(Horowitz)和他的同事就是要求他们的评价者这样做的。和评价者间的一致性一样，对 CBCA 总分的评价者内的一致性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对某些个别的标准则相当低。

霍夫(Höfer)和克肯(Köhnken)(1999)认为在 CBCA 研究中的低的评价者间的一致性可能是因为对评价者的训练不够。他们提出了一个为期三周的训练课程，并报告说，经过三周的训练后，即使对每个 CBCA 标准而言，评价者间的一致性都是令人满意的。

迄今为止，没有进行过任何关于在 SVA 判定上的评价者间的一致性的研究——也就是说，CBCA 得分和有效性检查列表混合在一起。莱蒙斯－温克尔曼(Lamers-Winkelman)(1995)认为它们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克肯(Köhnken)(一位德国的司法心理学教授，常常作为德国刑事法庭案件的专家证人)同意莱蒙斯－温克尔曼(Lamers-Winkelman)的看法，并认为这是因为有效性检查列表的原因。如果两位专家在德国刑事案件中的一份陈述的真实性看法不一致，那么他们常常也在对外部因素对陈述的可能的影响的看法上也不一致(Köhnken，1997，《人际沟通》)。

什么时候使用这一方法还不明确

建立在安乔吉假设上的 CBCA 认为，来自真实经验记忆的陈述与来自捏造或幻想的陈述在内容和质量都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操作假说——假定某种差异应该出现，但并没有说为什么这些差异会出现[施波雷(Sporer)，1997]。在专业人士对遭受性虐待的儿童访谈的经验的基础上，CBCA 得到了发展，它们被特别设计出来评价这类案件中的判断的真实性。理论方法的

一个好处就是它可能能预知这一方法可以在哪种情景中被使用。因为 SVA 缺乏理论上的支撑，很难说它可以被用于什么样的情景中。正如我们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提到的，CBCA 专家实际上对这一方法应使用在何种情景下还没有达成一致。

人们认为说实话者说了什么

CBCA 标准

对于熟悉 CBCA 研究的观察者而言，哪种言语特征可以增加或减少他们对叙述的可信度？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据我所知，只进行了两项（非常相似）研究来考察观察者对 CBCA 标准与真实性之间关系的看法。研究在表 5.5 中被列出。在这些研究中，给被试提供了一系列 CBCA 标准，并询问他们是否相信，与说实话相比，说假话时这些标准出现的频率会增加或减少，或者相信在说实话与说谎话之间没有差异。两项研究都是在英国进行的，并且都用非专业人士和警察做被试。

表 5.5　说实话的主观的言语特征（标准基础内容分析）

	CBCA 标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kehurst 等人（1996）	>	<	>	–	–	<	<	<	<			<	>	<	<	<	–		

（续表）

	CBCA 标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aylor & Vrij(1999)	–	–	–	<			<	<	<					<	<	>	>		

>，观察者相信言语特征更常出现在说实话时而不是说谎时；

<，观察者相信言语特征更少出现在说实话时而不是说谎时；

–，观察者没有将言语特征和说谎/说实话联系起来。

两项研究的调查结果都没有发现在非专业人士和警察之间存在着差异，这表明警察和非专业人士对于说实话的言语特征有着相似的信念。调查结果进一步表明，“正确的关系”（也就是这些标准在说实话的时候出现得更频繁）仅仅只被提到几次，即在埃克赫斯特（Akehurst）及其同事的研究中只被提到 3 次，而在泰勒和维吉进行的研究中只提到两次。埃克赫斯特（Akehurst）及其同事所进行的研究中的被试认为，与虚假的叙述相比，一个诚实的叙述应该具有更有逻辑的结构（标准 1），包含更多的细节（标准 3），而且包括较多的犯罪者心理状态的归因（标准 13）。泰勒和维吉进行的研究的被试相信，诚实的陈述包括对更多的对自己证言的怀疑（标准 16）和较多的自我否定（标准 17）。

另一方面，不正确的关系（也就是 CBCA 标准在说实话期间出现得很少）在埃克赫斯特（Akehurst）及其同事的研究中提到了 9 次，而在泰勒和维吉的研究中提到了 6 次。在这两项研究中，观察者相信诚实的叙述与虚假的叙述相比，包括了比较少的料想不到的复杂化（标准 7），比较少的特殊的细节（标准 8），除此之外，埃

克赫斯特(Akehurst)及其同事的研究中的被试认为,与虚假的叙述相比,诚实的叙述更结构化(标准2),而且包括较少的话语复述(标准6),较少的主观的心理状态的描述(标准12)以及较少的对自己的证言的怀疑(标准16)。泰勒和维吉的研究的被试进一步相信,诚实的陈述比虚假的陈述包含比较少的语境铺垫(标准4)。当我在这些已经进行的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时我必须很小心,因为只进行过两个研究,并且两个研究表明了一些不同的调查结果。但是,结果暗示人们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说实话的言语特征。这很有趣,因为当说话者想要给别人留下可信的印象,它会影响说谎者说话的动机。例如,他们也许不会故意地在他们的叙述中加入料想不到的复杂化,包括在他们的描述中料想不到的复杂化,特殊的细节和多余的细节,因为他们相信说实话者也不会提到这些类型的细节。然后这些类型的细节的缺少可能会暴露他们的谎言。很明显,说谎者如果获得了关于说实话的言语特征(例如,通过阅读这本书),为了给观察者留下诚实的印象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策略。我稍后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没有包括CBCA标准列表,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知觉的可信度和细节的数量的关系上。大多数的研究发现,包含多的细节能留下诚实的印象(Bell & Loftus,1988,1989;Conte,Sorenson,Fogarty & Rosa,1991;Wells & Leippe,1981)。举例来说,贝尔(Bell)和罗芙托斯(1989)以及维尔斯和Leippe(1981)发现,模拟的陪审员倾向于相信那些能回忆起有关犯罪的较琐细和无关的细节的证人而不相信那些只能记起重要信息的人。但是,佛瑞德门(Freedman)、亚当(Adam)、戴维(Davey)和科格尔(Koegl)(1996)发现,这一关系依赖于语境。当观察者怀疑某人在

说谎时，中等程度的细节会带来最大程度的影响。在这些情景下，太多的细节可以容易地给观察者这样的印象，例如“他们太努力了，难以令人信任”，“他们在自我保护”，或者“他们正在捏造一些材料”。库贝尔（Coolbear）（1992）也提到，太多细节会引起怀疑，因为这意味着叙述是被人教导的。

SVA 检查列表

库贝尔（Coolbear）（1992）调查了专业人士（不熟悉 SVA）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与有效性检查列表相似的标准来评价指控的可信度。她对 51 名专业人士（法律职业和人权服务机关中的那些对儿童性虐待指控有经验的人）进行了结构化访谈，主要是关于用于评价这类指控可信度的方法。最常见的回答是把使用儿童式的语言作为诚实的一个指示器（检查列表的项目 1）。情绪与儿童提供的材料的性质一致（检查列表的项目 2）也被作为真实叙述的标志。最后，许多被试提到，如果他们知道儿童的父母之间有监护/探视权之争或离婚（项目 6 到 8），他们将会很谨慎地处理这一性虐待指控。

评　　价

在世界上的几个国家中，SVA 评估被接纳为刑事法庭的证据。在本章的调查结果通常都支持安乔吉假设——也就是说，他们支持这样的观点：“来自真实经验的记忆的一份陈述与基于捏造或幻想的一份陈述，在内容和质量上是不同的。”但是，我认为，SVA 评估存在着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在法庭上把这样的评价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使用是不受欢迎的，至少在目前来说。我将讨论其

中的五个问题。

关于正确地区分虚假叙述的问题

不幸的是，到现在为止，所进行的大多数的现场研究还没有具体的数据来报告评价者在识别真实和虚假的陈述方面有多准确。在埃斯普林（Esplin）及其同事进行的现场研究中，在真实的和虚假的陈述之间没有重叠，这造成100%的击中率。但是，这一项研究存在着方法上的漏洞，这使得调查结果不那么可靠。实验室研究的准确率显示当评价者在区分说实话者和说谎者时，特别是在区别说谎者时，确实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在大多数的研究中，发现准确率在65% ~75%（偶然概率是50%），这意味着在25% ~35%的案件中做出的是不正确的判断。在这些案例中，说谎者被错误地归为说实话者。这些错误分类的百分比是令人害怕的，假定它们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判断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实验室研究的调查结果是否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调查结果，我们也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SVA评价是否有将虚假的叙述归为真话的相似倾向。但是，让我们假设实验室调查结果反映了现实生活上出现的趋势，而且SVA专家具有轻信虚假叙述的倾向。这样的错误的判断会有严重的后果。在现实生活中，SVA方法通常被用来评价证人或被害人的陈述。因为证人的虚假陈述被错误地归为实话，这样的错误可能会造成实际上无罪的某个人被错误地判定为有罪。错误地判定无罪的嫌疑犯有罪是无法接受的，至少在西方的法律体系中是这样，因为这一法律体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基础上，即放过10个有罪的人好过判定一个是无罪的人有罪。因此，在把SVA评价引入法庭作为实质证据使用，就必须在认定虚假陈述方

面达到较高的准确率。

什么是“事实”

既然知道了 CBCA 是一个验证事实而非识别谎言的工具，那么 CBCA 评价在识别谎言方面有相对低的击中率也许就不怎么令人惊讶。但是，问题是“什么是事实”。假设某人曾经遭受过性虐待，并因此提供了关于她的经历的一份详细的叙述，但是没有认定真正的犯罪者，而是指控一个无辜的嫌疑犯是罪犯。大多数情况下，专家会相信她的叙述，因为她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细节。如果法院以这些评价为他们判决的基础，无罪的人可能被判定为有罪。

也可能是一名证人相信他或她曾经目击一件特别的事件，而且已经细化了对这类事件的记忆，虽然事实上他们记忆不是这一事件。科洛目巴葛（Crombag）、瓦格纳（Wagenaar）和冯·库本（Van Koppen）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强有说服力的例子（1996）。他们的研究以一件真实的事件为基础，即 1992 年 10 月 4 日，一架 El Al 波音 747 货机撞上阿姆斯特丹（荷兰）的一栋 11 层高的公寓楼。荷兰电视广泛地报道了这场国家灾难，播出了消防队员灭火救人的场面。好几天内，这场灾难是主要的新闻事件，而且最后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或者他们认为他们知道——已经发生的细节。在所有的这些新闻节目中，电视只报道了飞机坠毁后发生的事情；因为坠毁本身没有被拍摄下来，因此从来都没有播放过。但是，93 名参与研究的学生中有 61 名（66%）对问题“你在电视上看到过飞机撞上大楼时的镜头吗？”做了肯定的回答。多数“证人”提供了根本不存在的飞机坠毁的电视镜头的进一步的细节。例如，41 名学生回忆说他们看见飞机是水平地撞上建筑物

的，10 名学生说飞机是垂直地撞上建筑物的，并且有 14 名学生指出他们在电视上看到，飞机在坠毁的时候已经着火了。总之，许多被试拥有对他们从来没有目击的事件的丰富而生动的记忆，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曾经目睹过这一事件。

约翰逊（Johnson）、哈什绰第（Hashtroudi）和琳塞（Lindsay）（1993）描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在那个节目中里根总统向海军人员详述了一个有关一名真正的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这一行为或英勇事迹的记录，而这个故事与达纳·安德鲁斯（Dana Andrews）20 世纪 40 年代的一部电影的一个场景离奇地相似。

一般的常识认为孩子有时会有丰富而生动的幻想①。孩子，与成人相比，有时更难进行真实监控——也就是说，他们对什么是他们实际上经历的和什么是他们想像的事情会感到困惑（Foley & Johnson, 1985; Johnson & Foley, 1984; Markham, 1991; Parker, 1995）。西塞（Ceci）和他的同事让 3 ~ 6 岁的儿童想像一些事件，包括从未在他们身上发生过的事件，例如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并在腿上被缝了一针（消极事件），以及和同学一起乘坐热气球（积极事件）（Ceci, Loftus, Leichtman & Bruck, 1994）。他们就儿童想像的事件和他们每周进行一次访谈。在第十一次面谈的时候，59%

①儿童为什么在区别经验和想像的事件方面比成人更困难，一个理由就是他们确实没有使用那些成人用来做出这样的区别的技巧。举例来说，假设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在圣诞节假期到地中海的海滩度假。你和你的家人说了好几次要去海边游泳，但是事实上你一次也没去，因为当时是冬天，去海边游泳太冷。数年之后，一位朋友拜访你家，问你是否在那个圣诞节假期在那个海滩度假并游过泳。与孩子相比，成人将会对这个问题没那么困惑，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在冬天去海边游泳。

的三四岁的儿童和 51% 的五六岁的儿童认为他们实际上已经乘坐过热气球了,31% 的三四岁的儿童和 28% 的五六岁的儿童告诉访谈者他们事实上曾经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并在腿上被缝了一针。所有的访谈都被录了像,而且这些录像展示了内部联系紧密的,详细的,但是错误的叙述。西塞(Ceci)及其同事将儿童第十一次的访谈录像放给专业人士看(专门对儿童进行访谈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看看他们能否判定哪个事件是儿童亲身经历的,哪一事件是虚构的(Ceci, Huffman, Smith & Loftus, 1994; Ceci, Loftus, Leichtman & Bruck,1994)。这些专业人士在区别正确的和错误的报告上并不好于偶然概率(虽然他们没有接受过使用 CBCA 方面的训练)。

总之,虚假的叙述在信息方面可能是非常详细、生动和丰富的。因此 CBCA 评价者有时出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将详细、生动和丰富作为说实话的指示器。从这个方面来看,CBCA 评价仅仅把重心集中在"事实标准"上是十分可惜的,因为纳入"谎言标准"(欺骗的言语指示器)可能会使这一工具在评价虚假的陈述方面少些弱点。

主观评价

我以前提到过 SVA 评价是主观的——也就说,其依赖于评价者的解释。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就必须要求不是一名,至少是两名评价者彼此独立地评价同一份陈述。目前这还不是常见的做法。例如,现在在德国的实践中只有一名专家对一份陈述进行评估(Köhnken,1997,《人际沟通》)。

惟一的证据

既然 SVA 评价常常被作为一个刑事案件的一种主要的证据使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 CBCA 评价的准确率都是很低的,以至于这样的评价无法用作法庭证据(Steller & Köhnken, 1989)。性侵犯常常以缺乏证据为特点,而声称的被害人和嫌疑犯的陈述有时是惟一可以获得的信息。因此,陪审团和法官可能很依赖 SVA 专家作出的判定,这就要求这些评价必须是正确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小于 90% ~95% 的准确率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不正确的判定可能会导致错误的供述。假设一个无罪的嫌疑犯不能够证明自己无罪,而 SVA 专家又做出不正确的判定而告知法院他或她相信孩子的指控。然后嫌疑犯可能认为他现在不能避免被判刑,可能会决定承认有罪,并做出一个虚假的供述以获得减刑。因为常常没有其他的信息可供于检查专家的判定的准确性,所以很难证实这一判定的对错。提供检查 SVA 判定准确性的惟一方法是通过使用一些独立的 SVA 评价者。

我们对 SVA 判定的效力知道些什么

到目前为止,CBCA 已经吸引很多研究人员的注意。最近已经发表了许多 CBCA 的研究,而且现在一些学者还在进行更多的研究。我赞同这样的发展,因为还有很多问题仍需要去解决(这些将会在下面的部分谈到)。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已经发表的研究都是 CBCA 研究。目前还没有发表过一项 SVA 研究。这是对 SVA 判定用在法庭上的事实一个警告。人们可能说 SVA 研究是一个两步过程。第一,应在良好的控制条件下例如实验室中对

CBCA 的有效性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已经表明 CBCA 评价并不是 100% 准确的。因此，我同意拉姆以及他的同事在现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虽然结果与拉斯金(Raskin)和埃斯普林(Esplin)的预测一致，即与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叙述相比，CBCA 标准会更多地出现在单独来看就可信的叙述中，CBCA 的准确度太低而不能被允许作为法庭的一个可靠而有效的测试"(Lamb, Sternberg, Esplin, Hershkowitz, Orbach & Hovav, 1997, p. 262)(也可见 Lamb, Sternberg, Esplin, Hershkowitz & Orbach, 1997)。

但是，当专家提及 CBCA 判定时他们的观点是有些误导性，而专家在法庭上呈现的却是 SVA 判定。这就使得第二个步骤成为必要的。在这个阶段，SVA 判定——也就是 CBCA 评价和其他的外部影响因素一起——都应该接受调查。当列在有效性检查列表中的外部因素被考虑进来时，判定会更正确吗？换句话说，SVA 结果比 CBCA 结果更正确吗？它们可能是更正确，而且如果 SVA 评价者要把他们的评价作为法庭的一项实质性证据使用它们就应该更准确。

虽然我认为，目前 SVA 评价不应该被允许作为法庭的一项实质性证据，但是 SVA 评价者似乎在识别实话和谎言方面的准确率要大于偶然概率。这使他们的评价是有价值的。他们在警察调查中可能是有用的——举例来说，指导那些侦查。如果在法庭上有其他的实质性证据，这些评价可能被作为辅助证据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应该提供 SVA 存在的问题(例如在 CBCA 评价中存在着事实偏见，以及这一评价是主观的事实)。我也认为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获得关于 SVA 评价的效力的更详细的观念。我将在下文中概括地说明我的想法。

对 SVA 的深入研究

- 研究不应该只集中在 CBCA 评价上，也应该放在 SVA 评价上。
- 当人们真正进行 SVA 评价以前，应该训练他们如何对陈述进行评分。拉斯金（Raskin）和埃斯普林（Esplin）（1991b）指出，进行 CBCA 评价是一门技术，可以在 2 天或 3 天内学会。霍洛维茨（Horowitz）（1991）发现，把一般特征（标准 1，2 和 3）教给新的评分者特别困难，这也许是因为这些标准与其他的标准相比，特征较少。但是，研究已经指出，45 ~ 90 分钟的训练足够使得大学生们提高他们在区别儿童（Steller，1989）和成人（Landry & Brigham，1992）的真实和虚假的陈述上的准确性。

  埃克赫斯特（Akehurst）、布尔（Bull）和维吉（Vrij）（2000）最近训练了不同类型的人（警察、社工和大学生）使用 CBCA。培训包括了一个 45 分钟的以大卫 · 拉斯金（David Raskin）和约翰 · 尤尔（John Yuille）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的内容。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训练没有提高学生和社工的识别的准确性，而且，警察在训练期后的表现明显地比以前差。克肯（Köhnken）（1987）也发现警察在接受了 CBCA 训练后的表现比以前更差。他指出这样训练程序对警察而言，要理解和应用实在是太难了。这些调查结果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 CBCA 评价可能对警察特别有用。因此，应该发展出适合他们的训练课程。
- 虽然 SVA 已经被发展用来评价儿童陈述的真实性，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研究是针对儿童的。因此需要有更多的针对儿童的研究。

- 正如前面提到的，有人建议用 CBCA 评价来评价嫌疑犯的陈述。这将对警察特别有用。但是，目前发表的关于嫌疑犯的研究只有一个。
- 到现在为止，只是研究在司法背景下的 CBCA 的效力。调查这项技术在其他一系列的情景下是否适用也是很有用的。史德拉(Steller)认为，当正在被调查的事件与消极情绪有关，涉及失控或者直接涉及到被访谈者时，进行 CBCA 评价就成为可能(Steller，Wellershaus & Wolf，1988)。许多司法背景以外的情景都满足这些标准，例如病人在接受心理治疗期间回忆他孩童时期遭受的与性或犯罪无关的创伤经历，有人宣称他目击了一名穿着白色制服的男子在一架飞机坠毁后马上在寻找残骸(如前面刚刚提到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所发生的波音 737 坠毁事件)，度假者宣称导游应该为他的迷路负责，并因此要求退还他的钱，以及职员宣称他的同事应该为工作没有按时完成负责。很明显，做出完整的 CBCA 评价是非常费时的，也许在许多情景下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只使用一部分标准，给陈述的真实性提供一个粗略的建议，它也可能是一个很快的评价。标准 2(无组织的叙述)可能对这一目的有用，因为扎帕留克(Zaparniuk)及其同事的研究显示，90% 的实话和 70% 的谎言可能用这一标准区分出来(Zaparniuk，Yuille & Tayler，1995)。我要强调是“粗略的建议”这个词的使用。使用有限数量的标准几乎肯定会导致判定的准确性降低。要记住的是，在一个最近的案例中，人们可以质疑(德国)公诉方使用的观点的有利性来反对怀疑一名妇女使用武器在 1977 年在摩加迪沙(Mogadishu，索马里首都)劫持一架(联邦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公诉方主要是依赖于

一名证人,他的叙述"详细得无可指摘"(《独立报》,1998 年 10 月 17 日,p. 18)。仅仅只看细节在我听来是一个危险的评价证人陈述真实性的方法。

- 一个没有在 CBCA 相关文献中被广泛谈及的问题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误导评价者。也就是说,已经意识到他们的陈述将会被 CBCA 方法评价的说谎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在陈述中包括足够多的标准以给 CBCA 评价者留下诚实的印象?假设一些 CBCA 标准对欺骗者而言比其他标准更容易操纵的,这似乎是合理的。举例来说,承认记忆的缺乏(标准 15)比做出无组织的陈述(标准 2)要简单。因此标准 15 比标准 2 更可能出现在被操纵的陈述中。其他的标准,例如话语复述(标准 6),异常的细节(标准 8)和多余的细节(标准 9)也可能产生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将这样的细节纳入他们的虚假陈述中的,而且那些能做到这点的人也可能很难记住那些他们曾经在他们的虚假陈述中使用的细节。对这些捏造的细节的良好记忆是很重要的,无论是为了避免陈述中的前后不一致,还是为了避免在以后访谈中忘记了这些细节。

我们最近完成了一项调查大学生愚弄 CBCA 评价者能力的研究(Vrij,Kneller & Mann,即将发表)。要求被试对录像中的事件说实话或者说谎。在进行这项任务以前,有一半的说谎者被告知了 9 个 CBCA 标准(所谓的被告知的说谎者)。这些被告知的标准包括标准 2(无组织的陈述)、标准 3(细节的质量)、标准 4(语境铺垫)、标准 8(异常的细节)、标准 9(多余的细节)、标准 13(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归因)、标准 14(自发改正)、标准 15(承认记忆的缺乏)以及标准 16(对自己的证言有怀疑)。其他的说

谎者没有被告知(所谓“未被告知的说谎者”)。用CBCA方法对被试的陈述进行评分。结果指出,未被告知的说谎者的CBCA总分显著低于说实话者和被告知的被试的CBCA总分,而被告知的说谎者的CBCA总分与说实话者彼此之间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被告知的说谎者在愚弄CBCA评价者方面是成功的。仅仅把CBCA标准纳入一份陈述本身还不够。这些标准还必须以一种使人信服的方式纳入到陈述中。当CBCA专家看了被告知的说谎者的陈述时,可能会开始怀疑。当说谎者把CBCA标准纳入到他们的叙述中时,他们可能夸大,因为一些CBCA标准可能出现得太明显了。举例来说,说谎者可能在他们叙述中常常承认记忆的缺乏,以至于这引起了CBCA专家的怀疑。因此我们要求说英语的CBCA专家估定每份陈述的真实性,但是没有告知他们我们已经告知了一些说谎者有关CBCA的信息。专家在识别这些被告知的说谎者的谎言时的表现非常差,只有27%的正确率。随后我们告知了专家我们的操作,并要求专家再对陈述进行评价。这次,被告知的说谎者的40%的谎言被识别——仍然低于偶然概率水平。这些调查结果表明我们的大学生能够愚弄CBCA专家。但是,我不能假设每个人将会成功地做到这点。举例来说,一名非常小的孩子能否愚弄CBCA评价者就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可能缺乏必要的认知技巧。因此,误导CBCA评价者的问题在对年纪较大的儿童和成人的陈述评价方面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

- 正如卢比(Ruby)和布里汉(Brigham)(1997,1998)正确指出的那样,CBCA研究尚未谈及可能的文化差异。研究主要使用的是欧洲人和美国白人的陈述,他们的言语表达风格可能与其他

文化和种族的人的言语行为不一样。正如在第 3 章中提到的，研究已经显示，在白种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以及在本地（白种）荷兰人和来自苏里南的非裔荷兰人之间，在非言语行为上存在着差异。同时，需要进行相关的研究来调查说实话和说谎言时白人与黑人间的言语差异。

- 所有的 CBCA 标准都是诚实的指示器。因为我前面提到的理由，纳入一些谎言标准并看看这是否会增加准确性得分将会十分有用。在前面的章节我们介绍了一些谎言标准。例如自我指涉的出现和提供间接的答案。另外可能的谎言标准包括“认知操作”。这是真实监控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在下章谈到。

第6章
真实监控

洞察人的记忆

第5章表明,CBCA评价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局限。首先,虽然CBCA评价者识别实话和谎言的水平高于偶然概率,但是这个方法并不是完美的,会犯错误,尤其是在识别谎言方面。第二,CBCA是一个证明事实的方法而不是一个识别谎言的方法。它包含了检查某人是否在说实话的标准,但是缺乏那些检查他是否在说谎的标准。第三,CBCA原则上是受背景限制的,它是特别为儿童(性)虐待案件发展起来的。这三个局限要求发展出另一种替代的方法,并要求这个方法包括"谎言标准"以及可以用于除了儿童性虐待案件以外的其他背景下。真实监控可能满足这些要求。它主要处理关于感知到的(实际上是体验到的)和想像到的事件的记忆。真实监控的核心是,基于真正的体验的记忆是不同于基于虚构的记忆的。虽然真实监控与说谎无关,但是它的原理却是与欺骗有关的。它暗指真实的记忆(体验到的事件)与捏造出来的事件的记忆在性质上会有差异。因此,当人们说实话时的说话方式与他们说谎时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吗?本章将说明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

1981年,玛西雅·詹森(Marcia Johnson)和卡罗尔·瑞(Carol

Raye)发表了他们有关记忆特征的观点和研究发现。他们认为真正的经验记忆的获得需要有知觉加工,因此有可能包括知觉信息(视觉的细节、声音、气味、味道和身体感觉),背景信息(例如有关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细节)和情感信息(有关在事件过程中某人的感觉如何的细节)。这些记忆通常是清晰、明显和生动的。关于想像的事件的记忆来自于内在的东西(内部来源),因此可能包括了认知操作,例如思考和推理("我只记得我当时在想我的朋友会喜欢要什么样的礼物")。它们通常是比较含糊和不太具体的(也可参见 Johnson, Hashtroudi & Lindsay(1993)以及 Johnson & Raye(1998)关于真实监控的最新的回顾)。

人们常常要判定他们是否真正经历过他们记忆中的事件,或者这一记忆是否是来自想像。人们把记忆归为真实经验(外部来源)或归为想像(内部来源)的过程就叫做真实监控。我们一般使用上述的线索来区别真实的经验的记忆和想像的经验记忆。举例来说,当记忆很生动,并且包含许多知觉信息时,我们倾向于相信我们经历过这一事件,但是如果我们的记忆是模糊的,并包含了许多思考和推理,我们更可能假设我们曾想像过这一事件(Johnson, Foley, Suengas & Raye, 1988)。在詹森及其同事的研究中,他们要求被试回忆一个感知过的事件和一个他们想像的事件,并且要求他们描述他们是如何在头脑中区分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和只在他们的想像中发生的事件的。感知过的事件引出了如下的反应:"我能回忆起牙医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我记得在那时候我对当时的情景有很强烈的感觉",而想像的事件则导致了如下的反应:"这一定是幻觉,我太年轻了,无法当医生"(Johnson, Foley, Suengas & Raye, 1988, p. 374)。

假如某人问你是否在某天有个特别的女人在你的汽车里。这个问题可能带来不同类型的记忆。首先,你可能回忆起那个事件的一些细节,例如她当时所穿的衣服的颜色,她的香水的味道以及她因为感到冷而要求你关车窗。第二,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思考:"她当时肯定在车上,因为汤姆斯,她的男友,也在那里,而且我记得当时他们总在一起"。在后面的情况下你或许没有在前面的情况下那么确定这名女性当时确实是在车上。

当要求人们指出他们是否认为其他的某个人真的经历过某件事时,他们使用相同的判定规则。也就是说,当叙述中包含了较多的知觉、背景和情感的信息时,他们相信这个人说的是一种真实的经历,但是,如果叙述中包括了太多的推理,他们会认为这个人只是在想像那件事(Johnson & Suengas,1989)。回到那个汽车中女子的例子,如果你描述事件的细节而不是推理她是在你的车上,人们更可能相信她确实是在你的车上。

真实监控和欺骗

与说实话者相比,说谎者的陈述中包括较少的知觉、背景和情感信息,而有更多的认知操作,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从詹森的研究获得的。首先,她的研究解决的问题是人们如何确定他们是否在想像一件事情。这与欺骗无关。因为说谎者是知道他们的叙述是虚构的。第二,詹森的工作主要是关于人们如何回忆事件,而不是他们如何描述事件。她认为人们如何描述他们对事件的记忆与他们实际上如何回忆这些事件是不一样的。人们有让他们的叙述听起来有趣而又连贯的倾向。如果有必

要，他们将会用那些实际上他们并不记得的信息来填补他们记忆的空缺，但他们认为这些填补的信息是有道理的，并可能是真实的（例如，你知道某人总是戴一个绿色的围巾，你可能把这一描述放进某个特别的事件中，但事实上那个人当时戴的就是一个绿色的围巾，虽然事实上你根本不记得这一细节）。填补记忆空缺的趋向尤其会发生在想像的事件上，因为这些事件比较不清晰，不生动。因此，当要求人们讲出他们的记忆的时候，感知过的事件和想像的事件之间的差异已变得很小了（Johnson，1988）。当人们说谎时，他们似乎有理由更强烈地希望使得他们自己的叙述有趣而连贯，也使得说实话者和说谎者之间是否真的出现了差异变得模糊不清。

相对而言，在说谎环境下的真实监控的研究是比较新的。还没有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标准。事实上，不同的研究员使用不同的标准。在本章中，我将使用施波雷（Sporer）（1997，表 6.1）使用过的标准，因为这是惟一一套发表过的英语的标准。在一些真实监控标准和一些基于内容分析的（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标准之间存在着重叠（见第 5 章），这点将会在本文中提到。施波雷标准列表包含 8 个标准。标准 1 ~ 7 是事实标准，人们假设它们在诚实的陈述中更常发生，而标准 8 是一个谎言标准，人们假设它在虚假的陈述中更常发生。

表6.1 真实监控标准

1 清楚
2 知觉信息
3 空间信息
4 时间信息
5 感情
6 叙述的重构能力
7 真实性
8 认知操作

1. 清楚。这是指陈述的清晰和生动。如果报告是清楚的、敏捷的和生动的(否则是模糊的和含混的),那么这一标准就出现了。

2. 知觉信息。如果陈述包括了知觉的经验,如声音(例如"他真的冲我大叫")、气味(例如,"有一种腐烂的鱼的味道")、味道(例如"薯条很咸")、身体感觉(physical sensation)(例如,"真的很痛")和视觉的细节(例如,"我看见了护士进入病房"),这一标准就出现了。

3. 空间信息。如果陈述中包括关于地点的信息(例如"当时是在一个公园里")或人和[或]物的空间位置(例如,"那名男子坐在她妻子的左边"或"灯半掩在窗帘后"),这个标准就出现了。这一标准与"语境铺垫"(CBCA 标准4)有关。

4. 时间信息。如果陈述中包括了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例如,"当时是一大早")或者明确地描述了事件发生的顺序(例如,"当他听见所有的声音时,访客变得紧张,然后就离开了","这家伙一进酒馆,那个女孩就开始笑"),这一标准就出现了。这一标准与

“语境铺垫”(CBCA 标准 4)也有关。

5. 感情。如果包括了当事人在事件中的感受,那么这一标准就出现了(例如,“我当时被吓坏了”)。这一标准与“主观的心理状态的描述”(CBCA 标准 12)相似。

6. 叙述的重构能力。如果在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能够重构事件,则这一标准就出现了。这一标准与“逻辑结构”(CBCA 标准 1),“无组织的叙述”(CBCA 标准 2)和“细节的数量(CBCA 标准 3)有关。

7. 真实性。如果叙述是可靠的、真实的和合理的,那么这一标准就出现了。这一标准与“逻辑结构”(CBCA 标准 1)有关。

8. 认知操作。如果有对事件发生时当事人的推理的描述,则这一标准就出现了(例如,“依我看她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建筑物的规划”,“她的反应给我的印象是她很不安”)。

作为测谎工具的真实监控

表 6.2 提供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的所有的真实监控谎言研究的概况。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里,要求被试(几乎都是成人)描述实际上曾经有或者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举例来说,在霍夫(Höfer)、埃克赫斯特(Akehurst)和迈兹戈(Metzger)(1996)的真实条件下的被试被要求参加一个摄影活动,随后要接受一个访谈,关于这个活动发生了什么事情。虚假条件下的被试不参加摄影活动,但是同谋者口头告诉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在后来的访谈中他们必须假装他们实际上已经照过相。罗

勃特斯(Roberts)及其同事(1998)的研究是个例外。他们调查了26份声称的性虐待儿童的陈述,他们的案子有被证实的(n=10)或没被证实的(n=16)。如果嫌疑犯在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以前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和[或]有其他医学的或物理证据,这些案子就被判定为被证实的。如果缺少实质证据,嫌疑犯坚持否认了声称和[或]多道测谎结果表明关于声称的否认是诚实的,这个声称就被判断为没有被证实的。

表6.2 说实话的客观指示器(真实监控)

	标准							
	1	2	3	4	5	6	7	8
Alonso-Quecuty (1992)(成人)		>	>[1]			>		
Alonso-Quecuty (1996)(成人)		–	>[1]		>			–
Alonso-Quecuty (1996)(儿童)		>	<[1]		<			–
A lonso-Quecuty 等人(1997)(成人)[2]		>	>[1]					–
A lonso-Quecuty 等人(1997)(儿童)[2]		>	>[1]					–

（续表）

	标准							
	1	2	3	4	5	6	7	8
Hernandez-Fernaud & Alonso-Quecuty(1997)(成人)		>	>					<
Höfer 等人(1996)(成人)	>	–	–	>	–	>	>	>
Manzanero & Diges(1996)(成人)		<	<[1]					
Roberts 等人(1998)(儿童)	–	>	>	>	–			–
Sporer(1997)(成人)	–	–	>	>	>	–	>	–
Vrij 等人(1999)(成人)		>	>	>	–			–

[1]空间信息(标准3)和时间信息(标准4)组合。

[2]声音－记录－事件条件。

>，言语特征在诚实的陈述中比在虚假的陈述中更常发生；

<，言语特征在虚假的陈述中比在诚实的陈述中更常发生；

－，言语特征在说谎/说实话之间没有关系。

表6.2表明关于真正经历过的事件时间的陈述比关于想像的事件的陈述包括了较多知觉信息(关于视觉的细节、声音、味道等信息；标准2)、较多的空间信息(标准3)和较多的时间信息(标准4)。表6.2更进一步表明，与谎言相比，真实监控判断者比较容易

在已有的信息基础上进行重构(标准6)。

但是,谎言标准还没有得到证实。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证明说谎者比说实话者在他们的陈述中包括较多的认知操作。而且,詹森(Johnson)发现,想像的事件并不总是比真实经历过的事件包括更多的认知操作(Suengas & Johnson,1988)。一种解释是人们在经历的事件中使用认知操作是为了以后回忆这些事件更容易,更牢固(Roediger,1996)。举例来说,在德国开快车的人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来记起这件事。首先,他可以通过回忆他当时曾看过记速器来获得他的车速。另外,他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来回忆(例如,因为他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所以他当时一定开得很快)。包括了认知操作的后一种方法,与第一种方法相比,更容易回忆他当时开得很快。如果在数年之后,问这一个人他是否在德国开过快车,他更可能通过想他当时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来回忆这件事,而不是通过他查看了记速器。因此,人们关于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将会包含认知操作。

到目前为止,施波雷(Sporer)、霍夫(Höfer)及其同事,维吉(Vrij)及其同事是惟一的在真实监控评价的基础上计算过识别谎言和实话的准确率的研究人员。维吉及其同事发现的识别实话的准确率为71%,识别谎言的为74%。霍夫(Höfer)等人的研究表明,认定实话的击中率是61%,认定谎言的击中率是70%。施波雷(Sporer)的研究中击中率分别是75%和68%。所有的三项研究的准确率水平都大于偶然概率(也就是50%)。

使用真实监控的局限性

詹森、弗雷(Foley)、苏嘎兹(Suengas)和瑞(Raye)(1988)的研究已经显示,在感知过的事件和想像的事件之间,在记忆的质量方面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小。他们发现,对成人的最近记忆比对他们在孩童时期的记忆差异更大。这大概是,如果人们谈论或者思考某一事件,外部记忆(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逐渐内化,而内在的记忆(有关虚构的事件的记忆)逐渐外化。我们已经提到,为了方便回忆,人们将会将推理加入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中。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尽量设想可能发生过什么,想像的事件会变得更生动,更具体(Manzanero & Diges,1996)。这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当被试的反应是立即的和即时的时候,说谎者和说实话者之间存在差异,而当他们在给出答案前有一阵犹豫或者他们被允许准备他们的答案的时候,这种差异就不存在了(Alonso-Quecuty,1992;Manzanero & Diges,1996)。但是,施波雷(Sporer)(1997)发现,如果他们在较短的延迟以后给出答案与立即给出答案相比,诚实的反应和欺骗的反应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

人们已经发现,儿童在正在进行的事实和幻想之间的差异没有成人那样明显。一种解释是,他们对这两类经验的记忆方式可能不同于成人的记忆方式。(Ceci & Bruck,1995;Lindsay & Johnson,1987)。这可能能解释为什么阿隆索(Alonso-Quecuty)(1992)发现预期的在感知过的和想像的事件之间的差异只存在于成人的陈述中,而不存在于儿童的陈述中。

总之,真实监控对分析成人的陈述可能比对分析儿童的陈述

更有用，而且可能对分析最近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对分析很久前的事件特别地有用。

结 论

最初的研究结果已经显示，真实监控可以被用来识别实话和谎言，尤其是当反应是由成人给出的以及是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时。比较真实监控与CBCA（在第5章中讲到的）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两个方法之间有一些重叠。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哪一方法比较好。霍夫（Höfer）、埃克赫斯特（Akehurst）和迈兹戈（Metzger）（1996）用CBCA获得的击中率（70%实话，73%谎言，以及71%全部）稍高于真实监控的击中率（61%实话，70%谎言以及65%全部），但是施波雷（Sporer）使用真实监控识别谎言和实话方面（75%实话，68%谎言以及71%全部）比使用CBCA（70%实话，60%谎言以及65%全部）要成功一些。维吉（Vrij）、爱德华（Edward）、罗勃特斯（Roberts）和布尔（Bull）（1999）获得的CBCA的击中率（77%实话，74%谎言，75%全部）与真实监控的（71%实话，74%谎言以及72%全部）相似。所有的三项研究都用的是成人的陈述。正如上面提到的，有理由相信真实监控对成人的陈述更有效，而CBCA是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因此，目前对CBCA和真实监控之间的比较可能对CBCA有点不公平。为了较好地判断出哪一种方法是最合适的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但是，假如未来的研究的结果与目前已进行的三项研究的结果相似，确实表明CBCA和真实监控评价之间的准确性没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真实监控比较好。首先，它应用起来比CB-

CA 容易，因为它包含较少的标准。第二，正如施波雷（Sporer）所说的，训练观察者进行真实监控评价比进行 CBCA 评价要容易（Sporer，1997；Vrij，Edward，Roberts & Bull，1999）。第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真实监控比 CBCA 有更多的理论基础。真实监控的理论进路（theoretical approach）是关于记忆和（认知的）记忆过程。真实监控的理论支撑的好处在于这使得它可以预言这一方法应用的情景，也就是说记忆和记忆过程所在的情景。很明显，欺骗有很多记忆和记忆过程，这意味着真实监控事实上可以被用于所有的欺骗情景中。

一个合乎逻辑的做法是联合两种方法。施波雷（Sporer）和维吉等人显示了联合两种方法的好处（施波雷（Sporer）：CBCA 全部，65%；真实监控全部，71%；联合全部，79%；维吉等人：CBCA 全部，75%；真实监控全部，72%；联合全部，78%），但是，霍夫（Höfer）的研究表明联合两种评价技术并没有好的效果。真实监控对 CBCA 标准列表有意义的补充就是“知觉信息”（标准 2）。例如，色情电影可能会增加孩子对性行为的知识。结果，一个没有经验的儿童在看完色情电影后能对没有经历过的遭遇进行详细的描述。但是，在这样的描述中，将会缺乏关于气味和味道的细节，因为这样的细节需要有真实的经历。因此，在性虐待的陈述中，出现了关于气味和味道的细节则强烈暗示这一陈述是建立在真实经验的基础上的（除非在色情电影中有人提到了气味和味道）。

除此之外，认知操作标准（标准 8）也是对 CBCA 列表的补充。我知道还没发现这一标准在区分实话和谎言方面是可靠的。从这方面看来，增加这一标准也未必有保证。但是，这一标准在区分那些陈述者认为是事实而实际上是想像的陈述与对真实经历的陈述

方面可能是有用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指出，在区分以上两种陈述的时候 CBCA 是有问题的。研究已经指出，当人们在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经历过的但事实上是想像的事件的时候，比描述他们确实经历过的事件，更多地在叙述中使用推理（Schooler，Gerhard & Loftus，1986）。因此，当使用 CBCA 时，查看认知操作可能是一个区别事实和幻想的有用工具。

第三部分
专业测谎

第7章
多道测谎技术[①]

案例1　1986年,CBS(美国一家电视台)请了纽约的四家多道测谎公司来鉴定它的四名雇员中是谁偷了一台价值不菲的摄像机。当多道测谎测试人员(polygraph examiner)(在不同的日子)来测谎时,都被告知主管重点怀疑某个人;不同的测谎人员被告知的怀疑对象不同。

其实这只是一场游戏。实际上没有摄像机被盗,并且四名雇员都知道这点。仅仅要求他们否认自己偷过任何摄像机(也就是说出事实)。如果他们能成功地通过测试,作为奖励,他们每人将会得到50美元。结果是,这四名测试人员,每人都很自信地认定了一名盗窃犯——这名盗窃犯正好就是主管告知这名测试人员他所怀疑的对象(Lykken,1988)。

案例2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一枚炸弹在亚特兰大百年纪念公园(Centennial Park)爆炸。两人被炸死,111人受伤。33岁的理查德·金维尔(Richard Jewell)成为主要的嫌疑犯,

---

①译者按——原文为"polygraph",有人译为"多通道记录仪"、"多通道生理记录仪",或者有人直接译为"测谎仪"。实际上,"polygraph"只是"测谎仪(lie detector)"的一种,直接译为"测谎仪"不妥。"polygraph"除了作为一种仪器以外,还指使用这种仪器测谎的技术。我国还有人对此的称谓是"心理测试仪"和"心理测试技术",译者觉得不妥,因为心理测试在心理学上是专用名词,不能混用,故本书译为"多道测谎仪(polygraph)",这项技术称为"多道测谎技术(polygraph)",把"polygraph test"或"polygraph examination"译为"多道测谎测试"。

因为在袭击之前他曾警告过警方小心炸弹。为了证明自己无辜，金维尔自愿接受多道测谎测试。经过 15 个小时的测试，测谎仪得出结论，金维尔是无辜的。随后，FBI 把金维尔从嫌疑犯中排除。

什么是多道测谎仪

除了通过说话内容和非言语行为，原则上还有第三种方法来测谎，就是通过检查说话者的生理反应。自古以来，人们就假设谎言伴随着说谎者身体的生理活动。例如，中国人强迫被怀疑的说谎者咀嚼生米粉，然后吐出来。如果吐出来的生米粉是干的，这个人就会被判为说了谎（Kleinmuntz & Szucko，1984）。

现代测量说谎者生理活动的方法是通过多道测谎仪（polygraph）。多道测谎仪——polygraph 这个词来自两个希腊词，也就是“poly”（=多）和“grapho”（=记录）——是一种准确的科学仪器，通过墨水笔（ink pens）在图纸上或者通过计算机屏幕，准确而有效地将各种身体变化显示出来（Bull，1988）。最经常测量的活动是汗腺分泌、血压和呼吸（Ben-Shakhar & Furedy，1990）。在科学测谎仪的研究中，也在研究脑电活动的测量（事件相关脑电位）。但是还没有应用于实践。多道测谎仪准确地记录汗腺分泌、血压和呼吸，它能够测量到非常小的变化。它能做到这点是通过放大那些从戴在人身体各部分的感觉器所收集的信号。在典型的多道测谎仪测试时，有四个感觉器戴在身体上。呼吸管环绕人的胸部和胃部来测量呼吸深度和频率的变化。血压套套在二头肌上来测量血压的变化，情绪探测器放在手指上测量汗腺分泌（Ekman，1992）。

多道测谎仪测量生理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变化。生理活动的变化常常伴随着唤醒变化。人们假设说谎者比说真话的人有更高的唤醒程度。这可能是负罪感的结果——在测谎背景下更可能出现——因为被测人可能害怕测谎人员发现他们说谎。

人们常常将多道测谎仪称为测谎仪，但是这个术语是有误导性的。多通道记录仪是不能测谎的，只是唤醒可能是说谎的结果。可能没有其他的方法以这样直接的方式来测谎，因为典型的说谎的生理活动模式是不存在的(Saxe，1991)。

能轻易地想见，这种间接识别谎言的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准确的结果——例如，当说谎者没有被唤醒时或者说实话者正好被唤醒时。对于说实话者被唤醒，甚至比说谎者唤醒程度更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两个妇女声称某个婴儿是自己的那个圣经故事。她们都被带到所罗门国王面前，国王建议将婴儿一分为二，分给这两个妇女以解决争执。一个母亲同意这个解决方法，但是另一个母亲则很痛苦。注意到后者的这一唤醒，所罗门国王意识到她才是真正的母亲，并把孩子给了她(Ford，1995)。说明一个被唤醒的人不一定是说谎者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罗杰·基思·科勒曼(Roger Keith Coleman)案例，他被判定强奸并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嫂子(Ford，1995)。科勒曼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且案件中也存在着一些疑点。例如，在他被定罪以后，有四个人挺身而出，证明他们曾听到其他人承认是自己犯下的罪行。在最后一次尝试证明自己是无罪的时候，科勒曼要求接受多道测谎测试。多道测谎测试比预期的时间提前了12个小时。然后宣布科勒曼没有通过测试，那天晚上的稍晚，他被执行了死刑。科勒曼没有通过多道测谎测试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无论他是无辜还是有罪，当他在测试期

间被问到那些生死攸关的问题时，很难相信他可以不被唤醒。我稍后将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多道测谎测试现在被用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犯罪侦查中，包括加拿大、以色列、日本、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台湾、泰国和美国（Lykken，1998）。但是，在大多数的国家，多道测谎技术的使用是受到限制的，除了美国，在美国使用多道测谎测试是很广泛的（Barland，1988）。在美国，多道测谎测试一般被用于犯罪和法庭调查以及安全检查中（Gale，1988）。《多道测谎保护法案》（The Polygraph Protection Act）（1988 年颁布）已经限制了多道测谎测试在人事筛选中的使用。多道测谎测试的结果有时在美国法庭的刑事案件中被当作证据使用（Honts & Perry，1992）。但是，并不是在美国所有的州都能做证据使用的（Patrick & Iacono，1991）（见 Cohens（1997）以及 Faigman，Kaye，Saks 和 Sanders（1997）对美国多道测谎证据的历史回顾以及目前的法律地位的研究）。在美国很多法院，多道测谎证据仍然是不被承认的，但不一定是因为觉得这个测试不准确。另一个理由是陪审团可能被证据的科学性质吓住了（Honts，1994）。但是，最近由梅尔斯（Myers）和阿巴思诺特（Arbuthnot）（1997）进行的实验研究不支持这一说法。他们要求模拟的陪审团成员（美国俄亥俄大学的大学生）在几种证据的基础上给出裁定，即法庭证据（在被害人公寓发现的毛发样本和指纹与嫌疑犯相符），医学证据（现场发现的精液与嫌疑犯相符），证人证言（一位目击者作证说他看见嫌疑犯离开了受害人所在的那栋建筑，并且嫌疑犯似乎在他的夹克下面藏着东西）和多道测谎证据（表明嫌疑犯有罪的多道测谎测试）。陪审团成员发现最后一项证据最不令人信服。

在其他的国家,像荷兰和英国,多道测谎测试是不能使用的。在英国,经过一个众所周知的间谍案以后,政府宣布计划对多道测谎仪的效力进行试验性研究(pilot study),英国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组成了工作小组,由汤尼·盖尔(Tony Gale)教授主持。他们的目标是提供关于多道测谎测试的情况报告。他们的结论是摧毁性的。心理学家怀疑多道测谎结果是否足够正确(这和其他在他们的结论中提到的问题在本章的后面将会进行讨论)。测谎测试所包括的程序没有标准化到心理测量学上所要求的那种满意的程度。他们认为在检查个体测谎人员的从业和程序上存在困难。最后,他们考察了多道测谎的其他一些方面,尤其是欺骗被测者,违背了大不列颠法律,使得多道测谎测试的结果不可能被英国法庭承认。(《英国心理学会关于多道测谎仪使用的工作小组报告》,英国心理学会,1986,p.92)。随后,英国政府放弃了准备引进多道测谎测试的计划。

换句话说,多道测谎仪的使用是有争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媒体、专业期刊和书籍上相互攻击,关于多道测谎仪的争论很活跃。除了在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以外,在多道测试技术业内也存在着不统一的意见。有两名最著名的科学多道测谎技术研究人员:戴维·拉斯金(David Raskin)和戴维·莱肯(David Lykken),就各种多道测谎测试方法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他们在科学研究中相互反对,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相互反对,在法律程序上也是对手。最近,其他的人例如佛瑞德(Furedy)、伊克诺(Iacono)(莱肯阵营的)和汉斯(Honts)(拉斯金阵营的)接替了莱肯——拉斯金之争(Furedy,1993,1996a,b;Honts,Kircher & Raskin,1996;Iacono & Lykken,1997)。同样,两个

阵营都赞成多道测谎测试，他们争论的问题在于应该使用哪种测试方法。本章将对已有的多道测谎测试方法进行回顾和总结，其中也会提到两大阵营的争论。

出于下面两个原因，我将对多道测谎技术进行详细的讨论。第一，许多人已经听说过多道测谎测试（通过（美国）媒体和电影工业），但可能不知道多道测谎测试是如何进行的。因此，本章可以用于增加他们的知识。第二，许多人（包括那些司法工作者）对多道测谎测试有着非常消极的态度。“我不相信它，它完全不可靠”是常常听到的意见。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是有些夸大。多道测谎测试在某些环境下可以被用于识别谎言，我将在本章阐明这点。要更多地注意多道测谎测试人员的作用。他们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其在设计和实施测试方面，以及在评估测试结果方面。合格的多道测谎测试需要有熟练的测试人员，他们的工作远不是那么简单，这将会在本章中体现。

相关/不相关技术

目前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多道测谎测试程序。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程序是相关/不相关技术（Relevant/Irrelevant Technique，RIT），由拉森（Larson）在1932年创立。在相关/不相关技术中，会问到两类问题，即罪行——相关问题和罪行——不相关问题。罪行——相关问题是与正在调查的罪行相关的问题，例如“昨天是你盗走了一辆黑色宾士汽车吗？”很明显，所有的嫌疑犯——无罪的和有罪的——都会对这一问题回答“不是”，否则他们就承认了犯下了这一罪行。不相关问题是与罪行无关的问题，测试人员要确

认当问这些问题时，被测者都会说实话。罪行——不相关问题的一个例子是“今天是星期二吗?”然后测试人员比较两类问题的生理反应。RIT的原理在于，对相关问题的反应大于对不相关问题的反应说明被测者回答罪行——相关问题时在说谎。但是，很明显，RIT多道测谎测试的前提是不正确的。强烈的生理反应可能是这个人说谎引起的，但并不一定。假设给一名女性带上多道测谎仪，以确定她是否偷了她所在公司的办公室的钱。她是无罪的，但是她意识到在多道测谎仪上的一个大的反应可能意味着她将失去她的工作。因此，相关问题“你偷钱了吗?”的结果对她很重要，因此可能唤醒她。那么，这个相关问题在测谎仪上反应比不相关问题——说她的衬衣的颜色——的反应要大。但是，这个案子的正分是因为她害怕被认定是小偷而失去工作，而不是因为说谎。

不久以前一个相似的案例在荷兰的电视上播出。给前世界自行车冠军里埃·立特满(Gerrie Knetemann)戴上多道测谎仪。在这个节目中使用了声音压力分析仪，一种不是很可靠的识别欺骗的仪器(Merckelbach,1990)。这个测谎测试的目的是为了检测立特满是否为了提高成绩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使用过违禁药物。像“你此时只戴着一只手表吗?”和“你现在是在阿姆斯特丹吗?”这样的与罪行不相关的问题和像“在你作为自行车手的职业生涯中，曾使用过违禁品提高成绩吗?”这样的与罪行相关问题都被问到。立特满对这个相关问题回答说“没有”，但随后就被测谎人员认定为说谎，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生理反应比回答罪行——不相关问题的生理反应要强烈。当然，这个结论是草率的。为提高成绩使用违禁品对专业自行车手而言是敏感话题，与这一话题相关的问题几乎能自动地引起他们唤醒，无论他们是否真的使用过这些药

品。换句话说,所有的竞技型自行车手——无论使用或者没有使用过这些药品,都可能对这样的相关问题出现强烈的反应。

有罪的嫌疑犯回答相关问题时不会被唤醒的情景也可能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多道测谎测试在罪行——相关和罪行——不相关问题上的唤醒没有差异,测试人员会不正确地认定嫌疑犯无罪。这些例子清楚地说明 RIT 并不是多道测谎测试的良好的技术,多道测谎研究人员一致认为不应该使用这样的技术(Honts,1991;Lykken,1998;Raskin,1986;Saxe,1994)。拉森(Larson)自己也承认他的技术的局限性,并宣称他对别人过高的评价这一技术感到不高兴。他在 1961 年说:

"我本来希望仪器化的测谎能够成为专业警察科学的一个合法的部分。它比欺骗好不了多少。当测谎仪被用于很多地方时,只不过是和鞭打一样以酷刑逼供为目的的三流心理学的东西。有时我对自己在它的发展中起过作用而感到后悔(引自 Lykken,1998,p.28~29)。

现在最常使用的测试是控制问题测试(Control Question Test,CQT)和犯罪情景测试(Guilty Knowledge Test,GKT)。CQT 最初是由瑞德(Reid)在 1947 年提出的,后来通过拉斯金在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现代概念的框架下进一步概念化(Raskin,1979,1982,1986)。GKT 是由莱肯提出并加以详细地描述的(Lykken,1959,1960,1991,1998)。在美国,CQT 比 GKT 使用得更多(Honts & Perry,1992)。另一方面,GKT 多道测谎测试在以色列和日本使用得更多(Lykken,1991)。

多道测谎仪:它是如何工作的

程序

被测者在多道测谎测试时不分心是很重要的。每次分心都可能造成一个能被测谎仪识别的生理反应,从而可能影响测试结果。因此,测试应该在隔音的环境中进行——防止外面的声音被听见——测试人员和仪器最好放在被测者身后。而且,被测者不应该乱动,回答问题只需要回答简单的"是"或"不是",因为动作和说话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生理反应。因此,很明显,在使用多道测谎测试时,对被测者进行操作是必要的。不值得惊讶的是,被测者要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多道测谎测试,并在任何时候都能决定是否放弃。但是,被测者也许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能使他们显得更可疑。放弃测试可能很容易导致这样的反应"如果你是无罪的,为什么不用多道测谎测试来证明呢?"

控制问题测试

典型的控制问题多道测谎测试由四个阶段组成(Furedy, 1991b)。在第一个阶段,测试人员编制出将会在多道测谎测试中问到的问题,并和被测者讨论这些问题。为什么要和被测者事先讨论这些问题?有两个理由。首先,测试人员要确定被测者理解了这些问题,以防在后面测试的时候,要对问题的内容进一步讨论。第二,测试人员要确认被测者愿意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问题(而不是用"是,但是……"或"这要看情况……"这样的

答案)。表7.1提供了一个案例中CQT问题的顺序,这个案例是关于某人被怀疑偷了一台照相机。这个案例来自拉斯金(Raskin)、柯切尔(Kircher)、霍洛维茨(Horowitz)和汉斯(Honts)(1989)。

表7.1 控制问题顺序例子

N1:你住在美国吗?“是”
C1:在你生活的最初20年里,你曾经拿过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吗?“不是”
R1:你拿过那个照相机吗?“不是”
N2:你的名字是瑞克吗?“是”
C2:在1987年以前,你曾经做过不诚实或违法的事吗?“不是”
R2:你从书桌上拿走过那个照相机吗?“不是”
N3:你是十一月份出生的吗?“是的”
C3:在21岁前,你曾为了摆脱麻烦或给别人制造麻烦而说过谎吗?“不是”
R3:你曾以任何方式参与盗窃那台照相机吗?“不是”

有三类问题,即中性问题(neutral question)、相关问题(relevant question)和控制问题(control question)。中性问题是一般的问题,假设不会引起任何唤醒(例如“你住在美国吗?”“你的名字是瑞克吗?”等等)(见表7.1)。中性问题作为过滤器(filler)。当对测谎图谱进行评分时,对这些问题的生理反应是不考虑的。过滤器可以被用于检查被测者是否认真听测试人员所提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的“反测试”部分提到。

*相关问题*是有关罪行的特殊问题。例如“你拿过那个照相机吗?”是在照相机窃盗案中可能问到的问题。很显然,无论是无罪的还是有罪的被测者都会对这个问题回答“不是”,否则他们就承

认是他们盗窃了照相机。我们假设相关问题在有罪的嫌疑犯(因为他们在说谎)比在无罪的嫌疑犯会引起更大的唤醒(因为他们在说实话)。

*控制问题*涉及那些与正在调查的罪行相关的行为,但不是直接有关的问题。他们一般是概括性的,有意含糊的、涉及很长的时间。它们是为了让嫌疑犯觉得困窘(包括有罪的和无辜的),从而引起唤醒。要产生这种效果,一方面要让嫌疑犯在回答问题时不得不说谎,另一方面让嫌疑犯知道多道测谎仪将会识别这个谎言。测试人员设计的这个控制问题,在被测者看来,他或她回答"不是"就是说谎。编制准确的控制问题要看被测者的成长环境,一个有关盗窃的测试的控制问题可能是"在你生活的最初20年里,你曾经拿过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吗?"在这里,测试人员要确信被测者在21岁以前确实偷过什么东西(很多人都曾经做过)。在正常情景下,一些被测者可能会承认做错过事。但是在测谎测试中他们不会承认,因为测试人员告诉被测者如果他们承认这样的行为,会使得测试人员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被测者是会犯下要调查的这类罪行的这类人,因此会被认定为有罪。因此,被测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否认早期的不良行为,因此在回答控制问题时是不诚实的。但是,如果被试承认某些不良行为,就要对控制问题重新进行编制(例如"除了你已经告诉我的……")(O'Toole, Yuille, Patrick & Iacono, 1994)。此外,测试人员还要告诉被试,在测试时对控制问题说谎会导致生理反应,并且这一反应会被测试人员识别。于是被测者会被引导着认为对控制问题的说谎反应意味着这个被测者对正在调查的案件相关的问题也说了慌,就本例来说,就会被认为在照相机盗窃案中有罪。实际上,正如后面要提到的,测谎人员

实际上将对控制问题的强烈的生理反应解释为诚实的标志，但他不会告知被测者这点！

总之，控制问题和相关问题在有罪的和无罪的嫌疑犯身上可能会唤起不同的生理反应模式，如图 7.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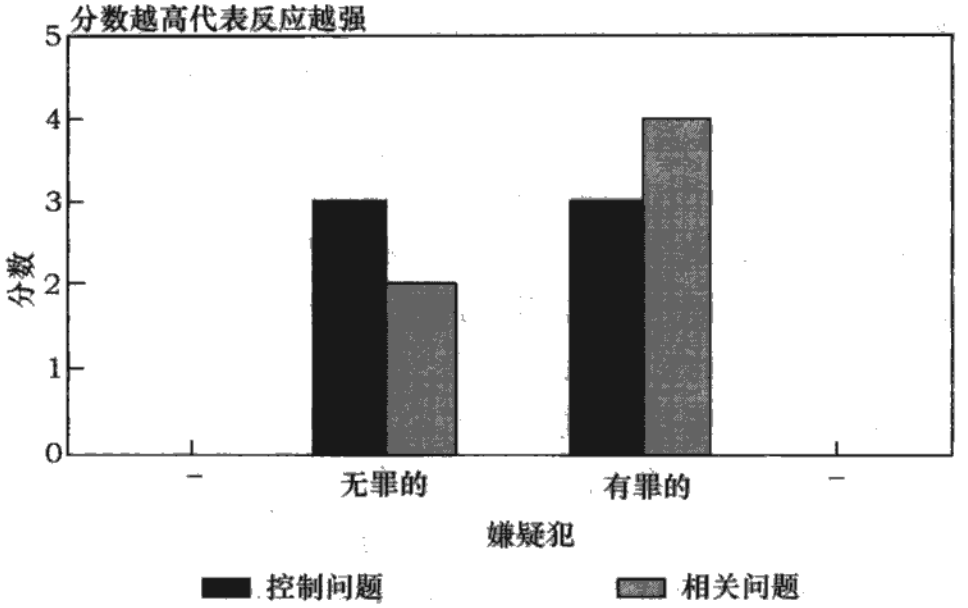

图 7.1　有罪的和无罪的嫌疑犯的生理反应图(CQT)

在无罪的嫌疑犯身上，控制问题可能比相关问题引起更强的唤醒，原因有二。第一，无罪的嫌疑犯对控制问题给出的是说谎反应而对相关问题给出的是诚实反应。第二，因为测试人员重点强调了被测者对控制问题的反应是说谎的，以及被测者知道自己对相关问题的反应是诚实的，因此被测者将会更多地注意他/她自己对控制问题的回答。但是，同样的控制问题被认为在有罪的嫌疑犯身上引起的唤醒会比相关问题弱。一个有罪的嫌疑犯对控制问题和相关问题给出的都是说谎反应，在原则上对两类问题的生理反应应该是相似的。但是，相关问题对被测者而言代表着最紧迫、

最严重的威胁，它将会比控制问题引起更强烈的生理反应。有罪的嫌疑犯会认为“如果测试人员发现我在相关问题上说谎，那么游戏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测试人员注意到我在控制问题上说谎，那还有希望。”

在设计完问题以后，并且在测试人员确认被测者已经理解了问题并会以简单的“是”或“不是”回答以后，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也就是所谓*激励测试*（stimulation test）。激励测试就是为了让被测者相信这项技术是十分准确的，测谎仪可以测出任何一个谎言。对多道测谎测试而言，让被测者相信测试是不会出错的是很关键的。多道测谎测试是100%准确的想法可以增加有罪的嫌疑犯回答相关问题害怕被识别的恐惧（“没有办法打败这台机器了”），以及无罪的嫌疑犯回答相关问题的自信（“这台机器很准确，因为我是无罪的，所以我将会被证明是无罪的”）。如果被测者不相信测谎仪的准确性，那么相反的情形就会出现。它可能使有罪的嫌疑犯更自信（“什么都不会失去，我还有机会打败这台机器”），而使得无罪者更害怕（“我知道我是无罪的，但是这台机器会说什么？我真的希望这台机器不要犯错”）。

纸牌游戏经常会出现在激励测试中。要求被试从一副纸牌中抽出一张，看一眼，然后放回去。然后测试人员出示几张牌，让被试对每张牌都说“不是”。当被试这么回答的时候，测试人员对生理反应评价，最后告诉被试他或她抽的是哪张牌。测谎人员对牌的选择几乎都是正确的。出示正确的那张牌几乎会自动引起被测者的生理反应——例如，由于担心测试人员是否会发现在这个例子中说谎。纸牌测试还让测试人员了解了被测者在说谎和说实话时的反应模式。测谎人员应该明确告诉被测者这点（实际上，纸牌

游戏是一种犯罪情景测试,这个将在犯罪情景测试部分说清楚)。

测试人员常常有着作出错误的判断的危险,这样的后果就会很严重的。如果测试人员告诉被测者他们刚才看的牌是红桃 4 而实际上却是黑桃 5,这会使得测试人员显得十分愚蠢,多道测谎测试也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有时为了避免这样的过失,测试人员要使用一些手段——例如,在正确牌上做记号或者使用所有的牌都一样的一副牌(被测者不知道)(Bashore & Rapp,1993)。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测试人员不能真正地出示牌给被测者看,而只是说出怀疑的牌的名称。其他的测试人员可能不玩纸牌游戏,但是可以通过在办公室墙上挂上各种证书和文凭来向被测者表明测谎的效力(Bull,1988)。

在激励测试以后,第三阶段——正式测试——开始。表 7.1 是那个窃盗照相机案例的多道测谎测试的例子,但是控制问题根据被测者的经历重新进行了编制。相同问题顺序至少呈现三次,这是为了排除控制问题和不相关问题之间的生理反应的偶然误差。也就是说,可能出现一个无罪的被测者偶尔对一个相关问题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反应。测试人员问的问题越多,这样的偶然反应对最后结果的影响越小。

测试的最后阶段,第四阶段,主要是对测试图谱的解释。有两种解释方法,即整体方法和数量化评分方法。在整体方法中,测试人员对被测者对测试的生理反应形成一个整体印象。这一信息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和与案件事实(被测者的犯罪历史,本案的证据情况)以及被测者在测试时的行为结合起来,以达到对被测者诚实性的全面判断。

拉斯金强烈地反对整体评分方法,主张数量化评分方法。数

量化方法试着尽量减少除了多道测谎图谱以外的因素对做出结论的影响，并尝试着系统地对图谱评分。在数量化方法中，要比较对相关问题和紧随其后的控制问题的生理反应（R1 与 C1 相比较，R2 与 C2，R3 与 C3）。存在四种可能。如果在生理反应上没有差异，就记为0。如果有明显的差异就记为1，强烈的差异和激烈的差异分别记为2，3。但是，对于什么是“明显的”、“强烈的”和“激烈的”差异并没有一个标准。根据拉斯金的说法，大多数记为0或1，记为2的就不常见，记为3的就很少见了（Raskin, Kircher, Horowitz & Honts，1989）。如果观察到相关问题的反应比控制问题强，就记负分（-1，-2或-3）。如果观察到的相关问题的反应比控制问题弱，就记正分（+1，+2或+3）。所有的分数加起来得到测试的一个总分。在总分的基础上得到测试结果。如果总分在-6或者更低（-7，-8等等），测试人员就会得出结论说嫌疑犯没有通过测试，是有罪的。如果总分在+6或者更高（+7，+8等等），测试人员就会得出结论说嫌疑犯通过了测试，是无罪的。分数在-5到+5之间意味着结果是没有结论（inconclusive）。对第一个控制问题和相关问题的反应往往不考虑，因为有时候被测者对第一个问题会出现不恰当的强反应，主要是因为对测试的陌生或者对调查有点紧张。

测试还有非正式的第五阶段，主要是在测试以后直接告知被测者他或她在说谎，并让被测者想想为什么测试图谱表明他或她在说谎（Lykken，1998）。为了让他们好好思考，测试人员需要离开房间一段时间。第五阶段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口供。在这个阶段，被测者会变得很紧张，他们会认为游戏结束了，可能会主动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在这个案件中，测试人员指出被测者的问题以后，

离开了房间一会儿,在另一个房间通过单向玻璃对被测者进行观察(Lykken,1998)。这个被测者显然很不安,不断地看测试图谱,然后下了决心开始吃测试图谱——整整 1.8 米长、15 厘米宽的纸。当他吃完以后,测试人员返回房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把耳朵放在测谎仪上说:"什么? 他吃了它们?"被测者反应说:"天呀,你是说它也能说话?"然后他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对控制问题测试的批评

控制问题测试在它的反对者中引起了很大的批评。主要的批评如下:

无罪的嫌疑犯和控制问题

CQT 假设,无罪的嫌疑犯对控制问题比对相关问题会出现较大的生理反应。埃克曼(Ekman)(1992)举出了五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一些无罪的嫌疑犯可能相反,对相关问题的反应会比对控制问题出现更强烈的唤醒。

- 无罪的嫌疑犯可能认为警察是容易犯错的。无罪的嫌疑犯被要求接受多道测谎测试,就知道警察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也就是怀疑他们犯下了不是他们做的罪行。也许他们已经尝试着使警察相信他们是无罪的,但是没有成功。虽然,一方面,他们可以认为测试是一个证明他们无罪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害怕那些已经错误怀疑他们的人会继续犯错误。换句话说,如果警察的方法已经错误地让他们成为错误的怀疑对象,他们的测谎测试为什么不可能会是易犯错的呢?
- 无罪的嫌疑犯可能认为警察是不公平的。人们可能不喜欢或不信任警察,因此认为和担心多道测谎测试人员将会错判他们或

欺骗他们。

- 无罪的嫌疑犯可能认为机器是易犯错的。例如，他们可能由于他们自己对个人电脑或者其他的机械仪器不在行，因此不相信一台机器可以是绝无错误的。
- 无罪的嫌疑犯是一个很胆小的人。通常胆小的人可能对相关问题的反应比对控制问题的反应强。
- 正如前面提到的，嫌疑犯——即使无罪——对与案件相关的问题也会有情绪反应。假如一名无罪的男子被怀疑谋杀了他的妻子。当被问及与谋杀相关的问题时，他对已故妻子的记忆可能再度唤醒他对妻子的强烈感情，这将会记录在多道测谎图谱上。
- 还要加上第六个理由。一个有效性依赖于欺骗的测试是有弱点的，因为为了使测试有效说谎必须是成功的。因此，被测者必须相信测试是绝无错误的，必须相信控制问题是决定性的。根据伊拉德(Elaad)(1993)和莱肯(Lykken)(1988)的说法，不可能所有的被测者都相信这点。或许有数十种关于 CQT 的书和文章介绍了这种测试，包括激励测试的细节，控制问题的性质，以及测试有时会犯错误的事实。甚至一些流行报纸也有关于这种测试的文章出现(Furedy,1996b)。当然，那些要接受多道测谎测试的人是有机会接触这些资料的，而且很可能已经阅读过其中的一些。那些知道测试程序和/或测试的缺点的人是不可能相信测试人员的那些谎言——控制问题的重要性和测试从不犯错误。随着人们不信任测试人员，多道测谎测试也许将会逐渐地变得无效。不信任的无罪嫌疑犯完全有理由在相关问题上紧张，因为不正确的测试结果——如果测试不是确实可靠的就很有可能这样——将可能导致他们被指控犯了他们没有做的罪行。

有罪的嫌疑犯和相关问题

如果在测前访谈期间,测试人员的努力是成功的话,那么所有的被测者都会关注控制问题。正如班·沙克哈(Ben - Shakhar)和佛瑞德(Furedy)(1990)指出的,还不清楚为什么一个有罪的嫌疑犯应该对控制问题给予较少的注意,因为既然嫌疑犯都有这样的印象——对这些控制问题的欺骗反应可能会对他或她的案件有害。

测试人员困难而关键的作用

准备一个多道测谎测试可能像考虑一件杰作一样。为了让多道测谎测试顺利进行,测试人员应该编制好控制问题,一方面,在无罪的嫌疑犯身上引起比相关问题更强的生理反应。另一方面,在有罪的嫌疑犯身上,这些控制问题应该引起比相关问题弱的生理反应。很显然,让测试人员编制出符合这些要求的问题并不是很容易。如果测试人员由于控制问题惊吓了被测者,他们将会冒着有罪嫌疑犯的罪行不被发现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控制问题的生理反应可能与对相关问题的生理反应相等,从而导致一个"没有结论"的测试结果。问"太重"的控制问题的更大的问题是可能损害被测者的心理(Furedy,1996a)。另一方面,如果测试人员没有用控制问题使被测者足够困窘,他们将冒着无罪的被测者被认定为有罪的危险,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相关问题的生理反应可能比对控制问题的生理反应更高。莱肯(1998)将测试人员在第一阶段的任务当做"心理学工程最精细的一块儿"。佛瑞德(Furedy)(1991a)认为过多的依赖测试人员的技巧是 CQT 受批评的主要原因。

拉斯金也承认这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如下:

“传统的 CQT 是很难管理的，心理敏感度、世故和测试人员的技巧都对获得正确结果至关重要。不幸的是，许多多道测谎测试人员缺乏足够的心理学方法训练，不理解基本概念和标准心理学测试的要求。当测试人员编制控制问题和把控制问题介绍给被试时，这些问题就会恶化，因为语言和与被测者对问题的讨论很难标准化，很大部分依赖于在测前访谈期间和被试介绍和讨论时他们对控制问题的认识和反应（Raskin, Kircher, Horowitz & Honts, 1989, p. 8）”。

巴兰德（Barland）（1984）也表达了对美国的许多测试人员素质的担心。

一个额外的问题是，测试人员无法在测前发现他们将要问的控制和相关问题是否能达到需要的效果。瑞德（Reid）和应鲍（Inbau）（1977）认为测试人员应该在测前检查被测者的行为状态。但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和危险的工作。正如我们在第 3 章中看见的，人们并不擅长通过观察某人的非言语行为来识别谎言。埃克曼（Ekman）和奥沙利文（O' Sullivan）（1991）特别考察了多道测谎测试人员，发现他们并不特别擅长在行为线索的基础上识别谎言。

最后，测试人员对控制问题的反应常常不是“已知的”谎言而是“假设的”谎言（Lykken, 1998）。测试人员相信被测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正确的，但是常常不能完全确定。很显然，当被测试人员所做的假设不正确时，控制问题将不会达到需要的效果，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被测者确实说的是事实。

测试人员的重要作用可能会导致这种情景，测试人员在测试之前认为被测者有罪的想法会影响测试结果。对测试人员而言，

被测者通常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测试人员通常知道有关他或她的重要的事情的细节（包括档案文件），将会在编制控制和相关问题的测前访谈期间形成对他或她的印象。如果测试人员相信嫌疑犯是无罪的，结果可能是他或她在控制问题上给予嫌疑犯更多的压力，以提高多道测谎结果是“无罪”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一个测试人员相信嫌疑犯有罪的情景中，这可能导致测试人员不再多过地强调控制问题，从而导致多道测谎测试的“有罪”的结果。结果是测试结果反映了测试人员对被测者罪行先行的想法。这已经发生在最初第一个案例中，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研究。在那个案例研究中，经理提前告诉测试人员他认为那个嫌疑犯是盗贼，测试人员在进行多道测谎测试以后确认那些嫌疑犯为盗贼。这并不一定暗示测试人员有意地瞄准这个结果。他们可能已经无意识地收到先前信息的影响。除了对被测者可能有罪的想法外，其他的印象也可能影响多道测谎的结果，例如喜欢某些嫌疑犯或同情他们。在这些情景下，“有罪的结果”也许比较不可能发生。

如何对测谎结果评分还不明确

控制和相关问题之间的差异可以评为①明显的差异、②强烈的差异或③剧烈的差异。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对于什么是明显的、强烈的、剧烈的差异没有标准。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一定的标准，因为这根据被测者的不同而不同。同样的差异在一个被测者那里是强烈的，而在另一个被测者那里可能只是明显的。图 7.2 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图 7.2 的两个被测者对相关问题比对控制问题都出现了一个较强烈的反应。在两个被测者之间对控制和相关问题的反应差异在绝对值上是相同的。但是，相对的差异是被测者 2 大于被测者

1，因为被测者 2 的整体生理反应比被测者 1 的整体反应要小。因此测试人员将会给被测者 2 的差异比给被测者 1 的差异记更高的分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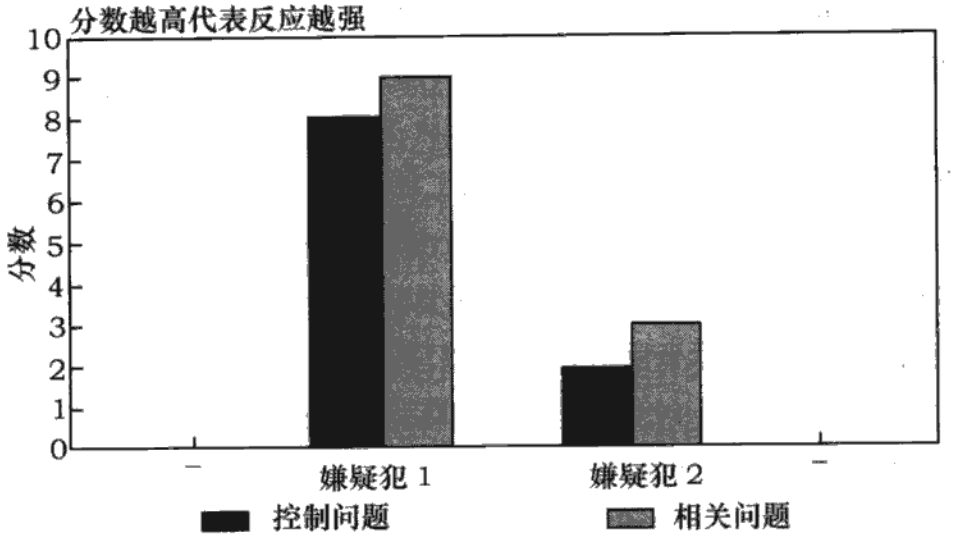

图 7.2　在生理反应上的个体差异

给多道测谎图谱评分是一件主观的事情

在整体方法中，测试人员对被测者的多道测谎图谱形成一个整体印象，并且把这些信息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和非测谎信息结合在一起——例如案件档案信息，被测者的犯罪历史或被测者在测试的态度——以形成一个全面的认定。这意味着决策的过程是主观的，因为它依赖于测试人员。而且，还是不能证明的。其他人很难发现某个测试人员为什么得出某个结论。拉斯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把数量化评分方法介绍进来。但是，即使是这种方法也是主观的，有两个理由，如下。

首先，即使是在数量化评分方法中也会出现污染。测试人员

常常知道有关被测者的重要细节。这很可能会影响测谎图谱的评分，特别是因为评分没有标准化，正如上面提到的。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用经验丰富的多道测谎测试人员做被试，伊拉德（Elaad）、吉顿（Ginton）和沙克哈（Shakhar）（1994）说明污染确实发生了。在他们的实验中，他们操作对被测者的先前期望（在有罪期望的条件下，告诉测试人员被测者最后承认了罪行，而在无罪期望条件下，他们被告知另一个人已经承认了罪行）。结果显示，这些被操作的先前期望影响了测试人员对被测者罪行的判断，但是只有当多道测谎图谱没有明确的有罪或无罪的指示时才这样。如果图谱包括了明确的指示来反对这些期望，判断是不受这些期望的影响的。汉斯（Honts）（1996）承认这种类型的污染也发生在现实情景下，我稍后将讨论这个。

第二，因为不可能定义是否给测谎图谱评 1、2 或 3 分，所以对同一种图谱，不同的测试人员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一个测试人员给测试的总分是 -5，因此测试结果是无结论，而另一个测试人员可能评 -6，指出被测者没有通过测试（而且将会被认定说谎）。再一次强调了测试人员的重要作用。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计算机化的多道测谎数据评分方法解决，柯切尔（Kircher）和拉斯金（Raskin）（1988）发明了这项技术，最近被奥尔森（Olsen）和他的同事进一步发展（Olsen，Harris，Capps & Ansley，1997）。另一种解决办法是使用独立的评分者，他对被测者和正在调查的案件一无所知。巴兰德（Barland）（1988）说在美国大部分联邦政府进行的多道测谎测试是由质量 - 控制官员检查的，他们没有看见被测者的行为而检查图谱。不幸的是，在现场研究中，不同的测试人员之间的一致率并不是经常可以得到。而实验室研究中测试人员之

间的一致率的范围从一般(0.61)到满意(0.95)(Carroll,1988)。

无论发现什么解决办法,都不太可能使 CQT 的反对者满意。反对者之一就是约翰·佛瑞德(John Furedy)(他支持 GKT,这将在下面讨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他对这些解决方法的观点:"基于有缺点程序的数据仍会产生有缺点的结果……或用非技术,不礼貌的话说:垃圾进,垃圾出"(Furedy,1996a,p.57)(这段话是关于利用计算化的多道测谎图谱评分方法)。

控制问题测试是不道德的吗

误导被测者在控制问题测试中有很关键的作用。引起争论的一点就是使用欺骗的程序是否合适。支持者或许会说为了目的可不择手段,而且它认定严重的罪犯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必需也可以欺骗他们。支持者也可能说多道测谎测试有时对无罪的嫌疑犯是有利的,也就是当测试认定他们是无罪时,例如理查德·金维尔(Richard Jewell)的案例(见例 2)。

反对者可能指出,欺骗嫌疑犯总是不合适的,而且可能有消极的后果。例如,它可能渐渐破坏对警察局和其他进行测谎测试的机构的公众信任和社会信任,或者嫌疑犯可能认为他们被允许说谎,因为警察测试人员允许对他们说谎。最后,当嫌疑犯发现他们被欺骗以后,他们可能决定不再配合调查(因为多道测谎结果常常不能用在法庭上,所以有时为了获得进一步的证据,需要嫌疑犯的配合)。

除了对嫌疑犯说谎是否合适或必要的争论以外,这样做常常也是违法的,因为在很多国家欺骗的调查程序在法律上是不认可的。这意味着通过 CQT 多道测谎测试获得的资料几乎肯定不能

作为法院证据使用。

根据上面提到的,有关多道测谎的争论很热。的确,它或许是目前心理学界最激烈的争论之一。下面通过引用 CQT 的两个反对者佛瑞德(Furedy)和海斯里格瑞(Heslegrave)的话来说明 CQT 反对者攻击的尖锐性:

"认知评分者对接受错误的态度的重要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权衡这些错误依赖于环境。因为环境是先于多道测谎的进行而为评分者所知的。因为测试没有标准化,有可能不仅是在被测者的环境和测试人员态度的基础上判定结果,而且测试的进行也将会被这些偏见影响。因为测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包括了类似访谈的测试人员和被测者之间的互动的心理学的东西,在编制和进行测试时的任何偏见都可能导致结果和这些偏见保持一致。因此,被控不同罪行的不同个体可能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测试,即使全部的测试都被冠以一个单一的名称:多道测谎测试。的确,术语测试本身可能就有潜在的误导,因为它是相对地标准化的工具,例如 IQ 测试,虽然有争议,但是合格的操作员基本上都能给出相同的结果(Furedy & Heslegrave,1988,p. 224)"。

犯罪情景测试

犯罪情景测试的目的是要调查被测者是否有对他们不想暴露的某个罪行的情景的知情。举例来说,假设被测者用一把刀杀害了某人,并把刀留在了谋杀现场,并且告诉警察他没有以任何方式卷入这一犯罪事件。然后警察可能试着用犯罪情景测试,发现当嫌疑犯否认对罪行任何牵涉时,是否在说实话。在犯罪情景测试中,测试人员将会向嫌疑犯出示几种不同类型的刀,包括那把在谋

杀中使用过的刀。对于每把刀,都会问被测者是否认出有一把是他曾经用过的。无罪和有罪的被测者每次都会否认他们曾经用这样的刀。但是,有罪的被测者将会认出他用的刀。假设这一所谓的有罪情景会产生一个高的生理反应,这个反应将会被多道测谎仪识别到。前面提到的纸牌游戏,常常作为激励测试用在控制问题测试中,它就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

图7.3显示了无罪和有罪的嫌疑犯在犯罪情景测试中的预期的生理反应。在这个例子中,第三个选项代表有罪情景。

莱肯(Lykken)(1988)给出了下面有关犯罪情景测试的测试(表7.2)。问题总是以多项选择的形式提出,而且指导嫌疑犯对每个选项都回答说"不是"。例子是关于一个银行抢劫犯,从一条小路逃跑,意外地把他的帽子弄掉,留在现场。

从理论上说,一个无罪的嫌疑犯对这些问题的任何一个,有五分之一的几率对正确的选项出现最强烈的反应。但是,他大约只有千分之二(准确地说是1.6)的几率对所有的四个问题的正确选项出现最强烈的反应。于是,问的问题越多,无罪的嫌疑犯被错误地认定有罪的可能性越小。被测者常常对第一个选项给出一个比其他选项稍微强烈的反应。因此第一个选项常常是一个不正确的选项(不是有罪情景选项)(Bashore & Rapp,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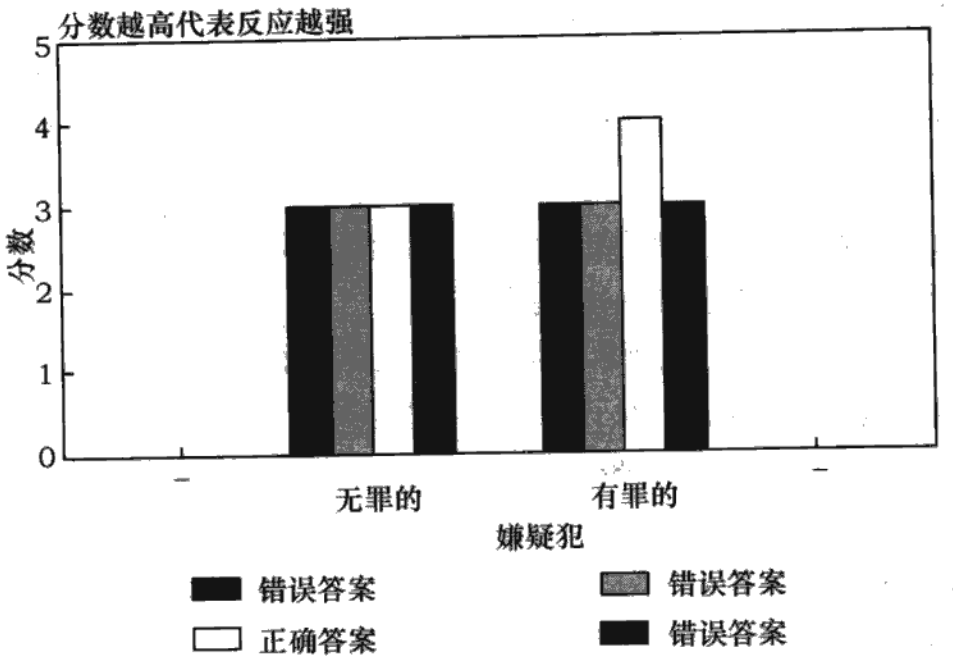

图 7.3　有罪的和无罪的嫌疑犯的生理反应图(GKT)

表 7.2　一个有罪情景顺序的例子

1. “这个案子的抢劫犯在逃脱的时候丢了一些东西。如果你是那个抢劫犯，你会知道丢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件武器吗？一个面具吗？一袋钱吗？一顶帽子吗？一把汽车钥匙吗？”
2. “帽子是在哪里掉的？是在银行吗？在银行的台阶上吗？在人行道上吗？在停车场吗？在一条小路上吗？”
3. “帽子是什么颜色的？它是褐色的吗？红色的吗？黑色的吗？灰色的吗？蓝色的吗？”
4. “我将要给你看五顶红色的帽子，一次一个。如果它们中的一个是你的，你会认出来。这些帽子哪一个是你的？是这个吗？这个？（等等）”

让不知道正确答案的人做测试人员进行测试可能比较好，因为如果测试人员知道正确的答案可能会影响他或她的行为。举例来说，测试人员可能对嫌疑犯是否会对正确选项出现一个较强的反应感到兴奋。这个测试人员的行为方面的细微变化可能被被测者注意到，他们可能在回答正确选项时变得紧张，这可能增加他们的生理反应（Rosenthal & Rubin，1978）。但是伊拉德（Elaad）（1997）最近的研究显示，当测试人员知道犯罪情景测试的答案时，被试也不会出现较强的反应。

因为反应的本质不同，不同的选项在被测者那里可能引起的不同的反应。例如，也许，选项“武器”比选项“钥匙”在被试（有罪的和无罪的）身上引起更多的唤醒，或者选项“黑色短裤”比选项“粉色短裤”在被试身上引起更多的唤醒（在被测者被怀疑实施了强奸的案件中）。一些反应也可能会引起较强烈的反应，因为他们更可能是正确答案。举例来说，一个银行抢劫犯在逃跑中更可能丢失他的帽子而不是他的一只鞋，因此在无罪的人身上选项“帽子”可能比选项“鞋子”唤起一个较大的反应。这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测前用每组选项测试模拟嫌疑人——也就是已知是无罪的人——来减到最少。他们应该对所有的选项都出现相似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则需要选择另一组选择问题（Lykken，1988）。

对犯罪情景测试的批评

犯罪情景测试在科学家中引起的争议要比控制问题测试少。伊克诺（Iacono）和莱肯（1997）最近发表了对两类多道测谎测试的科学意见调查。他们调查了美国生理心理研究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Psychophysiological Research）的成员（他们可以看成是专

家)和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区分1,普通心理学)的会员对CQT和GKT多道测谎测试的意见。调查结果——已经发表在权威的《心理学应用杂志》上——表明两组的心理学者的意见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他们赞成犯罪情景测试。大多数被访谈者(约75%)认为犯罪情景测试似乎是以科学的心理学原则或理论为基础的,而少数人(约33%)则认为控制问题测试是这样。并且,只有22%的人主张将控制问题多道测谎测试的结果作为法庭证据。

但是,也有关于犯罪情景测试的批评。这些批评都是关于它的有局限的适用性的。GKT的问题是被问到的只可能是编制测试的人和有罪的被测者知道答案的问题。编制测试的人应该知道正确的答案,否则有可能存在正确的答案没有包括在选项组中的危险。而且,只有所问的细节确实是为罪犯所知的GKT才能有效,否则就没有犯罪情节被识别。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有罪的嫌疑犯可能没有知觉到测试人员问的那些细节或者在测试前他们已经忘记了。举例来说,当测试人员问关于在犯罪现场发现的一顶帽子的颜色时就会有这种情况,犯罪嫌疑人就是忘记了帽子的颜色!犯罪和测试之间间隔的时间越长,这个嫌疑犯忘记某些细节的可能性就越大。问题是编制测试的测试人员不可能永远确信犯人知道问题的答案。例如,没有一个人敢肯定抢劫犯确实知道自己在小路上丢掉了帽子。只能假设有罪的嫌疑犯可能知道这些。

而且,一个嫌疑犯可能承认知道犯罪情景但是否认是自己犯下的罪行。如果嫌疑犯承认自己在现场但是否认有被指控的行为就是这种情况。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在一个被指控的性侵犯案件中,目击证人说是被迫的,而嫌疑犯承认有性行为但是说是两人自

愿的。在多个嫌疑犯参与的案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否认自己是主犯(Raskin,1988,pp. 102 ~ 103)。

最后,被问到的问题只能是关于那些无罪嫌疑犯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否则他们也会有犯罪情景认知)。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在许多情况下,犯罪的显著细节已经被媒体、调查人员或者律师披露了。为了将这一个问题减到最小,问题可以使用那些不被广泛知道的较小细节,虽然这会增加有罪的嫌疑犯也不知道答案的可能性。

结果是可以使用 GKT 的案子的数目是有限的。鲍德森(Podlesny)分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刑事案件档案,发现使用 CQT 的案子中只有不到 9% 的案件也可以使用 GKT(Podlesney,1995)。巴希尔(Bashore)和拉普(Rapp)(1993)认为这项技术适用的有限性是它更宽广使用的主要障碍。考虑到它的有限的适用性,伊拉德(Elaad)和班·沙克哈(Ben-Shakhar)(1997)最近的发现则是很有希望的。他们的实验 GKT 研究表明,为了得到可靠的准确率可以不问几个问题(见表 7.2 的例子),而对相同的问题提问超过一次。他们的研究是一种尝试,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得出结论。但是,如果这一结果能在不同的研究和不同的情景下重复,它可能增加 GKT 的适用性,因为编制一个问题比多个问题要容易。另一方面,问一个问题可以强调刚刚提到的那些。但是,如果嫌疑犯不知道这个惟一的问题的答案,就没有准确性可言。

莱肯(1998)反对 GKT 在许多案子中不能使用的说法。他指出,目前还没有训练 FBI 调查人员搜索 GKT 可用的新鲜的犯罪现场的东西。如果他们接受了这样的训练,那么会更经常地使用这一测试。莱肯用指纹搜索作比较进行说明:

"鲍德森(Podlesny)(*前面提到的分析FBI 档案文件的人*)在苏格

兰场工作时,引进了高尔顿－亨利指纹识别系统,有可能他也发现极少的案例在苏格兰场的嫌疑犯指纹记录中(Lykken,1998,p.305)”。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莱肯(1998)描述了如何在 O. J. 辛普森(Simpson)谋杀案和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中使用 GKT。1995 年 4 月 19 日,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市默拉(Murrah)大厦遭到炸弹攻击,建筑物被破坏,168 人死亡。在辛普森的妻子的尸体被发现以后,马上就可以在 GKT 测试中使用以下问题:(i)“你知道已经发现妮可被杀害了,辛普森先生。她是如何被杀害的呢?她是被淹死的吗?她被什么东西打击头部而死的呢?她是被枪杀的吗?她是被殴打致死的吗?她是被刺死的吗?她是被勒死的吗?”以及(ii)“我们是在哪里找到她的尸体的?是在起居室吗?是在车道上吗?是在侧门吗?是在厨房吗?是在卧室吗?是在游泳池吗?”(Lykken,1998,p.298)。

多道测谎仪:它有效吗

与每年进行的测谎测试的数字比较,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关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多道测谎的文章的数目很令人失望。但是,在专业期刊上的案例就比较容易找到,比如在本章的最开始提到的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包括“成功的”(如案例 2)和“失败的”(如案例 1)。

目前所发表的研究案例都是在司法背景下进行的。对于 CQT 和 GKT 都是为了司法目的进行的事实并不令人惊讶。在从业人员中,测试也为了人事筛选的目的——例如,为了调查应聘者是不是合适的雇员。事实上,GKT 不能够用于人事筛选。在筛选过程中,雇主关心的是一般信息——例如,应聘者是否偷过东西。GKT 不能够回答这个问

题,因为 GKT 只能询问特殊事件的特殊问题。

GKT 在人事筛选上的不实用性可能是 CQTs 被频繁使用的原因之一,但是 CQT 也是不适用的。在控制问题序列中可能问的是一般性问题。但是,如果问题太一般,不正确的结果的数目将会增加(Barland,1988)。

但是,当多道测谎测试发现某人隐藏了关于过去行为的信息(举例来说,它可以发现应聘者在填写申请表是否说谎),也许对雇主来说,某人未来的行为更重要。多道测谎测试不能够回到这个问题,这限制了多道测谎测试在人事筛选上的使用。

为了测试多道测谎测试的准确性,进行了现场研究和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是关于现实生活中的刑事案件和嫌疑犯。现场研究的好处是他们是真实的。嫌疑犯真的关心测谎的结果,因此,可能出现强的情绪。另一个好处是研究的是真实的嫌疑犯而不是大学生(他们常常是实验室研究的被试)。现场研究最主要的缺点是基本事实(ground truth)的模糊——也就是说,很难知道被试中谁是真正有罪的,谁是无辜的。口供常常被作为基本事实,但是并不是 100% 的可靠。一方面,人们不招供,或者虽然实际上有罪但自认为无罪,这样的案子不是因为无罪而是因为证据缺乏而撤销。另一方面,有些实际上无罪而被认为是有罪的,一些无罪的人招了供。有时,一些无罪的人在被测谎仪认定有罪以后所做的口供是假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机会让陪审团或者法官相信他们是无罪的,因此他们为了少受刑罚而决定招供。另一种情况是,由于错误的测谎结果让嫌疑犯真的认为他们自己是有罪的。例如彼得·瑞里(Peter Reilly)和汤姆·索耶(Tom Sawyer)就是这样。表框 7.1 是关于他们的案例。

表框 7.1 瑞里和索耶的案例

彼得·瑞里(Peter Reilly) 一天晚上,18 岁的彼得·瑞里回家发现他的母亲死了。他意识到她已经被谋杀,并叫来了警察。警察询问了瑞里,并怀疑是他杀害了母亲。他们进行了多道测谎测试。警察告诉他没有通过测试,因此指出他是有罪的,即使他没有这件事的记忆。审问期间的记录显示瑞里的供述有明显的从否认指控到承认的转变("好吧,看起来真的像我干的")。两年后,独立的证据表明瑞里没有实施谋杀行为,而他所做的供述后来被确认是错误的(Kassin,1997)。

汤姆·索耶(Tom Sawyer) 汤姆·索耶隔壁的邻居被人用手勒死。警察单单怀疑索耶,因为在他接受询问期间表现得很紧张,那个询问只是因为他是被害女子的邻居之一而做的例行询问。索耶被邀请到警察局接受第二次询问。对于关于他的一般背景的问题的回答,索耶谈到了他的社交焦虑和他酗酒的事实。为了让索耶先生谈谈有关本案的事情,侦探要求他帮助他们设计一个关于谋杀可能如何发生的情景。索耶先生,在闭路电视上,显得喜欢观察侦探,渴望帮助和参与。警察让索耶先生解释了几个情景,然后最后指控他实施了这一犯罪行为。警察宣称他提到了只有凶手才知道的 9 个事实。后来的调查记录分析,所有的关键信息都是警察在审问的时候透露的。(混淆信息来源的事情经常会发生,并被称为来源 - 操作错误(source-monitoring error)(Raye & Johnson,1980)。人们有时弄不清是自己还是别人提供的信息,或者一群人中是谁提供的信息。这有时也会发生在会议期间。人们对是谁最先提出某项提议的看法不一,等等。)

被控以后,索耶先生强烈否认他的罪行。警察提取了他手指指纹和头发,并且建议使用多道测谎测试。索耶先生相信多道测谎测试会证明他是无罪的,并同意测试。在测试之后,测试人员告诉索耶先生测试证明他在说谎(随后由多道测谎测试专家再评分证明测试结果是没有结论)。一旦他被告知多道测谎测试说明他在说谎,索耶先生信心开始动摇。他不再坚定地否认是他干的,只是说他仍不相信他犯下这样的罪行。他对付警察的主要

（续表）

防卫方法就是承认他记不起他曾经犯下过这一罪行，警察反复地说他可能出现了记忆阻塞，于是他就有了记忆阻塞，正如他常常因为喝醉酒出现记忆阻塞一样。此时，索耶先生仍然拒绝完全接受他犯了罪，而且他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测试（手指指纹和毛发测试）来证明他无罪。侦探决定对他说谎，告诉他他的头发与受害人尸体上发现的头发吻合。 收到这一信息，索耶先生的抵抗彻底崩溃，他承认所有的证据都对，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在下一个审问期间，侦探想得到关于犯罪的正确描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索耶先生实际上没有犯罪。警察通过暗示索耶先生，告诉他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举例来说，警察认为受到了性攻击。在警察侦探的鼓励下，索耶先生承认曾强奸过被害人。当医检报告出来以后，没有关于性伤害的证据（Ofshe，1989）。

因为嫌疑犯信赖多道测试仪，认为他们是绝无错误的，所以可能开始怀疑他们清白。这也许听起来天真，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测试人员让嫌疑犯确信多道测谎是绝无错误的，并且从未出错。而且，警察随后将会告诉嫌疑犯结果是正确的，一些嫌疑犯相信它。

在典型的实验室测谎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地分为有罪和无罪。有罪的被试实施一个模拟的犯罪，例如盗窃某一物品。而无罪的被试，只是对他们描述一下罪行而不亲自实施。所有的被试都被要求否认窃盗。如果他们让测试人员相信自己就可能会有报酬，或者如果不能就会受到惩罚。例如，布拉德利（Bradley）和简尼斯（Janisse）（1981）威胁他们有罪和无罪的被试，如果没有通过测试就会受到“痛苦但没有长期损伤的电击”。然后被试接受测试人员的测试，这名测谎人员不知道谁是有罪的或无罪的。测试人员的任务是通过多道测谎测试发现谁是有罪和谁是无罪。这样的实验室研究的主要好处是有绝对确定的基本事实——也就是绝对确

定谁实际上是有罪或是无罪的。然而，实验室研究有几乎不可避免的缺乏现实性。例如，在现实情景中的风险比在实验室研究中的高。在实验室中引起的情绪几乎不可能比现实生活中被控谋杀并由测谎测试决定其有罪无罪的人的情绪强烈。因为这些原因，莱肯（1988，1998）和克莱姆兹（Kleinmuntz）和塞寇（Szucko）（1982）认为实验室多道测谎测试对评价现场准确性是无用的。拉斯金认为只有满足某些要求的实验室研究才可能是有用的，即有代表性的被试人口（不仅仅是大学生）和真正的多道测谎人员（包括专家测试人员和被测者有欺骗测试人员的动机）（Kircher，Horowitz & Raskin，1988；Raskin，1989）。在一项最近的实验研究中，伊拉德（Elaad）和班·沙克哈（Ben-Shakhar）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高动机的被测者实际上比低动机的被测者更容易识别。

在测谎研究中，高尔顿（Ginton）、Daie、伊拉德（Elaad）和班·沙克哈（Ben-Shakhar）（1982）进行的一种独特的尝试，就是在现实情景下，拥有确定的基本事实。这项研究的被试是21名以色列警察，他们进行了一次纸笔测试，作为他们参加的警察课程的一项要求。然后要求他们自己给自己评分，也就是提供了修改最初答案进行欺骗的机会。但是，测试的答案纸是做过技术处理的，他们的欺骗能被识别。结果21名被试中有7名出现了欺骗行为。稍后，告诉所有的人他们都被怀疑进行了欺骗行为。他们接受了多道测谎测试，他们将来的事业可能依赖于这次测试的结果（并允许警官有拒绝接受测试的选择，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正如前面提到的，在用多道测谎测试调查犯罪是可以选择的，不是绝对要求嫌疑犯接受）。虽然最初所有的21名警察都同意接受多道测谎测试，但是一名有罪的警察在测试时没有露面，还有两名（一名有罪，一名

无罪)拒绝接受测谎测试。三名有罪的被试在测谎前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①],因此最后的样本只包括两名有罪的和 11 名无罪的被试。使用控制问题测试,结果是相当准确的。两名有罪的被试都被准确地识别出来,但是 11 名无罪者中有两名被错误地认定为在说谎。虽然结果似乎有力地支持控制问题测试,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测试人员(他决定被测者是有罪还是无罪)有机会了解多道测谎测试数据以及被试在提问时的举止行为。他判断无罪被试的准确性(13 名中有 11 名准确)和只有机会了解嫌疑犯的行为举止的观察者是相同的!(观察者只观察多道测谎测试本身,没有机会了解测谎的数据,也能从 13 名被试中正确地识别出 11 名)。一名盲评价者只了解测试的数据,只能从 13 名被试中正确地识别出 7 人,3 名是有罪的,另外 3 名没有结论。这些结果严重地挑战了这个案例中的多道测谎测试的有效性(Carroll,1991)。

CQT 和 GKT 准确率:实验室研究

大体而言,在控制问题测试中会出现六个结果。一名有罪的嫌疑犯可能在相关问题上比在控制问题上出现更强的生理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嫌疑犯没有通过测试,这是一个正确的结果。也可能他们在相关和控制问题上的反应相似。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没有结论。最后,他们可能较对控制问题的生理反应比对相关问题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了测试,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一名无罪的嫌疑犯可能在控制问题上比在相关问题上出现更

---

①埃克曼(Ekman)(1992)指出,这些数据证明了多道测谎测试人员所说的话,即进行测谎测试的威胁确实能够导致有罪嫌疑犯的供述。但是,研究结果也表明拒绝接受测试并不是有罪的某种保证。

强的生理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嫌疑犯通过了测试，这是一个正确的结果。也可能他们在相关和控制问题上的反应相似。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没有结论。最后，无罪的嫌疑犯可能对相关问题的生理反应比对控制问题的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通过测试，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GKT 多道测谎测试也可能有六个结果。有罪的嫌疑犯可能在正确答案上比在不正确答案上出现更强的生理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嫌疑犯没有通过测试，这是一个正确的结论。也可能他们在所有的选项上（正确和不正确的）的反应相似。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没有结论。最后，有罪的嫌疑犯对不正确的答案出现较强的生理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测试人员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把有罪者认定为无辜。

无罪的嫌疑犯可能对所有的选项（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出现相似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嫌疑犯通过了测试，这是一个正确的判定。一名无罪的嫌疑犯可能对一个不正确的答案出现最强烈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嫌疑犯又通过了测试。最后，嫌疑犯可能对正确的答案出现最强烈的反应。这次，嫌疑犯没有通过测试，是不正确的判断。

总之，有两种类型的错误，即将有罪的被试认定为无罪，称为*假阴性错误*（false-negative error），以及错误地认定一名无罪的嫌疑犯，称为*假阳性错误*（false-positive error）。虽然两种类型的错误都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假阳性错误或许是最严重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结果可能是一名无罪的嫌疑犯会被判定有罪和［或］失去他们的工作。假阴性错误可能造成有罪的人逃脱。

图 7.4 是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多道测谎研究的总结。所得的分

数是在几个回顾的基础上得到的，这些回顾是关于已经发表的和一些最近的研究（在1995以后发表的）关于实验室测试检查CQTs和GKTs的准确性。附录7.1和附录7.2提供了以往的研究的概况以及个体检查和研究的准确性分数。

关于实验室控制问题测试的结果表明这些测试在识别有罪的被试方面是相当准确的。多数有罪的嫌疑犯（73%）被识别，相对少的有罪的嫌疑犯（9%）被不正确地归为无罪。在证明无罪的被试的无罪方面要稍为差点。总的来说，66%的无罪者被正确地归为无罪，而相当高的百分比的被试（13%）被错误地控为有罪。大约20%有罪的和无罪的嫌疑犯的测试结果是没有结论。

关于实验室犯罪情景测试的结果表明对无罪的被试是非常准确的。很大部分的无罪者（96%）被正确地归为无罪，只有很小百分比的无罪者（4%）被错误地控为有罪。但是，在识别有罪者的罪行方面，测试是比较不正确。总的来说，82%的有罪嫌疑犯被认定为有罪，但是相对高百分比的有罪被试（18%）被归为无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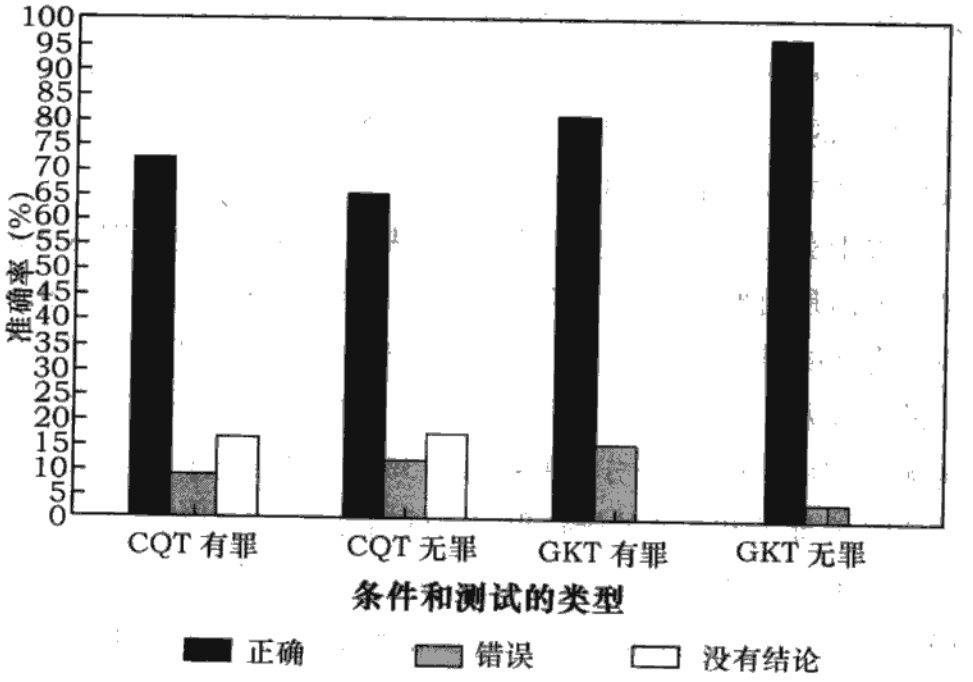

图 7.4　检验 CQT 和 GKT 准确性的实验室研究结果

比较两类测试发现，GKTs 在识别真实和识别欺骗两个方面都更正确。而且，CQT 比 GKT 有更多的假阳性错误，而 GKT 比 CQT 有更多的假阴性错误。

CQT 和 GKT 准确率：现场研究

图 7.5 提供 CQT 和 GKT 多道测谎测试在应用背景下的概况。所得的分数是在几个评论和一些没有纳入文献评论中的最近的研究为基础的。所包括的最近的研究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i) 被试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的嫌疑犯；(ii) 仅仅以生理的数据为基础评分；(iii) 评分的人受过训练，在进行“盲”图谱评分方面很有经验；和 (iv) 谁是无罪的，谁是有罪的标准独立于多道测谎测

试制定。大部分研究用口供作为标准。我已经说过，口供并不一定能确定谁是真正的有罪或无罪的嫌疑犯。汉斯(Honts)(1996)所用的标准就不是很明确(虽然满足了条件(iv))。附录7.3和附录7.4提供以往的研究的概况以及个体检查和研究的准确性分数。

关于现场研究控制问题测试的结果表明这些测试在识别有罪的得分上是相当高的。相当部分的有罪的嫌疑犯(87%)被正确识别为有罪，而相对少的有罪的嫌疑犯(10%)被不正确地归为无罪。和实验室研究一样，在证明无罪的被试的无罪方面要稍为差点。只有72%的无罪者被正确地归为无罪，而21%的被试没有通过测试，被错误地控为有罪。大约7%有罪的和无罪的嫌疑犯的测试结果是没有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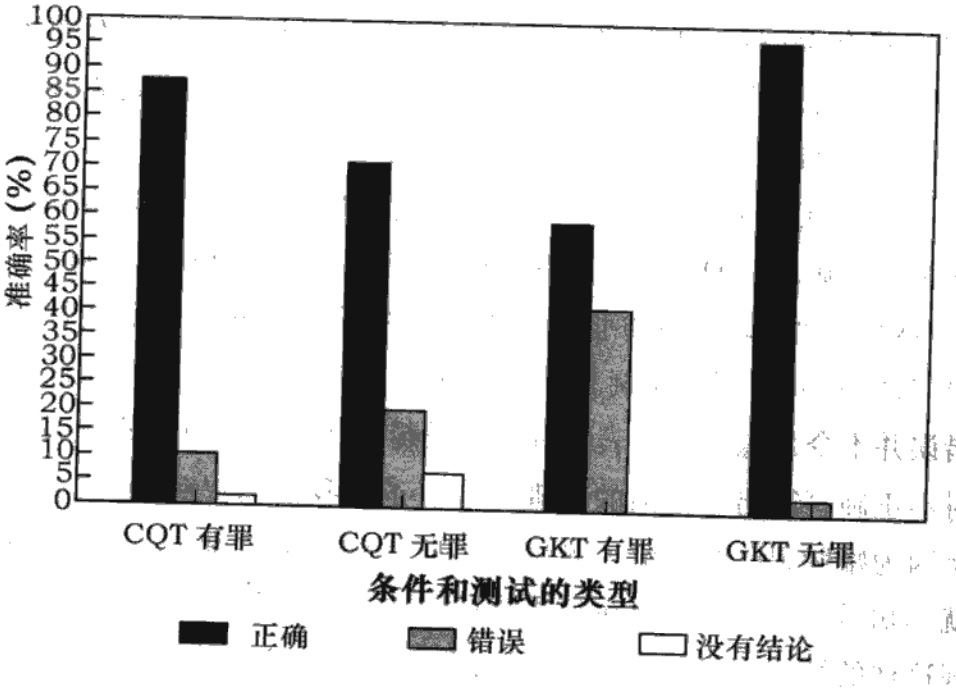

图7.5　检验CQT和GKT准确性的现场研究结果

调查结果表明 CQT 的假阳性——错误地指控无罪的嫌疑犯——是值得怀疑的。这也许不令人惊讶。当被试回答相关问题比回答控制问题出现更多的情绪唤醒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很显然，不管测试人员如何努力，无罪的嫌疑犯并不总是对控制问题比对相关问题更关注。有可能是，他们意识到相关问题的主要的后果，因此在回答这一类型的问题时会出现情绪唤醒，甚至在他们诚实回答时。

在现场研究中的假阳性错误的百分比要高于实验室研究的，这并不令人吃惊。在现场研究中，风险很高，嫌疑犯意识到了相关问题的主要后果。

关于现场研究的犯罪情景测试的结果表明，和实验室研究一样，对无罪的被试是非常准确的。案件中正确认定的概率是96%，只有4%的无罪者被错误地控为有罪。但是，在识别有罪者的罪行方面，正确率也比较低。总的来说，59%的有罪嫌疑犯被认定为有罪，41%的有罪嫌疑犯被归为无罪。

比较 CQT 和 GKT 的现场研究发现，GKT 在识别无罪嫌疑犯方面更准确，而 CQT 在识别有罪的嫌疑犯方面更准确。实际上，在 GKT 的现场研究中的准确率是很低的，会出现很多的假阴性错误(41%)(将有罪的嫌疑犯认定为无罪)。在 GKT 中出现假阴性错误并不令人意外。这表明有罪的嫌疑犯并不总是对正确答案比对不正确答案出现更强的生理反应。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可能是因为嫌疑犯已经忘记了测试人员所提到的那些细节，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些细节。但在犯罪情景测试中问到这些问题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正如上面提到的，警察并没有接受使用 GKT 的训练，因此缺乏搜寻发现适合 GKT 测谎测试的犯罪现场的技巧。接

受了训练的警察可能很擅长发现更适合犯罪情景测试的犯罪现场——也就是说,那些在随后的犯罪情景测试中能被有罪者认知的犯罪现场。

在现场研究中,假阴性错误出现的概率要高于实验室研究,这也不令人吃惊。在实验室研究中,所有的有罪被测者都有犯罪情景认知(因为试验者要确认达到这点),而在现场研究中,这可不一定,原因在上面已经说过。

在 CQT 现场研究中,通常有几类测试人员对测试图谱评分,也就是原来的测试人员(他们做的测试)和独立的测试人员,他们在测试时没有出现。这两类测试人员的主要区别在于独立的测试人员仅仅只接触了测试图谱,而原来的测试人员有很多的可以使用的信息,例如被测者在测试时的行为举止,案件档案信息和被测者的犯罪史。到现在为止,独立的测试人员获得的百分比数据是准确性评分。在最近的三项研究中,独立的和原来的测试人员的准确率都被报告(Honts, 1996; Honts, Raskin, Kircher & Hodes, 1988; Patrick & Iacono, 1991)。这使得两种类型的测试人员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一比较在图 7.6 中被举例说明。

图 7.6 表明对于有罪的嫌疑犯,这种差异是很小的。独立的测试人员稍微更多地做出"正确的"识别,但是他们也制造了更多的错误。对于无罪的嫌疑犯的识别这种差异就特别明显。原来的测试人员能正确地识别 82% 的无罪嫌疑犯,但独立的测试人员只能正确地识别 49% 的。总体而言,原来的测试人员比独立的测试人员更准确。汉斯(Honts)、拉斯金(Raskin)、柯切尔(Kircher)和霍兹(Hodes)(1988)在原来的测试人员上获得了很高的击中率——在全部已有的谎言识别中的最高的击中率。他们对有罪和

无罪识别的准确率分别为92%和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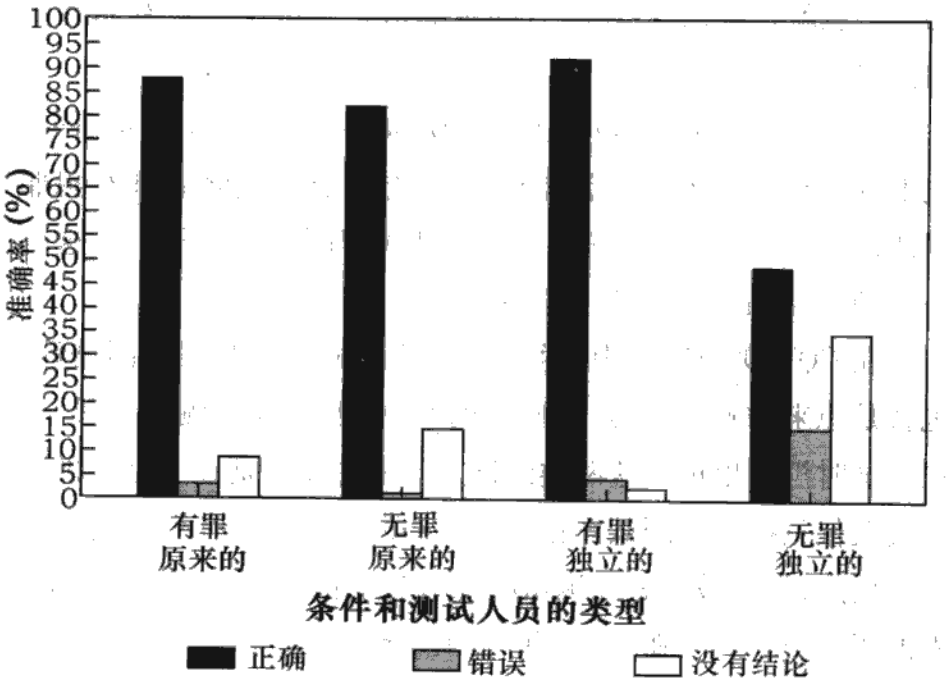

图 7.6　CQT 现场研究结果:原来的和独立的测试人员

有两个可能的原因解释为什么原来的测试人员比独立的测试人员更准确。首先,原来的测试人员可能对图谱评分的技巧更好。这个解释不太可能,因为独立的测试人员常常也是富有经验的,技巧良好的测谎人员。第二,原来的测试人员在做决定时使用了非多道测谎测试的信息,例如被测者在测试时的行为举止、案件档案信息等等。汉斯(Honts)(1996)承认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有四个例子——包括两名无罪和两名有罪的嫌疑犯——测试人员在测谎结果的基础上做出了判断。但是他本来是不应该做出判断的,因为这四个例子的测谎结果本身都是"没有结论"。但是,在这四个例子中,测谎人员做出的判断(有罪或无罪)

都是正确的，表明非多道测谎测试信息指导测试人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要记住的是，有必要去考察一下测谎测试能带来多大的正确性。既掌握被测者行为又掌握测谎的生理反应的测试人员比那些仅仅观察被测者行为的测试人员，更正确的程度是多少？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第8章中谈到。

反　测　试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设的是被测者在多道测谎测试中都按测试人员的要求做。很显然，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被测者试图影响测谎的结果，制造一些让测试人员判定他们是在说实话的生理反应。用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称为“反测试(countermeasure)”。如果这样的反测试技术被证明是有效的，可能对多道测谎测试有很大的含意，因为它会使得测试技术无效。

不同的反测试能被区分出来，例如咬舌尖、绷脚(用脚趾抵压地面)、数绵羊或者倒数。咬舌尖或绷脚能产生能被测谎仪识别的生理反应。通过这种方式，被测者能人为地增加他们对控制问题的生理反应，从而增加他们通过测试的可能性。数绵羊或者倒数(很显然，是默数而不是出声的)的结果将会使被测者不去加工测谎人员所问的问题(CQT)或者列出的选项(GKT)。因此，对每个问题或者答案选项的身体反应都是相似的，这将会导致在CQTs中的“没有结论”或在GKTs中的“通过测试”的测试结果。通过引入过滤器(filler)(用于CQTs)可以对抗反测试技术，因为其假设是被测者会对过滤器说“是”而对其他问题说“不是”。这就强迫被测者要去听和加工那些问题，因为对过滤器回答“不是”则说明他们

没有去注意这些问题。

最有名的反测试或许是佛洛德·菲(Floyd 'Buzz' Fay)所进行的那个测试。佛洛德是一名因为错误的多道测谎测试而被错误地判为谋杀犯的男子。他在两年半的被错误监禁的时间内使自己变成一名多道测谎专家。他对27名同监的犯人进行训练(这些人都自愿地对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让他们学会如何打败控制问题多道测谎测试。经过仅仅20分钟的指导,27名犯人中的23名成功地打败了多道测谎测试(Ford, 1995; Kleinmuntz & Szucko, 1984)。

瑞德(Reid)和应鲍(Inbau)(1977)似乎不关心反测试的效力。他们认为反测试是相当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一名受过适当训练的测试人员会注意到被测者正试图愚弄自己。但是,一些研究已经表明,训练反测试可能会非常有效地打败多道测谎测试(Ben-Shakhar & Dolev, 1996; Elaad, 1987, 见 Ben-Shakhar & Furedy, 1990; Honts, Devitt, Winbush & Kircher, 1996; Honts, Hodes & Raskin, 1985; Honts, Raskin& Kircher, 1994)。在汉斯(Honts)、拉斯金(Raskin)和柯切尔(Kircher)进行的研究中(1994),被试接受了30分钟的训练,学会使用身体反测试(咬舌尖或者用脚趾抵压地面)或心理反测试(从7开始倒数)。训练以后他们接受了一个CQT多道测谎测试。心理的和身体的反测试一样有效,每种反测试方法都能使大约50%的被试打败多道测谎测试。而且,这名测试人员(他在控制问题多道测谎测试方面很有经验)只识别出12%的使用身体反测试的被试,而没有一名使用心理反测试的人表现出了能引起测试人员怀疑的行为或生理反应。这些调查结果反驳了瑞德和应鲍宣称的有经验的测试人员能够发现被测者使用了反测

试的说法①，而且这些调查结果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在美国，CQT多道测谎测试仍然被用在国防事业中，也许是为了发现和制止间谍。这些间谍很可能接受过对付多道测谎的训练。莱肯(Lykken)引用了艾德里克·阿穆斯(Aldrich Ames)的例子，这位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多年来在苏联窃取情报，在这些年中通过了好几次多道测谎测试。莱肯说到，阿穆斯"只要他做间谍，他就能在他的间谍事业中取得成功，因为他可以打败测谎仪的能力误导了官方的怀疑"(Lykken，1998，p.3)。最近，阿穆斯的克格勃(KGB)控制者契可辛(Viktor Cherkashin)在接受英国的一家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1998年2月8日，p.21)的访谈中解释了他如何帮助了阿穆斯通过测谎测试。契可辛曾经安排了阿穆斯和一位俄国外交官之间的午餐。令阿穆斯吃惊的是，契可辛自己也参加了午餐。于是阿穆斯变得很紧张，因为FBI认识契可辛并且在监视他。但是，契可辛是有意参加午餐的。他知道CIA经常让它的官员接受例行的测谎测试，而且他也知道阿穆斯会被问到"他最近是否和KGB官员有非官方的接触"，因为这是他们常问的标准问题。既然阿穆斯和KGB官员们之间的接触是秘密的，当阿穆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必须说谎。但是，在午餐之后，阿穆斯不再需要对这件事说谎，他可以放心地说他和KGB有接触。

和控制问题测试一样，犯罪情景测试也会受到反测试的影响。但是，情况是不一样的。在CQTs中，即使是无罪的嫌疑犯也可能试图打败多道测谎测试，试图在控制问题上出现强烈的反应，以避

---

①使用反—反测试也许可以识别反测试，汉斯(Honts)、拉斯金(Raskin)和柯切尔(Kircher)(1987)在腓肠肌(gastronemius muscle)和颞肌(temporalis muscle)上戴上电极，能正确地识别90%的使用反测试者。

免被错误地判定为有罪。在 GKTs 中,无罪的嫌疑犯不能系统地使用反测试,即使他们希望如此,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选项是正确的,哪个选项是错误的(Lykken,1998)。

很明显,进行反测试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只能在实验室而不能在现场环境中进行。因此,不可能发现在实验室以外使用反测试是否与在实验室内使用反测试一样成功。

个性和多道测谎测试

识别一名精神病患者的谎言对多道测谎仪来说是困难的,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只有被测者在说谎时出现唤醒,谎言才能被测谎仪识别。正如我在本书的前面指出的,唤醒可能是负罪感,恐惧或者欺骗兴奋的结果。精神病患者在面对一般的危险或者特殊的惩罚时出现的焦虑没有正常人那样高(Lykken,1998)。因此有可能精神病患者在说谎的时候不会被唤醒,这使得识别他们的谎言变得不可能。拉斯金(Raskin)和海尔(Hare)(1978)的研究表明,使用多道测谎仪,精神病患者和非精神病患者具有同样的可识别性,这或许有点令人吃惊。但是,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下结论未免太早,特别是当这个研究还受着批评的时候(Lykken,1998)。为了激励这一研究的被测者,规定那些打败多道测谎测试的人可以得到 20 美元的奖励。虽然这一个奖可能会激励被测者,引起唤醒,但它更可能产生欺骗高兴而不是恐惧或负罪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研究没有发现精神病患者和非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差异。虽然一名精神病患者是比正常人对处罚较少焦虑,但是没有理由认为精神病患者会对胜利较少感兴趣。为了调查精神病患者和非精

神病患者之间的差异,应该进行那些被测者面对处罚而不是激励的测试。这样的测试尚未进行过。因此在犯罪调查中,精神病患者是否比正常人更有能力打败多道测谎测试仍不清楚。

据我所知,除了精神病患者和非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差异以外,个性内向者和个性外向者在测谎测试中的差异也是被研究的个性因素之一(Steller,Haenert & Eiselt,1987;Watson & Sinka,1993)。这些研究没有表明在个性内向者和个性外向者之间存在任何差异。

结　论

检查多道测谎的准确性的现场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测试(CQTs 和 GKTs)犯了相当多的错误。CQT 测试的支持者或许认为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然后他们将会提及在他们的现场研究中由原来的测试人员获得的准确性得分。问题是独立的测试人员要不正确得多。这意味着额外的,非测谎测试信息,只有原来的测试人员知道而独立的评分者不知道的信息,对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很重要的。测试本身的准确性仅仅只能由那些只掌握测试结果的评分者确定,他们的准确性明显不是很好。

考虑到多道测谎测试所犯错误的数目,我认为多道测谎结果不应该被允许作为法庭的一项实质性证据(substantial evidence)。拉斯金支持法庭承认 CQT 的结果,而莱肯则反对。莱肯也不赞同法庭将他自己的犯罪情景测试作为证据(Iacono & Lykken,1997)。然而,多道测谎测试可能作识别欺骗是有价值的和有作用的。因此,多道测谎结果可能被法院作为一种辅助证据使用(只要有更实质性的证据被同时呈现)或被当作一种警察调查工具使用,用来排除潜在的嫌疑犯,检查信

息提供者的真实性或调查证人和嫌疑犯之间叙述的不一致(Boelhouwer, Merckelbach, Van Koppen & Verbaten, 1996; Van Koppen, Boelhouwer, Merckelbach & Verbaten, 1996)。

出于这一目的,我主张并提倡使用犯罪情景测谎测试。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准确性的问题。研究表明,控制问题测试可能是正确的,而且它们的准确率(至少在现场研究中)确实要超过犯罪情景测试的准确率。我之所以反对控制问题多道测谎测试是部分程序涉及到欺骗被测者。首先,当人们阅读有关 CQT 的资料并开始了解它,欺骗会让测试受到损害,这可能会使测试的效力降低。第二,在许多国家,在犯罪的调查中使用欺骗是违法的。例如,在英国(我工作的国家)和荷兰(我的祖国)在犯罪调查中对嫌疑犯说谎是违法的。这使得在这些国家进行犯罪情景测谎测试是违法的,也不可能将测试的结果用作刑事审判的证据。这种"欺骗即非法"观念可能是典型的欧洲人的观念。例如莱肯,他的书《血液的震颤》(*Tremor in the Blood*)(第一版为 1981 年,第二版为 1998 年)可能被视为对 CQT 多道测谎测试持续的挑战,没有使用这一欺骗的观念。

在犯罪情景多道测谎测试可能在警察调查中被广泛地应用以前,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澄清。

- 需要有更多的 GKT 现场研究来检验它的准确性。在这些测试中,一个项目多次重复技术(对一个细节问几次)代替了多重项目技术(问几个细节),可能是值得测试的,因为这或许提高了测试的适用性,因为设计一个只包括一个细节的测试比设计一个包括几个细节的测试要容易得多。
- 确定测试人员的资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在测谎测试中的作用很重要。在大学学分中引进测谎测试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并且规定

只有那些得到“多道测谎测试学位”的人才被允许进行测试。

- 多道测谎测试应该由那些独立于警察系统的机构实行。有一些理由支持这一观点。首先,警察往往对有罪的嫌疑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可能会影响测试。第二,警察可能会为了给嫌疑犯施加压力而捏造多道测谎结果。如果测试由独立的组织进行,那么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三,嫌疑犯可能不会信任警察或者对他们不放心,对于那些被警察错误地控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无罪嫌疑犯尤其如此。给这样的嫌疑犯一个独立的测谎测试看起来是公平合理的。
- 仔细地检查嫌疑犯在没有通过测谎测试以后的供述是必要的。多道测谎测试可能造成错误的供述,也许是因为嫌疑犯将会相信他们已经实施了罪行(见瑞里和索耶的案件;表框 7.1),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再有机会使其他人相信他们是无罪的。

附录7.1 实验室研究的结果回顾以及对控制问题多道测谎测试准确性检验的最新研究

	有罪情景			无罪情景		
	有罪(%)	无罪(%)	没有结论(%)	有罪(%)	无罪(%)	没有结论(%)
Ekman (1992) (*n*=13)	68	10	22	15	55	30
Honts (1995) (*n*=8)	77	10	13	8	84	8
Kircher等人(1988) (*n*=14)	74	8	18	12	66	22
Ben-Shakhar & Furedy (1990) (*n*=9)	80	7	13	15	63	22
1995年后发表的研究						
Bradley等人(1996)	60	10	30	10	80	10
Horowitz等人(1997)	53	20	27	13	80	7

n=回顾的研究数

附录7.2 实验室研究的结果回顾以及对有罪情景测试准确性检验的最新研究[1]

	有罪情景		无罪情景	
	有罪(%)	无罪(%)	有罪(%)	无罪(%)
Ekman (1992) (*n*=6)	78	22	5	95
Honts (1995) (*n*=5)	86	14	1	99
Ben-Shakhar & Furedy (1990) (*n*=10)	84	16	6	94
1995年后发表的研究				
Elaad (1997)	76	24	0	100

[1]GKT没有“没有结论”这项
n=回顾的研究数

附录 7.3　现场研究的结果回顾以及对控制问题多道测试准确性检验的最新研究：对多道测谎图谱盲评分

	有罪情景			无罪情景		
	有罪 (%)	无罪 (%)	没有结论	有罪 (%)	无罪 (%)	没有结论(%)
回顾						
Ekman (1992) (n=10)	88	10	2	20	78	2
Ben-Shakhar & Furedy (1990) (n=9)	84	13	3	23	72	5
没有包括在以前的回顾中的最新的个别现场研究						
Honts (1996)	91	5	4	9	55	36
Honts & Raskin (1988)	92	8	0	15	62	23
Patrick & Iacono (1991)	92	2	6	24	30	46

n=回顾的研究数

附录 7.4　有罪情景测试准确性检验的现场研究的结果[1]

	有罪情景		无罪情景	
	有罪 (%)	无罪 (%)	有罪 (%)	无罪 (%)
Elaad (1990)	42	58	2	98
Elaad 等人(1992)	76	24	6	94

[1]GKT没有“没有结论”这项

附录 7.5　对控制问题测试准确性检验的现场研究的结果：由原来的测试人员评分

	有罪情景			无罪情景		
	有罪 (%)	无罪 (%)	没有结论(%)	有罪 (%)	无罪 (%)	没有结论(%)
Honts (1996)	71	5	24	0	82	18
Honts 等人(1988)	92	8	0	0	91	9
Patrick & Iacono (1991)	98	0	2	8	73	19

第 8 章
对专业实务中的谎言识别的指导和建议

最后，我将明确地讨论三个我尚未讨论的问题。首先，个体说谎的好坏如何存在着个体差异。一些人说的谎言很容易就被识破，而另一些人则是非常有技巧的说谎者。每个人或许都能想到这两个类型的说谎者的例子。说那些一看就透的谎言的人的一个例子就是乔纳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前英国保守党政客，在约翰·梅杰（John Major，前首相）手下工作，开始任国防采购部部长（Defence Procurement Minister），后来任财政部第一秘书。当艾特肯任国防采购部部长时，他在巴黎的濠璟酒店（Ritz Hotel，以豪华著称的瑞士酒店）住了一段时间。英国的报纸《卫报》（*The Guardian*）和电视节目《世界在行动》（*World in Action*，英国比较典型的时事分析评论节目）报道说他的酒店账单被一个商人支付了。艾特肯强烈地否认了这件事。他宣称是他的妻子而不是商人支付了账单，他以文字诽谤罪控告了报纸和电视台。当被告出示的证据显示在艾特肯住在酒店期间，他的妻子不在巴黎，不可能支付账单时，诽谤案的审判就告终了。艾特肯面对陪审团承认了自己做了伪誓并妨碍了司法公正。在 1999 年 6 月 8 日，他被判监禁 18 个月（《独立报》，1999 年 6 月 9 日，第一版）。利用他游手好闲的妻子来说谎，艾特肯说了一个他自己也知道可能被识破的谎言。控告报纸和电视节目可能增加了他被识破的可能性，因为这刺激了被告方去寻找证明他说谎的证据。艾特肯可能是一个不好的说

谎者。在这章中,我将描述一个好的说谎者有什么特点。

第二,我将对全书提到的三个不同的识别说谎者的方法进行总结(分析非言语行为,说话内容和生理反应)。到目前为止,我是分别讨论这三项技术,现在将对这三项技术进行比较。

第三,我写本书的目的是指导和建议谎言识别者如何识别谎言。不可避免的是,一本为谎言识别者写的书也会对说谎者有益。它描述了说谎者的反应以及谎言识别者为了识别说谎者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在阅读这本书后,说谎者可能决定改变他们的反应策略,这将会使谎言识别者的任务更加艰巨。实际上情况总是这样。说谎者和谎言识别者在彼此的"军备竞赛(arm race)"中提高他们的技术,谎言识别者的进步将会导致说谎者改变他们的策略。这在第7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多道测谎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为打败多道测谎的反测试技术的发展。我在第7章中描述了克格勃(KGB)如何帮助了俄国间谍愚弄中央情报局的谎言识别者。识别所有的谎言是永不可能的,并且也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人们常常愿意保持无知,不愿发现某人是否对他们说谎。但是,那些想识别说谎者的人能让说谎者的说谎任务更困难。在本章中,我将描述如何做到这点。

谁是好的说谎者

好的说谎者的特点

我相信说谎者之所以被识别是因为持续说谎有认知上的困难,或者因为他们处理情绪的方式暴露了他们的谎言。好的说谎

者是那些说谎时没有认知困难和没有任何情绪体验的人。更精确地说,好的说谎者至少有七个方面的特点:(i)良好的准备;(ii)有创造性;(iii)思维敏捷;(iv)雄辩;(v)良好的记忆力;(vi)当说谎时,体验不到恐惧、负罪感或欺骗快乐;以及(vii)善于表演。

说谎者常常因为准备得不够充分而被识别。谎言识别者将会寻找反驳说谎者的陈述的证据,因此说谎者应该小心他们自己所说的话。理想上,他们应该只说那些其他人无法证实的事情。因此隐瞒信息比说直接的谎言要好。告诉某人你"很诚实但是记不起来"数天前你做过什么比编造故事要好得多,因为后者给观察者一个检验故事的机会。但是,并不总是能够隐瞒信息,因为有时需要提供陈述。从说谎者的角度看,陈述越难证实越好。乔纳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他所说的谎言就能够被查证——但是他并不是惟一的一个。我们最近描述了五个案子的当事人,他们被认为杀害了他们的亲人,但是他们最初都否认杀人(Vrij & Mann, 1999)(见第 3 章)。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编造事实时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他们很容易就被发现他们或许在隐瞒事实。举例来说,一个人不能说清楚他在从开始旅行——这个旅行最后导致被害人死亡——到报警之间这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为。而且,血迹显示被害人实际上不是在这个人声称的地方被杀害的。另一个人宣称自己被打昏了 10 个小时,而麻醉师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进行了案情重建,"重回到"那个人宣称的犯罪当晚他呆的酒吧里,那里没有人能证实在那个特别的晚上被告是呆在那里的。

关于创造性,一名说谎者可能要面对意想不到的情景,这需要说谎者立即做出反应。举例来说,一名妻子可能质问丈夫为什么

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了一名妇女——她不认识的——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或者警探可能告诉嫌疑犯有一个证人看到他在犯罪发生后不久出现在犯罪现场。要在这些情景下——或者相似的情景下——成功地说谎，说谎者需要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回到刚才说的那个例子，被告在案情重建时没有被酒吧里的任何人认出来，他其实可以质疑其他顾客的记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承认了罪行。

说谎者不仅应该有创造性，而且应该能够很快地给出答案。因为延迟可能使观察者产生怀疑，所以有必要让他们在得到答案前不会等太久。因此需要迅速地思考。

成为一名雄辩者将会对说谎者有益，因为口才能帮助他们摆脱尴尬的情景。经常使用很多的词汇来表达他们自己的人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他们能给出一个很长的回答，但是实际上却没有回答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可能想到了适当的答案。或者他们能用他们的口才愚弄观察者，给出一个听起来令人信服但事实上没有提供答案的反应。一些政客非常善于使用这个。

说谎者总是冒着谎言识别者要求他们重复或澄清他们刚刚所说的内容的危险。他们应该能够重复相同的叙述或添加那些不自相矛盾的信息。因此这需要很好的记忆力。当说谎和要求重复或澄清谎言之间有一些时间间隔的时候，重复相同的叙述或补充额外的信息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对他们不能参见一个特别的聚会说谎，一周以后再问起这个问题时，他们想不起来他们曾经给出的借口。

当人们说谎时，他们体验的情绪会不一样。当一名有罪的嫌疑犯被带到模拟的犯罪现场时，他可能非常恐惧，而另一名嫌疑犯

可能保持平静。当一名应聘者夸大他现在的雇主给他的薪水时可能有负罪感，而另一名应聘者这么做时没有任何负罪感。一名学生可能因为意识到他的校长将会相信他谎称的迟到的借口而高兴，而另一名学生则体验不到这种“欺骗的快乐”。当说谎者体验不到恐惧、负罪感或欺骗的快乐时，欺骗别人就会比较容易。只要说谎者体验不到这些情绪中的任何一种（或者任何其他的情绪），将会没有任何在他们说谎时必须压抑的情绪行为，因此他们能反应自然。此外，如果被测者体验不到任何情绪，控制问题多道测谎测试就不能识别谎言。说谎时情绪的缺乏可能是因为频繁地说谎导致的。一个人越经常说谎，就越少在说谎时感到欺骗的快乐和负罪感。经常说谎也可能使某人成为一名更有技巧的说谎者，从而减少被识别的可能性，因此较少有害怕被识别的恐惧。

擅长表演也可能会有帮助。它甚至可能减少伴随欺骗的情绪的出现。好的表演者很擅长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也可能知道如何给别人留下诚实的印象。这使得他们在说谎时很自信。而且他们将时常使他们的谎言不被识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最终将会减少他们害怕被识破的恐惧。说谎者体验的恐惧越少，就越容易让他们的谎言令人信服。

狄保罗（DePaulo）和狄保罗（DePaulo）（1989）以销售人员为被试进行说谎研究。他们没有在说谎的销售人员和说实话的销售人员之间发现任何差异，这表明销售人员是非常好的说谎者。狄保罗（DePaulo）和狄保罗（DePaulo）给这一调查结果提供了几种解释，这些解释和我上面说到的一致。首先，销售人员经常在出售商品时夸大事实，这意味着他们对说谎很有经验。这些经验能使他们成为更好的说谎者，因为顾客的反应让他们洞察到他们的谎言

是多么地成功。如果他们没有使客户相信,他们可能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可能一直这样做直到给客户留下诚实的印象。第二,销售人员在说谎时可能不会有负罪感,因为他们可能认为夸大事实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第三,销售人员或许知道他们是好的说谎者。因为他们常常发现他们的谎言没被识破。因此他们可能对他们的说谎能力很自信,将不会杞人忧天地认为他们的谎言会被识破。

好的和完美的说谎者

在好的和完美的说谎者之间可以做一个区分。完美的说谎者是指那些不会显露任何欺骗线索的说谎者,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这样的说谎者可能存在,但是他们是特殊的。在我自己的研究中(第2章),被试通常都接受两次访谈。在第一次访谈中他们说实话,而在另一个访谈中说谎。然后我们比较在两次访谈中他们表现出的行为。随带说一句的是,我们在两次访谈期间确实偶然遇见过一些被试是完美的说谎者,他们表现的行为前后一致。然而,多数的被试都表现出来欺骗的行为线索。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好的说谎者(至少在我的实验中)。说他们是好的说谎者是因为观察者常常不能识别他们的谎言,但是他们不是完美的说谎者,是因为他们确实显示出了欺骗的行为线索。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识破是因为他们表现的欺骗的行为线索很少,或者是因为他们表现出的线索很细微而很难被识别,或者因为他们表现出线索并不是识别者期待说谎者表现的那些线索。因此,虽然这些线索被发现了,但是这些线索并不导致谎言识别相信这个人在说谎。我的研究(在第3章中讨论的)显示,在接受访谈时坐姿安静的说谎者通

常给观察者留下诚实的印象。但是,他们并不是完美的说谎者,因为他们通常在说谎时表现出不自然的僵硬。

识别谎言的三种方法

原则上,有三种方法来识别说谎者。第一是通过观察说谎者的非言语行为,例如他们的动作,他们是否有笑容或者视线转移,他们声音的高低、说话的频率、是否口吃等等。第二种方法是分析说话的内容。第三种方法是用多道测谎仪来检查生理反应(血压、心率、手掌出汗等等)。表 8.1 表现了这三种方法的一些方面。

表 8.1　识别谎言的三种方法

	非言语的	言语的	生理的
说谎者应该体验到什么?	认知困难/情绪	情绪/认知困难	情绪/犯罪情景的认知
谎言如何表现自己?	• 口吃 • 说话时停顿 • 语速变慢 • 僵硬 • 高音 • 情绪化的面部表情	• 似乎不真实的回答 • 消极的陈述 • 间接的回答 • 缺乏个人体验 • 结构化陈述 • 缺乏细节	• 生理反应
是否有个体差异?	是	是	未知

（续表）

	非言语的	言语的	生理的
这种方法是否需要仪器来识别谎言？	是	否	否
非专业人士识别谎言的能力如何？	差	未知	不适用
专业人员识别谎言的能力如何？	68%的实话 -92%的谎言[a]	76%的实话 -68%的谎言[b]	72%的实话 -87%的谎言[c] 96%的实话 -59%的谎言[d]
人们能被训练成好的谎言识别者吗？	未知	是	是
愚弄观察者有困难吗？	可能	多半没有	否

[a]是弗兰克（Frank）和埃克曼（Ekman）（1997）以及维吉（Vrij）等人（1999）进行的惟一两个在详细分析非言语行为的基础上区分实话和谎言的研究中得到的平均击中率。

[b]由第5章的表5.4中的CBCA研究得到的平均击中率，去掉了埃斯普林（Esplin）等人得到的准确率，因为他们的结果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白人和黑人的准确率是混在一起的（Ruby等人，1998）。由CBCA专家得到的准确率和区别分析是混在一起的（Vrij，Kneller & Mann，即将发表）。

[c]使用控制问题技术和独立的测试人员的现场研究得到的平均击中率（见第7章图7.5）。

[d]有罪情景测试的现场研究得到的平均击中率（见第7章图7.5）。

欺骗的非言语线索

如果谎言很难捏造，就可能出现欺骗的非言语线索。当说一则困难的谎言时，说谎者容易出现语速变慢，出现更多的口吃和停顿。举例来说，那个被认定的凶手（第 2 章中提到的）就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模式。

情绪，例如负罪感，恐惧或说谎时的兴奋也都可能影响某人的行为。这些情绪越强烈，越有可能出现欺骗的非言语线索。非常担心被识别的说谎者将会努力给观察者留下诚实的印象。第 2 章表明他们在这样的情景下倾向表现的行为常常显得是僵硬的，事先设计好的和演练过的。而且，情绪的体验常常会造成声调变高，这是说谎者不能控制的自动反应。但是，声调的升高是非常小的，很难被识别。最后，情绪可能导致面部情绪表达。举例来说，恐惧会自动地造成眉毛的抬起并挤在一起，上眼皮的抬起和下眼皮的绷紧。不想显出他们自己的恐惧的说谎者会试着抑制这些情绪表达。他们常常在情绪表达出现后的 1/25 秒内抑制这些表情。这意味着情绪表达会呈现 1/25 秒，这刚刚够熟练的观察者识别。

欺骗的言语线索

有时观察者知道说谎者说的东西是不真实的。通过倾听说谎者在说什么就能很容易地识别出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说谎者所说的谎言都是一看就透的。即使谎言不是一看就透的时候，通过注意说话的内容也常常可以识别出谎言来。在第 4，5 和 6 章中我们说到，说谎者有时会说一些听起来难以置信的陈述。而且，他们的陈述常常是消极的，间接的，而且缺乏对个人体验的描述。除

此之外，说实话者，尤其是当他们情绪激动时，容易以一种无组织的方式说他们的故事，而说谎者会以时间顺序来描述事件。最后，与说实话者相比，说谎者在他们的陈述中更少包括那些细节描述。对这些调查结果有一些解释（见第 4，5 章）。例如，消极情绪（如负罪感，愤怒）可能造成消极陈述，不安可能导致说谎者以一种无组织的方式陈述。不提许多细节可能是因为缺乏创造这样的细节的想像力，没有足够的知识制造某个细节，或者不想提到太多的细节，因为这将会增加自相矛盾的可能性或者观察者检查时会发现谎言。

说谎时的生理反应

害怕被识别的恐惧，说谎时的负罪感，说谎时的兴奋和欺骗时的有罪情景认知都伴随着（少量）的生理反应，例如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和手掌出汗增多。多道测谎仪能够测量这些生理反应。

三种识别欺骗的方法比较

个体差异

对非言语行为和说话内容的分析常常会受到这样的事实的阻碍，即在欺骗时，个体彼此之间的非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是有差异的。例如，雄辩的人在说谎时比不雄辩的人更少出现说话混乱，小孩比成人更少在他们讲的故事中加入细节，无论他们是否说谎。个性对多道测谎测试的结果是否有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在多道测谎测试中，在生理反应上的个体差异还没有发现。

测谎的必备仪器

不像分析言语行为和生理反应，对非言语行为的分析不需要任何的仪器。所有的观察者都不得不小心地观察和小心地倾听。检查言语行为需要有对陈述的书面记录，生理反应只能通过使用机械仪器调查。这意味着分析生理反应或言语行为在那些需要立即观察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而多数情景下都要求这样。很显然，父母不会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儿子是否抽烟而要求他接受多道测谎测试，海关官员也不能在用纸笔记录下他和旅客的谈话以后再决定是否搜查行李。而且，为了分析言语行为或生理反应，必须让潜在的说谎者说点什么。当分析行为时则不需要有言语反应。甚至在一个人决定保持沉默时也可以进行行为分析。总之，在许多情景下，观察者要依赖对非言语行为的分析来识别某人是否在说谎。

非专业人士识别谎言的能力如何

实验室研究已经表明，非专业人士并不擅长识别谎言。在典型的欺骗实验中，给观察者呈现一段录像，录像中有许多的人（陌生人，朋友或伴侣），他们有的说实话，有的说谎。观察者必须指出录像上的每个人是否说谎。这些研究的准确率（正确答案的百分比）通常在 45% ~60% 之间，而 50% 准确率是偶然概率。这意味着观察者在观察某人的非言语行为时，他们识别谎言的能力仅仅只超出了偶然概率一点点。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非专业人士在通过分析书面记录来识别谎言方面比观察行为要准确一些，但是非专业人士在通过分析书面记录识别谎言方面到底有多好，还不是很清楚（DePaulo，Stone & Lassiter，1985）。合格的多道测谎测试只

能由熟练的多道测谎测试人员进行。

专业的谎言识别者识别谎言的能力如何

埃克曼(Ekman)和他的同事是惟一的提出识别谎言的非言语方法,应用这一方法,并发表了准确率的研究人员。他们观察了因为情绪体验而产生的面部表情,使用他们的方法能够识别70%的实话和90%的谎言(Frank & Ekman,1997)。但是,还不清楚这20%的错误是否包括无结论(inconclusive)的结果。埃克曼(Ekman)、奥沙利文(O'Sullivan)、佛瑞森(Friesen)和斯克若(Scherer)(1991)声称他们得到了一个更高的击中率(86%),但是他们也忽视了无结论的结果。在那项研究中,他们得到了19次击中;3次错误和9次无结论的结果。当无结论的结果被忽视时,准确率是86%,但是当无结论的结果被我们考虑进来的时候,准确率就低了,只有61%。

大部分专业谎言识别者,例如海关官员和警察,当他们观察非言语行为时他们得到的准确率要比埃克曼的低。平均而言,他们识别实话的准确率是54%,谎言是49%(见第3章的表3.3)。这些击中率和偶然概率的水平一致,和非专业人士所得到的准确率相似。研究进一步显示,专业谎言识别者比非专业人士对他们的识别谎言的能力更自信,这意味着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可能使得他在测谎方面更自信而不是更准确。

研究还表明,受过CBCA训练的人——言语测谎技术(the verbal detection of deception technique),在第5章谈到的——识别实话和谎言的水平高于偶然概率。平均而言,CBCA评价方法能够识别出76%的实话和68%的谎言。

检查多道测谎测试的现场研究表明，控制问题的准确率是相当高的——能正确识别 72% 的实话和 87% 的谎言。对犯罪情景测试的现场研究表明识别实话的击中率相当高（96%），但是识别谎言的击中率则相对低一些（59%）。

总之，专家在通过非言语、言语或多道测谎技术识别谎言时，他们识别实话和谎言的水平都高于偶然概率。但是，准确率并不肯定是完美的。因此，使用这些技术得到的结果不能作为法庭的实质性证据使用，它们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性证据使用。除了提供这样的证据，专家们也应该告知法庭这些技术是不完美的，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会伴随着几个问题。全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非言语行为的主要问题是并不存在一个典型的非言语欺骗行为，并且欺骗行为会随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景变化，说实话者和说谎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是很小的。SVA 的问题包括在 CBCA 评价中假阴性错误的弱点（相信说谎者的倾向），评价是主观的，检验这项技术准确性的研究不多。多道测谎测试的问题是：欺骗被测者，被测者的反测试技术的使用，假阳性错误的弱点——也就是不相信说实话者（主要是在控制问题测试中），假阴性错误的出现，以及到目前为止关于这项技术的正确性的现场研究几乎没有（主要指控制问题测试）。

人们能被训练成好的谎言识别者吗

研究已经表明，受过使用 CBCA 训练的观察者比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更好的谎言识别者。很显然，进行一个多道测谎测试，要求训练人们如何进行测试，以及如何解释多道测谎图谱。还不清楚人们是否能被训练来分析非言语行为。到目前为止，对分析非

言语行为的训练项目都被认为不是非常成功。但是，正如我在第3章中已经提到的，这些训练项目有一些局限性。他们把太多的重点放在告知观察者什么是真正的非言语欺骗指示器上。这并不是特别有用，因为不是每个说谎者都会表现出这些行为。尽管典型的欺骗行为并不存在是事实，但是一些人在观察某人的行为时，确实很擅长识别谎言。应该通过咨询这些人，从他们那里学习经验，发展出更成功的测谎方法。但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是什么使得他们善于识别谎言，以及他们注意的是哪些线索。为了发现这些，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愚弄观察者有困难吗

很显然，如果说谎者知道观察者为了识别谎言而使用的那些技术，并能够愚弄观察者，那么谎言识别方法将会不太正确。一些人可能会疑惑这个问题的相关问题是什么？说谎者去寻求哪些关于测谎的最新信息，然后训练自己打败测谎仪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或许要看说谎者避免被识别的动机，以及这项技术用在他们身上的可能性。高动机的说谎者，例如罪犯、间谍和通奸者，或许比低动机者会对愚弄谎言识别者的方法表现出较多兴趣。他们是否能够真的获得关于这些技术的信息以及训练自己打败这些技术，可能要看他们认为这些技术用在他们身上的可能性大小。因此，通奸者不太可能会寻求有关这些技术的信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伴侣不太可能会对自己使用这些技术。另一方面，罪犯和间谍可能认为他们冒测试人员将会对他们使用这些技术的危险，因此他们可能为了愚弄测试人员而进行训练。正如第7章中讲到的，中央情报局使用多道测谎测试来识别间谍，但是间谍却被训练来愚

弄中央情报局的多道测谎测试人员。

研究已经指出多道测谎被测者能够愚弄多道测谎测试人员并且能够打败多道测谎。一些这样的案例在第 7 章已经提到。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来调查说谎者打败言语和非言语谎言识别技术的能力，可能是因为这些技术是相对比较新，没有被广泛地使用（CBCA），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有效的非言语谎言识别技术）。

据我所知，我们自己的研究是第一个检查说谎者愚弄 CBCA 判断者的能力的（Vrij，Kneller & Mann，即将发表）。正如在第 5 章所说的，说谎者成功地欺骗了一名 CBCA 专家。但是，在这个惟一的研究的基础上很难得出结论，因此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我预想的下一步研究是证明很多测谎者都能愚弄那些 CBCA 专家们。人们通过联系，能很好地控制他们说话的内容，因为言语对表达思想、想法、感情和观念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训练会使我们更好地控制我们说话的内容。

也许没有必要让说谎者练习他们的非言语行为风格，因为事实上观察者一般都不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来识别谎言。我很怀疑能够发现说谎者可以很好地控制他们的行为，如果他们想控制的话。有时候，说谎者的细微的面部表情就能暴露他们的谎言。但是，要想完全抑制这些情绪表达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当体验到情绪时，他们会自动出现。一些证据表明说谎者在控制一些比情绪表达更好控制的行为时都很困难，例如手脚动作。在我的研究中，我们告知一半的被试说，细小的手和手指动作的减少常常表明在说谎（Vrij，Semin & Bull，1996）。剩下的被试没有被告知这点。指导所有的被试说谎，然后问他们如何看待他们在说谎时的行为。与那些没有被告知的说谎者相比，被告知的说谎者认为他们在说谎

的时候做了更多的细小的手和手指动作。但是，分析这些被试的实际行为发现，两组被试出现细小的手和手指动作的数量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虽然被告知的被试认为他们表现了更多的细小的手和手指动作，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做到这点，这说明这样做是很困难的事情。

不同测谎技术的联合

到目前为止，不同的测谎方法——通过分析说话的内容，非言语行为或生理反应——已经分别讨论过了。一个尝试着提高测谎准确性的明显的方法就是联合几种方法。但是，不是所有的联合都是可行的，就像不可能联合言语测谎技术和多道测谎技术。正如我在第 7 章中解释的，在多道测谎测试中，被测者只被允许回答简单的“是”或“不”，因为说话可能导致我们不想要的生理反应。很显然，如此短的答案对言语测谎技术是不够的。因此，只可能联合非言语行为测谎技术和多道测谎测试或者非言语行为测谎技术和言语测谎技术。但是，并不能保证这样联合是成功的。举例来说，使用控制问题技术的多道测谎测试人员和观察面部情绪表情的谎言识别者都要识别谎言。当说谎者没有情绪时，这两类的谎言识别者都将不能识别谎言。没有情绪体验的说谎者不能被那些观察面部情绪表达的谎言识别者识别，因为这些说谎者没有情绪表现。这些说谎者也不能被控制问题多道测谎测试识别，因为这些说谎者不会在测试的时候出现那些期望的生理反应。

除此之外，谎言识别者似乎不太情愿联合谎言识别技术。举例来说，戴维 · 拉斯金（David Raskin）（卓越的多道测谎专家）和甘特（Günter Köhnken）（卓越的 CBCA 专家）都反对分析非言语行

为，因为他们对通过行为线索识别欺骗的可能性持悲观的态度（《人际沟通》，1996）。分析多道测谎结果和非言语行为的观察者比那些只分析非言语行为的观察者的准确性要高多少？埃克曼（Ekman）和奥沙利文（O'Sullivan）（1991，见第 3 章表 3.3）表明只分析非言语行为的多道测谎测试人员可以达到 56% 的准确率，而多道测谎测试研究显示评估多道测谎图谱的测试人员能达到 80% 的准确率（表 8.1）。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比较，因为多道测谎测试人员没有接受通过非言语线索识别欺骗的训练。我在第 3 章中曾提到，优秀的谎言识别者仅仅通过观察非言语行为就能达到 80% 的准确率。因此，训练观察注意被测者在多道测谎测试时表现的行为线索可以增加识别谎言的准确率。对于多道测谎测试的被测者而言，风险常常是很高的，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出现情绪表现。他们的行为线索能提供他们在测试时感受到的情绪的信息，例如恐惧、愤怒、惊奇、苦恼或兴奋（Ekman，1992）。而且，有罪的被测者可能有高度的逃脱被识别的动机，这使得他们倾向于动机损害效应（motivational impairment effect）（一种设计好的和僵硬的行为倾向）。到目前为止，调查这些观点的研究还没有。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发表过有关联合言语和非言语测谎方法的研究。我们目前的研究计划结果表明这样的方法可能是成功的（Vrij，Edward，Roberts & Bull，1999）。在一个实验中，36 名护士学生，对他们刚看过的一部影片有的说实话，有的说谎。对这些访谈进行录像和录音，分析说谎者和说实话者的非言语行为以及说话的内容，对说话内容的分析使用了 CBCA 和真实监控器（Reality Monitoring）。结果表明在只有非言语行为分析的基础

上,81%的真话和假话可以被识别。CBCA 和真实监控器的准确率分别是75%和72%。但是,三项技术联合在一起(非言语行为,CBCA 和真实监听器)能达到94%的准确率!不难解释一项联合的测谎技术有更多价值。非言语谎言识别方法考虑的说谎者和说实话者的方面(例如非言语行为)与言语谎言识别方法考虑的方面(如说话的内容)是不同的,因此非言语和言语技术的联合导致对说谎者和说实话者比单独的两项技术更细致的观察。

对识别说谎者的指导

一方面,当谎言识别者想发现某人是否说谎时,他们可以进行多道测谎测试。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测谎可能决定把注意力放在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上。在后一种情况中,有一些方面很重要。

保持怀疑

谎言之所以没有被识别常常是因为观察者太信任——他们太经常假设人们说的是真话。对谎言识别者而言,保持怀疑和不轻信人们所说的话是很重要的。有时候这很难。日常生活交谈的原则让观察者避免表现怀疑。如果观察者表达了他们的怀疑,交谈就会变得很尴尬,因为如果观察者不断地打断说话者并对他们说的每件事情都挑衅("我不相信这个""你有证据证明吗?""我想查查你说的这些"等等),说话者很快就会被激怒。如果说话者是观察者觉得感情上很亲近的人,例如朋友或伴侣,表示怀疑就尤其困难。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不擅长识别那些由朋友和伴侣所说的谎言。很显然,不被允许表现怀疑仅仅只在日常生活中。专业

的谎言识别者，例如警察局的警探和与越境的旅行者交谈的海关官员，都被允许保持怀疑，并对一个人所说的话进行质问。

探测

此外，观察者一旦怀疑某人正在说谎，他们应该不断地对相关问题进行询问。当观察者对某个问题不断地进行询问，保持说谎将会变得更困难。对此有几个解释。说谎者必须避免自相矛盾，不应该说那些观察者已经知道是不正确的事情，一定要记住他们自己已经说过的事情以防观察者要求他们对仅仅说的信息进行重复或澄清。而且，说谎者应该始终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免明显地表明神经紧张和认知负荷的行为会暴露他们的谎言。

但是，不断问问题并不容易。第一，正如前面刚刚提到的，问很多问题是与社会交谈原则不相容的。第二，研究已经表明，在第一个例证中，说谎者利用进一步的询问来制造诚实的印象。也就是说，当说谎者在被观察者质问以后还坚持说谎时，观察者就倾向于相信他们。一种解释可能是观察者想通过进一步的询问把说谎者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因此期待说谎者出现神经紧张的行为（开始口吃、慌张等等）。因此只要说谎者成功地避免出现这些紧张行为，他们将会给观察者留下诚实的印象。

不要暴露重要的信息

对观察者而言，不要向说谎者暴露太多他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说谎者不应该说那些观察者知道是不正确的事情。如果说谎者知道观察者知道什么这就很容易做到，但是如果说谎者不知道观察者已知的信息这就会变得很困难。在这样的情

景中，说谎者不知道他们应该说什么，而且他们总是冒着因为说了那些与观察者已知的事情相反的话而被识别的危险。这种持续的被识别的威胁也可能使他们神经紧张，这将会增加他们说谎时的行为线索的可能性。

被告知

如果观察者被很好地告知谎言的主题，他或她识别说谎者就比较容易了。观察者已知的细节越多，他或她将越有可能注意到说谎者说的不是事实。

要求说谎者重复他们以前说的内容

对谎言识别者而言，一项有用的技术就是要求说谎者重复他们以前说过的内容。这有两个好处。首先，说谎者有时会因为他们不能记起他们曾经所说的内容，并且在他们试图重复故事时出现自相矛盾，这会留下可疑的印象，甚至被识别。第二，当说谎者意识到观察者使用这项技术时，他们可能会决定不再在他们的谎言中捏造更多的信息，因为他们说得越多，他们冒的忘记自己所说的内容和自相矛盾的危险就越大。这可能使得虚假陈述的质量不高，可能使得那些观察陈述丰富性的测谎技术（例如 CBCA）更准确。

仔细地观察和倾听，抛弃刻板印象

不存在典型的指示欺骗的非言语行为，也不是所有的说谎者都说特定的事或避免说特定的事。因此，在刻板信念基础上对欺骗做出判断也是无用的（例如，“说谎者会表现出视线转移”，“说

谎者会慌张”,“说谎者会口吃”)。事实上,观察者应该独立地判断每个案子。仔细地观察某人的行为和仔细地倾听他们的话是十分必要的。简短的情绪表达,微妙的动作,自相矛盾的言语——都是欺骗的表征。因此谎言识别者应该试着解释这个人为什么出现了这些特别的表征,应该记住的是,这些表征的出现也可能是因为除了那个人在说谎之外的其他原因。

仔细地观察某人的行为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观察手、手指、腿和脚的运动可能对识别谎言尤其有用。这意味着观察不得不小心仔细地检查潜在的说谎者,几乎是从头到脚观察他们。这在交谈中是非常不寻常的行为,会给别人留下古怪的印象,因为我们通常限制我们去注视交谈对象的眼睛。但是,眼睛运动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欺骗的可靠信息。因此,在警察讯问的时候,一个或者多个警察坐在另一个房间里,通过录像连接系统观察嫌疑犯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这能够给观察者提供从头到脚观察嫌疑犯的机会,如果这些警察和访谈者在一个房间里就不可能这样。

比较说谎者的行为和他们的正常行为

如果谎言识别者熟悉潜在的说谎者的正常行为,那么识别细微的说谎的非言语线索则比较容易。在这样的情形下,行为的变化能被更容易地看见。因此谎言识别者应该试着了解这个人的正常行为,寻找与这一“基线”行为不同的偏离行为,并且试着解释这些偏离行为(它们也可能是因为除了那个人在说谎之外的其他原因而出现的)。但是,“基线比较方式”只有在这个人的潜在欺骗行为与在相似的环境出现的正常行为进行比较时才是有效的。举例来说,比较嫌疑犯在否认实施了犯罪时的行为和他或她在访

谈开始寒暄时的行为就是没用的，因为嫌疑犯（有罪的和无罪的）很可能在闲谈期间和在真正的讯问期间（当他们被怀疑，风险很高时）表现的行为不同（Vrij，1995）。一个公平的比较是把嫌疑犯在这一特定的否认期间的行为和他或她否认另一个相似的犯罪期间的行为（确定这个否认是事实）进行比较。

最后的说明

在本书中，我尝试着对欺骗和非言语行为的关系、说话内容和生理反应的关系提供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和理论的概观，以及为了识别谎言，谎言识别者应该做什么。这一解释有多有效和多诚实由你们来决定。

参考文献

Akehurst, L. & Vrij, A. (1999). Creating suspects in police interview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 192–210.

Akehurst, L., Bull, R. & Vrij, A. (2000). *Training British police officers, social workers and students to detect deception in children using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Akehurst, L., Köhnken, G. & Höfer, E. (1995). *Th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Law, Budapest, Hungary.

Akehurst, L., Köhnken, G., Vrij, A. & Bull, R. (1996). Lay persons' and police officers' beliefs regarding deceptive behaviour.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0**, 461–471.

Allen, J.J.B. & Iacono, W.G. (1997).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of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in deception detection. *Psychophysiology*, **34**, 234–240.

Alonso-Quecuty, M.L. (1991). *Post-event information and reality-monitoring: when the witness cannot be hone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Spanish and British Meeting on Psychology, Law and Crime in Pamplona, Spain.

Alonso-Quecuty, M.L. (1992). Deception detection and Reality Monitoring: a new answer to an old question? In F. Lösel, D. Bender. & T. Bliesener (Eds), *Psychology and law: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328–332.

Alonso-Quecuty, M.L. (1996). Detecting fact from fallacy in child and adult witness accounts. In G. Davies, S. Lloyd-Bostock, M. McMurran & C. Wilson (Eds), *Psychology,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74–80.

Alonso-Quecuty, M.L., Hernandez-Fernaud, E. & Campos, L. (1997). Child witnesses: lying about something heard. In S. Redondo, V. Garrido, J. Perez & R. Barbaret (Eds), *Advances in psychology and law*.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29–135.

Anolli, L. & Ciceri, R. (1997). The voice of deception: vocal strategies of naive and able liar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1**, 259–284.

Anson, D.A., Golding, S.L. & Gully, K.J. (1993). Child sexual abuse allegations: reliability of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7**, 331–341.

Apple, W., Streeter, L.A. & Krauss, R.M. (1979). Effects of pitch and speech rate on personal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715–727.

Arntzen, F. (1982). Die Situation der Forensischen Aussagenpsycholog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A. Trankell (Ed.),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the role of psychologists in criminal trials*. Deventer: Kluwer, 107–120.

Arntzen, F. (1983). *Psychologie der Zeugenaussage: Systematik der Glaubwürdigkeitsmerkmale*. Munich: C. H. Beck.

Aune, R.K., Levine, T.R., Ching, P.U. & Yoshimoto, J.M. (1993).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ource reward value on attributions of decep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0**, 15–27.

Backbier, E. & Sieswerda, S. (1997). Wanneer en waarom liegen we eigenlijk? *Nederlands Tijdschrift voor de Psychologie*, **52**, 255–264.

Barland, G.H. (1984). Standards for the admissibility of polygraph results as evidence. *University of West Los Angeles Law Review*, **16**, 37–54.

Barland, G.H. (1988). The polygraph test in the USA and elsewhere. In A. Gale (Ed.), *The polygraph test: lies,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73–96.

Bashore, T.R. & Rapp, P.E. (1993). Are there alternatives to traditional polygraph procedur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3–22.

Baskett, G.D. & Freedle, R.O. (1974). Aspects of language pragmatics and the social perception of lying.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3**, 117–131.

Bell, B.E. & Loftus, E.F. (1988). Degree of detail of eyewitness testimony and mock juror judgment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8**, 1171–1192.

Bell, B.E. & Loftus, E.F. (1989). Trivial persuasion in the courtroom: the power of (a few) minor detai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669–679.

Bell, K.L. & DePaulo, B.M. (1996). Liking and lying.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8**, 243–266.

Ben-Shakhar, G. & Dolev, K. (1996). Psychophysiological detection through the Guilty Knowledge technique: effects of mental countermeasur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1**, 273–281.

Ben-Shakhar, G. & Furedy, J.J. (1990).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Blaauw, J.A. (1971). 99 tips voor het verhoor. *Algemeen Politie Blad*, **120**, 287–296.

Boelhouwer, A.J.W., Merckelbach, H.L.G.J., Van Koppen, P.J. & Verbaten, M.N. (1996). *Leugendetectie in Nederland* (Rapport aan Minister van Justitie). Tilburg: University of Tilberg.

Bond, C.F. & Fahey, W.E. (1987). False suspicion and the misperception of decei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 41–46.

Bond, C.F. & Robinson, M. (1988). The evolution of decep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2**, 295–307.

Bond, C.F., Kahler, K.N. & Paolicelli, L.M. (1985). The miscommunication of deception: an adap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 331–345.

Bond, C.F., Omar, A., Mahmoud, A. & Bonser, R.N. (1990). Lie detection across culture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4**, 189–205.

Bond, C.F., Omar, A., Pitre, U., Lashley, B.R., Skaggs, L.M. & Kirk, C.T. (1992). Fishy-looking liars: deception judgment from expectancy vio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çial Psychology*, **63**, 969–977.

Boychuk, T. (1991).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of children's statements about sexual abuse: a field-based validation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mpe, AZ.

Bradley, M.T. & Janisse, M.P. (1981). Accuracy demonstrations, threat, and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cardiovascular, electrodermal and pupillary measures. *Psychophysiology*, **18**, 307–315.

Bradley, M.T., MacLaren, V.V. & Black, M.E. (1996). The control question test in polygraphic examinations with actual controls for truth.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83**, 755–762.

Brandt, D.R., Miller, G.R. & Hocking, J.E. (1980a). The truth-deception attribution: effects of familiarity on the ability of observers to detect decep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6**, 99–110.

Brandt, D.R., Miller, G.R. & Hocking, J.E. (1980b). Effects of self-monitoring and familiarity on deception detec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8**, 3–10.

Brandt, D.R., Miller, G.R. & Hocking, J.E. (1982). Familiarity and lie detection: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The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6**, 276–290.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1986).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use of the polygraph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personnel screening.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9**, 81–94.

Brooks, C.I., Church, M.A. & Fraser, L. (1986). Effects of duration of eye contact on judgments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6**, 71–78.

Brougham, C.G. (1992).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can what they don't say give them away?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61**, 15–18.

Bull, R. (1988). What is the lie-detection test? In A. Gale (Ed.), *The polygraph test: lies,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0–19.

Bull, R. (1989). Can training enhance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In J. C. Yuille (Ed.), *Credibility assessment*. Dordrecht: Kluwer, 83–97.

Bull, R. (1992). Obtaining evidence expertly: the reliability of interviews with child witnesses. *Expert Evidence: The International Digest of Human Behaviour Science and Law*, **1**, 3–36.

Bull, R. (1995). Innovative techniques for the questioning of child witnesses,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young and thos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y. In M. Zaragoza *et al*. (Eds), *Memory and testimony in the child witnes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79–195.

Bull, R. (1998). Ob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child witnesses. In A. Memon, A. Vrij & R. Bull, *Psychology and law: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redibility*. Maidenhead: McGraw–Hill, 188–210.

Buller, D.B. & Aune, R.K. (1987). Nonverbal cues to deception among intimates, friends, and stranger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1**, 269–289.

Buller, D.B., Burgoon, J.K., Busling, A.L. & Roiger, J.F. (1994a). Interpersonal deception. VIII. Further analysis of nonverbal and verbal correlates of equivocation from the Bauelas *et al*. (1990) research.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3**, 396–417.

Buller, D.B., Burgoon, J.K., White, C.H. & Ebesu, A.S. (1994b). Interpersonal deception. VII. Behavioral profiles of falsification, equivocation and concealment.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3**, 366–395.

Buller, D.B., Comstock, J., Aune, R.K. & Strzyzewski, K.D. (1989). The effect of probing on deceivers and truthteller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3**, 155–170.

Buller, D.B., Stiff, J.B. & Burgoon, J.K. (1996). Behavioral adaptation in deceptive transactions. Fact or fiction: a reply to Levine and McCornack.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 589–603.

Buller, D.B., Strzyzewski, K.D. & Comstock, J. (1991a). Interpersonal deception. I. Deceivers' reactions to receivers' suspicions and probing.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8**, 1–24.

Buller, D.B., Strzyzewski, K.D. & Hunsaker, F.G. (1991b). Interpersonal deception. II. The inferiority of conversational participants as deception detector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8**, 25–40.

Burgoon, J.K. & Newton, D. A. (1991). Applying social meaning model to relational messages of conversational involvement: comparing participant and observer perspectives.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56**, 96–113.

Burgoon, J.K., Buller, D.B., Guerrero, L.K., Afifi, W.A. & Feldman, C.M. (1996). Interpersonal deception. XII.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mensions underlying deceptive and truthful message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3**, 50–69.

Burgoon, J.K., Manusov, V., Mineo, P. & Hale, J.L. (1985). Effects of gaze on hiring, credibility, attraction and relational message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9**, 133–147.

Carroll, D. (1988). How accurate is polygraph lie detection? In A. Gale (Ed.), *The polygraph test: lies,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28.

Carroll, D. (1991). Lie detection: lies and truths. In R. Cochrane & D. Carroll (Eds), *Psychology and social issues: a tutorial text*.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60–170.

Ceci, S.J. & Bruck, M. (1995). *Jeopardy in the courtroo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eci, S.J., Huffman, M.L., Smith, E. & Loftus, E.F. (1994). Repeatedly thinking about a non-event.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3**, 388–407.

Ceci, S.J., Loftus, E.F., Leichtman, M.D. & Bruck, M. (1994). The possible role of source misattributions in the creation of false beliefs among preschool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nosis*, **17**, 304–320.

Chahal, K. & Cassidy, T. (1995). Deception and its detection in children: a study of adult accuracy. *Psychology, Crime, and Law*, **1**, 237–245.

Cody, M.J. & O'Hair, H.D. (1983).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deception: differences in deception cues due to gender and communicator dominanc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0**, 175–193.

Cody, M.J., Lee, W.S. & Chao, E.Y. (1989). Telling lies: correlates of deception among Chinese. In J. P. Forgas & J. M. Innes (Eds), *Recent advances in social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359–368.

Cody, M.J., Marston, P.J. & Foster, M. (1984). Deception: paralinguistic and verbal leakage. In R. N. Bostrom & B.H. Westley (Ed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8*. Beverly Hills CA: Sage, 464–490.

Cohen, P. (1997). Lie detectors back on trial. *New Scientist*, 15 May.

Comadena, M.E. (1982). Accuracy in detecting deception: intimate and friendship relationships. In M. Burgo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6*. Beverly Hills, CA: Sage, 446–472.

Conte, J.R., Sorenson, E., Fogarty, L. & Rosa, J.D. (1991). Evaluating children's reports of sexual abuse: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1**, 428–437.

Coolbear, J.L. (1992). Credibility of young children in sexual abuse cases: assessment strategies of legal and human service professionals. *Canadian Psychology*, **33**, 151–164.

Craig, R.A. (1995). *Effects of interviewer behavior on children's statements of sexual abu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rombag, H.F.M., Wagenaar, W.A. & Van Koppen, P.J. (1996). Crashing memories and the problem of source monitoring.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0**, 93–104.

Davies, G. (1991). Research on children's testimony: implications for interviewing practice. In C. R. Hollin & K. Howells (Eds), *Clinical approaches to sex offenders and their victims*. Chichester: John Wiley, 93–106.

Davis, M. & Hadiks, D. (1995). Demeanor and credibility. *Semiotica*, **106**, 5–54.
DePaulo, B.M. (1988). Nonverbal aspects of decep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2**, 153–162.
DePaulo, B.M. (1991). Nonverbal behavior and self-presentation: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R. S. Feldman & B. Rimé (Eds), *Fundamentals of nonverbal behavior* Par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1–397.
DePaulo, B.M. (1992). Nonverbal behavior and self-present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1**, 203–243.
DePaulo, B.M. (1994). Spotting lies: can humans learn to do better?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83–86.
DePaulo, B.M. & Bell, K.L. (1996). Truth and investment: lies are told to those who ca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703–716.
DePaulo, B.M. & Kashy, D.A. (1998). Everyday lies in close and casu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63–79.
DePaulo, B.M. & Kirkendol, S.E. (1989). The motivational impairment effect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deception. In J. C. Yuille (Ed.), *Credibility assessment*. Dordrecht: Kluwer, 51–70.
DePaulo, B.M. & Pfeifer, R.L. (1986). On-the-job experience and skill at detecting decept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6**, 249–267.
DePaulo, B.M. & Rosenthal, R. (1979). Telling l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713–1722.
DePaulo, B.M., Charlton, K., Cooper, H., Lindsay, J.L. & Muhlenbruck, L. (1997). The accuracy–confidence correlation in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 346–357.
DePaulo, B.M., Epstein, J.A. & Wyer, M.M. (1993). Sex differences in lying: how women and men deal with the dilemma of deceit. In M. Lewis & C. Saarni (Eds), *Lying and deception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26–147.
DePaulo, B.M., Jordan, A., Irvine, A. & Laser, P.S. (1982) Age changes in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Child Development*, **53**, 701–709.
DePaulo, B.M., Kashy, D.A., Kirkendol, S.E., Wyer, M.M. & Epstein, J.A. (1996). Lying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979–995.
DePaulo, B.M., Lassiter, G.D. & Stone, J.I. (1982). Attentional determinants of success at detecting deception and trut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8**, 273–279.
DePaulo, B.M., Rosenthal, R., Eisenstat, R.A., Rogers, P.L. & Finkelstein, S. (1978). Decoding discrepant nonverbal cu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313–323.
DePaulo, B.M., Rosenthal, R., Rosenkrantz, & Green, C. R. (1982). Actual and perceived cues to deception: a closer look at speech.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 291–312.
DePaulo, B.M., Stone, J.L. & Lassiter, G.D. (1985). Deceiving and detecting deceit. In B.R. Schenkler (Ed.), *The self and social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323–370.
DePaulo, B.M., Tang, J. & Stone, J.L. (1987).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skill at detecting decep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3**, 177–187.
DePaulo, P.J. & DePaulo, B.M. (1989). Can deception by salespersons and customers be detected through nonverbal behavioral cu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 1552–1577.
Desforges, D.M. & Lee, T.C. (1995). Detecting deception is not as easy as it looks. *Teaching of Psychology*, **22**, 128–130.
deTurck, M.A. (1991). Training observers to detect spontaneous deception: effects of gender. *Communication Reports*, **4**, 81–89.

deTurck, M.A. & Miller, G.R. (1985). Deception and arousal: isolating the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decep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 181–201.
deTurck, M.A. & Miller, G.R. (1990). Training observers to detect deception: effects of self-monitoring and rehearsal.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6**, 603–620.
deTurck, M.A., Feeley, T.H. & Roman, L.A. (1997). Vocal and visual cue training in behavioural lie dete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4**, 249–259.
deTurck, M.A., Harszlak, J.J., Bodhorn, D.J. & Texter, L.A. (1990). The effects of training social perceivers to detect deception from behavioural cue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8**, 189–199.
Dulaney, E.F. (1982). Changes in language behavior as a function of verac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9**, 75–82.
Ebesu, A.S. & Miller, M.D. (1994). Verbal and nonverbal behaviors as a function of deception typ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3**, 418–442.
Edinger, J.A. & Patterson, M.L. (1983). Nonverbal involvement and social contro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3**, 30–56.
Ekman, P. (1981). Mistakes when deceiving.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364**, 269–278.
Ekman, P. (1988). Lying and nonverbal behavior: theoretical issues and new finding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2**, 163–176.
Ekman, P. (1989). Why lies fail and what behaviors betray a lie. In J. C. Yuille (Ed.), *Credibility assessment*. Dordrecht: Kluwer, 71–82.
Ekman, P. (1992). *Telling lies: clues to deceit in the marketplace, politics and marriage*. New York: W. W. Norton.
Ekman, P. (1993). Why don't we catch liars? *Social Research*, **63**, 801–817.
Ekman, P. (1997). Deception, lying, and demeanor. In D. F. Halpern & A. E. Voiskounsky (Eds), *States of mind: American and post-soviet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issues in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3–105.
Ekman, P. & Frank, M.G. (1993). Lies that fail. In M. Lewis & C. Saarni (Eds), *Lying and deception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84–201.
Ekman, P. & Friesen, W.V. (1969). Nonverbal leakage and clues to deception. *Psychiatry*, **32**, 88–106.
Ekman, P. & Friesen, W.V. (1972). Hand movem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2**, 353–374.
Ekman, P. & Friesen, W.V. (1974). Detecting deception from the body or fa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 288–298.
Ekman, P. & Friesen, W.V. (1982). Felt, false and miserable smile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6**, 238–253.
Ekman, P. & O'Sullivan, M. (1991). Who can catch a liar?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913–920.
Ekman, P., Davidson, R.J. & Friesen, W.V. (1990). The Duchenne smil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brain physiology. II.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342–353.
Ekman, P. Friesen, W.V. & O'Sullivan, M. (1988). Smiles when ly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414–420.
Ekman, P. Friesen, W.V., & Scherer, K.R. (1976). Body movement and voice pitch in deceptive interaction. *Semiotica*, **16**, 23–27.
Ekman, P. O'Sullivan, M., Friesen, W. V. & Scherer, K. (1991). Face, voice, and body in detecting deceit.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5**, 125–135.
Elaad, E. (1990). Detection of guilty knowledge in real-life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5**, 521–529.

Elaad, E. (1993). Detection of deception: a transactional analysi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7**, 5–15.

Elaad, E. (1997). Polygraph examiner awareness of crime-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1**, 107–120.

Elaad, E. & Ben-Shakhar, B. (1997). Effects of item repetitions and variations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 *Psychophysiology*, **34**, 587–596.

Elaad, E., Ginton, A. & Jungman, N. (1992). Detection measures in real-life criminal guilty knowledge tes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7**, 757–767.

Elaad, E., Ginton, A. & Shakhar, G. (1994). The effects of prior expectations and outcome knowledge on polygraph examiners' decision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7**, 279–292.

Esplin, P.W., Boychuk, T. & Raskin, D.C. (1988). *A field validity study of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of children's statements in sexual abuse ca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O Advanced Study Institute on Credibility Assessment in Maratea, Italy, June 1988.

Exline, R., Thibaut, J., Hickey, C. & Gumpert, P. (1970). Visual interaction in relation to machiavellianism and an unethical act. In P. Christie & F. Geis (Eds), *Studies in machiavelliani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53–75.

Eysenck, H.J. (1984). Crime and personality. In D.J. Muller, D.E. Blackman & A.J. Chapman (Eds), *Psychology and law*. New York: John Wiley, 85–100.

Faigman, D.L., Kaye, D., Saks, M.J. & Sanders, J. (1997).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St Paul, MN: West.

Farwell, L.A. & Donchin, E. (1991). The truth will come out: interrogative polygraphy ('lie detection') with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Psychophysiology*, **28**, 531–547.

Feeley, T.H. & deTurck, M.A. (1997).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on as seen by the actor and as seen by the observer: the case of lie dete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Montreal, Canada, 1997.

Feeley, T.H. & deTurck, M.A. (1998). The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sanctioned and unsanctioned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2**, 189–204.

Feeley, T.H. & Young, M.J. (1997). *Detecting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a narrative review*.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eeley, T.H., deTurck, M.A. & Young, M.J. (1995). Baseline familiarity in lie dete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2**, 160–169.

Feldman, R.S., Jenkins, L. & Popoola, O. (1979). Detection of deception in adults and children via facial expressions. *Child Development*, **50**, 350–355.

Fiedler, K. & Walka, I. (1993). Training lie detectors to use nonverbal cues instead of global heuristic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 199–223.

Fisher, R.P. & Geiselman, R.E. (1992). *Memory-enhancing techniques for investigative interviewing: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Flavell, J.H., Botkin, P.T., Fry, C.K., Wright, J.C. & Jarvis, P.T. (1968). *The development of role-tak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children*. New York: John Wiley.

Foley, M.A. & Johnson, M.K. (1985). Confusions between memories for performed and imagined actions: a developmental comparison. *Child Development*, **56**, 1145–1155.

Ford, Ch.V. (1995). *Lies! Lies!! Lies!!! The psychology of decei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Frank, M.G. & Ekman, P. (1997). The ability to detect deceit generalizes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high-stake l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1429–1439.

Freedman, J.L., Adam, E.K., Davey, S.A. & Koegl, C.J. (1996). The impact of a statement: more detail does not always help.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1**, 117–130.

Freud, S. (1959). *Collected 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Fugita, S.S., Wexley, K.N. & Hillery, J.M. (1974). Black–white differences in nonverbal behavior in an interview setting.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 343–351.

Furedy, J.J. (1991a). Alice in Wonderland terminological usage in, and communicational concerns about, that peculiar flight of technological fancy: the CQT polygraph. *Integrative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6**, 241–247.

Furedy, J.J. (1991b). On the validity of the polygraph. *Integrative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6**, 211–213.

Furedy, J.J. (1993). The 'control' question 'test' (CQT) polygrapher's dilemma: logico-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psychophysiological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15**, 263–267.

Furedy, J.J. (1996a). Some elementary distinctions among, and comments concerning, the 'control' question 'test' (CQT) polygrapher's many problems: a reply to Honts, Kircher and Rask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2**, 53–59.

Furedy, J.J. (1996b). The North American polygraph and psychophysiology: disinterested, uninterested, and interested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1**, 97–105.

Furedy, J.J. & Heslegrave, R.J. (1988). Validity of the lie detector: a psychophysiological perspective.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5**, 219–246.

Gale, A. (1988). The polygraph test, more tha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A. Gale (Ed.), *The polygraph test: lies,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1–9.

Garratt, G.A., Baxter, J.C. & Rozelle, R.M. (1981). Training university police in black-American nonverbal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3**, 217–229.

Garrido, E., Masip, J., Herrero, C., Tabernero, C. & Vega, M.T. (1998). *Policemen's ability to discern truth from decep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inton, A., Daie, N., Elaad, E. & Ben-Shakhar, G. (1982). A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use of the polygraph in a real-life situ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7**, 131–137.

Goldman-Eisler, F. (1968). *Psycholinguistics: experiments in spontaneous speech*. New York: Doubleday.

Goodman, G.S. & Schwartz-Kenney (1992). Why knowing a child's age is not enough: influences of cognitive, social, and emotional factors on children's testimony. In H. Dent & R. Flin (Eds), *Children as witness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15–32.

Goodman, G.S., Rudy, L., Bottoms, B. & Aman, C. (1990). Children's concerns and memory: issues of ecological validity in the study of children's eyewitness testimony. In R. Fivush & J. Hudson (Eds), *Knowing and remembering in young childr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9–284. .

Gordon, R.A., Baxter, J.C., Rozelle, R.M., & Druckman, D. (1987). Expectations of honest, evasive and deceptive nonverbal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7**, 231–233.

Gordon, B.N., Schroeder, C.S. & Abrams, J.M. (1990). Age and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knowledge of sexualit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9**, 33–43.

Granhag, P.A. & Strömwall, L.A. (1998). *"Let's go over this again": effects of repeated interrogations on deception detection perform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Law, Cracow, Poland, September 1998.

Greene, J.O., O'Hair, H.D., Cody, M.J. & Yen, C. (1985). Planning and control of behavior during decep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 335–364.

Greuel, L. (1992). Police officers' beliefs about cues associated with deception in rape cases. In F. Lösel, D. Bender & T. Bliesener (Eds), *Psychology and law: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34–239.

Gudjonsson, G.H. (1992). *The psychology of interrogations, confessions and testimony*. Chichester: John Wiley.

Hale, J.L. & Stiff, J.B. (1990). Nonverbal primacy in veracity judgments. *Communication Reports*, **3**, 75–83.

Hall, J.A. (1979). Gender effects in decoding nonverbal cu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 845–857.

Hall, J.A. (1984). *Nonverbal sex differences: communication accuracy and expressive style*.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emsley, G.D. & Doob, A.N. (1978). The effect of looking behavior on perceptions of a communicator's credibilit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8**, 136–144.

Hernandez-Fernaud, E. & Alonso-Quecuty, M. (1997).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and lie detection: a new magnifying glass for Sherlock Holme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1**, 55–68.

Hershkowitz, I., Lamb, M.E., Sternberg, K.J. & Esplin, P.W. (1997).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terviewer utterance type, CBCA scores and the richness of children's responses.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2**, 169–176.

Hocking, J.E. & Leathers, D. G. (1980). Nonverbal indicators of deception: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47**, 119–131.

Höfer, E. & Köhnken, G. (1999) *Assessing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 statem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Law, Dublin, Ireland, July 1999.

Höfer, E., Akehurst, L. & Metzger, G. (1996). *Reality monitoring: a chan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B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n Psychology and Law in Sienna, Italy, August 1996.

Höfer, E., Köhnken, G., Hanewinkel, R. & Bruhn, C. (1993). *Diagnostik und attribution von glaubwürdigkeit*. Kiel: Final report to 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KO 882/4-2 Kiel, Germany: University of Kiel.

Honts, C.R. (1991).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ygraph tests in the American workplace. *Forensic Reports*, **4**, 91–116.

Honts, C.R. (1994). Assessing children's credibility: scientific and legal issues in 1994. *North Dakota Law Review*, **70**, 879–903.

Honts, C.R. (1995). The polygraph in 1995: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he law. *North Dakota Law Review*, **17**, 987–1020.

Honts, C.R. (1996). Criterion development and validity of the CQT in field application.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23**, 309–324.

Honts, C.R. & Perry, M.V. (1992). Polygraph admissibility: changes and challenge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6**, 357–379.

Honts, C. R. & Raskin, D. C. (1988). A field study of the validity of the directed lie control question.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16**, 56–61.

Honts, C.R., Devitt, M.K., Winbush, M. & Kircher, J.C. (1996). Mental and physical countermeasures reduce the accuracy of the concealed knowledge test. *Psychophysiology*, **33**, 84–92.

Honts, C.R., Hodes, R.L. & Raskin, D.C. (1985). Effects of physical countermeasures on the physiological detection of decep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0**, 177–187.

Honts, C.R., Kircher, J.C. & Raskin, D.C. (1996). Polygrapher's dilemma or psychologist's: a reply to Furedy's logico-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psychophysiological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0**, 199–207.

Honts, C.R., Raskin, D.C. & Kircher, J.C. (1987). Effects of physical countermeasures and their electromyographic detection during polygraph tests for deception.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1**, 241–247.

Honts, C.R., Raskin, D.C. & Kircher, J. C. (1994). Mental and physical countermeasures reduce the accuracy of polygraph tes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9**, 252–259.

Honts, C.R., Raskin, D.C., Kircher, J.C. & Hodes, R.L. (1988). Effects of spontaneous countermeasures on the physiological detection of deception.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16**, 91–94.

Horowitz, S.W. (1991). Empirical support for 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 *Behavioral Assessment*, **13**, 293–313.

Horowitz, S.W. (1998). Reliability of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of child witness statements: response to Tully.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3**, 189–193.

Horowitz, S.W., Kircher, J.C., Honts, C.R. & Raskin, D.C. (1997). The role of comparison questions in physiological detection of deception. *Psychophysiology*, **34**, 108–115.

Horowitz, S.W., Lamb, M.E., Esplin, P.W., Boychuk, T.D., Krispin, O. & Reiter-Lavery, L. (1997). Reliability of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of child witness statements.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2**, 11–21.

Horowitz, S.W., Lamb, M.E., Esplin, P.W., Boychuk, T.D., Reiter-Lavery, L. & Krispin, O. (1996). Establishing ground truth in studi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Expert Evidence: The International Digest of Human Behaviour Science and Law*, **4**, 42–52.

Hunter, J.E., Gerbing, D.W. & Boster, F.J. (1982). Machiavellian beliefs and personality: construct invalidity of the Machiavellianism dimen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3**, 1293–1305.

Hurd, K. & Noller, P. (1988). Decoding deception: a look at the proces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2**, 217–233.

Iacono, W.G. & Lykken, D.T. (1997). The validity of the lie detector: two surveys of scientific opin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2**, 426–433.

Ickes, W. (1984). Compositions in black and white: determinants of interaction in interracial dya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330–341.

Inbau, F.E., Reid, J.E., & Buckley, J.P. (1986). *Criminal interrogation and confessions*. Baltimore, MD: Williams & Wilkins.

Jackson, J. (1996). *Truth or fantasy: the ability of barristers and laypersons to detect deception in children's testimon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P-LS Biennial Conference, Hilton Head Island, South Carolina, USA, March 1996.

Jones, D.P.H. & Krugman, R. (1986). Can a three-year-old child bear witness to her sexual assault and attempted murder?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0**, 253–258.

Jones, D.P.H. & McGraw, J.M. (1987). Reliable and fictitious accounts of sexual abuse to childre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 27–45.

Jones, D.P.H. & McQuinston, M. (1989). *Interviewing the sexually abused child*. London: Gaskell.

Johnson, M.K. (1988). Reality monitoring: an experimental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7**, 390–394.
Johnson, M.K. & Foley, M.A. (1984). Differentiating fact from fantasy: the reliability of children's memor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0**, 33–50.
Johnson, M.K. & Raye, C.L. (1981). Reality monitor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88**, 67–85.
Johnson, M.K. & Raye, C.L. (1998). False memories and confabula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 137–145.
Johnson, M.M. & Rosenfeld, P.J. (1991). Oddball-evoked p300-based method of deception detection in the laboratory. II. Utilization of non-selective activa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12**, 289–306.
Johnson, M.K. & Suengas, A.G. (1989). Reality monitoring judgments of other people's memories.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27**, 107–110.
Johnson, M.K., Foley, M.A., Suengas, A.G. & Raye, C.L. (1988). Phenomenal characteristics of memories for perceived and imagined autobiographical ev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7**, 371–376.
Johnson, M.K., Hashtroudi, S. & Lindsay, D.S. (1993). Source monitor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4**, 3–29.
Kalbfleisch, P. (1992). Deceit, distrust and the social milieu: application of deception research in a troubled world.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 308–334.
Kalbfleisch, P.J. (1994). The language of detecting deceit.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3**, 469–496.
Kalma, A., Witte, M. & Zaalberg, R. (1996). Authenticity: operationalization, manipulation, and behavioural components: an explanation. *Medium Psychologie*, **8**, 49–65.
Kashy, D.A. & DePaulo, B.M. (1996). Who l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037–1051.
Kassin, S.M. (1997). The psychology of confession evid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 221–233.
Kircher, J. C. & Raskin, D. C. (1988). Human versus computerized evaluations of polygraph data in a laboratory sett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3**, 291–302.
Kircher, J.C., Horowitz, S.W. & Raskin, D.C. (1988). Meta-analysis of mock crime studies of the control question polygraph technique.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2**, 79–90.
Kleinke, C.L. (1986). Gaze and eye contact: a research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0**, 78–100.
Kleinmuntz, B. & Szucko, J.J. (1982). On the fallibility of lie detection.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7**, 85–104.
Kleinmuntz, B. & Szucko, J.J. (1984). Lie detection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 call for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stud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766–776.
Kline, P. (1993). *The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New York: Routledge.
Knapp, M.L., Hart, R.P. & Dennis, H.S. (1974). An exploration of deception as a communication construct.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15–29.
Köhnken, G. (1985). Speech and deception of eyewitnesses: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In F. L. Denmark (Ed.),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17–139.
Köhnken, G. (1987). Training police officers to detect deceptive eyewitness statements. Does it work? *Social Behaviour*, **2**, 1–17.
Köhnken, G. (1989).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statement credibility: theories, paradigms and results. In H. Wegener, F. Lösel & J. Haisch (Eds), *Criminal*

behavior and the justice syste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71–289.

Köhnken, G. (1990). *Glaubwürdig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m psychologischen konstrukt*. Munich: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Köhnken, G. (1996).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law. In G. R. Semin & K. Fiedler (Eds),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57–282.

Köhnken, G. & Wegener, H. (1982). Zur Glaubwürdigkeit von Zeugenaussagen: Experimentelle Uberprüfung ausgewählter Glaubwürdigkeitskriterien (Credibility of witness statements: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selected reality criteria). *Zeitschrift für Experimentelle und Angewandte Psychologie*, **29**, 92–111.

Köhnken, G., Milne, R., Memon, A. & Bull, R. (in press).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Crime, and Law*.

Köhnken, G., Schimossek, E., Aschermann, E. & Höfer, E. (1995).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credibility of adults' statemen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0**, 671–684.

Koppelaar, L., Winkel, F.W. & Steen, J.C. van der (1986). Psychologische kanttekeningen bij art 27 Sv.: een experiment rond etnische origine, ritmisch gedrag en verdacht zijn. *Delikt en Delinkwent*, **16**, 25–38.

Krauss, R.M. (1981). Impression formation,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nonverbal behaviors. In E.T. Higgins, C.P. Herman & M.P. Zanna (Eds), *Social cognition: the Ontario Symposium*. Vol. 1. Hillsdale, NJ: Erlbaum, 323–341.

Kraut, R.E. (1978). Verbal and nonverbal cues in the perception of ly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380–391.

Kraut, R.E. (1980). Humans as lie detectors: some second though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 209–216.

Kraut, R.E. & Poe, D. (1980). On the line: the deception judgments of customs inspectors and laym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380–391.

Kuhlman, M.S. (1980). Nonverbal communications in interrogations.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49**, 6–9.

Lamb, M.E. (1998). Mea culpa but caveat emptor! Response to Tully.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3**, 193–195.

Lamb, M.E., Esplin, P.W. & Sternberg, K.J. (1995). Making children into competent witnesses: reactions to the Amicus Brief in re Michaels.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1**, 438–449.

Lamb, M.E., Hershkowitz, I., Sternberg, K.J., Esplin, P.W., Hovav, M., Manor, M. & Yudilevitch, L. (1996). Effects of investigative utterance types on Israeli children's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9**, 627–637.

Lamb, M.E., Sternberg, K.J. & Esplin, P.W. (1994).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statements made by young victims of sexual maltreatment.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 255–280.

Lamb, M.E., Sternberg, K.J., Esplin, P. W., Hershkowitz, I., Orbach, Y. & Hovav, M. (1997). Criterion-based content analysis: a field validation study.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1**, 255–264.

Lamb, M.E., Sternberg, K.J., Esplin, P.W., Hershkowitz, I. & Orbach, Y. (1997). Assessing the credibility of children's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 a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 175–194.

Lamers-Winkelman, F. (1995). *Seksueel misbruik van jonge kinderen: een onderzoek naar signalen en signaleren, en naar ondervragen en vertellen inzake seksueel misbruik*.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Lamers-Winkelman, F. & Buffing, F. (1996). Children's testimony in the Netherlands: a study of Statement Validity Analysis. In B. L. Bottoms & G. S. Goodman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ld abuse and children's testimony*. Thousand Oaks, CA: Sage, 45–62.

Landry, K. & Brigham, J.C. (1992). The effect of training in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on the ability to detect deception in adult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6**, 663–675.

Lane, J.D. & DePaulo, B.M. (1999). *Completing Coyne's cycle: dysphorics' ability to detect decep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3**, 311–329.

Larson, J.A. (1932). *Lying and its detection: a study of deception and deception test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vine, T.R. & McCornack, S.A. (1992). Linking love and lies: a formal test of the McCornack and Parks model of deception detec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9**, 143–154.

Levine, T.R. & McCornack, S.A. (1996a).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al adaptation explanation of the probing effect.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 575–588.

Levine, T.R. & McCornack, S.A. (1996b). Can behavioral adaptation explain the probing effect?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 604–613.

Levine, T.R., McCornack, S.A. & Aleman, C.G. (1997). *Ask and you shall believe: behavioral adaptation, confidence, and heuristic-based explanations of the probing effec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evine, T.R., McCornack, S.A. & Park, H.S. (1999). Accuracy in detecting truths and lies: documenting the 'veracity effec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6**, 125–144.

Lewis, M. (1993). The development of deception. In M. Lewis & C. Saarni (Eds), *Lying and deception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90–105.

Lindsay, D.S. & Johnson, M.K. (1987). Reality monitoring and suggestibility: children's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among memorie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S. J. Ceci, J. Toglia & D. F. Ross (Eds), *Children's eyewitness memor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91–121.

Littlepage, G.E. & Pineault, M.A. (1985). Detection of deception of planned and spontaneous communic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5**, 195–201.

Littmann, E. & Szewczyk, H. (1983). Zu einigen Kriterien und Ergebnissen forensisch-psychologischer Glaubwürdigkeitsbegutachtung von sexuell misbrauchte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Forensia*, **4**, 55–72.

Loftus, E.F. & Palmer, J.C. (1974). Reconstructions of automobile destruction: an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emory.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3**, 585–589.

Lord, C.G., Ross, L. & Lepper, M.R. (1979).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2098–2109.

Lykken, D.T. (1959). The GSR in the detection of guil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43**, 385–388.

Lykken, D.T. (1960). The validity of the guilty knowledge technique: the effects of fak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44**, 258–262.

Lykken, D.T. (1988). The case against polygraph testing. In A. Gale (Ed.), *The polygraph test: lies,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111–126.

Lykken, D.T. (1991). Why (some) Americans believe in the lie detector while others believe in 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 *Integrative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126**, 214–222.

Lykken, D.T. (1998). *A tremor in the blood: uses and abuses of the lie detector*. New York: Plenum Press.

McClintock, C.C. & Hunt, R.G. (1975). Nonverbal indicators of affect and deception in an interview setting.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 54–67.

McCornack, S.A. (1997). The generation of deceptive messages: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a viable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deception. In J.G. Greene (Ed.), *Message production: advance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Mahwah, N.J.: Erlbaum, 91–126.

McCornack, S.A. & Levine, T.R. (1990). When lovers become lee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spicion and accuracy in detecting deception.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7**, 219–230.

McCornack, S.A. & Parks, M.R. (1986). Deception detection and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the other side of trust. In M. McLaughli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9*. Beverly Hills, CA: Sage, 377–389.

McCornack, S.A. & Parks, M.R. (1990). What women know that men don't: sex differences in determining truth behind deceptive messag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7**, 107–118.

McCroskey, J.C. & Mehrley, S. (1969). The effects of disorganization and nonfluency on attitude change and source credibility. *Speech Monographs*, **36**, 13–21.

Mann, S., Vrij, A. & Bull, R. (1998). *Telling and detecting true l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n Psychology and Law in Cracow, Poland, September 1998.

Manstead, A.S.R., Wagner, H.L. & MacDonald, C.J. (1986). Deceptive and nondeceptive communications: sending experience, modality, and individual abilitie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0**, 147–167.

Manzanero, A.L. & Diges, M. (1996). Effects of preparation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mories. In G. Davies, S. Lloyd-Bostock, M. McMurran & C. Wilson (Eds), *Psychology,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56–63.

Markham, R. (1991). Development of reality monitoring for performed and imagined actions.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72**, 1347–1354.

Maxwell, G.M., Cook, M.W. & Burr, R. (1985). The encoding and decoding of liking from behavioral cues in both auditory and visual channel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9**, 239–264.

Mehrabian, A. (1972).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Aldine-Atherton.

Mei-tai Fan, R., Wagner, H.L. & Manstead, A.S.R. (1995). Anchoring, familiarity, and confidence in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83–96.

Memon, A. (1998). Telling it all: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In A. Memon, A. Vrij & R. Bull, *Psychology and law: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redibility*. Maidenhead: McGraw-Hill, 170–188.

Memon, A. & Bull, R. (1999).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interviewing*. Chichester: John Wiley.

Merckelbach, H.L.G.J. (1990). Leugendetector kan gevaarlijk zijn. *Intermediair*, **26**, 35–37.

Metts, S. (1989).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decep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6**, 159–179.

Millar, M.G. & Millar, K. (1995). Detection of deception in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persons: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restric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9**, 69–84.

Millar, M.G. & Millar, K. (1997). Effects of situational variables on judgments about deception and detection accuracy.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 401–410.

Miller, G.R., Bauchner, J.E., Hocking, J.E., Fontes, N.E., Kaminski, E.P. & Brandt, D.R. (1981). '...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In B. D. Sales (Ed.), *Perspectives in law and psychology. Vol. II: The trial process*. New York: Plenum, 145–179.

Miller, G.R., deTurck, M.A. & Kalbfleisch, P.J. (1983). Self-monitoring, rehearsal, and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 97–117.

Miller, G.R., Mongeau, P.A. & Sleight, C. (1986). Fudging with friends and lying to lovers: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495–512.

Milne, R. & Bull, R. (1999). *Investigative interviewing: psychology and practice*. Chichester: John Wiley.

Mitchell, R.W. (1986). A framework for discussing deception. In R.W. Mitchell & N.S. Mogdil (Eds), *Deception: perspectives on human and nonhuman decei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3–4.

Moston, S. (1987). The suggestibility of children in interview studies. *Child Language*, **7**, 67–78.

Mulder, M. & Vrij, A. (1996). Explaining conversation rules to children: an intervention study to facilitate children's accurate response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0**, 623–631.

Myers. B. & Arbuthnot, J. (1997). Polygraph testimony and juror judgments: a comparison of 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 and the control question test.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7**, 1421–1437.

Neisser, U. (1981). John Dean's memory: a case study. *Cognition*, **9**, 1–22.

Nigro, G.N., Buckley, M.A., Hill, D.E. & Nelson, J. (1989). When juries 'hear' children testify: the effects of eyewitness age and speech style on juror's perceptions of testimony. In S.J. Ceci, D.E. Ross & M.P. Toglia (Eds), *Perspectives on children's testimon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57–70.

Ofshe, R. (1989). Coerced confessions: the logic of seemingly irrational action. *Cultic Studies Journal*, **6**, 1–15.

O'Hair, H.D., Cody, M. & McLaughlin, M.L. (1981). Prepared lies, spontaneous lies, Machiavellianism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7**, 325–339.

Olsen, D.E., Harris, J.C., Capps, M.H. & Ansley, N. (1997). Computerized polygraph scoring system.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2**, 61–70.

O'Sullivan, M., Ekman, P. & Friesen, W.V. (1988). The effect of comparisons on detecting deceit.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2**, 203–216.

O'Toole, D., Yuille, J.C., Patrick, C.J. & Iacono, W.G. (1994). Alcohol and the physiological detection of deception: arousal and memory influences. *Psychophysiology*, **31**, 253–263.

Parham, I.A., Feldman, R.S., Oster, G.D. & Popoola, O. (1981).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nonverbal disclosure of decep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3**, 261–269.

Parker, J.F. (1995). Age differences in source monitoring of performed and imagined actions on immediate and delayed tes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60**, 84–101.

Patrick, C.J. & Iacono, W.G. (1991). Validity of the control question polygraph test: the problem of sampling bia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6**, 229–238.

Peters, D.P. (1991). The influence of stress and arousal on the child witness. In J. Doris (Ed.), *The suggestibility of children's re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0–76.

Podlesney, J.A. (1995). *A lack of operable case facts restricts applicability of the Guilty Knowledge Deception Detection Method in FBI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FBI Technical Report, Quantico, VA.

Poole, D.A. & White, L.T. (1991). Effects of question repetition and retention interval on the eyewitness testimony of children and adul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975–986.

Porter, S. & Yuille, J.C. (1996). The language of decei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verbal clues to deception in the interrogation contex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0**, 443–459.

Pynoos, R.S. & Eth, S. (1984). The child as witness to homicid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0**, 87–108.

Pynoos, R.S. & Nader, K. (1988). Children who witness the sexual assault of their moth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7**, 567–572.

Raskin, D.C. (1979). Orienting and defensive reflexes in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In H. D. Kimmel, E. H. Van Olst & J. F. Orlebeke (Eds), *The orienting reflex in humans*. Hillsdale, NJ: Erlbaum, 587–605.

Raskin, D.C. (1982).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polygraph techniques and their use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A. Trankell (Ed.),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Stockholm: Norsted & Soners, 317–371.

Raskin, D.C. (1986). The polygraph in 1986: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and legal issues surrounding acceptance of polygraph evidence. *Utah Law Review*, **29**, 29–74.

Raskin, D.C. (1988). Does science support polygraph testing? In A. Gale (Ed.), *The polygraph test: lies,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96–110.

Raskin, D.C. (1989). Polygraph techniques for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In D.C. Raskin (Ed.), *Psychological method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47–296.

Raskin, D.C. & Esplin, P.W. (1991a).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statements of sexual abuse. In J. Doris (Ed.), *The suggestibility of children's re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53–165.

Raskin, D.C. & Esplin, P.W. (1991b). 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 interview procedures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children's statements of sexual abuse. *Behavioral Assessment*, **13**, 265–291.

Raskin, D.C. & Hare, R.D. (1978). Psychopathy and detection of deception in a prison population. *Psychophysiology*, **15**, 126–136.

Raskin, D.C., Kircher, J.C., Horowitz, S.W. & Honts, C.R. (1989). Recent laboratory and field research on polygraph techniques. In J. C. Yuille (Ed,), *Credibility assessmen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24.

Raye, C.L. & Johnson, M.K. (1980). Reality monitoring vs. discrimination between external sources.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15**, 405–408.

Reid, J.E. (1947). A revised questioning technique in lie detection tests.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37**, 542–547.

Reid, J.E. & Inbau, F. E. (1977). *Truth and deception: the polygraph (lie detector) technique*. Baltimore, MD: Williams & Wilkins.

Reis, H. T., Senchak, M. & Solomon, B. (1985). Sex differences in the intimacy of social interaction: further examination of potential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1204–1217.

Riggio, R.E. (1986). Assessment of basic social skil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649–660.

Riggio, R.E. & Friedman, H.S. (198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ues to de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899–915.

Riggio, R.E., Tucker, J. & Throckmorton, B. (1988). Social skills and deception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3**, 568–577.

Roberts, K.P., Lamb, M.E., Zale, J.L. & Randall, D.W. (1998).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accounts of confirmed and unconfirmed incidents of sexual abu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Redondo Beach, March 1998.

Robinson, W.P., Shepherd, A. & Heywood, J. (1998). Truth, equivocation/concealment, and lies in job applications an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7**, 149–164.

Rockwell, P., Buller, D.B. & Burgoon, J.K. (1997). Measurement of deceptive voices: comparing acoustic and perceptual data.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8**, 471–484.

Roediger, H.L. (1996). Memory illusion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5**, 76–100.

Rosenfeld, P.J. (1995). Alternative views of Bashore and Rapp's (1993)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polygraphy: a critiqu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 159–166.

Rosenfeld, P.J., Angell, A., Johnson, M.M. & Qian, J. (1991). An ERP–based, control-question lie detector analog: algorithms for discriminating effects within individuals' average waveforms. *Psychophysiology*, **28**, 319–335.

Rosenfeld, J.P., Reinhart, A.M., Bhatt, M., Ellwanger, J., Gora, K., Sekera, M. & Sweet, J. (1998). P300 correlates of simulated malingered amnesia in a matching-to-sample task: topographic analyses of deception versus truthtelling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8**, 233–247.

Rosenthal, R. & DePaulo, B.M. (1979). Sex differences in eavesdropping on nonverbal cu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273–285.

Rosenthal, R. & Rubin, D.B. (1978). Interpersonal expectancy effects: the first 345 studi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 377–415.

Rowatt, W.C., Cunningham, M.R. & Druen, P.B. (1998). Deception to get a dat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4**, 1228–1242.

Rozelle, R.M. & Baxter, J.C. (1975). Impression formation and danger recognition in experienced police officer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6**, 53–63.

Rozelle, R.M. & Baxter, J.C. (1978). The interpretation of nonverbal behavior in a role-defined interaction sequence: the police-citizen encounter.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Nonverbal Behavior*, **2**, 167–181.

Ruby, C.L. & Brigham, J.C. (1997). The usefulness of the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technique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ruthful and fabricated allegations.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3**, 705–737.

Ruby, C.L. & Brigham, J.C. (1998). Can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distinguish between true and false statements of African-American speaker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2**, 369–388.

Ruva, C. & Bryant, J.B. (1998). *The impact of age, speech style, and question form on perceptions of witness credibility and trial outcom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P-LS Biennial Conference, Redondo Beach, March 1998.

Saarni, C. (1984).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children's attempts to monitor their expressive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55**, 1504–1513.

Saxe, L. (1991). Science and the GKT polygraph: a theoretical critique. *Integrative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6**, 223–231.

Saxe, L. (1994). Detection of deception: polygraph and integrity test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69–73.

Schneider, S.M. & Kintz, B.L. (1977). The effect of lying upon foot and leg movement.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10**, 451–453.

Schooler, J.W., Gerhard, D. & Loftus, E.F. (1986). Qualities of the unre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2**, 171–181.

Siegman, A.W. & Reynolds, M.A. (1983). Self-monitoring and speech in feigned and unfeigned ly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1325–1333.

Sleek, S. (1998). Psychologists debate merits of the polygraph. *Monitor*, **June**, 30.

Smith, A. (1983).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mong black female dyads: an assessment of intimacy, gender and ra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9**, 55–67.

Smith, H.J., Archer, D. & Costanzo, M. (1991). 'Just a hunch': accuracy and awareness in person percep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5**, 3–19.

Soppe, H.J.G. (1995a). Getuigenissen van kinderen in zedenzaken 1: De herinnering van kinderen en hoe hen te horen. *De Psycholoog*, **30**, 213–219.

Soppe, H.J.G. (1995b). Getuigenissen van kinderen in zedenzaken 2: Bepaling van de geloofwaardigheid. *De Psycholoog*, **30**, 261–265.

Soppe, H.J.G. (1997). Het verhoren van kinderen in zedenzaken. In P. J. Van Koppen, D. J. Hessing & H. F. M. Crombag (Eds), *Het hart van de zaak: Psychologie van het recht*. Deventer: Kluwer, 352–376.

Soppe, H.J.G. & Hees-Stauthamer, J.C. (1993). De geloofwaardigheid van getuigenissen van jeugdige slachtoffers van zedenmisdrijven. *Tijdschrift voor Ontwikkelingspsychologie*, **20**, 1–25.

Sporer, S.L. (1997). The less traveled road to truth: verbal cues in deception detection in accounts of fabricated and self-experienced event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1**, 373–397.

Steller, M. (1989).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tatement analysis. In J. C. Yuille (Ed.), *Credibility assessment*. Deventer: Kluwer, 135–154.

Steller, M. & Boychuk, T. (1992). Children as witnesses in sexual abuse cases: investigative interview and assessment techniques. In H. Dent & R. Flin (Eds), *Children as witnesses*. New York: John Wiley, 47–73.

Steller, M. & Köhnken, G. (1989).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In D.C. Raskin (Ed.), *Psychological method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17–245.

Steller, M. & Wellershaus, P. (1996). Information enhancement and credibility assessment of child statements: the impact of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on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In G. Davies, S. Lloyd-Bostock, M. McMurran & C. Wilson (Eds), *Psychology,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Berlin: de Gruyter, 118–127.

Steller, M., Haenert, P. & Eiselt, W. (1987). Extraversion and the detection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1**, 334–342.

Steller, M., Wellershaus, P. & Wolf, T. (1988).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O Advanced Study Institute on Credibility Assessment in Maratea, Italy, June 1988.

Sternberg, K.J., Lamb, M.E., Hershkowitz, I., Esplin, P.W., Redlich, A. & Sunshine, N. (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igative utterance types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child witnesse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7**, 439–451.

Sternberg, K.J., Lamb, M.E., Hershkowitz, I., Yudilevitch, L., Orbach, Y., Larson, C., Esplin, P.W. & Hovav, M. (in press). Effects of introductory style on children's abilities to describe experiences of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Stiff, J.B. & Miller, G.R. (1986). 'Come to think of it...': interrogative probes,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and deception detec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 339–357.

Stiff, J.B., Corman, S., Krizek, B. & Snider, E. (199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nonverbal behavior: unmasking the changing faces of decep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555–581.

Stiff, J.B., Hale, J.L., Garlick, R. & Rogan, R. (1990). Effect of cue incongruence and social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individual judgments of honesty and deceit.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55**, 206–229.

Stiff, J.B., Kim, H.J. & Ramesh, C.N. (1992). Truth biases and aroused suspicion in relational decep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 326–345.

Stiff, J.B., Miller, G.R., Sleight, C., Mongeau, P., Garlick, R. & Rogan, R. (1989). Explanations for visual cue primacy in judgments of honesty and decei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555–564.

Streeter, L.A., Krauss, R.M., Geller, V., Olson, C. & Apple, W. (1977). Pitch changes during attempted de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4**, 12–21.

Suengas, A.G. & Johnson, M.K. (1988). Qualitative effects of rehearsal on memories for perceived and imagined complex ev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7**, 377–389.

Taylor, R. & Vrij, A. (1999). *The effects of varying stake and cognitive complexity on beliefs about the cues to deception*.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Toris, C. & DePaulo, B.M. (1985). Effects of actual deception and suspiciousness of deception on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1063–1073.

Trankell, A. (1972). *Reliability of evidence*. Stockholm: Beckmans.

Tully, B. (1998). Reliability of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of child witness statements: Cohen's kappa doesn't matter.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3**, 183–188.

Undeutsch, U. (1967). Beurteilung der Glaubhaftigkeit von Aussagen. In U. Undeutsch (Ed.), *Handbuch der Psychologie. Vol. 11. Forensische Psychologie*. Göttingen: Hogrefe, 26–181.

Undeutsch, U. (1982). Statement reality analysis. In A. Trankell (Ed.),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the role of psychologists in criminal trials*. Deventer: Kluwer, 27–56.

Undeutsch, U. (1984). Courtroom evaluation of eyewitness testimon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Psychology*, **33**, 51–67.

Undeutsch, U.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ment reality analysis. In J. C. Yuille (Ed.), *Credibility assessment*. Dordrecht: Kluwer, 101–121.

Van Koppen, P.J., Boelhouwer, A.J.W., Merckelbach, H.L.G.J. & Verbaten, M.N. (1996). *Leugendetectie in actie: Het gebruik van de polygraaf in de praktijk*. Leiden: Nederlands Studiecentrum Criminaliteit en Rechtshandhaving.

Van Rossum, W. (1998). *Verschijnen voor de rechter: Hoe het hoort en het ritueel van Turkse verdachten in de rechtszaal*. Amsterdam: Uitgeverij duizend en een.

Volbert, R. & Van der Zanden, R. (1996). Sexual knowledge and behavior of children up to 12 years: what is age-appropriate? In G. Davies, S. Lloyd-Bostock, M. McMurran & C. Wilson (Eds), *Psychology,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Berlin: de Gruyter, 198–216.

Vrij, A. (1991). *Misverstanden tussen politie en allochtonen: Sociaal-psychologische aspecten van verdacht zijn*.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Vrij, A. (1993a). Credibility judgments of detectives: the impact of nonverbal behavior, social skills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n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3**, 601–611.
Vrij, A. (1993b). *Students, prisoners and professional lie detectors' beliefs about verbal correlates of deception*. Unpublished data.
Vrij, A. (1994).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setting on detection of deception by police detective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8**, 117–137.
Vrij, A. (1995).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deception in a simulated police interview.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129**, 15–29.
Vrij, A. (1996). De rechercheur als leugendetector: Een overzicht van onderzoeken nar nonverbaal gedrag en misleiding. *Modus: Tijdschrift voor Recherche en Forensische Wetenschappen*, **5**, 4–9.
Vrij, A. (1997a). *Detecting lies in partners, friends and strangers*. Unpublished data.
Vrij, A. (1997b).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lf-oriented and other-oriented lies*. Unpublished data.
Vrij, A. (1998a). Interviewing suspects. In A. Memon, A. Vrij & R. Bull, *Psychology and law: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redibility*. Maidenhead: McGraw-Hill, 124–146.
Vrij, A. (1998b). Telling and detecting lies: some future directions in research. *Forensic Update*, **54**, 14–19.
Vrij, A. (1998c). To lie or not to lie. *Psychologie*, **17**, 22–25.
Vrij, A. & Akehurst, L. (1996). *Hand movements during deception: some recent insigh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Law. Italy, Sienna, August 1996.
Vrij, A. & Akehurst, L. (1998). 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credibility: 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 In A. Memon, A. Vrij & R. Bull, *Psychology and law: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redibility*. Maidenhead: McGraw-Hill, 3–31.
Vrij, A. & Bull, R. (1992). *Beliefs about verbal correlates of deception: British students*. Unpublished data.
Vrij, A. & Fischer, A. (1995).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simulated rape interviews.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10**, 64–67.
Vrij, A. & Graham, S. (1997).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liars and the ability to detect lies. *Expert Evidence: The International Digest of Human Behaviour Science and Law*, **5**, 144–148.
Vrij, A. & Heaven, S. (1999). Vocal and verbal indicators of deception as a function of lie complexity. *Psychology, Crime and Law*, **5**, 203–215.
Vrij, A. & Holland, M. (1999).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ersistence in lying and experiences while deceiv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3**, 299–308.
Vrij, A. & Lochun, S. (1997). Neuro-linguïstisch verhoren. In P. J. Van Koppen, D. J. Hessing & H.F.M. Crombag (Eds), *Het hart van de zaak: Psychologie van het recht*. Deventer: Kluwer, 493–505.
Vrij, A. & Mann, S. (in press). *Lying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deceptive behavior of a murderer during his police interview*.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Vrij, A. & Mann, S. (1999). *Who killed my relative? Police officers' ability to detect real-life high-stake lies*.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Vrij, A. & Semin, G.R. (1996). Lie experts' beliefs about nonverbal indicators of decep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0**, 65–80.
Vrij, A. & Taylor, R. (1999). *Police officers' and students' beliefs about telling and detecting little and serious lies*.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Vrij, A. & Van Wijngaarden, J.J. (1994). Will truth come out? Two studies about the detection of false statements expressed by children. *Expert Evidence: The International Digest of Human Behaviour, Science and Law*, **3**, 78–84.

Vrij, A. & Winkel, F.W. (1990). Culturele verschillen in spreekstijl van Surinamers en Nederlanders: De relatie tussen 'zakelijkheid' en 'misleiding' bij een politieverhoor. *Recht der Werkelijkheid*, **11**, 3–15.

Vrij, A. & Winkel, F.W. (1991). Cultural patterns in Dutch and Surinam nonverbal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simulated police/citizen encounter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5**, 169–184.

Vrij, A. & Winkel, F.W. (1992a). Crosscultural police–citizen interactions: the influence of race, beliefs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on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2**, 1546–1559.

Vrij, A. & Winkel, F.W. (1992b). Social skills, distorted perception and being suspect: studies in impression form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deceive.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8**, 2–6.

Vrij, A. & Winkel, F.W. (1994). Perceptual distortions in cross-cultural interrogations: the impact of skin color, accent, speech style and spoken fluency on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5**, 284–296.

Vrij, A., Akehurst, L. & Morris, P.M. (1997).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and movements during decep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1**, 87–102.

Vrij, A., Akehurst, L., Van Dalen, D., Van Wijngaarden, J.J. & Foppes, J. H. (1996). Nonverbaal gedrag en misleiding. *Tijdschrift voor de Politie*, **58**, 11–14.

Vrij, A., Dragt, A.W. & Koppelaar, L. (1992). Interviews with ethnic interviewees: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errors in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 199–209.

Vrij, A., Edward, K., Roberts, K.P. & Bull, R. (1999). *Detecting deceit via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Reality Monitoring and analyses of nonverbal behaviou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Law, Dublin, Ireland, July 1999.

Vrij, A., Foppes, J.H., Volger, D.M. & Winkel, F.W. (1992). Moeilijk te bepalen wie de waarheid spreekt: Non-verbaal gedrag belangrijkste indicator. *Algemeen Politie Blad*, **141**, 13–15.

Vrij, A., Kneller, W. & Mann, S. (in press). The effect of informing liars about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on their ability to deceive CBCA raters.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Vrij, A., Semin, G.R. & Bull, R. (1996). Insight in behavior displayed during decep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 544–562.

Vrij, A., Winkel, F.W. & Akehurst, L. (1997). Police officers' incorrect beliefs about nonverbal indicators of decep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J. F. Nijboer & J. M. Reijntje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New Trend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Lelystad: Koninklijke Vermande, 221–238.

Vrij, A., Winkel, F.W. & Koppelaar, L. (1988). Culturele verschillen in nonverbaal gedrag: De persoonlijke ruimte van Nederlanders en Surinamers. *Migrantenstudies*, **4**, 40–49.

Vrij, A., Winkel, F.W. & Koppelaar, L. (1991). Interactie tussen politiefunctionarissen en allochtone burgers: twee studies naar de frequentie en het effect van aan-en wegkijken op de impressieformatie. *Nederlands Tijdschrift voor de Psychologie*, **46**, 8–20.

Wagenaar, W.A. & Groeneweg, J. (1990). The mem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4**, 77–87.

Walkley, J. (1985). Reading the suspect. *Police Review*, **93**, 337–340.

Walters, S.B. (1996). *Kinesic interview and interrogation*.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Waltman, J.L. (1983).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interrogation: some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ce and Science Administration*, **11**, 166–169.

Watson, D.C. & Sinka, B.K. (199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ocial arousal and the electrodermal detection of decep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 75–80.

Wells, G.L. & Leippe, M.R. (1981). How do triers of fact infer accuracy of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Using memory of peripheral details can be mislead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6**, 682–687.

Wells, G.L. & Loftus, E.F. (1991). Commentary: is this child fabricating? Reactions to a new assessment technique. In J. Doris (Ed.), *The suggestibility of children's re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68–171.

West, I. (1992). *Decision-making in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ritish Psychology Society, Division of Criminological and Legal Psychology. Harrogate, March 1992.

Westcott, H.L., Davies, G.M. & Clifford, B.R. (1991). Adults'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videotaped truthful and deceptive statements. *Children and Society*, **5**, 123–135.

Wilson, D.S., Near, D.C. & Miller, R.R. (199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Machiavellianism as a mix of cooperative and exploitative strategie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19**, 203–212.

Winkel, F.W. & Vrij, A. (1995). Verklaringen van kinderen in interviews: Een experimenteel onderzoek naar de diagnostische waarde van Criteria Based Content Analysis. *Tijdschrift voor Ontwikkelingspsychologie*, **22**, 61–74.

Winkel, F.W., Vrij, A., Koppelaar, L. & Van der Steen, J. (1991). Reducing secondary victimisation risks and skilled police interventio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police rape victim encounters through training programmes.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7**, 2–11.

Woodall, W.G. & Burgoon, J.K. (1983). Talking fast and changing attitudes: a critique and clarifica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8**, 126–143.

Young, M.J. & deTurck, M.A. (1996). *The effects of stress and coping on truthful and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Yuille, J.C. (1988a). *A simulation study of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O advanced study institute on credibility assessment, Maratea, Italy, June 1988.

Yuille, J.C. (1988b). The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testimony. *Canadian Psychology*, **29**, 247–262.

Yuille, J.C. & Cutshall, J. (1989). Analysis of statements of victims, witnesses, and suspects. In J.C. Yuille (Ed.), *Credibility assessment*. Dordrecht: Kluwer, 175–191.

Zaparniuk, J., Yuille, J.C. & Taylor, S. (1995). Assessing the credibility of true and false stat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18**, 343–352.

Zuckerman, M. & Driver, R.E. (1985). Telling lies: verbal and nonverbal correlates of deception. In A.W. Siegman & S. Feldstein (Eds), *Multichannel integrations of nonverbal behavior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29–147.

Zuckerman, M., DeFrank, R.S., Hall, J.A., Larrance, D.T. & Rosenthal, R. (1979). Facial and vocal cues of deception and hones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5**, 378–396.

Zuckerman, M., DePaulo, B.M. & Rosenthal, R. (1981).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of deception.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57.

Zuckerman, M., Koestner, R. & Alton, A.O. (1984). Learning to detect de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519–528.

Zuckerman, M., Koestner, R. & Colella, M.J. (1985). Learning to detect deception from thre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9**, 188–194.

Zuckerman, M., Koestner, R. & Driver, R. (1981). Beliefs about cues associated with decep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6**, 105–114.

作者简介

阿德顿·维吉(Aldert Vrij,1960 年出生)是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心理系应用社会心理学高级讲师。他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欺骗,尤其是非言语行为与欺骗的关系的文章。他最新的著作也是关于言语内容与欺骗的。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获得了好几项研究资助。他目前从事的研究是关于嫌疑人在接受警察询问时的行为,这一研究由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并且,他关于言语内容与欺骗的关系的研究也获得了来自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与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阿德顿也是法院公认的专家证人。